

中共榆林历史

(1919—1949)

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编 任德存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榆林历史

(1919——1949)

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编 任德存

陕西人民出版社

顾问：周一波 王登记

《中共榆林历史》编委会

主任：李 涛

副主任：刘培仓 邢解放 任德存

审稿：任德存 白泽生 郭向军 钟自鸣

主 编：任德存

副主编：白泽生 郭向军

执行编辑：钟自鸣

撰稿：薛生德 赵旭东 陈世荣 钟自鸣

李永清 乔兴继

特邀审稿：贾自新 乔兴继

编辑说明

一、《中共榆林历史》(第一卷)以中共榆林党组织建立和发展为主线,以陕北红军游击队、陕北地方武装和各级政权的建立、发展为辅线,真实、全面、客观地记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榆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既是革命史,又是发展史,是了解榆林、研究近、现代榆林历史的通俗读本,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青少年进行爱党、爱国、爱家乡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本书以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准则,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和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力求反映历史原貌,具有真实性、史料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三、书中的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国际计量单位,一些地方沿用了当时的习惯用法(如石、斗、升等)。

四、本书所用地名、机构、文件、会议等名称采用历史称谓,必要时加注现称。地名、属地的变更随后加括号作了说明,所述史实,力求保持历史原貌,一般不加评论。

五、本书的收录范围以榆林市现辖区为准,对于时属榆林、现属毗邻地区成立的机构,发生的事件,不作叙述。如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25支游击队,延安现辖区内有6支(十六至二十支队,安塞十二支队),本书只记述建立在榆林现辖区的游击队。其中有四支游击队番号相重(绥德十二支队、安塞十二支队,吴堡十五支队,米东十五支

队)。

六、附录中的中共中央委员按当选时间排列,将军按所属籍贯排列。

七、本书参考了已经出版发行的《辛亥革命在陕西》、《国民革命在陕西》、《中共榆林地区组织史资料》、《陕北革命根据地》、《神府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榆林国统区》、《陕甘宁边区史》、《榆林和平解放》、《红日照陕北》、《中国共产党榆林地区历史大事记》、《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西北革命根据地史》等书籍,及《榆林党史资料通讯》、各县和本军征集到的档案资料。

目 录

第一编 中共榆林组织在大革命时期

(1919年5月—1927年7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榆林的影响及早期传播	(2)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榆林的社会状况	(2)
第二节 五四运动在榆林的影响	(6)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榆林的早期传播	(11)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榆林的早期组织	(14)
第一节 中共绥德特别支部和绥德地委	(14)
第二节 团在绥德的早期组织	(21)
第三节 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	(23)
第三章 榆林早期党团组织开展的国民革命运动	(27)
第一节 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	(27)
第二节 开展“驱吴”和声援五卅惨案运动	(30)
第三节 学生青年运动的兴起	(33)
第四节 农民工人运动高涨	(37)
第五节 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	(42)

- 第六节 支持国共合作的陕西省新政权…………… (44)
- 第七节 反对新军阀蒋介石 声讨奉系军阀
张作霖…………… (48)

第二编 中共榆林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 第四章 榆林初期的土地革命战争…………… (54)
 -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榆林的政治形势…………… (54)
 - 第二节 中共陕北特委成立…………… (59)
 - 第三节 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68)
 - 第四节 艰难曲折的兵运工作…………… (74)
 - 第五节 排除干扰 摸索前进…………… (83)
- 第五章 陕北游击战争的兴起和发展…………… (94)
 - 第一节 中共陕北特委的三次重要会议…………… (94)
 - 第二节 工农武装的初步发展…………… (101)
 - 第三节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共陕北特委
寺圪里会议…………… (107)
 - 第四节 陕北红军的创建和游击武装的壮大…………… (113)
 - 第五节 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和第二次反“围剿”
的胜利…………… (121)
 - 第六节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共陕甘晋
省委成立…………… (132)

第六章 根据地的开辟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42)

第一节 陕北根据地的开辟和西北

根据地的形成 (142)

第二节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和

西北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 (150)

第三节 彻底粉碎第三次“围剿” (154)

第七章 根据地的建设 (165)

第一节 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工作 (165)

第二节 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教育工作 (170)

第三节 巩固榆林苏区 (177)

第三编 中共榆林组织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八章 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

第一节 榆林的两个抗日行政区域 (19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榆林的组织 (197)

第三节 共产党对榆林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200)

第四节 坚持团结 反对摩擦 (208)

第九章 国共合作 保卫河防 (217)

第一节 建立和扩大抗日人民武装 (217)

第二节	抗敌后援会的成立及活动	(222)
第三节	抗击日军 保卫河防	(227)
第十章	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234)
第一节	政治建设	(234)
第二节	经济建设	(247)
第三节	文化建设	(268)
第四节	张闻天等在榆林解放区的调查研究与 晋绥边区领导机关在神府	(277)

第四编 中共榆林组织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十一章	争取和平 准备自卫战争	(290)
第一节	进行和平劳动建设的榆林解放区	(290)
第二节	三边新解放区的形成	(300)
第三节	榆横新解放区的形成	(304)
第四节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	(312)
第十二章	坚持自卫战争 保卫榆林解放区	(321)
第一节	国民党军大举进犯榆林解放区	(321)
第二节	中共中央转战在榆林	(324)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党政领导机关在榆林	(331)
第四节	西北野战军在榆林解放区进行的重大 战役和新式整军运动	(335)

第五节	榆林解放区的生产救灾和支前工作	…	(344)
第十三章	进行外线作战 解放榆林国统区	……	(352)
第一节	两次攻打榆林城受挫	……………	(352)
第二节	解放神府国统区	……………	(358)
第三节	和平解放榆林县国统区	……………	(362)
第四节	榆林全境解放后的三个分区	……………	(368)
第五节	恢复战争创伤 支援解放大西北	……	(372)
附录一	榆林各分区书记一览表	……………	(377)
附录二	榆林籍中共中央委员	……………	(381)
附录三	榆林籍将军	……………	(391)
后 记	……………		(403)

第一编

中共榆林组织 在大革命时期

(1919年5月—1927年7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 榆林的影响及早期传播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榆林的社会状况

一、榆林的地理概况

辛亥革命前,陕北的北部设绥德直隶州和榆林府,分辖 12 个县。辛亥革命后的 1913 年,民国政府废除府州制,在陕北设置榆林道,下辖陕北各县,治所在榆林。榆林道所属的府谷、神木、榆林、佳县、米脂、绥德、吴堡、清涧、横山县、定边、靖边县的大部,安定县的一部,即为今榆林市的管辖区域。

榆林位于北纬 $36^{\circ}57'$ —— $39^{\circ}34'$,东经 $107^{\circ}28'$ —— $111^{\circ}15'$ 之间,地域呈三角形。它的东部以黄河为界与山西省毗邻;北部与绥远特别区(今内蒙古自治区)接壤;西部与甘肃省(今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相连;南部与延安相邻。东西最长 309 公里,南北最宽 295 公里。明朝修筑的长城,在境内东西延绵 700 多公里。

榆林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地貌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北部以长城为界,为风沙草滩区,属毛乌素沙漠南缘,沙丘连绵起伏,滩地、海子星罗棋布,地势平缓;南部为丘

陵沟壑区,梁峁跌宕、沟壑纵横,“七沟八梁一面坡”便是它的真实写照;西南部白于山区一带为梁状低山丘陵区,黄土厚积,梁塬广阔,梁涧交错。

榆林境内河川广布,黄河沿东界南下,蜿蜒 270 公里,还有“四河四川”。四河即:无定河、窟野河、秃尾河和佳芦河,均注入黄河;四川为:皇甫川、清水川、孤山川和石马川。四条河中,无定河的流域最长,水量最大,它发源于白于山,由西而北而东而南,注入黄河,境内流长 489 公里。

榆林境内居住着汉、回、蒙、苗、满、藏等十多个民族,民国初年总人口 80 余万。这里春季干旱,飞沙走石,尘土蔽日,夏秋则暴雨频颐,河川洪泛,泥沙俱下,毁田损屋,因为自然灾害长期侵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二、榆林的政局

1911 年 10 月武昌首义,全国爆发辛亥革命。10 月 22 日西安起义,27 日以张凤翔为大统领的“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

11 月 22 日,清政府的榆林驻军在杨昆山的领导下起义,推翻了榆林的清政权。成立“秦陇复汉军榆林洪汉军”,并派兵神木、府谷、佳县和怀远县(后名横山)等地,扩大革命成果。后来由于起义军内讧和政局的动荡,杨昆山惨遭杀害。1914 年袁世凯委派心腹陆建章,率军入潼关,取代陕西都督张凤翔主政陕西。陆建章部的刘国栋、商震分别率军驻榆林、绥德,把持陕北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投靠陆建章的陕军头目、原同盟会盟员陈树藩,委派陕西第一混成旅营长井岳秀(字崧生,陕西蒲城人)带兵来榆林,

驻防半年。1916年，陈树藩继陆建章主持陕政。驻守榆林的刘国栋率部出逃，驻防绥德的商震率部退往山西投靠阎锡山。同年8月，陈树藩委派已升任团长的井岳秀第二次入驻榆林。从此，开始了井岳秀对陕北二十余年的反动统治。

井岳秀进驻榆林后，就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军阀统治。他为了寻求政治靠山，到山西拜阎锡山为干父，并通过阎锡山去北京晋见了曹锟、吴佩孚等人，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1917年5月，井岳秀被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陕北镇守使。阎锡山也利用井岳秀作外围屏障，先后送给他一批枪炮弹药和锅炉、机器、钢材，派遣技术人员帮助他建立起军工厂，制造枪炮弹药，后因质量低劣，改为修械所。阎锡山还派出一批军官学校毕业生，帮助井岳秀成立军官训练团，培训军官。

井岳秀为了巩固其军阀政权，勾结地方豪绅，扩充武装，编练民团，实行封建武装割据。他将所属军队以营、连或排为单位派驻陕北各县，操纵那里的政治经济大权，肆意征粮收税，拉丁派捐。同时，又和地方恶势力、土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无恶不作。

井岳秀为了保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满足其奢侈生活的耗费及向上级官僚的贿赂费用，不仅向陕北人民严征所谓的烟亩捐、驼捐、斗捐、羊圈捐、屠宰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一手把持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开设“井记”商店，垄断畜产品出口。勾结、拉拢地方豪绅，大肆放种鸦片，强征税捐。“头上三把刀，苛捐、重税、利息交”的民谚，即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民国初年,陕北连年灾荒,加之战乱频繁,盗贼蜂起,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农民为谋求生存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而地主、富农则趁机掠夺兼并大批良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广大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处于租种土地,出卖劳力和借高利贷来维系生存的境地。在井岳秀集团对人民横征暴敛下,为富不仁的地主更采用高额收取地租和放高利贷两种盘剥方式,对农民进行肆无忌惮、敲骨吸髓般的剥削。地租有“四六”(即全年收成农民得四成,地主收六成)及“对半分”等;高利贷的盘剥,一般是月息三分,还有“驴打滚”(到期不还,利息加倍)。贫苦农民既要交地租和债利,又要承担名目繁多的捐税,一年辛勤劳作,所剩无几。每遇灾年,许多人因无力还租交债,而被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井岳秀为了强化其军阀统治,还操纵了陕北的文化教育事业。他豢养指使学阀,在思想文化上尊孔尚礼,在教育上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榆林城内的各中、小学校,教师均是前清的秀才、举人等封建老学究,教学沿袭旧制,惟读四书,不及其他,学校政治空气极为闭塞。井岳秀还利用神权,愚昧麻痹人民。1919年,他倡议在青云山兴建庙宇,借此大量搜刮民财。修庙共役使民工数十万人次,耗费银洋8.4万余元,铜钱2万多吊,粮20万~30万石之多。

井岳秀为标榜其在陕北的“功绩”,1922年7月,授意其心腹及一些地方绅士向各县勒索银洋4万元,在榆林城大街中心为其建生祠(名为“长春楼”)铸铜像。工程兴建中受到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特别是一些进步报刊的猛烈抨击,被迫改建为钟楼。但建成后,仍在楼顶阁内悬挂井的画

像，设置长生禄位木牌。后来又在南关阁的偏殿上，雕塑了井的泥像。榆林解放后，这些东西才被摧毁。

在井岳秀反动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重压盘剥下，陕北的经济形势日趋严峻，阶级矛盾也随之尖锐化。绝望中的民众奋起抗争，各地的抗粮、抗捐、抗税等反井斗争，此起彼伏。陕北的革命斗争，就在这种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和发展了起来。

第二节 五四运动在榆林的影响

一、五四运动中的陕西旅京学生

1919年的五六月间，在北京、天津求学的陕西大学生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其中绥德籍学生李子洲和户县籍学生杨明轩，是五四北京学生爱国斗争中有名的闯将。

李子洲是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的干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联合会负责总务股工作的领导人，北京学生五四集会游行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杨明轩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少年中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带领以“少年中国会”成员为骨干的北高师学生队伍，高举“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遗臭千古，北京学界同挽”的白布挽联，浩浩荡荡到天安门前参加北京学生五四爱国集会，十分引人注目。

李子洲和杨明轩，又是火烧卖国贼北洋政府外交部长曹汝霖住宅，痛打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的领头人物。杨明

轩并两次被捕入狱。

6月27日,北京、天津、山东、陕西等地的数百名学生代表集会新华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接见学生,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李子洲是这次斗争的组织者之一,他鼓动同学们“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坚持到底,才能胜利。”在场带领同学们呼口号的杨明轩,当得知陕西学联代表屈武,在中南海勤政殿以头撞壁,血溅总统府,向徐世昌泣陈学生爱国要求时,激愤异常,振臂高呼:“现在国之将亡,种之将灭,代表已献躯身,难道我们还能静坐长等?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宁愿血溅新华门。”

后来,李子洲和杨明轩,以及在京参加五四运动的陕籍大学生魏野畴、呼延震东、耿炳光等,或是到榆林、绥德从事教育事业,或是来进行其他工作,都对榆林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杜斌丞以榆林中学为基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辛亥革命后,全国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及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但地处偏远的榆林,依然是文化落后,消息闭塞的旧局面,陕北23县仅有的一所省立榆林中学,仍然沉迷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之中。

1917年秋,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米脂籍青年杜斌丞,受北京大学校长、文化泰斗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影响,不恋京华烟云,毅然回到荒凉的故乡,“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杜斌丞语),就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次年,担任榆中校长后,他顶住

各方面压力，力除陈规，锐意革新旧的教学体制。他四处联系，选贤任能，诚聘杜斗垣、李鼎铭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人士任教。他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杜斌丞在开学典礼上宣布：榆中的办学宗旨是德、智、体三育并重。他说，德的核心是要努力学习，将来致力于救国救民，经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在智育方面，他引导学生既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又学习世界近代的科学技术，主张“兼容并蓄”，要求学生努力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提倡科学实验，注重社会实践。为此他多方筹措资金，扩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采集标本，进行教学实验。在体育方面，杜斌丞亦很重视。他说：“个人身体羸弱不堪，成了陈独秀说的‘蒲柳之姿’，即使学习再好，又能对祖国有何贡献呢？”

五四运动爆发后，榆林中学进步师生率先响应。杜斌丞以坚定的立场和明确的态度，向学校师生全面介绍了五四运动。支持学生组成宣讲团，分批上街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到商店检查日货。古文教师杜斗垣还写了一篇《讨倭奴檄》，慷慨激昂，情感奔放。在榆林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1921年7月，榆中第一届学生（甲乙两班）毕业，杜斌丞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盛赞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民主革命的潮流已经席卷全球，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有了希望，反动军阀统治的日子不会很

长了。他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多关心政治,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人。这一届毕业的 52 名学生中,18 人考入北京等地的大学,7 人进入军事学校,其余都在陕北各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1923 年春,杜斌丞先后从北京、天津等地聘请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大学毕业生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到榆林中学任教。这些人到榆林后,积极宣传民主思想,大胆改革教学内容,提倡白话文。在教材内容上,由过去的只学四书五经,改为大量选用《新青年》、《独秀文选》、《向导》等书刊上的文章和鲁迅、蔡元培、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还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讲座,使广大学生的眼界大为开阔,不但了解了国内形势,也知道了外国历史及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活跃学习气氛,宣传进步思想,榆中师生结合教学,成立了以刘志丹为主席的学生自治会及青年学社、青年文学研究会、陕北教育改进会等进步团体,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学术、时局讨论,引导学生要“讲民主,反封建;讲科学,反迷信;宣传新思想,反对旧思想。”他们还创办了《榆中旬刊》、《榆林之花》、《榆钟》等刊物并向全国发行。

杜斌丞主教的榆林中学,成了陕北学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阵地。

三、《秦钟》和《共进》杂志在榆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政治运动。全国各地进步青年纷

纷成立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思想。

《秦钟》月刊,是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编辑,1920年1月20日创刊的,6月20日停刊,共出版6期。它的编辑宗旨是:(一)唤起陕人自觉心;(二)介绍新知识于陕西;(三)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因此,它发表的文章,主要以宣传民主、科学、个性解放、女子解放、平民教育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内容,此外还发表了一些陕西社会调查、军阀统治下陕西人民痛苦生活的写照以及抨击军阀政府某项政治措施的文章。李子洲是《秦钟》月刊的发行者,并为筹办刊物捐银洋一元。榆林中学杜斌丞、绥德高等小学汪少洋,是《秦钟》在陕北的代售者。

《共进》半月刊,是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等旅京大学生组成的共进杂志社编辑,1921年10月10日创刊的。之后,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为了满足进步青年的要求,进一步联合旅京陕西学生进行斗争,共进杂志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社团组织。1922年10月10日,旅京陕西青年的政治性社团组织——共进社成立。《共进》杂志成为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共进》创刊之始,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它成为共进社的机关刊物之后,摆脱了狭隘的地方观念,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为编辑宗旨,扩大了立足点,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观察中国的社会问题。因而它的发行量不断扩大,由初期的千份发展到1925年春的3500份。榆林自治会、绥德县高等小学、清涧县高等小学,是其

在陕北北部的代售点。《共进》半月刊和共进社是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进步刊物和革命团体之一。共进社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它在陕西各地建立了不少地方团。后来,榆林方面的负责人有李子洲、魏野畴、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刘志丹、阎揆要、呼延震东等人,绥德方面的负责人有杨明轩、常汉三、王懋廷、韩叔勋、田伯英等人。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发展社员五六十人。其影响之大,使军阀井岳秀也惊恐不安地说:“我不怕大共(指共产党),最怕小共(共进社)”。

《秦钟》、《共进》杂志在榆林的发行和共进社社员在陕北各地的发展,使新文化、新思想在陕北各地得到广泛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榆林的早期传播

一、魏野畴在榆林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

陕北早期,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榆林中学教师魏野畴。

魏野畴,陕西兴平县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魏野畴到榆林后,按照党组织要求,以榆林中学为主要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榆中任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亲自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资本论》等著作,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

指出读书与救国的关系。为了唤醒民众,他还亲自编排话剧《爱国贼》,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卖国的丑恶嘴脸。

魏野畴不仅在校内积极向学生教授马克思主义,还积极在校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秋,在关中失利的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为保存实力,率部蛰驻榆林。经杜斌丞介绍,魏野畴与杨虎城相识,并且一见如故,经常促膝谈心。魏野畴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谈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从靖国军的失败教训,谈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魏野畴的影响下,杨虎城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他后来积极靠拢共产党,力主抗战及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

在魏野畴和其他革命教师的教育和影响下,榆林中学涌现出刘志丹、谢子长、杜润滋、阎揆要、曹力如等一大批思想进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骨干。这些同志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陕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为陕北党、团组织和红军的领导者,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榆林中学,也成为陕北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

二、李子洲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年春,陕西当局拟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京、津上学的李子洲等榆林籍学生,认为这是一个改变陕北教育落后面貌和解决学生升学难的绝好机会。于是在杜斌丞等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四处游说力争,终于

使当局同意将第四师范学校设立在绥德。次年5月,绥德第四师范正式开办。经杜斌丞举荐,1924年夏,李子洲由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师,就任绥德四师校长。

李子洲,名登羸,字子洲,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1923年初,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子洲在榆林中学任教时,就继魏野畴之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刘志丹等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他到绥德四师任校长后,除自己在教学中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广从外地邀请共产党员、学界知名人士来绥德四师办学。试图在绥德四师建立一支教授马克思主义的教师队伍。应邀来校的有王复生、王懋廷、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英、何寓础、韩叔勋、罗端先、常士杰、蔡南轩等十余人。1924年8月25日,李子洲在绥德四师开学典礼上对全校师生郑重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办学的目的不仅只是为陕北教育事业培养新的师资,更重要的是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起来改造中国,为实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李子洲的带领下,绥德四师的面貌焕然一新。学校购置了教学仪器,订购了《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等一大批进步书刊。教师们一方面给学生讲授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介绍有关共产党的知识,要求学生阅读《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书籍。绥德四师的学生遍布陕北各县,他们大多利用假期回乡宣传新思想、新风尚,为乡亲们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

李子洲主教的绥德四师成为陕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主要阵地。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榆林的早期组织

第一节 中共绥德特别支部和绥德地委

一、中共绥德特别支部

中国共产党在榆林地区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共北京区委(后称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直接指导下,由李子洲和王懋廷(即王德三)于1924年11月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建的^①。

李子洲从北大毕业后,是受李大钊委托回陕西开辟革命工作的。因此,他抓住接任绥德四师校长这一机遇,决心把绥德四师办成党在陕北建立组织和发展革命事业的基地。1924年春四师开学前,他专程去北京向中共北京区委汇报,一面请求为四师招聘进步教师,一面请示在陕西建立党组织事宜。李子洲到京后,先找到同窗好友王复生(王是云南祥云人,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外公开身份的发起人之一,1921年入党),一起拜访李大钊。在李大钊支持下,《北京大学日刊》登了四师聘教启事,并当即

^① 关于中国共产党陕北建立组织时间,一说1924年冬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建立了党小组,一说在1926年初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本书采取1924年冬在绥德四师建党的观点,并按此时间顺序编写。

决定将时在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的王懋廷(王复生胞弟)调到绥德四师协助李子洲建党和开展革命工作,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党组织建立后与北京直接往来,还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和联系地址。

绥德距榆林 100 多公里,是陕北北部仅次于榆林的重镇,由井岳秀的一个团驻守。为了在绥德四师开展建党和革命活动,李子洲多方周旋。他和井岳秀驻绥德部队团长石谦搞好关系,甚至通过杜斌丞与井岳秀接触,以求创造和谐氛围,尽力维持学校的稳定。为了以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便于建党,李子洲不能公开参加校内的建党和革命活动。他在党内除了担负总的领导和研究解决重大决策问题外,把具体的组织活动交给了王懋廷。

王懋廷到绥德四师时年仅 24 岁,但知识渊博,口才极好,很受学生欢迎。他任国文教员,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传授革命思想;在课外利用辅导机会,组织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经常与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求学目的和思想行为,从中培养和物色党、团员的发展对象。他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年已 25 岁的田伯英。

1924 年 7 月,田伯英由魏野畴推荐到绥德四师教书。他来四师时,受北京共进社委托在陕北发展共进社组织。王懋廷与田伯英同住一个宿舍,便将田伯英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经常向田讲解共产党的性质,说共产党比共进社有高深的理论,有更为远大的奋斗目标,给田推荐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等革命书刊。不久,田伯英申请入党,经李子洲同意,王懋廷即向北京党组织作了报告。10 月,北

京党组织回信,批准田伯英入党,并指示他们在陕北建立党的组织。11月,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根据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为党小组的规定,在四师成立起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小组,直接隶属北京党组织。由于王懋廷担任的国文课程较重,还要负责向外发展组织和开展青年运动,李子洲为了避开各方面的注视,因此决定由不易引人注目的田伯英担任党小组长。

1925年春,李大钊派北大陕西籍学生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的耿炳光,以于右任代表的身份来榆林做井岳秀的工作。同时,带着在陕北发展党组织的任务。耿炳光到榆林见井岳秀,但井只迷恋自己的枪杆子,不接受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拒绝了于右任的要求。耿炳光做了一星期工作无结果,就离开榆林到绥德四师。在绥德,耿炳光了解了四师党、团活动情况后,按照中共四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由小组改为支部的规定,与李子洲商量在原党小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支部,指定李子洲为书记。春季开学后,党支部书记仍交由英文课程任务较轻的田伯英担任。

1925年是绥德党组织发展较快的一年。中共绥德支部遵照中共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必须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的要求,在校内教师、学生和职工中大力发展党员。这一年,校内的党员已有教职工中的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王复生、李瑞阳、韩叔勋和学生中的白明善、杜嗣尧、乔国桢、马明方、霍维德、高光祖、王兆卿、邓重庆、白作宾、张肇繁、马瑞昌、赵通儒等26名。此外,李子洲和王懋廷还在绥德县立第一高小发展王

士英入党,在石谦团发展李象九入党。是年夏季,李子洲主持,在中共绥德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绥德特别支部,书记田伯英,李瑞阳负责组织、王懋廷负责宣传。中共绥德特别支部除领导绥德四师校内的三个支部外,还领导中共榆中支部、中共榆林特别支部和中共店镇支部、中共定边支部。

1924年寒假,绥德籍榆林中学学生张肇勤、李登霄回到绥德,在城内办了个假期补习学校,绥德四师度假的学生有十多人报名补习。这个活动,引起了李子洲和王懋廷的重视。王懋廷几次找他俩谈心,了解思想,最后由李子洲和王懋廷介绍张肇勤和李登霄入党。1925年3月,王懋廷亲自到榆中指导发展党员的工作。成立了中共榆中支部,书记张肇勤,归中共绥德特别支部领导,联络代号为“张基建”。榆中党支部成立后,又发展刘志丹、郭洪涛、武开章、王季明、刘景象、苗存权、周梦雄、周发源、庄培、李含芳、李力果、焦维炽、杨国栋等十多人入党。是年秋,王复生带领绥德四师体育代表队到榆林参加体育运动会,借机检查布置榆中党、团组织工作。他在榆林城西门外沙滩上,召集刘志丹等20多名党团员开会。会上将榆中部分团员转为党员,并遵照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决定派刘志丹、张肇勤、柳长青、杨国栋、郝长有等学生党员赴苏联留学和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后来赴苏留学未能成行,刘志丹和杨国栋等人入黄埔军校,中共榆中支部书记由周梦雄担任。11月,榆中党、团组织遭到破坏。12月,刘景象、李含芳、庄培等,秘密成立了中共榆林特别支部,书记刘景象,受中共绥德特别支部领导。中共榆林特别支部下辖中共榆中支部和

单级师范支部,同时在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发展吴碧云、王佩珊、韩慧芝等人入党,成立中共榆林女子师范支部。在榆林城内高小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榆林高级小学支部(书记郝敬修)。

1925年,绥德四师佳县籍学生杜嗣尧、乔国楨、高光祖、杜衡(杜振庭)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榆中就读的佳县籍学生武开章、苗存权等也入党。他们寒假回县后,于1926年1月在店镇成立起中共店镇支部,书记高光祖,属中共绥德特别支部领导。

1926年2月,在榆中参加罢课斗争被开除的学生共产党员汤登科(汤仲甫)、龙施普回到定边,与放寒假回家的绥德四师学生丁子齐等,在开明绅士余九鼎的支持下,以振兴定边教育为宗旨,召开改革教育会议,改组了“劝学所”,成立起县教育局,推汤登科为局长,并兼任县立高小校长,龙施普和进步青年郭子范任教员。汤登科又从绥德县周家硷(今属子洲县)邀请与他一起被榆中开除的同学、共产党员周梦雄、周发源来定边执教。遵照中共绥德特别支部指示,便在定边高小成立了定边县第一个党支部,周梦雄任书记,汤登科任支部干事会的干事。

二、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对陕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十分关注。1926年5月,中共北方区委再次派耿炳光来陕北,整顿党、团组织。6月8日在耿炳光的主持下,绥德党、团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党、团组织分开。在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

员会,隶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田伯英,组织蔡南轩,宣传赵少西,机关驻绥德四师高家祠堂。原中共绥德特支所属组织,统归中共绥德地委领导。

1926年6月,中共绥德地委将定边支部改为特别支部,书记周发源,以定边高小为活动中心,在周围发展党的组织。10月,汤登科到安边检查学校,与党员朱子坚、刘实庵、刘子贞接头,在安边小学建立起安边支部分部,隶属中共定边特别支部。

7月,绥德四师学生共产党员苗仰实回到绥德苗家坪(今属子洲县)高级小学任教,在校宣传进步思想,成立学生会、青年社等。期间,绥德四师学生党员田庆丰、贺维新经常利用回家之机,配合苗仰实在学校开展各种进步活动。冬天,田庆丰、贺维新毕业后回到苗家坪高小任教。经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三人组建中共苗家坪高小支部,书记田庆丰。

8月,中共绥德地委派四师学生党员李维勤到府谷,在县立第一高小(南门)以教员身份秘密开展活动。发展学生曹桂芳、刘应成、高仰先入党,建立起中共府谷特别支部。李维勤任书记。年底,李维勤奉调回绥德,特支也暂时停止活动。

1926年夏,绥德四师和榆中的吴堡籍学生党、团员丁学波、薛尚英、贾治国等回到吴堡,以吴堡县城里村(在旧城)为据点,建立起中共吴堡支部。书记薛尚英(后叛变)。

1926年寒假,中共绥德地委将四师毕业的李馥花(李秀峰)等几个党员组成直属米脂小组,指定李馥花为组长。他们回到米脂后,分别在米西小学和东街小学发展李

岸江、刘金邦、王和璧、姬世道等人入党，并将情况报告地委。地委决定将直属小组，改为中共米脂支部，书记李馥花。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正式成立，中共绥德地委归其领导。根据陕甘区委一次会议提出的“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健全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的精神和改组一些地委的决定，中共绥德地委实行改组。改组后的书记蔡南轩，组织何离础，宣传关中哲，青年赵通儒，农运李波涛。原地委书记田伯英，调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地委的下属组织是：中共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支部，书记常汉三；中共榆林特别支部，书记郭洪涛；中共定边特别支部，书记周发源；中共苗家坪高小支部，书记田庆丰；中共清涧县第一高小支部，书记刘耀三；中共佳县特别支部，书记杜嗣尧；中共米脂支部，书记李馥花；中共米脂桃花卯支部，书记姜鹏腾。还有绥德义合、米家沟、吉镇、周家硷，米脂杨家沟，清涧石嘴驿等地的中共支部或特别支部。共有党员196名。

1925年，共产党员李象九担任井岳秀部石谦团学兵连连长。发展阎红彦、史唯然、雷恩钧、呼延震西等人入党，在连内建立党支部。1926年军支扩建为军特支。1927年3月，李象九升任营长，部队驻防清涧。此时，李象九营的排、连都建立起党小组和党支部，特支隶属中共绥德地委。

1927年6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规定，通知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建为绥德县委。7月正式改建后，原绥德地委所辖组

织改由绥德县委领导。县委领导成员仍是原地委领导成员,中共绥德县委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驻地仍在四师高家祠堂。

第二节 团在绥德的早期组织

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师范学校支部和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在榆林地区的最早组织,与党在榆林的早期组织一样,在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直接指导下,由李子洲和王懋廷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首先建立起来的。

1924年11月,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小组,在绥德四师创建后,王懋廷又集中精力创建团的组织。他首先在学生中发展白明善、杜嗣尧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2月上旬在绥德四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师范学校支部。至寒假前发展学生团员14人。

1925年初,共产党员张肇勤、李登霄在榆中学生中发展了几名团员随之成立起团小组,不久团小组又改为共青团榆中支部,书记李登霄,属绥德四师团组织领导。与此同时,绥德四师佳县籍学生杜嗣尧、乔国桢、王好智被王懋廷发展为团员。寒假中,杜嗣尧等3人在店镇发展张俊贤、张如岗入团,成立了团支部。书记杜嗣尧,属绥德四师团组织领导。

1925年2月,王懋廷根据团组织的发展状况,在四师

成立了共青团特别支部。因为“绥德”二字不能包括外县，故定名为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以便于领导陕北各地团组织。团陕北特别支部成立时，北京团组织出了问题，中央宣布解散，所以王懋廷便与在上海团中央任组织部长，曾介绍自己入党的邓中夏联系。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直接隶属团中央，王懋廷任书记，田伯英和李瑞阳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5年秋，北京党组织调王懋廷回京，共青团陕北特支存在着领导人选问题。开始拟由教员李瑞阳代理书记，后经研究团的工作要逐步让学生党员去做，便改由学生党员马瑞昌任书记。之后，团特支又增加了一些人员，田伯英和李瑞阳则仍留在特支宣传部和组织部做培养和训练工作。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陕北各地的团组织迅速发展，各县的一些学校、延安中学、瓦窑堡驻军李象九连都建立了团组织。

二、共产主义青年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5年8月9日前，陕北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已发展到75名，团员中有学生、店员、军人。经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请示团中央局准许，成立了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设书记、组织、宣传、经济斗争委员，后增设学生运动委员，活动范围陕北各地。期间，领导成员多次变动。10月，中共豫陕区委成立，“管辖包括河南和陕北榆林地区以外的陕西各地”（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团中央局将陕北团组织划归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由于陕北与豫陕区委机关驻地开封联系不便，所以陕北团组织继续

向团中央报告工作。此后,团中央决定从1926年2月起,陕北团组织改为共青团北方区委管辖。4月,团北方区委正式与共青团绥德地委接上关系。6月13日共青团绥德地委召开会议,调整地委领导班子。书记杨璞(杨应举),宣传罗百福,组织杜衡。

共青团绥德地委的下属组织。在绥德县,有五个支部。其中第四师范学校由于团员多,分为三个支部,第一支部书记杨和春,第二支部书记马瑞昌,第三支部书记王好智;苗家坪高小团支部,书记田庆昌;清涧第二高小特别支部书记白作宾。团榆林特支书记庄培,下辖四个支部。即榆林中学支部,书记由庄培兼任;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支部,书记李仙峰;神木第一高级小学支部,书记贾拓夫,横山第一高级小学支部书记鲁賁。还有宜川、定边、安边、佳县、米脂高家村的支部或特别支部。共有团员近百名。

1927年2月,共青团绥德地委隶属共青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

第三节 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

一、中共陕甘区委决定组建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6年,中共榆林特支先后发展教师马云程、张光远、周家干、马济川和学生赵亚农、马树林、李文芳、胡颀民等人党,相继又在女师、单级师范和县立高小建立起支部。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组建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5月初,中共榆林地委正式成立^①。书记马云程,组织郭洪涛、宣传周家干。榆林地委和榆中党支部一块办公,机关驻榆中平民学校。

中共榆林地委的建立晚于中共绥德地委,按照陕甘区委决定,原属绥德地委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等地为榆林地委的工作区域。鉴于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高潮时期,中共榆林地委以国民党榆林县党部的名义对外活动。

二、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属的组织

中共榆林地委成立后,一方面领导中共榆林特支及榆中、女师、单级师范、高小等支部,深入广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一方面在其工作区域积极建立组织。

神木 大革命初期,神木有不少有志青年到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和北京、太原等地求学,寻找革命真理。1926年1月,在北京大学和山西太原省立一中入党的史仙舟、王瀛、汪铭、张友清,在榆中和四师入党的王季明、王兆卿等,寒假回到神木。他们在学生和进步青年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反对旧教育,旧道德。逢集遇会进行演讲,抨击时弊,传播马克思主义。暑假期间,在北京中国大学就读的张友清回来后,召集回乡度假的汪铭、庄植亭、李文

^① 中共榆林地委成立的时间说法不一。当事人郭洪涛和梁光远、马凌波等回忆,中共榆林地委是1926年12月由中共绥德地委派蔡南轩来榆成立的。1927年2月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成立地委表中,同时列有西安、渭南、绥德、三原、延安、榆林6地区。本书采用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中,“榆林在5月初才成立地委”的记述。

芳、杨和春、王季明等十几名党、团员，在县城庄植亭家和桦山庙里开了两次会议，成立了中共神木支部，书记张友清，统一领导暑假期间一切革命活动。暑假结束后，在外地上学的学生返校，党组织的活动也暂时停止。1926年冬，从榆中毕业的学生党员王季明、张新斋和在太原中学入党的张蜀卿回到神木任教。不久，张新斋任县教育局局长，王季明任县立第一高小校长。他们利用在教育界取得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3月，党员发展到六名，建立了中共神木第一高级小学支部，书记王季明，并派张蜀卿到榆林向党组织汇报工作。

横山 1925年3月，在绥德、榆林革命活动的影响下，横山县立第一高小学生曹动之、高岗等，在校内组织学生自治会反对奴化教育，开展罢课斗争。斗争引起校方惊恐，便开除了曹动之、高岗等5个带头罢课学生的学籍，并给参与者以罚款处分。学生为此到县衙请愿，县知事和反动军警又关押了两名学生，次日学生纷纷离校罢课。曹动之、高岗等5人，步行到榆林道署申诉。后经榆中校长杜斌丞与横山县知事斡旋，才释放了被押学生免除了罚款，并把被开除的学生收进榆中就读。此后，横山不少知识青年陆续外出求学。1927年春，共产党员李彝民、李绍唐分别从山西新民中学、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回横山任教。4月，在绥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亚华，回到第一高小，发展教师钱德明入党。5月，曹亚华、李彝民、钱德明等在李彝民家开会，成立了中共横山第一高小支部，曹亚华任书记，有党员7名。

府谷 1927年上半年，在绥德四师、榆中及外省求学

并入党的柴培桂、严念祖、孙计一、孙钟慧、张子栋、李来寅、刘子安等人，毕业后陆续回到府谷各学校任教，并开展党的活动。6月，张子栋秘密联络县城内的12名党员，在城外五虎山玉帝楼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府谷南门第一高小支部，书记张子栋，隶属中共榆林地委。支部成立后决定扩大活动范围，派严念祖、孙计一等一批党员分别到镇羌第二高小、麻地沟第三高小、木瓜第四高小、盘塘第五高小和青春岭、瓷窑沟等农村小学任教，开展党、团活动。并在农村发展农民马二疤、马外儿、阎银骥等入党，党组织在各学校和周围的农村发展起来。

第三章

榆林早期党团组织开展的 国民革命运动

第一节 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

一、成立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推翻了北京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政府以后,电邀在广州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毅然应邀北上,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

为了支持孙中山《北上宣言》中提出的革命主张,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又联合发出通告,对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作了具体的规定。全国各地区、各阶层纷纷响应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孙中山北上大造声势。1924年12月,陕北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联合各界于12日在绥德成立“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并设有总委员会。28日，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安定分会成立，除不少机关加入外，个人加入者150多人。次年成立了周家峪分会、义合分会、榆林分会等，到1925年2月，分会扩大到十几个县。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总委员会向各分会均颁发了图章。

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总委员会议决，为了早日召开全国的国民会议，应约集国内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举行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为此，总委员会组成了出席北京会议的代表团，选举清涧的白明善为代表团主任。同时派张鸿锡、营尔斌、霍子乐三人为驻京代表，与北京国促会联络，以便召集代表大会。后，总委员会又委托回籍过春节的委员杨明轩，与道经各县及关中各人民团体联络，并宣传陕北革命运动的情形。

二、召开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会

陕北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开展了重要的活动，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21日，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绥德召开各分会代表大会。会议由常汉三主持，李子洲、杨明轩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大会推选李子洲、常汉三、杨明轩、白明善等15人为陕北国促会总委员会委员。会上作出了反对善后会议，主张由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民会议的决议，并推选四名代表出席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我们始终认定，希望军阀来求和平统一，不但没有效果，

而且要受军阀的欺骗。因为军阀是列强的魔爪,而列强时时利用中国的内乱以肆呈他们的掠夺的毒计。我们要求到真正福利,必须要自己团结起来,组织真正的国民会议,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帝国主义,造成真正的民主政治。”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举国悲痛。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加倍努力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纪念孙中山。陕北党组织领导陕北人民举办了广泛的追悼活动,发表政治主张,唤醒民众,扩大革命影响。宣传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绥德四师党组织率先在四师院内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四师、女校、一高、平民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及各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不久,在李子洲的领导下,四师师生每人胸前佩戴“青天白日”布印章,同其他学校师生一起列队到砭上韩薪王故里处,为孙中山先生立了三米高、一米宽的纪念碑,碑上刻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众多师生在碑前默哀、宣誓,表示要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拥护三大政策,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反对军阀列强。与此同时,陕北各县也相继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

1925年10月,反奉战争爆发。12月,日本出兵东北支持奉系军阀。他们又联合英帝国主义撮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组成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根据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需要,再次强调提出了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问题。指示各地党组织结合具体情况,恢复或重新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12月14日,中共绥德特别支部

以“国民党临时绥德县党部”的名义发表宣言,斥责段祺瑞与民为敌的反动行径,要他“及时引咎,静候国人裁判”。号召陕西人民“继承先总理遗志,促成国民会议先开预备会,解决国内外一切症结,共谋长治久安之道”。

第二节 开展“驱吴”和声援五卅惨案运动

一、“驱吴”运动在榆林

1925年5月4日,受任才四天的陕西军务督办吴新田,借口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闹事,殴伤学生数十人。吴新田本是前陕西军务督办刘镇华的主要帮凶,本应随刘之垮台而倒台,但不愿轻而放弃陕西控制权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竟践踏陕西民意,委任吴新田接充刘镇华继续主政陕西。因此,以“五四”惨案为导火索,继“驱刘”运动之后,以西安为中心,在全陕立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驱吴”运动。

在陕北,首先是绥德第四师范学校的中共党、团组织,于5月下旬在四师礼堂召开“驱吴”大会,有5个学校师生400多人参加。会上,李子洲、韩叔勋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会后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这次“驱吴”大会不但对绥德城乡震动很大,而且影响到陕北其他县,极大地震慑了井岳秀的反动统治。

在强大的反吴军事、政治压力之下,吴新田于7月15日退出西安,率部向其老窝汉中溃逃,在岐山、凤翔受到杨虎城部的截击,损伤惨重。杨虎城是以“陕北国民军前

敌总指挥”名义，由榆林率部南下，于年初抵达渭北三原一带的。上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掀起“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之后，李子洲即从绥德专程北上榆林，与杜斌丞、王森然等密商，先说服井岳秀将其所部改称为“陕北国民军”，继又说服井岳秀和杨虎城，由井委杨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南下关中，参加驱逐刘镇华出陕西的斗争，配合国民军夺取西北。李、杜、王参加了井岳秀为杨虎城饯行的酒宴，并介绍一些陕北青年参加杨部南下关中。杨虎城部到达关中后，在“驱刘”、“驱吴”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共陕北党团组织在这个斗争中的另一重要贡献。

二、五卅运动在榆林

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残杀上海工人、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推动下，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狂飚迅速席卷全国。

在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和四师的党团组织负责人王懋廷、田伯英于6月7日召开教职员、学生紧急会议，提议通过发表宣言、通电的形式，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并决定停课两周。会后成立了后援会，发动和领导绥德城乡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校又把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编成若干小组，分赴佳县、吴堡、米脂、榆林等地开展五卅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捐款，支持上海工人大罢工斗争。次日，在绥德城召开市民大会，成立了“绥德各界救国办事处”，举办了“援助上海工人游艺

会”，创办了《救国日刊》。四师派高光祖到吴堡街头讲演、宣传，发动并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王懋廷于6月8日去米脂、榆林，组织指导当地青年开展反帝运动。他在榆林联络各界人士成立了“陕北各界反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其他县的党团组织也闻风而动，带领群众进行示威游行，掀起了支援上海工人大罢工的高潮。6月25日，榆林、绥德两县城同时罢业半天，下半旗哀悼五卅死难者。同时开展了游行示威、检查和抵制英货日货、募捐等活动。

暑假期间，汪铭等一批在外求学的神木籍学生回乡后，自动组织起来向神木各界人士举行报告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上海工人的滔天罪行。同时，成立“沪案救援会”发起募捐活动，慰问罢工工人及其死难家属。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正当陕西的五卅反帝运动深入开展之际，北京的共进社总部于7月19日至25日，在三原举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重点之一是讨论反帝问题。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刘志丹和李瑞阳、杜嗣尧，分别作为共进社榆林、绥德组织的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其中刘志丹和杜嗣尧是“经18日之行程”，晚了两天于21日到达三原的。他们向大会报告了陕北的社务状况和“驱吴”及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群众运动情况，并分别向大会题词。刘志丹的题词是：“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

在这次运动中，陕北各县人民在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不但唤醒了民众，增

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意志,还募捐 3200 多元汇交上海总工会,支援上海工人的五卅运动。

第三节 学生青年运动的兴起

一、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1924 年春夏,随着新思想、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在陕西北部的传播,平民教育亦随之兴起。

榆林 榆林中学教师王森然首先提议开办一所平民学校,为榆林惠记工厂^①的劳苦工人义务讲课。此事得到了榆中校长杜斌丞和客居榆林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赞助,榆中学生会负责人刘志丹、王子宜、李力果等也积极支持。开始每星期六到工厂上一次课,后来杜斌丞特为平民学校在榆中修建了一处校址(榆中第十斋),平民学校即搬至榆中。杜斌丞任平民学校名誉校长,刘志丹、王子宜任主任。由王森然指导榆中学生会、青年文学研究会、教育改进会的学生,自编教材义务担任教师。

绥德 1924 年暑假,李子洲和被邀请的几位青年教师到绥德后,即接办了 1921 年 2 月开办的平民学校,增设了一个成人班。这个成人班不分男女老少,工人、农民均可上学,同时开设了夜校。成人班白天上两节课,学生有 30 多人。参加夜校学习的有 40 多人,上课都有教员辅导。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不仅使穷人子弟能上学,而且密切了

^① 是陕北军属开办的地堰工厂。

四师学生与社会上的往来。农民、工人常来四师找学生、教师，四师学生也经常主动接触群众。绥德建党初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党的一切活动都在平民学校进行，因此平民学校也成了党活动的中心指挥部。1924年至1927年，平民学校共招收了26个班，680多名学生。

二、成立陕北学联和陕北青年社

1925年初，陕北党、团组织在绥德四师、榆中等陕北较大的学校成立了学生会，由青年团领导。以后由各学校的学生联络发起，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绥德四师。

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运动的作用，争取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3月绥德四师成立了青年协会，10月发展为青年社，有会员48人。青年社的宗旨是“砥砺学行，改造社会”，负责人马瑞生。1925年12月，绥德四师青年社改为陕北青年社，社址仍在四师。

陕北学生联合会和陕北青年社实际上是共产党团结青年学生的进步团体，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它创办的《塞声》半月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时弊，并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活动等，在团结广大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宣传、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各种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1926年夏，在绥德、榆林上学的佳县籍学生30多人，于佳县城内召开会议，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振佳会”。会址设在绥德四师，负责人高光祖、杜衡、王浪，并办了《振佳》会刊，先后共出35期。

三、榆林中学的两次学潮

在1925年11月至1926年7月期间,榆林中学发生了两次政治性的学潮。

1925年7月间,榆中学生会接到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关于学生参加校务会议的决议案。11月,榆中党、团支部即以学生会出面,向校方提出学生参加校务会议,参与管理校政的要求。此时校长杜斌丞在外看病,校务主要由总务主任高崇主持。高为人守旧顽固,以学校,教职员大会的名义,否决了学生会的正当要求。在一个星期日,校方与学生举行辩论。乙班学生李登霄、庚班学生栾本植、杜鸿章等相继发言,驳斥了高崇等反对学生参加校务会议的谬论,并当众揭露了高崇许多倒行逆施的做法。当时,同学们怒容满面,会场气氛十分紧张。高崇即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煽动部分教师提出辞职,榆中学生会借此全面罢课。学生会把要求参加校务会议,撤换高崇等内容的罢课宣言印刷成宣传材料,分发陕北各县乃至西安等地,收到不少声援函件。高崇便勾结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榆林道尹景志傅(景岩征),派兵包围学校,对学生大打出手,继而开除周梦雄、焦维炽、汤登科、周发源、王子宜、李登霄、高之钰、龙施普、霍学光、王怀德、周家骥、栾本植、李含芳、樊俊、王俊让、王通屏、霍作霖等19名学生代表的学籍,一一绑架出南城门外驱逐出榆林,并将学生所带钱财物件抢劫一空。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代表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其他许多党团员和进步学生也愤而离校,最后仅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迫复课。同年12月26日,陕北旅京同乡

会在《西安评论》第30期上,刊登了题为《对榆中风潮之经过及宣言》的文章,痛斥榆林封建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无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1926年1月1日出版的《共进》半月刊,发表了两篇题为《榆中学潮》、《榆中学潮的真相》的文章,尖锐地指出榆中学潮是高崇等人为了取代杜斌丞长教榆中,挑动教职员否定学生提出的参加校务会议的正当要求而爆发的,并正告“迷信武力,滥用威权破坏学校”的井岳秀,“请看蹂躏武昌高师之王占元,摧残西安一中之吴新田,今日何在?”

1926年7月28日,榆林城内万佛楼前搭台唱戏。井岳秀的几个太太,带着儿子井文龙(榆中学生)也来看戏。因人多拥挤,榆中学生苗存权(佳县人,共产党员)碰了井文龙,即遭到井岳秀护兵的毒打。事情发生后,榆中一些学生立即回校,聚在校长室门前要求处理。中共榆中支部以学生会名义召集全校学生在礼堂集会,支部负责人武开章在会上宣读了《告同学书》,要求开除井文龙学籍,严惩打人凶手,向被打学生赔情道歉,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还将《告同学书》印发陕北各县。井岳秀派榆林县长王卓儒来校和学生会谈判,表面上答应学生的要求,但实际上并不兑现。榆中党支部即发动学生搬出学校,借住在居民家里和店里,坚持斗争。这样僵持了30多天。后经从外地返回榆林的杜斌丞校长多方周旋,井岳秀才派其旅长刘润民来榆中宣布井文龙从此离校,向被打的学生苗存权赔情道歉,答应惩办打人凶手,同学们才回校复课。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陕北军阀井岳秀,因此在社会上震动很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灭了反动势力的威风。

第四节 农民工人运动高涨

一、成立脚户自保会，进行反“骡柜”斗争

1925年前后，绥德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毛驴、骡马，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用品主要靠脚户运输。可是脚户每一次进城，总是提心吊胆地怕支差。因为绥德县衙和驻军中通一气，设立“骡柜”组织，专门敲诈勒索脚户，强迫脚户为国民党军政机关及其官员无代价地支差。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否则就要挨骂挨打，因此脚户对“骡柜”咬牙切齿，恨之人骨。

1925年6月，绥德的中共党、团组织通过学生会和青年社，在绥德平民学校召开了“脚户自保大会”，到会的脚户30多人，农民和学生500多人。会场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像，院里街巷张贴了标语。会上成立了“脚户自保会”，推选出会长马瑞昌，副会长杜嗣尧，委员石泰清、罗百福、李明轩、张礼庭、赵通儒、姬世道、刘斌章、邓重庆、刘三、郝林瑞、严念祖等，他们大多是绥德四师的学生，且多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次会议主要是动员脚户和农民团结起来，抵制“骡柜”的敲诈勒索。会后，在“自保会”的领导下，脚户们多次痛打为虎作伥的“骡柜”走卒，提出不准“骡柜”拉差的口号。脚户又和学生、农民联合起来打了几次“骡柜”的人，迫使绥德县衙取消了“骡柜”，并规定准用牲口谁出钱雇。

脚户同“骡柜”斗争的胜利，是大革命时期学生和工农

联合斗争的首次胜利。

二、成立工会组织

成立绥德县总工会 绥德县的工人,除了织袜子工人,多是泥匠、木匠。中共绥德党、团组织号召党、团员“到民间去,开展工农运动”。脚户自保会取得反“骡柜”斗争胜利后,改称脚夫工会。在这个基础上,1925年夏成立了绥德县手工业工人工会,约有300名会员,主任委员雷忠秀,委员王进峰、李邦俊,会址在城内南关同善社。同时,绥德党组织派白明善、高光祖、李明轩、杜嗣尧等到木匠、泥匠、银匠、理发匠中活动,宣传工人阶级受压迫的阶级根源,讲“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革命道理。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介绍王进峰、雷忠秀、王进录、雷万春、李邦俊、王应合等工人入党。经过几个月的宣传组织工作,1926年下半年召开了绥德县总工会成立大会,地址仍在南关同善社。大会会场庄严隆重,周围贴满了标语。王进峰主持会议,工人代表雷忠秀等8人在会上发言,一致拥护成立工会组织,总工会由雷忠秀、王进峰、雷万春等负责。至1927年2月,总工会下设分会10余处,会员300多人。

成立榆林县总工会 1925年夏,王懋廷来榆林城内建立起榆林工会,同时鼓动榆中學生到农村去开展建立农民协会的活动。1927年春,榆林县成立了总工会,委员长李文正。还成立了榆林县商民协会,榆中职员康治臣任会长。这些民主社团成立之后,即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惠记工厂工人罢工,榆林城区小商人反对法院侵占房屋等

斗争。榆中和女师学生还利用节假日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斗争。

1927年6月底,在中共府谷南门高小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府谷工人协会,负责人李如裕。工人协会组织工人与农民一起斗争,使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行为有所收敛。

三、惠记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1年,张在田在榆林城米粮市顶开设了手工地毯厂,有工人20多人。后来井岳秀依仗权势逼迫他全家离榆逃往包头,该厂遂落入井岳秀之手,改名惠记工厂。

井岳秀将惠记工厂迁到榆林城定惠寺庙内,派心腹薛平任经理,孙寿山任图案技工,新招收技工和徒工100余人。该厂当时每月可织地毯30块,获利白洋180元;织丝毯15块,获利白洋900元,两宗每月可净获利白洋1000多元。但工人待遇极差,除技工每月有少量工资外,大量童工都是只管饭不发工资。工人生产定额很高,每天生产时间长达12小时,吃的是糟米烂菜,住的是厂里的简陋房屋,数人睡一小炕,夏天又热又臭,冬天冷冻难忍。更为残酷的是工人未经批准整年不准离厂一步,完不成生产定额或稍有所谓“越轨”的行为,即遭毒打直至私关黑牢。厂里对付工人的各种刑罚竟有十多种,工人进了惠记工厂就如入了监牢。

1927年春榆林县总工会成立后,中共党、团组织即通过工会及工会委员长李文正去做惠记工厂工人的工作。又派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李仙峰、张玉茹以到该厂参观、购

地毯为名,向工人宣讲井岳秀剥削压迫工人的事实。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工人觉悟逐步提高,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等要求,均遭薛平无理拒绝。薛平还奉井岳秀旨意,采取毒打为首闹事的工人、封锁工厂大门、禁止和外界联系等手段,迫使工人屈服。但在县总工会领导支持下,惠记工厂工人于4月22日早晨举行全厂总罢工。提出的条件是: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余时间工人行动自由;取消各种私设刑具和牢房;改善工人伙食;工人有组织工会、实行罢工的自由;撤换经理薛平等。罢工的工人都离开工厂,搬到榆中大礼堂居住。榆中学生刘绍绪(浪珠)、李登霄、豆成业、王扑代表工人和井岳秀代表、榆林县长王卓儒进行谈判。榆林党、团组织发动榆中全体师生和社会各界,支援工人的正义斗争。不少师生和社会人士慷慨捐助,妥善解决了工人罢工期间的的生活问题,使这次罢工斗争坚持了十多天。井岳秀迫于国民革命军北伐不断取得胜利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基本上接受了罢工条件。榆林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四、成立农民协会

1926年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每星期都要派出一批党、团员和学生,轮流到城郊农村做宣传动员工作。1926年10月,李波涛、乔国桢、霍世杰、冯文江等4人,从毛泽东接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到陕西。党组

织派李波涛回绥德开展农运工作,绥德地委介绍他到绥德四师任教,并负责绥德地委的农运工作。

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绥德农村首先迅速而广泛地建立起村、区农民协会,有条件的村庄还建立了党、团组织。仅绥德中区,就成立了23个农民协会,有会员658人。在村、区农民协会广泛成立的基础上,1927年2月8日成立了绥德总农会。成立大会在九贞观的大成殿举行,殿内柱子上挂着农民协会的大牌子,参加会的有1000多人。杨玉峰主持会议,中共绥德地委书记蔡南轩和农民、师生代表丁锦业、郝敬德、李波涛分别讲话。至1927年5月底,绥德已成立村农民协会151个、区农民协会7个,会员3409人,成为全省农运工作搞得好的7个县之一。农民协会成立后,反对不法驻军和地主劣绅,并取得胜利。绥德驻军向铁茄坪要骡马草料,折合190串铜钱,全村每户平均一串800文。村农民协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的说理斗争,一改过去12户富农出30%,其他农民出70%的不合理做法,而使富农出了60%,其他农民出40%。为了显示农会的威力,绥德四师学生化装成农民到吉镇把大地主马老总捉回绥德,在南关戏台上开了斗争大会。在与会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县长韩兆鹗宣布了马老总贪污粮草和少出款项的罪状。

1927年7月,在中共佳县组织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佳县农民协会。选举共产党员高锡爵、高光祖、高能孝、王好智等人为农协领导人,县农民协会下辖70多个村农民协会,有会员3700多人。

在此之前,据《陕西国民日报》报道:神木于4月25日

成立了区农民协会，到会农民近 300 人，国民党（实为共产党）派有同志讲演指导，农民异常高兴，选举职员后尽兴而散。闻一二日内尚有二三处分会成立。另据陕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 7 期报道，在 5 月底以前，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的县，在陕北北部除绥德、安定外，横山也是全省正式成立县农协会的 17 个县之一，清涧县是全省有农民协会组织的 25 个县之一。

第五节 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

一、建立绥德、佳县、榆林国民党临时县党部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凡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的指示，陕北的党组织在创建发展自身组织的同时，亦积极帮助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一个省有了两个临时县党部，始可成立临时省党部。陕西省临时省党部 1925 年 9 月 26 日成立前，全省共有 4 个临时县党部，其中绥德、榆林、佳县等 3 个临时县党部就在陕北北部。

在绥德县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成立之前，先成立了一个临时区党部。临时县党部成立之后，杨明轩、王懋廷即到附近几个县督促成立国民党临时地方组织，不久，建立了佳县临时县党部。国民党榆林临时县党部成立之前，先由榆林中学教师、国民党员朱横秋，发起在榆林中学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榆中党、团组织即派一批党、团员，以个人

名义参加国民党,成为榆中国民党区党部的骨干。临时县党部成立后,榆中区党部由学校发展到社会,成立了两个区党部。1927年春,正式组建了国民党榆林县党部,马云程,周家干、郭洪涛、井岳秀、郝敬修、白幼宜为委员,办公地址设在榆林中学平民学校。榆林中学早期党、团员张光远、李子长(又名李烈飞)、刘景象、王季明、张心斋、杨国栋、李文芳、胡颖民、秦本植,女子师范吴碧云等人,都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国民党。

国民党在陕北北部的地方组织,都是中共陕北的地方组织帮助建立的,其中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又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所以,遵照中共中央“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的指示,常以国民党的名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国民革命运动。

二、指派杨明轩南下关中主持筹组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

1925年夏,陕西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都参加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面目开展活动,并积极筹备重建国民党在陕西的组织。就在此时,报载,国民党中央的陕籍右派人士焦易堂将回陕“整理党务”。

为了限制国民党右派在陕西的活动。组建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掌握其领导权,中共陕北组织的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建议杨明轩参与其事。他们认为,时任绥德四师教务主任的杨明轩,在陕西教育界和青年中有较大的影响,请他先参加国民党,后南下关

中,联合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组建陕西国民党组织。杨明轩听从他们的建议,当即函托在北京的屈武为他办理了参加国民党的手续,于暑假期间回到西安开展组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活动。8月22日,他和刘含初具名在《新秦日报》刊登启事,宣布陕西中国国民党党员俱乐部已经成立,要求回陕的国民党党员到俱乐部签到。9月5日,64名国民党员聚会,公推刘含初为主席,杨明轩等为书记,并经杨明轩提议决定将省城分为六区,每区设干事二人进行宣传。9月12日,国民党员谈话会公推杨明轩为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筹备委员。9月26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举行成立大会,杨明轩报告了筹备经过。会议通过了临时省党部的组织大纲,选举杨明轩等9人为执行委员,王圣域等5人为候补委员。在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绝大多数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从组织上保证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性质和坚决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立场。

暑假后,杨明轩以国民党临时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陕北23县的党务特派员身份回到绥德。在李子洲的统一安排下,四师学生中的一些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被派往陕北各县从事国民党的党务活动,陕北的国民革命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六节 支持国共合作的陕西省新政权

一、西安解围,国共合作的陕西省新政权成立

1926年11月28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联

军援陕各军在西安城郊发起总攻击,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溃败,被围困近8个月的西安重见天日。

12月22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驻陕总部既是国民军联军驻陕各部队的总司令部,又是陕西的省政府,是“在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下”,“处理陕西全省军民政务的最高机关”,是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中共陕甘区委共同组成的。1927年1月,井岳秀被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命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副司令、第九路总司令,此时第九路共有7000余人,5000余支枪。同时,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命韩兆麟为绥德县长,张益为清涧县长,梁海峰为米脂县长,王卓儒为榆林县长,田芝芳为吴堡县长,郭长城为定边县长,高崇高为代理安定县长,艾罗宝为府谷县麻地沟县佐。陕北23县中,有17个县的县长由新政权委任。

新政权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实行合作,将陕西的国民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二、李子洲参与筹组中共陕甘区委

1926年11月,李子洲接到中共北方区委派他到西安工作的通知。月底,李子洲赶到了刚刚解围的西安。

随着国民军联军的胜利和西安解围,陕甘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统一陕甘地区的党组织,加强党对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建议中共中央成立陕甘区委。1927年1月28日,中共

中央决定成立党的陕甘区委,派耿炳光带中央决议回陕组织区委。耿炳光在回陕途中以密信、化名等方式,分别向绥德、榆林、延安等地的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立即派人来西安开会。

1927年2月25日,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桃胡巷举行第一次会议,耿炳光、曹趾仁、黄平万、吴化之、李子洲、赵葆华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召开第一次陕甘区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陕甘区委。之后,李子洲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在讨论《目前工作计划》时,李子洲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设想。他认为:今后一段工作的原则应该是相对集中,避免人力分散。主张把力量先集中于东至潼关,西至长武及渭河南北这一区域的主要工作上,然后扩展到其他地区;先集中于陕西,渐及甘肃等地;陕北仍集中于绥德,渐及榆林、延安。在组织工作方面,要大力发展农民党员,开展农民运动。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陕甘区委,书记耿炳光,组织委员李子洲、宣传委员魏野畴。会议通过了《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工作集中,人才集中”的工作原则和“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会议决定改组西安、渭南、绥德三个地委,组建三原、延安、榆林三个地委。

三、选派代表参加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6年底,中共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和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决定,召开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

各地选举出席省代表大会的代表。

陕北北部4个县选出出席省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8名。其中榆林县是：郭怀章、吴碧云、张永耀、刘景象、王鼎臣、李含芳；绥德县是：白士偶、安志潮、康俊阁、李子洲、刘维东、罗百福、武丕谟；佳县是：高能孝、高在位；清涧县是：惠又光、邓重庆、白诚斋。这是见之于当时报端的于会议开幕前报到的名单，据有的当事人后来回忆，陕北北部各地实际参加此次全省代表会议的，不只上列名单诸君。

1月20日至25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会议决定将1925年9月26日成立的临时省党部，改建为正式省党部。选举产生了省党部的监察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中的少数、执行委员会中的多数是共产党员，执行委员会中的3名常务委员和6名部长全是共产党员。在陕北北部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常汉三被选举为候补监察委员；李子洲、吴碧云、魏野畴、杨明轩被选为执行委员；马云程、呼延震东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李子洲任青年部部长，吴碧云任妇女部部长。

1927年6月1日至8日，陕西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绥德县代表鱼德明、徐雪尘、丁锦业、叶振云、李仰旭出席。陕北籍的李波涛当选为省农民协会正式执行委员，霍世杰、李仰旭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李还在闭幕典礼大会上讲演，号召全面贯彻执行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帝、反封建、反对新军阀的各项决议案。

四、组织党团员和学生跟随杜斌丞到西安进入中山学院和西安军事学校学习

陕北党组织为国民军联军输送进步学生和青年，是

从1926年开始的。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之后。1926年10月,国民军联军陕籍将领史可轩、中共北方区委派赴兰州帮助冯玉祥创办军事政治学校的钱清泉等途经榆林、绥德等地,史在榆林向学生讲话,钱在绥德向青年讲话,很受群众欢迎。乘此,中共绥德、榆林组织选派安子文、李林民、白雪山、张慕时、马承琪、常宣、崔仲英、张志文、李兼荣、马云泽等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冯玉祥部做军事政治工作。后来,这些青年考入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官学校(学校设在兰州,1927年初搬迁到西安,改名为随军军官学校)。

第二次是在西安城围解除以后。1927年3月,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参加解围庆祝活动。陕北党、团组织即选派各地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78人,跟随杜斌丞一同去西安。杜斌丞对共产党真诚拥护,对国共合作积极支持。他介绍马子敬、杨岐山等62名青年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介绍高岗等16名青年进入西安中山学院学习。

第七节 反对新军阀蒋介石 声讨奉系军阀张作霖

一、西安的反蒋介石反张作霖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捕杀共产党人。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 19 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

呼应蒋介石、张作霖,驻户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何经纬师,捣毁农民协会,残杀农协会员和农运工作人员,死难 11 人,受伤 40 余人。

新老军阀的残酷屠杀,激起了陕西人民对新旧军阀的义愤。西安展开轰轰烈烈的声讨蒋介石,坚持国民革命运动。中共陕甘区委编印了反蒋宣传大纲,翻印了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广为散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电,《陕西国民日报》发表社论,2000 多国民党员在西安举行大会讨蒋。全省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陕西省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各群众团体,一致拥护武汉国民党中央对蒋的制裁,通电全国打倒蒋介石。同时,中共陕甘区委,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陕西省党部,各人民团体,作决议发通电,声讨张作霖,悼念李大钊。号召全国民众打倒张作霖,打倒日、英帝国主义。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致电时在潼关的冯玉祥,并发表宣言,指出何经纬是陕西的蒋介石、张作霖,罪大恶极,全陕民众应起而讨之,为了开好追悼户县死难烈士大会,中共陕甘区委专门发表了通告书。

西安的反对新老军阀群众斗争,迅速扩展及全省各地,遍及城乡。

二、榆林的反蒋介石反张作霖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群众运动,

在陕北北部各地从未停止过,并利用各种机会去进行。绥德县于1927年1月21日举行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大会,国民党绥德县党部、陕北学生联合会、陕北青年社、工会、农民协会,第四师范学校学生会、县立高小学生会等400多名代表参加。3月18日,绥德各界代表2000余人举行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共产党员常汉三、杨和春、韩叔勋、陈愈廷等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讲,在纪念革命导师、纪念革命先烈的时候,千万勿忘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勿忘反对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中国封建军阀。

西安各界掀起声讨蒋介石、张作霖、何经纬的群众运动之后,陕北北部各地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军阀的斗争更为广泛。神木县4月23日近200工人举行县工会成立大会,24日300余人举行县商民协会成立大会;清涧县5月9日1000余人举行“五九”纪念大会,5月21日举行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5月29日1000余人举行烈士追悼大会,5月30日举行纪念五卅惨案二周年大会;绥德扶风寨300多男女群众举行妇女协进会成立大会;横山县6月7日500多人举行县妇女协进会成立大会。虽然各个会议的议程不尽相同,但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军阀则是各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老军阀”,是大家的共同心声。

在榆林举行的三次重要会议,更把陕北北部各地的国民运动推进一步。5月19日至23日,陕北23县各界代表大会在榆林中学礼堂召开,会议由中共榆林地委书记、国民党榆林县党部执行委员马云程主持,各界代表在会上严厉声讨蒋介石、张作霖、何经纬的同时,纷纷控诉、揭

露井岳秀部队和各县地主劣绅相互勾结、鱼肉乡民的事实。强烈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劣绅土豪、反对拉差拉夫”等要求，会议形成决议案 50 多件，送交井岳秀部和榆林道署各有关单位。这些决议案虽均石沉大海，但它揭露了井岳秀政权假进步、真反动的本来面目，也进一步唤醒了民众，团结了群众，推动了陕北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中共榆林地委以国民党榆林县党部的名义，隆重召开“追悼四·二八死难烈士大会”。会场分设在榆中操场和榆林城北大街凯歌楼前，分别由马云程、张光远主持，到会各界群众 2000 多人。马云程、女师学生李仙峰分别在大会上介绍了李大钊光辉的革命一生，控诉了奉系军阀祸国殃民、镇压革命志士的暴行，号召人民振奋精神，继承烈士遗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6 月 30 日晚，中共榆林地委以国民党榆林县党部名义，举行盛大的群众提灯游行大会，参加游行的有榆中、女师、职中等校学生、市民、工人、商人共 2000 多人，热烈庆祝从武汉出师的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会师于郑州。井岳秀此时已准备叛变国民革命，伺机清党，他视游行群众为洪水猛兽，故命令其部属派出大批士兵，警戒在游行队伍必经的街道两旁。但游行群众毫无惧色，一手持花灯、一手拿小旗，高呼着“打倒军阀，誓死北伐！”、“打倒南京政府！”等口号，秩序井然地游完全城。

1927 年 6 月冯玉祥致电于右任、邓宝珊在陕西实行“清党”，并颁发三条反共办法：一、不准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二、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的领袖一律解除

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加以严密监视；三、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接着反共的陕西省政府、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委会成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在陕西失败。

为了适应这一严峻的形势，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甘区委结束，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省委书记，李子洲为组织委员，崔物齐为宣传委员，亢维格为农运委员，魏野畴为军事委员，陕西的党、团组织完全转入了地下活动。8月，井岳秀开始在陕北“清党”反共，陕北各地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榆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榆林组织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二编 组织

第四章

榆林初期的土地革命战争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榆林的政治形势

一、井岳秀在陕北“清党”反共

以冯玉祥的总参谋长石敬亭为主席的反共的陕西省政府成立后,致电各地加紧“清党”反共。以井岳秀为代表的陕北反动势力,在榆林开始了“清党”运动,对陕北的中共党、团组织及党、团员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搜捕。暑假前夕,井岳秀派兵强行封闭了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榆林县党部、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禁止各校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的活动。逮捕了工会委员长李文正、商会会长康治臣,通缉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马云程、郭洪涛、周家干,榆林中学党组织负责人刘景象、杜聿德等人。同时井岳秀派其部旅长刘润民,于8月4日武装查封绥德第四师范。他们把教师学生全部集中起来,挨个搜查、押送出校。严令四师校长、共产党员常汉三三年内不准任教,不准担任公职,不准离开绥德。同时,将正在高伯定(在北京上过学,与四师的教职员认识)家吃饭的中共绥德县委(7月,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建为绥德县委)书记蔡南轩、宣传部长关中哲,以及雷五斋、赵少西四人抓走。

形势突变后,马云程和张光远一同离开榆林赴北京继续上大学。郭洪涛、周家干、武开章、王振华等“红得出了名的人”也纷纷离校,转赴家乡或到教育界、部队、农村,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和其他各学校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也都被迫出走。中共绥德县委、中共榆林地委,在白色恐怖下被迫解体。随后,井岳秀的“反共清党”活动殃及其他各县。反动势力捏造罪名,将中共佳县县委负责人杜嗣尧、高锡爵、高光祖等数十人控告到榆林,县委负责人隐蔽脱险,县委机关被迫解体。新任佳县县长陈瑞改组了国民党县党部,驱逐共产党人,破坏基层组织,解散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

陕北的革命运动,在井岳秀反动统治集团的疯狂破坏下,处于低潮。

二、清涧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

1927年10月1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白乐亭),率领党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驻清涧部队中的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

1925年,先后任安定县警佐和井岳秀部石谦团第三连连长的李象九,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加入共青团。同年,共产党员谢子长率领的安定县保安团改编为石谦团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绥德团组织派史唯然、阎红彦等一批团员和进步学生,到李象九连和谢子长连当兵。在李象九连建立了团支部。1926年春,绥德党组织派四师教员、共产党员李瑞阳到李象九连工作,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暑期,中共绥德地委又派一批党、团骨干到该连从事文

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在该连举办干部训练队，抽调班、排长进行军事政治训练。

1927年春，井岳秀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九路，石谦任第六旅旅长，李象九升任营长。石谦部队中党、团组织也有了更大发展，特别是李象九营的党、团组织发展更快，连队大多建立了党支部，有些连队的班、排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战士中亦有相当数量的党、团员。这些党、团组织除了定期召开党、团小组会、支部会外，还经常举行时事报告会、讲演会、辩论会，激发官兵的革命斗志。组织骨干分子到部队驻地附近各乡村，宣传、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反对拉夫拉差、苛捐杂税、官方放赌。谢子长在安定县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在谢子长的支持下，安定县农民协会拘禁和审判了恶绅宋运昌、李跃辉、王伯扬等，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这次斗争鼓舞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谢子长因此被群众称为“谢青天”。

然而正当革命力量在第六旅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井岳秀借口给自己做寿将倾向进步的石谦旅长诱骗到榆林暗杀，任命亲信营长康子祥代理旅长，令骑兵团长种宝卿在清涧、安定一带“严加防范”。假借换防，企图消灭共产党人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

1927年秋，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中共陕西省委派原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唐谢和白明善到驻防清涧石谦部队，与李象九、谢子长一起领导部队党的工作。不久，省委将李象九部的党支部划归省委军事部（军委）直接领导，与陕北党发生横的关系，并在石谦被

暗杀后,制定了李象九部反井举义“先由陕北清涧退至宜川,再不得已退至关中道合阳等地”“再谋与许权中同志会合”的行动方针。

石谦遇害,引起石部官兵极大愤慨。李象九和唐澍、谢子长等,通过公祭石谦,揭露井岳秀的残暴罪行。利用为“石旅长报仇”的口号,加紧进行起义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他们加强对部队的军纪教育;派李维俊、白锡龄去宜川,联络由共产党员李瑞成率领的第十连配合起义;由白乐亭负责,联系地方上的一些党团员参加起义。10月11日,部队封锁交通要道,割断清涧与榆林的电话联系;利用当天(农历九月十六日)城内逢集的机会,集中牲口向城外运输装备、物资;查封了清涧县城内几个大商号的银柜,向县长、大绅士“声言借钱,不加伤害”,共筹集辐重200多驮。

10月12日清晨,李象九在清涧向部队宣布起义和攻打宜川的命令,部队随即沿清涧河南下。当日下午,抵达延川县城与王有财连会合后向西疾进。晚上,在老庄河宿营。部队一路上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少战士路过家门而不入。13日,经杨家沟抵达延长县城附近。谢子长一面派班长周增玉等携带“公事”进城联系,一面亲率先头部队快速前进,以奇袭的战术缴了延长城防营长齐梅卿的枪。城内除寨山上一个排外,全部缴械投降。次日早饭后,起义部队处决了齐梅卿,继续向宜川挺进。

宜川城内驻有康子祥旅部及其控制的第五、六两个连,共产党员李瑞成等领导的第十连、第九连和骑兵连也驻在城内。在清涧起义的当天晚上,李瑞成带领第十连分三路突然冲进第五连营区,打死连长雷克让等人。经一夜

激战,控制了半个县城及西门、北门,形成对峙状态。15日下午,清涧起义部队到达宜川城外,与城内起义部队相配合发起进攻。康子祥见势不妙,带十几个随从仓皇逃跑,其余全部投降。清涧南下部队与宜川城内的第十连、九连、骑兵连等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占领宜川后,起义部队领导人之间在部队整编、行动等问题上意见发生分歧。唐澍提出要公开打出红旗,清理内部,各级军事指挥员改由党、团员担任;而李象九认为不应大量撤换干部,唐澍即去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

起义部队在宜川改编为旅,李象九任旅长,原旅部参谋孟微斋任参谋长。旅下辖3个营,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分别任营长,全旅近千人、1000多支枪。

清涧起义使井岳秀万分恐慌,他急令驻守延安的高双成率部围攻宜川。起义部队由于行动方向不够明确,战术应变不够灵活主动,造成滞留宜川城被围挨打的局面。高双成在加紧围攻的同时,还给起义部队一些连排长写信煽动其叛变。在这种形势下,高部很快占领了凤凰山、虎头山、七郎山等制高点,起义部队最后不得不仓促突围。除谢子长和韩起胜营的部分人员冲出包围外,其他人均被冲散,辐重全部丢失。突围部队向韩城方向退却,到韩城西庄镇村只剩下二三百人,暂时归杨虎城留陕的王保民部编制。

11月,唐澍携带省委指示,同省委派到起义部队工作的阎揆要一起去宜川。在途中得知部队已突围到了韩城,遂转赴韩城西庄镇找到部队。唐澍到部队后任参谋长,阎揆要任教导队队长。由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史唯

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拉到清涧、安定一带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十几天的准备后，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史唯然任大队长，率起义部队北上举行二次起义。途中听说宜川城内兵力空虚，决定突袭宜川县城。

经半天激战，始知城内驻有高双成的师部、直属连队等众多兵力，遂撤至城西 20 里的一个村庄休整。这次战斗伤亡 10 余人，损失枪械 200 余支，白乐亭、史唯然等负伤。在敌军的追击之下，部队继续北撤，一路上屡遭袭击，减员甚多。最后经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到达陕甘交界的豹子川时，只剩下 20 多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先后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其余分散隐蔽，等待时机。

清涧起义，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的一次武装暴动。历时三个多月，先后转战清涧、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安定、安塞、保安等县，部队曾发展到 1000 多人。终因党处于幼年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失败了。但它打响了西北地区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点燃了武装革命的火种。在西北党的历史上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二节 中共陕北特委成立

一、中共陕西省委对建立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

井岳秀反共“清党”后，坚强的陕北人民没有被白色恐

惨所吓倒,革命斗争旋即转入地下活动。一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骨干分子分赴陕北各地,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秘密地恢复、发展和壮大基层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9月,共产党员杨璞(杨玉峰)等在镇川建立了中共镇川支部。书记杨璞,组织委员强雄飞,宣传委员刘述蔚,隶属中共米脂区委领导。同月,王兆卿在神木南乡贾家沟建立了中共贾家沟支部,书记贾怀光。不久,高岗由西安中山军事学院回到横山开展革命活动。他与马明方、曹亚华等在响水堡、横山旧城创办了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宣传革命道理。中共神木第一高小支部发动神木城关及城郊300多群众,揭发清算了县长鹿仁安、里民局长乔济贪污公款的丑行。这次斗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10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冯文江、焦维炽等,到绥德秘密恢复党的组织。他们到绥德后,很快恢复了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冯文江。同时建立了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焦维炽。随后,冯文江、赵通儒等去米脂、横山、榆林、神木、府谷、佳县、三边等地巡视工作,帮助恢复党、团各级组织。赵通儒到佳县神堂沟召开党代表会议,重新建立县委机构,书记高光祖,组织部长高长直,宣传部长乔鼎铭。不久,陕北党组织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函,要求对在军队、农村、学校的同志加强领导,做好各项工作。

11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陕西省委联合发出《三个月组织工作计划大纲》,其中计划在陕南、陕北两地

设立党、团特委。28日,共青团陕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为了加强对陕北团组织的领导,会议决定设立共青团陕北特别区委员会,任命焦维织为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12月下旬,中共府谷县委成立,书记严念祖,副书记柴培桂,组织部长郭天锡,宣传部长刘子安,县委委员有苏建勋、赵同光、刘世英、韩峰等。同时,还成立了共青团府谷县委,书记柴培桂(兼)。中共米脂区委改为米脂县委,书记刘春园,县委辖8个支部。共青团米脂区委亦改为共青团米脂县委,书记李毓花。冬,赵通儒在榆林南门外召集榆中李文芳、白树堂等党、团员开会,秘密恢复榆中党支部,书记马济川,组织委员白树堂、宣传委员李文芳。后,接收榆中学生乔钟灵、王丕丞、刘长健、邵三春、王怀智、申世鑫、高仰云、高锦纯等为党员。同时,中共清涧区委在石台寺小环沟建立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对外称育新毛纺厂。

1928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陕北特委,并派杜衡到陕北筹建特委。会后,杜衡先到绥德与冯文江、赵通儒接洽,布置了工作任务后赴米脂、榆林、神木、清涧等地巡视检查工作,帮助恢复、整顿各地的党、团组织。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26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下,开展游击战争,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为便于领导,将全省划分为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区。3月,杜衡在榆林、神木巡视工作时,分别召开党、团会议,成立了中共榆林县委,书记李文芳,组织委员白树堂、宣传委员叶贤英。同时,成立共青团榆林县委,书记赵亚农,辖城关、横山两个区委。成立中共神木城关区委,书记杨林(杨和春)。

二、中共陕北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里,中共陕北的组织两次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其中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因敌破坏而流产。

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西川苗家坪(今子洲县)的南丰寨古庙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冯文江和榆林代表李文芳,神木代表张蜀卿,府谷代表柴培桂,绥德代表赵通儒,米脂代表景仰山,清涧代表师应三,苗家坪区委代表苗仰实等十几人。会议首先举行了预备会,研究通过了陕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大会由杜衡主持,并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与会代表分析了陕北政治军事形势、各派军阀的实力和矛盾,讨论了在学校中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学生运动,开展对反动派的斗争;在旧军队和土匪帮会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兵运工作;在水手、船工、煤炭、脚户和城镇工人中组织工会,领导其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等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政治、组织、农运、青运及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工作等决议案。决定当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积蓄力量,开展斗争,恢复和建立扩大各级组织机构,讲究秘密斗争策略,加强对党员的训练,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普遍建立农村党支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未到职),青年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

1928年9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接到中共陕西省委

《关于陕西暴动行动计划》，准备在米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省委的计划，讨论制定陕北行动计划。由于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杜衡缺乏警惕，麻痹大意，没有正确估计形势和敌情。加之，米脂街上出现了一些外地青年，口音服装不相同，渭华暴动的风声，又使城内群众议论纷纷，一时谣言四起。有的说土匪要攻城，又传说共产党要举行暴动。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和驻军的警觉。9月28日（中秋节），各地代表陆续到齐，会议尚未开始，米脂县政府从绥德调来一营兵力，将米脂县城突然包围，搜捕共产党人。这时，常黎夫（常应黎）、窦增荣等几次告急，催促参加会议的人快走，仍未引起杜衡的足够重视和警觉，致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遭逮捕，中共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未能举行。贾拓夫、李文芳被捕后因无证据，关押半月后具保获释。由于从杜衡、焦维炽身上搜出组织和人员代号的笔记本，被押送到榆林。经榆林地方党组织多方营救，于年底被释放。杜衡出狱后，即赴西安。米脂中秋节事件发生后，井岳秀派刘润民带兵到米脂三民二中搜查、焚书、训话，白色恐怖一时笼罩米脂。中共陕北特委虽然受到破坏和冲击，但组织仍然存在，同志们的情绪并未低落。10月初，特委委员杨国栋、冯文江、赵通儒等在绥德西川苗家坪小学（苗家坪区委所在地）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共商善后事宜。会议决定由杨国栋代理陕北特委书记，调白明善、霍世杰参加特委工作。会后，特委机关迁往清涧县折家坪村。不久，由于折家坪村子小，人员不易隐蔽，又搬迁到老君殿（今属子洲）。这段时期在特委工作的有杨国栋、贾拓夫、冯文江、刘澜涛、白明善等人。

三、中共陕北特委继续恢复建立陕北北部各地的党团组织

1928年4月,中共清涧区委根据陕北特委指示扩建为县委。书记师应三,组织委员刘耀山,宣传委员刘国恩,下辖4个区委。共青团清涧县委同时建立,王希勃任书记。陕北特委又将中共镇川支部,扩建为区委,书记刘绍让,组织委员崔明道,宣传委员刘述相,区委机关设在镇川小学,直属陕北特委领导。5月,中共佳县县委改为特区党委,属米脂县委领导,书记乔鼎铭,组织部长张俊贤,宣传部长高长直,机关由神堂沟迁往高家塔小学。7月,共青团陕北特委指派刘澜涛(化名刘鸿飞)到定边,以单级师范学校教员身份作掩护,建立了共青团定边工作委员会,刘澜涛任书记。年底,中共陕北特委为便于工作,将榆林城区委和榆林县委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榆林县委,书记胡颖民,组织委员刘德全,宣传委员范嗣淹,团县委书记刘秉钧。原榆林县委下辖的横山区委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书记曹亚华。

1929年2月,共青团陕北特委在米脂三民二中举行扩大会议,健全了团特委组织。贾拓夫任书记,李文芳为组织委员,刘秉钧为宣传委员,常黎夫、赵颢龙为委员。3月,井岳秀下令封闭米脂三民二中,国民党县长带领警察到三民二中向全体师生宣读布告,勒令学校封闭。中共陕北特委和米脂县委领导三民二中师生组织护校委员会,校长杜立亭带领学生到县政府静坐请愿。但由于井岳秀停止拨款,三民二中在暑期前被迫停办。这年春,陕北特委派刘澜

涛去吴堡,景仰山去神木,府谷巡视检查指导工作。他们分别召开党、团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和陕北特委会议精神。4月,中共清涧、延长、延川、延安等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在清涧把子山召开。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陕北特委会议精神。会后延安各地的代表将“打倒蒋介石”、“抗租,抗赋,抗捐,抗税,抗债”等口号写成标语沿途张贴。5月,榆林职中校长高崇指使他人将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党支部书记高尊德痛打后开除学籍。职中党支部动员学生罢课,提出4项要求。中共榆林县委发动榆林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罢课支援。迫于形势,高崇只得接受学生提出的条件,职中学潮取得胜利。

7月中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加强陕北特委的工作,派吉国桢(纪国桢)、张文华赴陕北分任党、团特委书记,苏士杰(苏醒民)到陕北特委搞军事工作,9月,三人分别来到陕北特委。此时,陕北遭遇大旱,群众生活相当困难。中共陕北特委派杜嗣尧、霍世杰赴北平从华洋义赈会领到一部分赈款赈粮运回陕北,无价散赈或低价出售给沿黄河的府谷、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县的饥民群众,起到了一定的救急作用。与此同时,陕北特委派白明善去府谷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白明善与严念祖、柴培桂等人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群众,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快恢复和建立起各级党团组织 and 群众团体。同时,中共陕北特委派赵通儒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兼特委南路特派员,全面负责清涧以南的工作。

11月7日,中共榆林县委与榆林中学党支部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2周年,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印刷传单在榆林城各处张贴。当晚榆中学生党员刘长健贴传单时,被军警发现抓捕,关押数日后因无证据被保释出狱。12月,赵觀龙、贾鸿儒、苗乐山等在安边成立中共三边区委,属陕北特委领导,机关驻安边镇,辖定边、安边两个地方党支部和国民党驻军内的两个党支部。

1930年初,中共陕北特委派胡颖民任中共三边区委书记,汤登科、龙施普、韩一凡为区委委员,三边区委有党团员三四十名。2月,井岳秀将榆林中学校长马济川与绥德四师校长柳砚琛对调,陕北特委机关在榆林无法立足迁往绥德。柳砚琛到榆林中学后,解散了榆中平民学校,在原址上建立国民党县党部,使中共党、团组织多年来在榆林的一个重要活动点遭到破坏。同时,陕北特委派景仰山任中共府谷县委书记,恢复了县委工作,吸收大批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刘志丹到定边、安边检查工作传达特委指示,动员牛化东等一批党、团员去宁夏苏雨生部王子元团搞兵运工作。常立德、高仰云先后继任中共米脂县委书记,毕维周接替常黎夫为团县委书记。4月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书记杜衡到绥德、米脂、榆林巡视工作。在米脂,杜将党的县委书记高仰云撤职,以团的县委书记毕维周接任。到榆林,杜在红石峡召开了榆林县党、团负责人会议,指示榆林党、团组织要加强对手工业工人的教育,在井岳秀兵工厂建立团组织。会上决定筹建陕北学生联合会,确定榆林中学石作琦、刘文春为陕北学联代表,尽快与

绥德四师和延安四中取得联系,以便建立学生联合会,开展活动。

1930年4月4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向西路、陕北、各军支等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70号通告精神,指出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各地党组织要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向着中心城市发展,首先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陕北的中心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兵变、扩大红军等。据此指示,中共陕北特委部分委员和有关县的代表10多人在绥德合龙山举行会议。杜衡在会上讲了关于职工运动、士兵运动、妇女运动等12条意见,并安排布置以榆林为中心开展红五月活动。会后张文华来到榆林,积极筹划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召开群众纪念大会。5月2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指示陕北特委,要抽调得力干部,加强延安、绥德、榆林、神木、清涧、米脂等中心区域的工作,加强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要求深入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发展和巩固党的力量和群众基础。30日,根据省委的指示和陕北特委的安排,中共榆林县委、吴堡党支部分别领导榆林女师和吴堡宋家川高小全体师生与市民集会、游行,隆重纪念五卅惨案5周年。7月,国民党重建清涧县党部,中共清涧县委机关也由城镇转入农村,刘耀三任县委书记。9月初,中共米脂县委派毕维周到佳县整顿党的组织,恢复了佳县特区党委机构,高光祖任特区党委书记,组织委员高长直,宣传委员高能孝。

第三节 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一、绥德抬龙王楼斗县长

1928年夏,中共绥德党、团组织根据旱情严重、饥民四起的现状,利用四乡农民抬龙王楼祈雨的迷信活动,发动了一场抬龙王楼斗县长,迫使其赈救灾民的群众运动。

党组织首先指派共青团员马仰西、高承恩等人,在绥德城内的二郎庙、三官庙、西门娘娘庙和南关老爷庙抬起四座龙王楼。先后到大劣绅马炽庵等所开的欺压农民的“永泰祥”商号和鸡蛋厂示威游行,震动了全县的地主豪绅。抬龙王运动发展到了高峰,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绥德县政府的县长。党组织经过周密安排,广泛动员城区四乡灾民抬龙王楼进城参加斗争。第三天上午,城内的几座龙王楼在高承恩等指挥下,首先冲进县衙闾人大堂。县长艾崇德闻讯大怒,踱出二堂指责灾民“胡闹”,要把灾民们“赶出去”,“押起来”。这就更激起了抗灾群众的义愤,抬起龙王楼直向艾崇德撞去。县衙的差役见状不妙纷纷溜走,艾崇德惊慌失措逃进三堂,群众乘势冲入三堂,将其住宅团团围住。此时,抬着龙王楼涌向县城的四乡灾民,在城门口和奉命阻挡的士兵发生了冲突。国民党驻军的两个营长田润民和杨向枝看到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只得收回成命,敞开城门,让四乡灾民浩浩荡荡地直奔县衙门。一时衙门内锣鼓齐鸣,吼声动地,形成了反对贪官污吏的群众怒潮。

慑于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县长和驻军营长及地主绅

士,只好向各座龙王楼烧香磕头,并答应了惩办劣绅马炽庵,灾年减租减税,富户出钱粮赈救灾民等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二、四十里铺农民斗顾家杂税局

1928年春末夏初,在共产党员崔正武等人的领导下,绥德四十里铺、赵家砭一带的广大农民群众,发起了一场以反对顾家杂税局为主的抗杂税运动。

四十里铺方圆有名的大地主、恶霸顾士明,有地近千顷,年租百千石。他不仅利用高利高租盘剥乡民,还在四十里铺镇上包设了杂税局。任用本家侄子顾七等恶少为爪牙,专门负责征收牲畜的交易税和屠宰税。他们私自提高税率,随意强征滥罚。强行规定当天屠宰、交易的牲畜,当天就要纳税,否则就是漏税,加倍罚款。横征暴敛,成为绥德北区的一霸。

5月初,崔正武集中部分农民代表,在四十里铺前街高房院杀猪吃了齐心饭,商议抗杂税斗争的策略。决定由崔正武、贺加昌等人去县政府控告顾家的不法行为,不料反遭县衙扣押。群众闻讯,怒不可遏,遂在刘金榜等人的带领下,组织几百人奔赴绥德县城包围县衙,迫使县衙释放了崔正武等人,并答应按村摊派杂税。但其承诺并未实施,顾家杂税局照收杂税。党组织又积极准备,掀起新的斗争高潮。

6月下旬,逢大集的一天,四十里铺方圆几十里约上千名农民群众,在崔正武等人的带领下,涌向顾家杂税局。砸了招牌,赶跑顾家恶少,并将顾士明围困于一商号内。顾

士明的亲家、大地主刘步云急忙派人到县衙诬告四十里铺乡民抢劫,要求派兵镇压。第三天凌晨,驻绥德国民党军奉命前来弹压,绑押崔正武、贺汉祖等人强行驱散抗税队伍。这一暴行犹如火上浇油,抗税的四乡农民遂扩大成为3000多人的反抗大军,将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于四十里铺小学,并严正提出“废包税”、“行摊派”、“审顾七”等正义要求。群众斗争的狂涛,迫使营长和承审员释放了被押人员,答应了群众提出的全部要求,杂税局被废止,人民的抗杂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三、义合农民抗烟亩税

1928年前后,绥德东区义合一带的农民种植鸦片者甚多,均须向官府交纳很重的烟亩税。是年春夏之交,因虫害的影响,烟草大多坏死,几乎毫无收成,用高利贷款做投资的农民,已处于倾家荡产的绝境。但县、区官府却不顾群众死活,派衙差、区丁绳捆棒打农民催征烟亩税,不少人被逼得离乡背井。针对反动政府的苛法酷政,中共义合支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分头去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抗烟亩税的斗争。

基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白色恐怖严重的现实,党支部决定在斗争策略上不采取那种只图形式上轰轰烈烈,容易暴露组织的过激行为,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说理斗争。支部内进行了明确分工:支部书记李芳春为总指挥,负责动员镇属的几个村庄,支委霍维德负责义合北川片,刘凤义负责东沟片,常永昌负责南川片。首先,在各村选择几位有威信、有觉悟的农民骨干,利用亲友邻里关系进行串

连,逐步扩大抗烟亩税的队伍。其次,由各村代表带领群众,去义合区公所向区长请愿,要求豁免烟亩税。从6月下旬至7月下旬,仅北川片去区上请愿的农民代表就有300多人次。日盛一日的小股请愿活动,引起了义合区长李怀仁的惊恐。他急忙给县府呈文,诬告刘凤义和霍维德为“共产余孽,煽惑农民,抗交烟税,请予惩处,以便征收”。

义合党支部得息后,立即向中共绥德县委汇报,决定一方面以农民代表的名义向县府递交诉呈,陈诉豁免烟亩税的情由。一方面派李芳春赴县交涉,据理澄清区所的无端诬告。由于这次运动组织严密,事理无懈可击,县府不得不接受农民的要求,减轻烟亩税,对抗烟亩税活动也未予追究。

四、镇川农民抗白地捐和“吃大户”运动

1928年,陕北遭大旱,榆林镇川堡的水地颗粒无收。但榆林县政府两次下文,要在镇川的800多亩水地上征收“白地捐”,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义愤。

为了支持农民的正义斗争,打击反动政府的气焰,中共镇川区委朱侠夫、朱子休领导农民进行抗白地捐斗争。县长王季斌,亲自带人到镇川征收,中共镇川区委及时组织500多名群众集聚镇川,朱侠夫等人又将王季斌诱至愤怒的群众面前。群众的叫骂喊打之声不绝,吓得县长撒腿就跑,慌不择路,躲进一座破庙里。群众追踪而至,将其扣在庙里的一口大铁钟下面,外面堆上干柴,声言:“如不免捐,就放火烧人!”王季斌吓得喘不过气来,终于签字画押,同意免掉“白地捐”。

是年大灾荒,逼得不少穷苦人拖儿带女外出逃荒,更多的人则靠挖野草剥树皮苦度日月。此时,镇川的一些豪绅大户则囤粮居奇。为了解救濒于绝境的农民,镇川区委遵照陕北特委的指示,派朱侠夫等人在镇川开展“吃大户”运动。朱侠夫和朱子休把聚集在镇川的五六百饥民组织起来,走街串巷,过村奔乡,先后到镇川的豪绅大户申家、艾家、罗家、朱家吃喝。他们先礼后兵,给吃则罢,不给吃就采取硬性行动。“吃大户”运动,很快从镇川扩展开来。邻近镇川的米脂,不仅有“吃大户”的斗争,在米脂党组织的领导下,李郁华、崔凌汉还发动 3000 多农民群众,进城包围国民党县政府,要了劣绅与污吏把持取利的义仓粮。

五、府谷群众开展“交农”运动、反厘局斗争

1928 年 7 月,府谷大旱。中共府谷县委利用这一时机,提出“不减租税不种地”的口号,发动农民开展“交农”运动,进行抗税斗争。

11 月,中共府谷组织负责人白明善、柴培桂等组织学校师生和运输工人几十人,要求国民党县政府民政科长苏德和停收斗捐税。苏不答应,群众当场打了他,又将他拉到街上,让更多的群众来声讨。苏慑于群众的压力,宣布停止征收斗捐税,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久,白明善、刘子安、刘世英、张子栋等人,联合国民党农村自治筹务处指导主任柴东阳,开展了打厘局斗争。12 月 26 日,由柴东阳出面以会操为名,集合南门第一高小,第一、二模范小学的学生,义务师范班和村长训练班的学员,人人手拿“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等标语小旗游行。

沿路又汇合了黄河渡口的运输工人和农村来赶集的群众数百人,直奔县厘金局局长的住宅,接着又冲到县盐厘局抗议,并向他们宣布:一不准再派卡丁、税丁勒索百姓;二不准再以偷税、漏税等名目滥罚百姓;三是当面向百姓赔情道歉。这次斗争团结和动员了很大一部分群众,鼓舞了群众斗争的志气,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同时,府谷的党组织还发动教师进行索薪斗争,迫使当局撤了政治上反动思想上守旧的县教育局长和几名高小校长的职务。共产党员刘子安接任了县教育局局长,凡所高小的校长也换成了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教师。

六、三皇峁盐工打盐局等斗争

1929年夏季,绥德西川(今子洲县三皇峁)十里盐湾有盐工近千人,靠生产小盐为生。国民党县政府在此设立盐局,收取盐税。盐工既受盐主的剥削,又受盐局收两道税的双重盘剥,生活痛苦不堪,难以维持。盐工恳求盐局收上一道税,但盐局局长不但不答应,还不准群众写呈贴上诉。于是在共产党员李景林的带动下,爆发了打盐局的斗争。张建财和张学贤,敲着铜锣集合了几百名工人,带头向盐局冲去。愤怒的盐工们手拿铁铤、火枪高喊口号把盐局团团围住,要求局长出来说话。盐局官员见盐工人多势众,怕得闭门不出,盐工们便拿来干柴,准备火烧盐局。盐局局长见众怒似火,跪地求饶,给工人钱财,可是盐工们不接受,一定要减免盐税。最后,盐局不得不答应减税要求。

1929年,佳县、吴堡、横山等县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向国民党政府、豪绅地主进行斗争。

6月,佳县党组织在农村组织了“农民之友会”与豪绅地主进行斗争。年底,共产党员牛营清、常在全、张书信等人,领导凌水寺、陈家岔、高庙山等20多个村庄的2000多名群众,开展分粮吃大户运动,坚持两个月之久。

同月,吴堡县的薛尚英、慕嘉绩、张毅忱等共产党员,领导岔镇及附近数十个村庄的500多名群众,与贪污受贿、私增地亩税的国民党县财政局长兼岔镇区长薛有年和劣绅薛时忠进行斗争,取得了胜利。10月,慕嘉绩、王国昌、张毅忱等人,又发动和领导高小师生,针对国民党县教育局局长宋尧生贪污教育经费、吸食大烟等问题,召开清算大会,历数其罪行,取得了胜利。

同年夏,横山县党组织派县第一高小支部书记李树林去青坪,与曹动之、李坤润、郝振秀、杨文耀等党员,到各村发动群众抗粮抗捐。不久,青坪的数百名农民群众在李坤润等人的带领下,与黑木头川、响水、油房头等地1000余名群众,聚集县城请愿。经过说理斗争,国民党县长张斗山被迫宣布免除当年的粮款。

第四节 艰难曲折的兵运工作

一、中共陕北特委张家岔、红石峡扩大会议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绥德西川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杜衡、杨国栋、冯文江、刘澜涛、贾拓夫、赵通儒、白明善、常立德、谢子长、蹇增荣(米脂代表)、周发源(绥德代表)、杜守智(延安

代表)、孙兰馥(安定代表)等20多人,马文瑞列席了会议。杜衡传达了中共六大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冯文江代表特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按照六大决议确定特委的工作方针是:深入群众,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等待时机进行苏维埃运动。批评了杨国栋不遵守纪律、生活腐化、主观武断和单纯结交白军军官的所谓“军事工作”等错误。决定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会议选举了中共陕北特委执委常委,杨国栋继续代理特委书记,增补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委员、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后,特委机关迁往榆林。

1929年春末(或夏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城北红石峡天门、地门之间的洞穴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杨国栋、刘澜涛、冯文江、贾拓夫、白明善、李力果、常立德、刘秉钧、霍世杰、乔乃文、韩俊杰、胡颖民等10多人。会议提出搞武装斗争要采取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红色的(公开组织革命军队)三种形式,并主张要以搞白军工作为主。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推动灾民分粮、吃大户运动。批判了杨国栋的右倾错误,并撤销其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职务,由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

二、在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建立中共秘密组织

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后,为了打击井岳秀集团的反革命气焰,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先后派遣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井岳秀、高志清、石子俊、王子元等

国民党部队去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开展秘密兵运工作。

在高志清部的中共组织及活动。驻神木的高志清部,始建于1923年,1927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路骑兵团,1928年上半年被缩编为陕西警备骑兵团,长期受井岳秀的节制和排挤,高、井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根据这一情况,提出“反蒋必先倒井”的口号,和“倒井须要联高”的思路。因此,请陕北著名人士杜斌丞先生,前往神木说服高志清“倒井”。又派共产党员杜鸿范、高宜之打入高志清旅部,与原在该部的共产党员张慕时,共同做中下层军官的工作。根据特委的指示,米脂县委派米脂三民二中学生、共青团员高学孔、高仰观、常翔峰、杨春兰、高文昭、刘德禄,米脂桃镇高小派进步学生高照璧、郭秉金、高振汉、高培、申长雄、申长敦、薛富华、常福耀和工友常焕文,绥德县委派团员刘尊山、高云亭,佳县区委派党、团员张俊贤、贺大增、刘均厚、马增前、刘国昌、刘国梁、乔鼎铭、马子骥等20多人前往神木,分别在高志清直属补充营手枪连和其他三个连队当兵,开展基层活动。在此期间,杜斌丞先生偕曹又参去神木说服高志清“倒井”,未果,愤而离去。1928年11月,高志清部补充营各连的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并组建了中共手枪连特别支部,刘尊山任书记,刘德禄、高学孔任委员,受陕北特委直接领导,和神木县委发生横的关系。其他三个连队只建立党小组,属手枪连特别支部领导。中共手枪连特别支部建立后,发动党员在士兵中广泛交朋友,扩大影响。先后又发展高照璧、常焕文、姬占昌、袁福禄、张德胜等多人入党,并培养了一批发展对象。是年冬,补充营第二连党小组已发

展党员 12 名,单独建立了支部,由张俊贤任支部书记。1929 年春,刘尊山因准备以“开小差”形式去特委联系汇报工作,被高志清关押了四个月之久,手枪连特支即由刘德禄负责。秋天,高志清部派刘尊山、刘德禄、高仰观、贺大增、马耀先、高云亭等去井岳秀在榆林开办的军官教育团学习,张俊贤、杨春兰、高文昭等又先后离队转回家乡搞地方工作。到 1930 年冬,手枪连发生兵变时,高志清部只有高宜之、常翔峰、高学孔、袁福禄等一部分党员。

在井岳秀直属部队中的中共组织及活动。1929 年秋,井岳秀在榆林开办了八十六师军官教育团(下设步兵、炮工两科),训练连、排、班下级军官。中共陕北特委和各县党组织即选派一批优秀党、团员前往受训,并相机开展活动。11 月中旬,团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兼搞特委的军事工作,他根据军队秘密工作的特殊要求,在征得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苏士杰同意后,将军官教育团的团员全部转为党员。1930 年初,正式组建了军官教育团党支部,书记姜海龙(姜兆莹)。此时,炮工科有党员何格兰、杨德厚等 10 多人,新发展党员孙师策、边临雍、魏志仁、李文赤;步兵科有党员张耀文、贺大增、高照璧、刘尊山等 10 多人。同时,将炮兵营的 13 名党员组建了一个支部,由张怀树负责,在八十六师刘润民旅部当文书的共产党员王贵宾,担任各军支与陕北特委军委之间的秘密交通员和情报员。1930 年 5 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陕北巡视工作,决定将陕北特委机关再次由绥德迁往榆林,并派特委委员李文芳上榆林先做准备,兼做军官教育团的工作。李文芳通过王贵宾与各军支取得联系,利用军人放假外出的日子,在榆林东

山药王庙、平民学校等处与军支负责人碰头,传达上级指示,听取组织发展汇报。1930年秋,军官教育团第一期学员结业,大部分回到部队,只留炮工科工兵专业的40名学员做骨干,组建了八十六师师部直属工兵连。党员何格兰、杨德厚、赵经昌、邱维汉、孙师策等,分别担任了班、排长。工兵连党支部成立后,何格兰任支部书记。同时,由特委杨国栋指派打入八十六师补充营内的共产党员梁毓凤(梁介宾)、梁思德、梁毓珍也组建起了补充营党支部,梁毓珍任支部书记。

在高双成部的中共组织及活动。延安是井岳秀在陕北统治的又一个重点,由高双成旅驻守。1928年渭华暴动失败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辗转来到高部继续开展活动。1929年3月,中共陕北特委派李馥华、赵觀龙、冯世光到延安区委指导工作。延安区委高鹏飞以收古董为掩护,专门负责高双成部队中的兵运工作。高双成部营长李含芳,连长王之环、魏明,高双成的卫士李玉田及一些班、排长许先志、殷保民、何格兰、魏俊德、张俊英、张耀文等都是党、团员,也建立了军队特支。红石峡扩大会议后,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来到延安,召集李含芳、王之环、高鹏飞、高岗等军运工作负责人开会,听取军运工作汇报,传达特委扩大会议精神。指示要把学运工作转移到军运工作上来,积极准备在高双成部发动兵变,以期建立革命武装。井岳秀军官教育团开办后,何格兰、许先志、李玉田等到榆林参加学习,高双成部的中共军支由殷保民负责。1929年冬,由于李含芳叛变,王之环等被捕就义,兵运领导人被迫离开延安,高部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在苏雨生部的中共组织及活动。1929年冬,宁夏骑兵第十六师师长苏雨生收编了陕北地方武装石子俊部为第九旅,由石子俊任旅长。1930年1月,苏雨生又将另一陕北地方武装王子元部收编为第八旅十五团,王子元任团长。谢子长因在清涧起义时和石子俊相熟,被石子俊邀请任第九旅名誉副旅长。刘志丹、谢子长还利用和王子元是“把兄弟”的关系,于1930年初介绍共产党员张东蛟到王子元十五团担任了中校团附,陕北特委在此基础上,又由各县陆续派了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九旅和八旅十五团当兵。榆林派出的党员有张秀山、曹华山等8人;横山派出的党员有李树林、黄育华、吴世彩,进步青年李贵春、魏长春、魏长城;定边派出的党员有牛化东、吕振华、姜耀、刘子珍、朱光继、刘世庵、汪兴民等。延安军支遭破坏后,高岗、高鹏飞等也来到王子元部。不久,谢子长又派去贺晋年、李仲英、高昆山、史法直等人。1930年春,经谢子长策划决定在宁夏平罗的立岗堡(今贺兰县),将陕北派到八、九两旅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统一集中到八旅十五团成立了学兵队。张东蛟兼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李树林任司务长。在学兵队内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张东蛟任书记(一说张秀山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黄育华、李树林、薛应昌任支部委员。同时,为了加强对八、九两旅兵运工作的领导,还成立了“中共宁夏骑兵第四师兵运工作委员会”,姜耀、黄育华、石子建先后担任兵委书记。兵委和学兵队特支机关都设在学兵队,受陕北特委直接领导。1931年春,十五团学兵队在甘肃定西结业,大部分学员分在九旅和八旅十五团当下级军官。学兵队特支即告结束,党员分

散各部队继续开展秘密兵运工作。

三、神木兵变

1930年冬,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高志清部补充营手枪连的秘密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党员常翔峰、高学孔、袁福禄等分别担任了班长,党员高宜之担任了掌旗官。他们还采取参加帮会,组织“哥老会”结拜弟兄的方式,团结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手枪连已经基本具备了搞武装哗变的条件。

12月,手枪连三排长王凤城(哥老会成员)因刑事案被关押。高志清令神木县长严刑拷打审讯,并判以重刑。事情发生后,手枪连王自强等几个与王凤城关系好的班长,密谋武装劫狱,抢出王凤城,拉走部队。共产党员常翔峰、高学孔等因未请示上级党组织,劝告王自强等人暂缓行动。12月22日凌晨,王自强等突然发难,下了其他排长的枪,并通知常翔峰、高学孔、袁福禄等一同率全连士兵哗变。事出仓促,常翔峰等4名党员临时决定参加哗变,掌握部队。就同王自强带人直奔司令部,联络守门的四连一班长李文彬、三班班长何海旺,打开司令部军需库和弹药库取出军械,从“马号”拉出战马。凌晨5时,暴动部队从北门出城离开神木,沿绥陕边界地带西进。暴动发生时,高志清躲在公馆未敢行动。天亮后,他命令第五团团长沙虎臣带兵追剿。金虎臣怕损失兵力,追了一天即返回。这次暴动,共拉出80多人,弹药充足,武器精良,每人一枪一马,另有八音枪3支,自来得手枪14支。但由于事出突然,手枪连还有一部分士兵未能加入哗变。就连奉派动员士兵参加哗变

的共产党员高照壁、常焕文，也未能及时通知撤出来。

暴动部队离开神木后，公推王自强任连长，常翔峰任三排长，袁福禄任司务长（后来袁牺牲，高学孔继任）。部队在横山纳泥河遇到在高志清部当过副官的谷占峰，经连排干部研究决定，由谷占峰的妹妹谷风莲帮助做了一面红旗，上绣“中国共产党陕北独立营”。但红旗没打几天，就因王自强反对而取消。兵变发生时，共产党员高宜之正奉命在安边出差。他得到消息后迅速返回，在靖边县史家孤和部队相遇，便参加了这支部队的领导工作。为了尽快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帮助，高宜之、常翔峰等将部队带到保安一带，在丁家岔找到了刘志丹。由于暴动部队成份复杂，党员少，环境恶劣，刘志丹指示高宜之等人，暂时不宜公开打出红旗，可以先和郑思成的人联合，共谋“倒井”。并要他们加强联系，注意提防驻安边的张鸿儒部，吞并这支部队的阴谋。不久，部队领导人撤了王自强的职，缴了他的枪，将部队扩编为一个营，推举郑思成部的彭岐周任营长，下辖两个连，高宜之任连长。

驻防安边的张鸿儒部，是高志清所属第三团，早有独霸三边的野心。他打着“联合倒井”的旗号，诱骗兵变部队奔袭定边，受挫后又策动一些人率部叛逃，并枪杀了营长彭岐周。不久，张鸿儒便将兵变部队吞并收编。“神木兵变”，遂以失败而告终。

四、榆林东山惨案

1930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县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陕西省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

要“争取以榆林为中心的一县或数县武装暴动的首先胜利”。10月,中共北方局也指示陕北特委,要加紧做井岳秀部队中的士兵工作,“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暴动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井岳秀八十六师炮兵营、工兵连以张怀树、何格兰为首的中共组织,开始从思想上、组织上做武装暴动的准备。他们以“拜把子”结金兰朋友为名,用吃喝谈心的方式,先后在莲花池、文庙、东山老爷庙等地秘密集会,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为暴动创造条件。

榆林武装暴动,先后有过三次计划。第一次定在1930年9月5日井岳秀生日举行,因准备不周,未能行动。第二次在1931年同期举行,又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实施。第三次定于1932年9月15日进行。以工兵连为主力,何格兰统一指挥。计划用三个排的兵力于15日拂晓前突袭师部,主攻井岳秀住所,收缴手枪队、东院机枪连的枪支。以一个排突袭新明楼和公安局,占领军械库。如暴动成功,沿咸榆路南下黄龙山,建立根据地。

9月初,正当暴动准备工作秘密进行之际,叛徒武福祥向井岳秀密报了党组织准备武装暴动的计划。9月15日,井岳秀下令对炮兵营、工兵连的共产党员进行大搜捕。于是,张怀树、何格兰、赵经昌、杨德厚、边临雍、魏志仁、孙师策等7名共产党员和非党的孙静山被逮捕。张怀树、何格兰、赵经昌、杨德厚、边临雍、魏志仁等6人面对酷刑大义凛然,终无只字口供,于19日英勇就义。孙师策、孙静山,被关押月余后释放。这就是震惊陕北的“榆林东山惨案”。

第五节 排除干扰 摸索前进

一、中共陕北特委合龙山扩大会议

1930年7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全体委员会议通过《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决议》,认为党在陕北的工作有基础,可以做全省工作的中心区域,以绥德、米脂、清涧为中心,进行秋收斗争,配合横山、佳县的灾民斗争,以及绥、米、清、榆、横、佳等县区域内的士兵工作,进行游击战争。会议决定委派赵伯平、高仰成赴陕北,分别接替吉国植、张文华任党、团陕北特委的书记,吉、张回省委工作。9月初,赵伯平由西安出潼关经山西介休到陕北,接任党的特委书记,并带来了红四军古田会议决议案和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件和著作。同时,中共北方局交通杨璞和中共中央派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孔祥楨和高维翰(李杰夫),带着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任务,也到达绥德。高仰成因病未能到陕北,张文华回省后由常黎夫代理团陕北特委的书记。

1930年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绥德合龙山古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赵伯平、高维翰、孔祥楨、杨璞、苏士杰、刘澜涛、常黎夫、常立德、崔田夫、杨重远、惠泽仁、张德生、张肇繁、崔玉珊、霍维德、李文芳等20多人。高维翰传达了中共中央6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赵伯平宣读了《陕西省政治任务决议案》、《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决议》等文件。会议决定合并党、团、工会、农会

等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桢，谢子长、刘志丹分任行动委员会的正副总指挥。会议被国民党绥德县党部发现后，行动委员会成员旋即转移。刘澜涛、张德生在转移时被逮捕（后经组织营救释放）。其他部分成员，在义合霍维德家中继续开会。决定以绥德、米脂为中心，制造暴动舆论，举行暴动，发动神木高志清部起义。

会后，陕北特委机关由绥德迁往榆林，马明方、常学恭、毕维周等先后参加特委工作。12月11日，绥德四师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布告，国民党绥德驻军姜梅生派兵查封四师，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准备执行暴动的县区，由于条件所限，也就自行停止了。

10月1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通知，陕北特委直属北方局，与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还指出，当前陕北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斗争，加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反对取消派、改组派、社会民主党以至第三党，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领导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要求张文华、赵伯平、杨璞于11月11日前必须到北方局讨论工作。12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派特派员王希南到榆林向特委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北方局指示，纠正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撤销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恢复陕北特委，赵伯平继续担任特委书记。

这次立三“左”倾错误，在陕北虽然未认真执行，但也使党的组织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特委在绥德的秘密机关暴露，在国民党宪特和军警的搜捕下，特委各委员之间失去联系，绥德的许多农村基层支部瘫痪了，中共清涧县

委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破坏下,于12月被迫停止活动;年底,井岳秀电令国民党府谷县政府和驻军,立即逮捕景仰山、李来宾、刘子安、苏子秀、苏建勋、孙计一、杨岐山等33人。景仰山首先被捕,押送榆林后叛变。接着刘世英、苏建勋相继被捕,其他同志秘密转移山西和内蒙等地,中共府谷县委遭破坏。

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告,宣布中共中央北方局改为中共河北省委,辖顺直、晋、陕、甘及河南北部党组织。陕西省委改为陕西特委,与陕北特委同归河北省委领导。

1931年1月,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镇川建立中共米(脂)佳(县)镇(川)中心县委。马明方任书记,委员崔明道、刘绍让、李俊藻、刘述相;派鲁学曾(鲁賁)去府谷,整顿恢复中共府谷县委。党的府谷县委恢复后,鲁学曾任书记,组织部长赵希贤,团委书记吴乃先,委员柴培桂。2月,陕北特委派阎红彦、白锡龄等人,去山西吕梁地区参加晋西游击队的创建工作。此时杨璞、白明善回到榆林,分别代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为此陕北特委召开紧急会议,经讨论决定:由于一时难辨是非,两人的观点不准再向下传达。不久,又传来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要求继续举行起义和进攻。会后杨璞回镇川,白明善一路南下,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押送榆林第三监狱。国民党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他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未果。翌年1月21日,被国民党处以绞刑,英勇就义。

二、陕北代表团赴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

1931年3月19日,中共陕北特委为了进一步搞清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河北省委近期组织活动情况,决定由王希南(传达完三中全会精神后未走)、赵伯平、常黎夫组成陕北代表团,赴河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特委工作由孔祥楨主持。刘澜涛随代表团,离开陕北去外地工作。

代表团经山西太原于4月间到达北平,向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了陕北特委的工作及现状。在代表团等待指示期间,陕北党、团特委发出开展红五月活动的通知,发动榆中学生到处张贴标语。宣传材料被榆中训育主任、国民党特务分子孙士英发现,特务学生袁芬又提供了进步学生名单,国民党军警随即在榆中操场上集合全校师生进行大点名。先后逮捕石作琦、杜鸿章等14人,迫使特委成员离开榆林分散各地。陕北特委陷于瘫痪。党、团榆林县委亦遭破坏。不久,赵伯平、张资平和常黎夫三人回陕北,张资平接替孔祥楨任党的陕北特委常委和军委书记。赵伯平由山西保德渡河,到神府、佳县巡视工作。张资平和常黎夫由破口过河,在米脂分手。张去榆林,常到米脂、绥德一带传达上级指示、巡视工作。在此之前,马明方因受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追捕,被迫离开陕北去山西,米、佳、镇中心县委停止活动。中共镇川区委在书记刘述相和崔明道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工作。7月初,赵伯平等回到榆林。经过组织整顿,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委机关迁往米脂姜兴庄农村,特委成员分散居住。

8月12日,中共三边区委书记田作勤和团区委副书

记高尚信等组织兵变失败。田、高等4人惨遭杀害,三边区委被迫停止活动。接着,由于党内出现叛徒,鲁贲在府谷无法立足,被迫离开。府谷县委再度遭破坏,各级党组织也都处于瘫痪状态。

此后,特委通知各地党、团组织全部迅速转入农村,实现工作重点的根本转移,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党的指示,采取办冬学等方式,向党员传达。佳县南圪,很快办起了冬学。

三、开始创建工农武装

1931年9月初,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山西吕梁地区作战受挫,难以立足。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游击队按照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在拓克宽、阎红彦、吴岱峰、杨重远等率领下,于9月3日夜西渡黄河进入陕北。游击队进入陕北后,首先在清涧县石嘴驿一带,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又在涧峪岔开仓放粮,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闹革命。中共陕北特委得知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的消息后,想方设法与其取得联系。9月8日,游击队行至安定县,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派慕嘉绩送去急需的油印机和蜡纸等宣传用品,同时派马云泽、强龙光等一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参加了游击队。使该队由渡河时的30余人,迅速发展到了100多人。不久,陕北特委派张资平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指示他们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一带坚持游击战争。晋西游击队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转战陕北近两个月,先后取得了平桥、安条岭、营盘山、玉家湾等战斗的胜利,使部队得到了发展壮大。10月底,游击队安全转移到桥山中段陕

甘交界的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合。晋西游击队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地区出现的第一支较大的革命武装。它对陕北各地开展革命武装斗争,起到了重要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使陕北的革命斗争,从低潮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红二十四军参谋长蒲子华率部从山西河曲强渡黄河,进入府谷十里长滩,歼灭段作山部两个连。10月,红二十四军在府谷的皇甫、清水、木瓜一带与井岳秀八十六师、傅作义骑兵团激战,因敌众我寡,蒲子华被俘,就义于榆林,红二十四军失散。后山西特委派梁子修、牛清明,到神府联系红二十四军时被捕入狱,不久获释。梁、牛二人到神木南乡隐蔽并协助区委开展工作,成立了以王宝珊为队长的临时特务队。

早在1930年12月,清涧县共产党员刘善忠、共青团员高朗亭积极筹款买枪,在绥德、安定、横山、延川一带建立了十七八个秘密联络站点和几十个秘密农会。1932年3月12日,刘善忠、高朗亭等4人,化装进入时属清涧县的淮宁湾寨子,缴了邱树凯反动民团的6支步枪。次日,中共延川县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全队共20余人。4月18日,游击队在当地200余名农民的配合下,袭击延川县永坪镇民团,活捉了罪大恶极的团总刘广汉。此后,在永坪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延川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刘善忠为司令员,高朗亭为政委,杨作栋为参谋长。下辖3个中队,共70余人30余支枪。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在先锋队中建立了党、团总支委员会。不久,刘善忠被混进队伍中的反动分子暗杀,由高朗亭兼任司令员。7月中旬,高朗

亭在米脂县叶家岔向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和特委委员马明方汇报了先锋队的情况,并要求接受特委的领导。10月1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西北先锋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队长,艾龙飞为政委,派毕维周代表特委到延川县高家圪崂为游击队授旗。九支队成立后,陕北特委明确指示:要以“解除豪绅地主武装,武装工农劳苦群众,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并创建陕北苏区”为主要政治任务。为了加强九支队的力量,特委先后派党、团员马万里、杜修秩、贺吉祥、栾新春、高庆恩等十几人参加游击队。按照特委指示,九支队主要活动在安定、清涧、绥德一带,打土豪、袭民团,壮大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12月上旬,九支队在清涧没收豪绅大批银元,遂派9名精干战士秘密武装护送给特委2000元,有力地支持了特委的工作。次年1月,红二十六军的强世清、史法直回家探亲时,特委巡视员毕维周动员二人参加了九支队。不久,特委任命强世清为九支队副队长。4月下旬,陕北特委将九支队改编为第一支队,任命强世清为队长,李成荣为政委。此后不久,国民党驻军派重兵与反动民团联合“围剿”红一支队。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特委决定由强世清、李成荣率红一支队南下陕甘边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得到了刘志丹的大力支持,补给了枪支弹药。随后,李成荣调西安工作,刘志丹派杨重远任红一支队政委。5月29日,红一支队在北返途经安定谭家峪时,被国民党张建南营包围,政委杨重远牺牲。突围后的红一支队,在安定杨道岭进行整编。此时已发展到80多人枪,下辖5个中队,并在安定西区、北区建立了以李家岔为中心的小块游击根据

地。

红一支队是陕北特委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它的建立与发展壮大,为广泛开展陕北游击战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横山农民的抗粮抗捐税斗争

1932年开春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组织委员毕维周和团特委负责人鲁賁到横山检查工作,在鲁賁家召开工作汇报会。针对当地封建军阀、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任意摊派粮款,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到处怨声载道的情况,决定在横山县响水堡、波罗堡一带,发动和领导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抗粮抗捐税斗争。在陕北特委的部署和鲁賁的直接指导下,很快在响水、波罗一带掀起群众性的反对军阀官僚、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的抗粮抗捐税运动。

6月,响水一带农民纷纷起来抗粮抗捐税。他们先写信给国民党横山县县长裘洁忱,要求减去“顶粮”赋(顶着不缴粮赋)。裘洁忱接信后,带了一连驻军,于6月8日从横山来响水镇压群众。裘洁忱等行至响水西门外花虎滩时,姜玉银、杨增荣等带领300多人请愿,要求减粮免捐。裘不但不答应群众所请,反而绑了姜玉银、杨增荣,押进了响水区公所,还打伤了一些人。响水群众见状,立即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联系。大家迅速传递鸡毛信“姜杨被绑,一致抗粮”。一夜之间,响水、波罗、韩岔、殿市、五龙山、南塔、白界、武镇、党岔等地的许多群众,都带着链枷、铁叉、长矛等,从东、南、北门涌进了响水城,包围了区公所,堵死了西门。在响水党组织负责人曹培芳等人带领下,大家一

致要求县长减粮免款,释放欠粮欠款的群众,撤回军队,以后不能再随便抓人。驻扎在西门外的驻军烧、砍城门,架云梯,要冲进城来保护县长,抗粮群众则站满了城墙,用石头砖块向城外砸去,致使驻军无法登城,只好鸣枪示威。这就更激起群众愤慨,高喊“打死秋(裘)瓜蛋子”、“打死吮吸我们血汗的狗官”等口号,一面守城,一面围住区公所。在党组织秘密活动下,各地群众继续向响水城涌来。到了晚上又有四五千 people 聚集到区公所,要求释放姜、杨等人,否则就打死县长。响水区长命令 30 余名区丁爬上屋顶向农民开枪,打伤了抗粮群众。群情激昂,喊声震天,用石头向屋里屋外和屋顶打去,把区丁们打得落花流水。裘洁忱惧于群众威力,乘夜色化装成农民从后墙溜出逃跑,慌不择路,跌到猪圈里粘了一身猪屎,他被群众赶着追打。裘洁忱威风扫地,答应了群众提出的条件,释放了扣押人员,撤退了军队。于凌晨从响水东水门洞钻出,越过无定河逃往榆林。

井岳秀听裘洁忱说响水群众反了,派兵一连来镇压。响水绅士曹雨山受群众委托,出面调停才妥善处理了此事。不久裘洁忱调离横山,从此再无人过问“顶粮”的事,抗粮抗捐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五、陕北代表团赴西安请示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3 月 15 日,中共陕北特委向河北省委书记面报告了陕北过去工作概况、组织概况、红二十四军失败原因等几个问题。之后,陕北特委在探索中前进。这年秋,调鲁贵回特委工作,任团特委书记。同时,特委派马明方到神木南乡贾家沟巡视工作。南乡区委根据马明方的指示精神,

先后派杨文谟、王兆相、温治恭等人前往陕甘游击队，学习武装斗争经验。10月初，特委又派杨国栋到府谷开展工作，于10月下旬恢复了中共府谷县委，赵希贤任书记，组织部长王巨武，宣传部长杨岐山，逐步恢复了7个区委，此时全县共有党员140人。

中共陕北特委虽改属中共河北省委，但自陕北代表团赴北平汇报工作返榆后一年多来，与上级组织关系中断了。为了搞清隶属关系，陕北特委决定由赵伯平、崔逢运、鲁贲组成代表团，于1932年10月去西安请示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委答复，陕北特委由河北省委及中央驻北方代表共同领导。于是派崔逢运去河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赵伯平、鲁贲在西安等待。不久，陕西省委调赵伯平去三原中心县委工作，崔逢运、鲁贲于翌年5月回到陕北。

1933年初，陕北特委在清涧东区和绥德东南区交界处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绥德中心区委，由崔田民、崔正冉等人负责。2月，特委机关迁到佳县乌镇，住在高录孝、高录忠的杂货铺里。张书信的饭店，是特委成员联络接头的地方。特委又派张达志到神木南乡整顿党的组织，先后整顿了贾家沟、贺家川、采林等10多个党支部。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孔原到天津主持北方地区工作，陕北特委改属其领导。此时，马文瑞、王兆卿参加了特委工作。

土地革命期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陕北党组织领导的农、工、学、商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有力地震慑了井岳秀集团的反动统治。1930年后的一段时间陕北党组织几次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一直在艰难曲折中排除干扰，探索前进。党组织虽然几遭破坏几次恢复，但党在农

村的工作却得到很大发展。陕北特委下辖府谷县委及神木、米脂、佳县、吴堡、绥德南区、北区、清涧、安定 8 个区委,还有横山、榆林、三边等 3 个特支和三皇峁支部。共计有党支部 81 个,党员 765 人。同时,先后在横山、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安定、米脂等县,建起秘密联络站、点 17 个,农会几十个,实现了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基本占领了农村广大阵地。在此期间,党组织曾以“钻进去,站稳脚,爬上去,拉出来”为口号,派遣党团员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利用其内部的矛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断壮大自己力量。从 1928 年至 1932 年,分别建立了 9 个秘密党支部,发展了数百名地下党员。先后领导和影响了清涧起义、神木兵变、榆林武装暴动(未遂),沉重打击了井岳秀为首的反动势力,培养了一批宝贵的武装斗争人才,为陕北武装斗争的兴起、发展和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第五章

陕北游击战争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节 中共陕北特委的 三次重要会议

一、中共陕北特委高起家城扩大会议

1933 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进而侵占热河占据华北。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政府却坚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方针,同时加紧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进行“围剿”。“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增加了群众对国民党的愤恨,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苏维埃红军的伟大胜利,全国罢工运动、农民斗争、士兵哗变的潮流,给陕北劳苦群众以更大的兴奋,使他们知道,只有斗争,才是从危机得到解放的惟一道路”。^①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共陕北特委在排除了几次“左”倾错误的干扰后,各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 1933 年 6 月,仅榆林各县即有“支部 73,同志 153,党的主观力

^① 共青团陕西省委 1933 年 3 月 23 日《目前陕北形势与团的紧急任务决议》。

量,使陕北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①。同时,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影响及陕北红一支队的创建,使陕北党组织深切意识到只有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武装力量,才能创造陕北新苏区。为了认真总结斗争经验,及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1933年7月23日至25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孤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

高起家孤,位于佳县城西十几公里处的一个偏僻山沟里。村里有十几户人家,多为贫苦农民。党团员多,群众基础牢固。该村高录孝是特委交通员,其祖父高振烈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拥护共产党,支持儿孙们闹革命。三叔高钧仰、堂兄高录忠都是共产党员。另外,由于平时国民党军警很少光顾,这里相对安全,因此特委将会议地址选在高家的套窑(当地人称作掌窑)里召开。会议期间,党组织在村子周围的山上遍布了暗哨,确保了代表们的安全。

参加此次会议的特委成员,有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鲁贵,交通员崔逢运。各县代表有崔田夫、崔田民、贾怀智、张达志、高长久、张岗、高录孝,游击队代表高朗亭,其他代表王国昌、赵福祥等共22人。代表“成份二分之一是知识分子,五分之一农民,十分之一小商,十分之一士兵”^②。

扩大会议由马明方主持并作了工作报告,崔逢运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对陕北工作的指示。会上,代表们就陕北代表团及共青团陕西省委批评陕北党团工作落后,走

① 1933年9月2日《陕北特委工作报告》。

② 1933年10月27日《崔瑞生陕北工作报告之第一号》。

“富农路线”^①，“作了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②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激烈的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团组织经受住了白色恐怖的考验，并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文化闭塞的广大农村，克服种种困难，建立健全了各级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1930年以后，在各级党、团组织领导下，陕北各地的群众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如榆林中学学生纪念五卅罢课，米脂商人罢市，榆林兵工厂工人罢工，国民党军队士兵开小差及哗变，绥德、横山、清涧数千农民抗粮抗税斗争等。同时，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及游击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使陕北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大会认为陕北目前形势快一般的事实，粉碎了‘陕北落后论’的荒谬”^③。

在讨论下一阶段工作时，代表们在客观分析陕北政治、经济、军事和群众斗争形势的基础上，共同认为陕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已基本形成。首先，陕北地处偏远，地瘠民贫，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剥削下，劳苦大众走投无路，革命的欲望特别强烈。其次，广大农村多为山大沟深之处，国民党军队难以顾及，是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区域。第三，近年来农村的党、团组织有了较大发展，群众基础牢固，具备了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第四，红一支队的建立与发展，绥德、神府等地游击小组的兴起，为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因此，会议决定尽

① 陕北代表团1933年2月25日通过的《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

② 共青团陕西省委1933年2月23日《目前陕北形势与团的紧急任务的决议》。

③ 1933年10月27日《谢耀生陕北工作报告之第一号》。

力扩大各级党、团组织，加紧开辟安定、绥德、神府三个游击区域，并派大批同志及赤色群众参加游击队，扩大第一游击支队，新建游击第二、三支队；广泛建立农会、互济会、赤卫队、妇女会及少先队等群众组织；继续领导群众开展抗粮抗税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根据崔逢运、鲁賁带回的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会议改选了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班子。特委由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张达志、崔田民、常学恭、鲁賁、崔逢运、高长久等 11 人组成，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毕维周，秘书长崔逢运，军委书记王兆卿，农运委员张达志，团特委书记鲁賁。

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明确了在陕北全面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及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策略。从此，陕北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中共陕北特委高家堡扩大会议

中共陕北特委高起家堡扩大会议之后，特委成员及会议代表分赴各地传达会议精神。毕维周到红一支队任政委，与前去该队巡视工作的王兆卿、取款的高录孝同行。崔田民、高朗亭等去绥德、清涧一带，筹建游击队第二支队。马明方、常学恭、马文瑞等，随特委机关到米脂姜家兴庄活动。在此期间发生两件大事，一是清涧农民的抗粮抗税斗争，一是“米镇事变”。

1933 年，国民党清涧县政府勾结井岳秀驻清涧的张

营长，向人民随意增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榨得人民苦不堪言，群众抗粮抗税斗争时而发生。8月，到清涧传达高起家扩大会议精神的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崔田民，在苏家渠石庙召开50多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会议由区委负责人张家修主持，研究部署了抗粮斗争。之后，在特委委员张达志的领导下，抗粮群众包围了县城，围城群众吼声震天，强烈要求县政府减轻苛捐杂税。县长被迫答应每斗粮款减少一块白洋，其他要求待后再说，群众不答应，继续围城。到了第三天，县政府要农民派代表进城和谈。抗粮农民群众就派刘葺子、张惠山、张维忠、刘中华4人为代表进城谈判。但当代表行至南门外新桥时，却被逮捕。因抗粮农民对此没有思想准备，随即四散回家，这次斗争失败了。不久，崔田民再次在大马家山唐洪澄家里召开清涧东区党员会，决定举行二次抗粮斗争。第二次抗粮斗争由张达志任总指挥，挑选能言善辩又在群众中享有威望的贺仲清、黄石山为群众代表，同时，挑选会武艺的十几个小伙子，组成“棒子队”，由黄石山率领，又分派干部到东区各村重新组织发动群众。8月14日，600多名抗粮群众从四乡农村陆续到白草寺大寺院集中。群众代表贺仲清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开进清涧城，减轻苛捐杂税，救出刘葺子等人。15日晨，在张达志的指挥下，抗粮群众肩扛农具，浩浩荡荡地向清涧城进发。当行至距清涧县城35公里的店则沟，被张营的两个连包围。双方相持到天黑，抗粮群众按县政府要求，退至惠家园则进行谈判。16日，抗粮群众代表与国民党县政府正式谈判。县政府为了平息怒火，稳住政局，在口头上答应了抗粮群众提出的21个条件。

此时,米脂县城也驻扎着国民党一个连。该连司务长董培义在佳县时伪装进步,被发展为共产党员。部队移驻米脂后,董又与中共米脂区委的高庆恩为邻,因此未引起区委同志的警惕。董培义于无意中得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开了会,遂向国民党告密。在董培义的带领下,驻军首先将米脂区委的王守义、高庆恩二人抓走。随后又扑向镇川,适逢参加过特委高起家扩大会议,南下路过此地的毕维周、王兆卿、高录孝刚赶到镇川区委负责人崔明道家中,于是4人一同被捕。两处得手后,驻军又扑向几十里外的姜家兴庄,抓捕特委的其他负责人。但在当地同志和群众的掩护下,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等人机智地脱了险。毕维周等6同志被捕后,国民党军警对他们施用了各种酷刑,但他们视死如归,大义凛然,8月3日于米脂城南十里铺曹家湾村的无定河畔就义,史称“米镇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驻军封锁了城乡各交通要道,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并发出通缉令,企图将陕北特委其他成员一网打尽。

米镇事变后,崔逢运、鲁贲经山西去了北京,剩下的同志四处躲避军警的搜捕。不久,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等,辗转来到佳县南圪村张达志家中,商定在佳县寨子沟召开特委紧急会议。8月中旬,特委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汇集寨子沟开会。与会的同志一致认为:虽然有6位同志牺牲,但陕北党、团组织并未受破坏,各地的同志仍在积极活动。因此,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特委高起家扩大会议决议精神,按确定的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派常学恭到天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其他成员分别到各地巡视,整顿组织,指导工作。马明方去安定,马文瑞去神府,崔田

夫、崔田民仍去绥德、清涧，张达志、高长久负责佳县、吴堡一带，特委机关移驻佳县南圪村。

三、党团陕北特委南圪村联席会议

193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李华生在北平召开陕北问题座谈会，继续要求陕北特委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同时，批评陕北特委犯有“富农路线”错误。会议决定派郭洪涛、李铁轮到陕北加强特委领导，常学恭、崔逢运、鲁贵留北平另行分配工作。

12月下旬，郭洪涛、李铁轮在佳县找到陕北特委。次年1月底，由党特委书记崔田夫召集，在佳县南圪村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张达志、高长久、马文瑞、李铁轮等7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郭洪涛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在肯定陕北党的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批评陕北特委“右倾”，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对开展武装斗争“消极怠工”。与会同志对北方代表不切实际的批评进行了坚决抵制，并决定继续按照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扩大一支队，发展二、三支队，新建四、五支队，开辟绥、米、佳、吴边新的游击根据地。会议决定把党、团组织分开，自成体系在各地发动群众，普遍成立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在这次会上，郭洪涛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

此次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意义甚为重大，不仅抵制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错误指导，而且使陕北特委高起家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促进了陕北的革命

运动向前发展。

第二节 工农武装的初步发展

一、红一支队的发展壮大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红一支队按照特委指示积极扩大武装力量,频繁开展革命活动,使游击区域逐步由安定、清涧扩大至绥德、横山一带。红一支队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惊慌。1933年8月,国民党八十六师炮兵营向安定地区围攻。为避其锋芒,红一支队留白得胜分队就地坚持斗争,其余人员在强世清、马佩勋等率领下,二次南下渭北照金一带。9月中旬,红一支队在合水县古城川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9月下旬至10月,先后配合红二十六军攻打旬邑县张洪镇和甘肃合水县,使一支队指战员得到了实战锻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战后又补充了部分弹药。随后,刘志丹派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总指挥魏武任红一支队政委。

11月初,魏武、强世清率队由葫芦河北返安定。11月20日,红一支队在没有搞清驻军防守工事的情况下,贸然偷袭驻守枣树坪八十六师一个连受挫,队长强世清等4人负伤,惠泽仁等5人牺牲。强世清在王家庄养伤时,不幸被搜捕英勇就义。不久,代理队长白得胜在关庄战斗中受伤被捕牺牲。枣树坪战斗失败后,魏武率队转移,在安定北区温家坡攻打折扣达民团时再次失利,魏武及4名队员牺牲。连续几次战斗失利,部队的伤亡很大,战士情绪低落。

加之与陕北特委及安定党组织失去联系,红一支队剩余人员被迫埋枪分散隐蔽。

1933年12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谢子长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次年1月下旬,谢子长返回陕北清涧并由红二支队白雪山护送到安定。谢子长将红一支队失散回家及隐蔽活动的同志集合起来,取出埋藏的枪支。3月8日,经陕北特委批准,谢子长在安定刘家圪塔正式恢复红一支队。任命李盛堂为队长,刘志清(后叛变)为政委,谢绍安为副队长,刘明山为经济员,全队有人枪各20余。一支队恢复后,频繁活动于安定、横山、延川一带,并很快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春夏之际,在得悉国民党军营长张建南率营部和一个排到窑则峁河修筑碉堡的消息后,谢子长率红一支队在庆阳游击队的配合下,将其包围在村子里。经过激烈战斗,歼、俘大部,缴获长短枪20余支。

二、红二支队的建立及活动

清涧一带革命斗争开展较早,特别是东区的群众基础好,党、团组织健全,力量雄厚。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里就有游击小组。当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抗粮抗税的围城斗争,有数千人参加。接着,许多村庄都成立了革命群众团体。共产党员王聚德、崔正冉、罗永宽等又秘密筹得三支短枪。为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开辟根据地创造了基本条件。

1933年8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崔田民奉特委指示,在王家山主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简称红二支队),罗永宽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王聚德

任副队长兼经济员,全队共10余人。红二支队成立后,首先在绥德县薛家峁区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区长薛运统,张贴布告,历数薛运统的罪状,深受群众的欢迎。

1934年1月21日,清涧县东区解家沟逢集,豪绅衙役乘机向群众逼粮收款,到处抓人,一时民怨鼎沸。红二支队接到解家沟党支部的报告后,认为这是打击豪绅衙役雷张气焰,鼓舞群众革命情绪的好时机。于是在新任队长白雪山的率领下,星夜赶往解家沟,包围砍杀了10名豪绅衙役(其中一人被砍未死),并张贴布告列数罪行,此即震惊一时的红军杀九个半豪绅衙役事件。消息传出后,群众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红二支队趁热打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后来,清涧东区人民将此事编成民歌广为传唱:“民国二十三年半,起了红军闹共产,红军的头儿白雪山,一心要在解家沟把工作办,一黑夜杀了九个半。”

3月21日,红二支队在500余名群众的帮助下,与红四支队协同作战,夜袭并全歼店则沟李成善民团。4月上旬,二支队在小沟岔与国民党部队及民团作战获胜。至此,红二支队开辟了包括清涧东区、绥德南区、延川北区在内的大块革命根据地。

三、红三支队的建立及活动

中共陕北特委寨子沟紧急会议后,马文瑞奉命到神木县南区传达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并与南区地方党组织酝酿成立工农游击武装,开辟根据地。当时,神木南区有十几个支部、200多名党员,而且群众基础相当好。党组织

派人搞到4支枪后不久,李成兰、李成荣、王宗光、王兆相等相继回到南区,区委决定成立游击队。1933年10月18日,在区委书记贾怀光领导下,神府地区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神府特务队在神木县温家川尚家岳成立,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共有队员7人、枪4支。特务队成立后,即在贾家沟镇压了多次告密并带领军警搜捕共产党员的贾凤隆和贾正官。同时贴出布告,公开了神府特务队的诞生及其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纲领和主张。

为了加强神府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陕北特委相继派曾任红一、二支队领导人的高朗亭、罗永宽、马佩勋、马万里等到神木南区,给特务队带去了部分枪支弹药。1933年11月7日,按照特委指示,神府特务队在神木松树峰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全队20余人,七八支枪。

红三支队成立后,在佳县沙坡西沟(今属神木)和神木尚家岭、红教寺、呼家庄等地,先后镇压了6个群众最为痛恨的豪绅衙役。将他们的粮食、衣物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称颂红三支队是“穷人的队伍”,并主动为游击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不少人争着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而地主豪绅则惊恐万状,纷纷逃往县城,衙役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下乡催税收款了。

红三支队的革命活动,使国民党当局又怕又恨。1934年春,国民党八十六师五一四团,在府谷、佳县等地驻军及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对红三支队进行大规模的“清剿”。红三支队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掩护下,神出鬼没,灵活游击,诱使“清剿”部队疲于奔命,“清剿”阴谋始终未能得逞。5月后,

红三支队根据特委王家畔会议精神,由打击土豪劣绅转为主动进攻反动民团和国民党驻军。6月上旬和下旬,先后袭击九孤村和太和寨民团取得胜利。8月8日,红三支队与当地上千名赤卫队员在菜园沟和八十六师驻盘塘的两个排激战,驻军二排长刘鸿飞(共产党员)率全排起义。此战后,红三支队已发展到200余人、100余支枪。

红三支队的英勇作战,使神府地区的游击区域不断扩大。至1934年秋,南抵秃尾河下游两岸,东北延伸到府谷县城附近和孤山以南地区,西北逼近高家堡周围和神木城南一带,形成了一块长100余公里,宽50余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并普遍建立了基层党、团组织和革命政权。

四、红四支队的建立及活动

1933年10月下旬,红一支队副队长马佩勋奉命到吴堡县开展武装斗争。随后,特委又派张达志到吴堡指导工作。当时,吴堡宋家川镇有一批人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他们为了生活,流落为“烟土嫖客”。这些人大多出身贫苦,政治上倾向革命。吴堡县党组织与马佩勋、郭洪涛通过关系,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是年12月30日,在吴堡樊家圪坨村成立了吴堡县第一个革命军事组织——抗日义勇队(因主要成员多系烟土嫖客,所以特委暂未授其正式番号)。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全队14人、两支枪。

1934年1月下旬,佳县反共的清乡委员会在木头峪召开反动绅士代表会议,准备于除夕夜,在木头峪、神堂沟捕杀一批共产党人。义勇队得知消息后,于2月4日秘密隐蔽在距木头峪2.5公里的前畔村。6日夜,抗日义勇队

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及内线的策应下,一举攻下木头峪,杀了民团团总张东蛟及反动绅士数人。此后,特委派刘子义、张益、张岗、刘耀山等五六名共产党员加入义勇队,充实了党的力量,改善了部队内部成分。

2月15日,根据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关于新建四、五支队,开辟绥、米、佳、吴边新游击根据地的精神,党的特委委员高长久代表特委,在吴堡樊家圪坨将抗日义勇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任命薛俊山为队长,马佩勋为政委,刘子义为经济员兼党支部书记。全队下设两个分队,20余人、长短枪8支。红四支队成立后,针对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纯及无政府主义比较严重等问题,进行了20多天的教育整训。整训后,又吸收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使队伍发展至60余人,增强了战斗力。此后,经过二打木头峪等战斗,四支队的声威大震。很快开辟了包括吴堡全县、佳县南区、米脂及绥德东区在内的大片游击根据地。

五、红五支队的建立及活动

1932年冬,中共绥德南区区委派共产党员张承忠、崔正冉参加延川游击队,学习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1933年6月,崔正冉回来后,经南区区委同意,首先建立了王家沟游击队。游击队在绥德南区斗地主、杀恶霸,开辟赤色村庄。活动了近一年,使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1934年4月,根据中共陕北特委南区联席会议精神,王家沟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队长崔正冉,政委马万里,副队长王海山,经济员王明园,

主要活动在绥德南区一带。6月,鉴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五支队为了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主动南下打游击。

1935年初,红五支队与红四、十四、十五支队合编为二五纵队。9月,二五纵队改编为战斗团。五支队多数人员编入战斗团,一部分人员组成新的红五支队,队长刘岳山,政委张维山。

第三节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和 中共陕北特委寺靖里会议

一、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围剿”的部署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在特委的正确领导下,陕北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团组织不断恢复、建立和健全;红军游击队不断发展和壮大,积极地主动地袭击地方顽劣势力以至正规的国民党驻军;群众心向共产党和红军,红色村庄不断扩大,已经出现小块的连片的革命根据地。

随着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陕北的封建统治者井岳秀亦不断加强其对革命力量的“清剿”、屠杀。到1934年5月,井岳秀以其八十六师为主力,纠集各地反动民团约1万余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将陕北的革命斗争,扼杀在摇篮之中。具体部署是:在北线,以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民部“围剿”神府。其主要兵力,部署在东南的沙崩、盘塘、万镇一线,主要目的是隔断神府与佳

米地区之间的联系。南线是井岳秀的主攻方向。以高双成二五六旅和二五八旅各一部,附随大量豪绅地主武装,沿大理河、无定河,在青阳岔、石湾、双湖峪、绥德、薛家峁、清涧一线,对安定、绥德、清涧地区构成马蹄形包围圈。在战术上,采取以连排为单位驻点,分散配置,逐村蚕食,逐地推进。在兵力使用上,以班排为单位出击,分为“驻剿”和“追剿”。“驻剿”部队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为主,摧毁红军的群众基础。“追剿”部队,主要是捕捉苏区的武装力量。

国民党军“围剿”的重点,是安定、绥德、佳吴和神府苏区。在这些地区的县城及中心村镇,都驻扎了重兵。“围剿”部队强迫群众修堡筑寨,组织保甲。其正规部队则以连排为单位,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对各游击根据地进行拉网式“围剿”。“围剿”初期,由于国民党军来势凶猛,地方反动民团、地主豪绅为虎作伥,加之游击根据地尚未稳固,游击武装又分散作战,使地方党、团组织遭受了较大损失。中共清涧城区区委负责人周纪丰、惠金瑞、霍建国,高杰村区委成员白志强、白振纪,党团员惠志儒、白家荣、惠生荣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二、中共陕北特委神堂沟、王家畔会议,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

蒋介石“围剿”红军和苏维埃区域,也是“全国一盘棋”。就在井岳秀对陕北红军和苏维埃区域进行第一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为剪除异己,欲借西北马鸿逵为首的马氏军阀集团之手,消灭另一杂牌军孙殿英部。“孙马大战”于1934年1月,在近靠陕北的宁夏爆发。同时,这也为陕

北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方面。2月3日,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孔原)指示陕北特委,要借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紧急动员起来,加强全部革命工作,以迎接与汇合广大士兵群众的斗争,最好将陕北农民斗争、游击运动与哗变的士兵群众斗争组织联系汇集起来,真正把创造陕北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任务变成实际”^①。

1934年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区神堂沟召开会议。在听取各委员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的基础上,对所谓“陕北党犯了富农路线”错误的观点再一次进行了抵制。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壮大游击队力量,努力在陕北创建一师红军。武装开辟村庄,扩大游击根据地,使苏区连成一片,相机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贯彻落实神堂沟会议精神,交流开展游击战争、武装开辟根据地的经验,5月初,特委又在佳县王家畔召开了陕北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联席会议。会上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发展游击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等工作,并讨论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新苏区的决议》。这两次会都讨论了反“围剿”的问题。特委决定,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要集中各地游击武装力量,统一指挥,形成重拳,各个歼灭国民党军,粉碎其对苏区的“围剿”。

7月8日,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杨道峁组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① 1934年2月3日《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给陕北特委的紧急指示信》。

三、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将红一、二、五支队合组成一个战斗集团,由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作战。共600余人。

7月17日,总指挥首先率部攻打安定县城。游击队在500多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一举攻破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安定县城,救出了被监禁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是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次攻占县城。战后,谢子长率部南下陕甘边,在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师。

为了彻底粉碎“围剿”,7月25日,谢子长和刘志丹于南梁阎家洼子,主持召开陕北红军游击队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共商反“围剿”之策。会上任命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决定派四十二师步兵第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和群众,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8月15日,谢子长率领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约千人,北返安定,立即展开了反“围剿”的进攻战斗。

首先取得景武家塌大捷。景武家塌在安定西区,距重镇石湾10余公里。8月17日,驻守石湾镇的国民党军一个连窜入景武家塌,伺机与红军作战。谢子长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这股孤立的国民党军。18日清晨,红三团在团长王世泰的率领下,首先攻占了东北的塄畔山,卡住其退路。随即由贺晋年率领的游击队,从沟底向村内进攻,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国民党军见势不妙,拼命向北突围,被迂回的游击队打了回去,向南溃退进入红

军伏击圈。谢子长一声令下，红军从四面进攻，很快结束了战斗。此战毙敌 30 多名，俘 80 多名，缴获长短枪 100 多支。

景武家塬大捷后，红军在玉家湾稍事休整，便挥师向东，迅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8 月 22 日进至绥德张家圪台，歼灭两个排，缴枪 70 余支。战后，红军乘胜向东南疾进，8 月 26 日深夜包围了河口镇。河口镇位于清涧东南无定河与黄河的交汇口，与山西隔河相望，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里驻守着国民党八十六师的一个连及一些地主武装，与驻清涧、延川守军遥相呼应。群众见红军围攻河口镇，纷纷赶来助战。27 日拂晓，红军偷袭未果，改为强攻，守军凭险固守。红三团从河西山顶上往下强攻，游击队从黄河渡口截断其后路，两面夹击，迫使驻军放弃外围据点，退守到碉堡和村边的工事里负隅顽抗。红军强攻数次，因缺乏攻坚武器而未能奏效。总指挥谢子长见部队进攻受阻，便亲自到阵地前沿查看地形，不幸被碉堡中射出的子弹击中胸部。谢子长负伤后，红军再攻一日未克，遂主动撤围。次日，守军惧怕红军再来进攻，即放弃河口，东渡黄河绕道山西逃回清涧县城。河口遂告解放。战后，谢子长不顾身负重伤，率师北上，在横山县董家寺与国民党高玉亭营相遇，激战数小时，将其击溃。

驻神府的国民党军采取“围堵”和“追剿”相结合的办法，“围剿”神府苏区。但红军游击队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采取运动战术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至此，陕北红军经过英勇战斗，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

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四、中共陕北特委寺圪里会议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中共陕北特委认为,各级党组织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巩固与扩大苏区,发展壮大红军,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同时要求集中全力巩固乡村阵地,使红色区域由小而大,发展成几个县乃至十几个县的统一的大块根据地。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特委于8月28日在清涧县寺圪里召开会议。特委委员马明方、崔田夫、张达志、郭洪涛、李铁轮等参加会议,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的领导干部也出席了会议。会上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部署第二次反“围剿”的各项工作,充分肯定在关键时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的有力配合下,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最终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伟大战绩。指出扩大红军力量,建立正规红军部队,是粉碎国民党大规模军事“围剿”,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必由之路。会议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决定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分配土地;扩大红军编制,将陕北一、二、三游击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决定李铁轮任团特委书记。

会后,特委书记崔田夫赴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汇报请示,要求派干部加强陕北的工作,并给陕北红军颁发番号,以统一陕北的红军组织和领导。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第三团返回陕甘边根据地,归还建制。

第四节 陕北红军的创建和游击武装的壮大

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创建

1934年8月底,遵照中共陕北特委寺坪里会议决定,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红军陕北独立师成立。独立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

组建红一团 1934年9月18日,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与第八支队,在安定崖窑沟合编为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郭洪涛讲话,谢子长授旗。任命贺晋年为团长,马佩勋为政委,路文昌为参谋长,下辖3个连。一连连长陈文保,二连连长李仲英,三连连长梁文有。全团共200余人、100多支枪。红一支队改编后,特委指示又成立了新一支队,队长姬占庭、政委刘明山。红一团成立后,10月10日,配合北上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步兵第三团,攻打安定县长蛇湾据点,击溃驻军一个连。13日,红一团在玉家湾伏击二五六旅张云衢炮兵营获胜。15日,谢子长带伤与贺晋年指挥红一团一个连及安定县新一支队、十三支队攻入安定县城,打死民团团总李丕成(绰号狼儿子),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及物资,救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及无辜群众。随后,红一团在地方党组织和赤卫队、少先队及农会的配合下,连续作战拔除了根据地内及边沿的一些据点,使横山、米西、安塞、延安及延川的老根据地逐步连成一片。1935年初,红一团在延川九支队的配合下,于青坪川王家圪坨消灭了延川县民团200余人,

缴枪 200 余支,子弹数千发,并活捉了团总刘广汉、高善亭等人。延川县民团从此一蹶不振。

组建红二团 1934 年 11 月 4 日,由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郭洪涛(一说马明方)主持,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东区小马家山,扩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二团。团长郭玉人,政委马万里,参谋长马三(惠世良),下辖 3 个步兵连和 1 个学兵连,约 300 余人枪。红二支队改编后,又成立了新二支队,队长惠永秉,政委惠自安,新二支队活动于清涧、延川一带。

组建红三团 1934 年 9 月 18 日,红三支队在神木一区王家庄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亮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下辖 3 个步兵连、1 个骑兵连,一连连长王进修、指导员贾如胜,二连连长刘德、指导员马尚前,三连连长贺伟、指导员刘锦华(刘镇西),骑兵连连长柴瑞。红三支队改编后,又成立了新三支队,队长贾兰枝。

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创建 1935 年 1 月 30 日,针对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共陕北特委及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共同决定,在赤源县白庙岔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任命杨琪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朱子休为参谋长。所辖三个团,分别由原陕北独立师的三个团改建而成。红八十四师一成立,就打了两个漂亮仗,消灭国民党军两个连。一是首战南沟岔。安定县南沟岔驻有高桂滋部一个连。该连为高部深入安定苏区的一个前哨连,进入苏区后,骄横狂妄,每天四处“清剿”,无恶不作,苏区人民对其恨之人骨。为了打击其嚣张气焰,稳定人心,鼓舞士气,

红八十四师于2月1日将主力一、二团隐蔽集结于南沟岔两侧,然后派游击队、赤卫队将其诱出碉堡,进入伏击圈后,红军突然出击,仅用了两个多小时便将该连全部歼灭。此战俘七八十人,缴获各类枪支百余件及部分弹药。南沟岔伏击战是红八十四师成立后的第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为以后的反“围剿”斗争开了好头。二是再战高杰村。高杰村位于清涧县苏区中心,在大革命时期即建立了党、团组织,是陕北较早开展革命斗争的地区之一。高桂滋部高建白旅专门派一个连驻扎在该村,并以此为中心频繁出动“清剿”周边地区,使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工作无法展开。2月13日,红八十四师主力埋伏在高杰村附近的阎王砭,由清涧红二支队和赤卫队将驻防高杰村的两个排诱至阎王砭伏击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被干净利落地消灭。2月15日,佳、吴两县在佳县张家山村召开县委书记和游击队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将活动在该地区的红六、十五支队合编为独立五团,任命王士杰为团长,慕生忠为政委,李启贤为副团长。全团下辖三个连,100多人,80多支枪。独立五团成立后,首先拔除了慕家驷据点,3月13日,用火攻战术打下了冯家岭寨堡,15日在红三庙与张建南营交火,歼其50余人,张建南腹部受伤逃跑。此后红八十四师将吴堡独立五团改编为师属第三团建制,原在神府的第三团改为陕北红军神府独立三团。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从广泛的游击战争,进入了创建正规红军的新阶段。从此,陕北的红二十七军与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遥相呼应,联合作战。使陕北(包括神府)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牢固

地屹立于西北高原。

二、陕北游击武装力量不断壮大

中共陕北特委在寺圪里会议后,在积极组建陕北正规红军陕北独立师的同时,加强了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工作。到1935年2月,在今榆林辖区组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支队,还有陕西省特务队。这些地方红军游击队,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陕北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及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 1934年5月,中共佳县县委按照陕北特委指示,委派曹世华筹建红军游击队。不久,特委派老任和樊文德从吴堡来到佳县和曹世华联系,6月成立了一个特务队,队长老任(名字不详),政委樊文德。随后,特委指示将佳县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全队有十六七人,长短枪七八支。是年冬,六支队发展到三四十人,二三十支枪。老任在作战中牺牲后,特委派王士杰和王士文分别担任队长和副队长。六支队主要活动在佳南、吴堡和米脂边界地区,1935年1月下旬编入吴堡独立五团。不久,又成立了新六支队,队长李海青,政委马增前。

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 1934年7月中旬,韩峰、赵展山等12人在府谷县清水镇青春岭,成立起一支煤矿工人武装游击队。不久,红三支队派贺伟等人带4支步枪、1支手枪到府谷帮助建立红军游击队。贺伟等配合韩峰游击队,

先后在白草塬、圪针塌、青春岭、清水村等地斗地主、杀恶霸、除税官。9月，在煤矿工人游击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队长兼政委韩峰，全队共20人，各种武器20多件。红七支队成立后，积极配合红三团打了不少胜仗，开辟了南到孤山，北至麻镇、庙沟门，西抵新民镇，东接府谷县城的一小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7日，七支队与红三团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出其不意，攻进高粱村，全歼国民党府谷县政府保安二团，缴获长短枪20余支，战马10多匹。战后，七支队发展至60多人枪，并装备了战马。因此，也被群众称为骑兵七支队。后编入红三团骑兵连。

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 1934年7月中旬，共产党员栾新春、贺吉祥等奉党组织指示，从安定县石窑湾折可达民团哗变出来，提了民团的10多支枪和全部子弹。随后，在贺家湾成立临时八支队，队长栾新春，政委刘明山，副队长贺吉祥。7月25日，临时八支队在李家川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又称横山八支队），主要活动在安定、横山、米脂西区及清涧北区一带。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后，八支队配合主力红军参加了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董家寺等战斗，并将折可达民团全部瓦解。是年秋，八支队在安定吴家寨子、白家园子连杀几个横行乡里的反动分子，打开了安定东区的革命局面。同时八支队在安定北区杨家沟、路家寺等村赤卫队的配合下，到离瓦窑堡城仅几百米的顾家楼斗地主，分财物，扩大了政治影响，并使瓦窑堡城内党的工作进一步活跃起来。八支队9月18日编入红一团后，特委在梨树台成立了新八

支队,任命高志明为队长,李盛堂为政委,全队 50 余人,20 多支枪,主要活动在横山石湾、靖边及安定北区一带,先后配合主力红军进行了二打安定城、攻打水晶沟等战斗并取得胜利。

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 1934 年 8 月 28 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成立。高朗亭任队长、王文良任政委,王保民任副队长。九支队主要负责巩固和扩大延安东北、延川西南、清涧西南和安定东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 1934 年 10 月中旬,谢子长奉陕北特委指示,调共产党员拓嘉楨、高步仁带五六支枪,到安定的杨滴哨村帮助建立游击队。不久,即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高步仁任队长、拓嘉楨任政委,全队有十三四人、六七支枪,主要活动在安定的李家岔、涧峪岔和槐树岔(今属子洲县)一带。1935 年 1 月,十支队发展至三四十人、20 余支枪。

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 1934 年 8 月 25 日,根据神府党组织指示,陕北游击队临时五支队在神木县高家堡点军崖成立。高永明任队长,李万栋任政委。10 月,临时五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队长刘德。次年 1 月,贾如胜被任命为政委。此时全队已发展至 23 人,各种枪 10 余支。十一支队主要活动在以新寨子为中心,西至高家堡,北至柏梁堡,东至太和寨西边,南至任念功、高念文、刘家畔等村的区域内。十一支队配合神府主力红军参加了攻打新寨子、太和寨等战斗。

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 1934 年秋,中共绥德五区区委

负责人霍维德等人经过秘密准备,在梁家甲村组建起一支赤卫队,梁凤鸣任队长,马景林任副队长。不久,陕北特委指示将赤卫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队长梁凤鸣,政委马龙飞,经济员高克恭。十二支队主要活动在绥德梁家甲、深沟、前后坪、孙家圪、郭家坪一带。队员白天上山劳动,晚上出去活动,斗地主,打击反动派,保护群众。

陕北游击队第十三支队 1934年5月,靖边沙庄组建起大刀队,队长李应祥,全队20余人,有大刀12把、步枪4支。6月,青阳岔成立赤卫军(亦称民兵游击中队),队长汪德育,指导员王治邦,全队20余人、八九支枪。大刀队、赤卫军成立后,打土豪,斗劣绅、杀盐吏。9月下旬,谢子长奉陕北特委指示,以赤卫军、大刀队为基础,在青阳岔过峁村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三支队。任命王锦秀为队长(后为王震川),贺树槐为政委,张四(张慈汉)为副队长,全队共30余人、10多支枪。十三支队成立后,首先攻克反动民团据守的张家沟崖窑和沈家圪坨崖窑,缴枪8支,打通了向西发展的交通要道。随后,十三支队配合红军主力参加了十里崖窑和常胜湾战斗。

陕北游击队第十四支队 1934年下半年,绥德县大部分地区已成为红军游击区或“半红半白”区域,只有北区和西区为国民党八十四师、八十六师及晋军盘踞,成为中陕南北红区通道,割裂佳、吴、绥、米四县苏区的障碍。因此,开辟绥德北区建立新的武装力量成为当务之急。陕北特

委曾先后派马明方、郭洪涛、张达志等，到北区商议成立游击武装事宜。8月底，马明方协同绥德六区区委，在绥德北区土地岔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四支队。任命吴创业（后叛变）为队长，刘九宫为政委，侯晋哲为经济员，全队有10多人、5支枪及一些大刀长矛。主要任务是打击地主豪绅，消灭反动民团，发动群众开辟苏区。1935年初，十四支队发展至80余人、20余支枪。

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 1934年底，因受国民党的残酷军事“围剿”，米东苏区的特务队和县、区工作人员进入佳县南部和吴堡苏区。1月23日，中共吴堡县委策动薛家圪、火烧山两处国民党保安团兵变成功。25日，慕生忠代表县委将兵变武装与米东特务队合并，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任命薛英桂为队长、慕生忠为政委，全队有30多人枪，与红四支队、六支队及十支队一起活动于绥、米、佳、吴地区。此时的十五支队亦称吴堡红十五支队。3月，为恢复米东苏区，原米东党的县委书记郭文华向上级请示后，将米东特务队从吴堡红十五支队调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米东第十五支队。队长高尚乐，政委白宝山，队员10多人，有枪四五支。

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一支队 1934年冬，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一支队在佳芦西南成立。队长王士杰，政委许培仁，队员有10多人。二十一支队主要活动在佳芦地区的秃尾河两岸、毛谷川和车会（通镇）以北一带。

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 1934年8月，经陕北特委批准，活动在陕绥边界的曹动之骑兵赤卫队（亦称蒙汉骑兵

游击队、蒙汉支队),在横山县清河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深红四团副团长吴亚雄任队长,曹动之任政委,全队有30多人,10多支步枪及七八匹马。二十二支队成立后,仍活动在乌审旗、鄂托克旗及陕西边沿的城川、大石砭、小石砭、尔林川、纳林河、巴兔湾一带。主要任务是向广大牧民宣传革命道理及党的民族政策,发动蒙汉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及国民党,保护人民利益。二十二支队配合周边地区红军游击队及正规红军作战多次,为开辟伊盟工作和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陕西省特务队 1935年春,经刘志丹同意,共产党员刘振华在安定黄家窑子建立了陕西省特务队,队长牛岗,政委刘振华,全队有10余人枪。主要活动在东起米西的花石崖,西至冷窑子、卧虎湾、石窑沟、白草圪、土窑岭、磨石沟等地。

第五节 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围剿”的部署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党中央及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革命形势再度陷入低潮。与此同时,陕北及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在中共陕北特委及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根据地军民的浴血奋战,却逐步进入鼎盛时期。“创造了陕北发展到十一县的

苏维埃领域及阵地与陕北独立师”，“在我们的区域里完全推翻了豪绅地主的统治，取消了苛捐杂税及一切剥削的文契，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广大劳苦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績，二万以上的赤少队都可以配合群众作战。”^①“二十三县中，除各城镇附近一二十里以内，几皆为共匪所盘踞”^②。

随着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开辟，特别是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但使井岳秀慌了手脚，也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恐慌。蒋介石在加紧部署重兵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直接筹划对西北红军的进攻。急调驻河南的高桂滋第八十四师进入陕北，纠集第八十六师、第八十四师、第三十五师、第四十二师、第六十一师共5个正规师，对陕北（包括神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军事“围剿”。

国民党对陕北的“围剿”部署是：以井岳秀八十六师的三个团，进攻神府苏区。其五一二团由府谷南下，五一四团由神木沿窟野河斜向东南，五一五团一部在万镇、通秦镇一线，构成两个对外正面，北向神木，南向米佳。五一五团一部和五一六团由横山、靖边前出大理河岸，在安定、绥德、清涧地区右翼构成包围战线。以高桂滋八十四师的四个团，分别进占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延安，在安绥清地区左翼形成包围线。另以一个团进入安绥清腹地，进占瓦窑堡。八十四师还分兵一部，控制了绥德、义合至宋家川的

① 中共陕北特委1934年11月14日给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

② 赵清正1934年12月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

道路,与八十六师通秦镇一线阵地,形成对米佳吴地区的南北夹击之势。国民党还在东线调集晋军第七十一师,陈兵黄河东岸待命,其二〇六旅于1935年4月西渡黄河,占据了吴堡、绥德一线。西线调集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7个团,清剿合水、庆阳地区。同时蒋介石派出了以毛佩为团长的参谋团,与八十四师师部同驻绥德,监督、控制各军。他们吸取了上次“围剿”的失败教训,在军事上采取围堵结合,分区“清剿”的办法。主力部队分驻在苏区中心要地,修筑堡垒,合并村庄,步步为营,轮番“清剿”;在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度,成立“肃反委员会”,组织“反共清乡团”、“铲共义勇队”,加紧反共宣传。

二、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部署第二次反“围剿”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1934年10月,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到陕北,对统一陕北、陕甘边两个地区的红军武装力量作了指示。1935年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刘志丹专程到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与正在养伤的陕北红军领导人谢子长作了一次长谈。两人就建立西北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进行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

2月5日,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谢子俊、刘志丹、崔田夫、马明方、郭洪涛等出席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

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议决定撤销陕北特委,所属组织归西北工委领导,陕甘边特委继续存在。西北工委隶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书记惠子俊。西北军委书记刘志丹(一说谢子长)。

在组织问题解决之后,会议认真讨论了反“围剿”的问题。高桂滋部初到陕北,人地两生,其兵员又多来自冀鲁豫平原,不适应山地作战。但该部仗着装备精良,人员充足,而骄横狂妄。正如1935年5月初,国民党延长县县长董公綬在给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报告中所说,高部“初视共匪若无物,骄矜之气溢于言表。只顾扩充防地,以不过五团之军力,驻地达十二县之多,兼以防剿计划均无。”在尚未与正规红军正面交锋的情况下,竟向蒋介石谎报“一弹未发,赤匪已平。”高桂滋原为井岳秀部下,后脱离井投靠了蒋介石,并很快升任到师长。因高是定边人,一直想驱走井岳秀而独占陕北为王,所以井对高始终存有戒心。对此次联合“进剿”,井岳秀明里积极配合,暗则持隔岸观火的态度,坐视高桂滋部与红军作战,他欲坐收渔人之利。针对上述情况,刘志丹认为集中红军优势兵力,先打孤军深入的高桂滋部,继而打井岳秀部,各个歼灭是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上策。具体计划为:第一步,先消灭分散在绥德、清涧、安定、延川中心苏区内的高部,采取调虎离山之计,诱其出笼,在运动中打击消灭或以伏击战歼灭之。第二步,集中优势兵力向苏区外奔袭,打击其守备薄弱孤立据点和城镇,力争陕北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会议同意刘志丹的分析和建议,确定了反“围剿”斗争的战略方针,即:集

中力量,坚决打击深入苏区的高桂滋部,进而打通陕北、陕甘边及神府苏区的联系。

为了加强陕北游击队的领导,有效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西北军委将游击支队改编成三个纵队,具体部署是:由第一、第十支队合编的第一纵队,向米西以北发展,以策应神府的武装力量;由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第十五支队合编的二五纵队,坚持绥德、佳县、吴堡一带,并相机沿黄河向神府方向发展;由第八、第十三支队合编的第三纵队,向靖边县城以北长城内外发展,威胁井岳秀八十六师侧后,积极创造新区;其余各游击队一部向安塞、延安方向发展,对安塞、延安形成包围之势;一部向东发展,隔黄河与晋军对抗。

会后,由刘志丹起草了关于粉碎“围剿”的动员令,号召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第二次“围剿”而英勇奋斗。

1935年2月21日,正在西北军委加紧部署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谢子长由于伤势恶化与世长辞。谢子长,字浩如,安定县枣树坪人。1897年1月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唐谢、白明善、李象九等一起发动了清涧起义,随后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他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逝世,不仅是西北革命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为了永远纪念谢子长,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安定县改名字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均为他题了词。

三、两路红军会师，前敌总指挥部成立

1935年4月底，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奉刘志丹命令，率领第三团及义勇军500余人北上到达陕北。27日，部队行至靖边县青阳岔与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会合。此前，刘志丹化装在青阳岔龙腰镇老爷庙集会上卖碗，已侦知石湾国民党李云发营驻龙腰镇、寺畔的军情。因此，红二十六军三团到达当日，刘志丹即率该团和义勇军在陕北游击队三纵队的配合下，于黎明前包围并全歼寺畔国民党军一个连。击毙连长，缴获长短枪80余支。

5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义勇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与前来接应的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主力会师。5月4日，刘志丹在玉家湾召集两部红军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为了统一指挥两路红军共同作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联席会议后，部队转移至冯家梢场又开了个军民联欢会。附近群众拿着慰问品，欢天喜地赶来参加。刘志丹在联欢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要求两部红军团结一致，在西北党组织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鼓足勇气，多打大仗，多打胜仗，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并把陕北苏区与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

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及前敌总指挥部的成立，统一了作战指挥，集中了红军优势兵力，形成打击国民党正规部队的铜拳铁臂。

四、两战连捷解放安定县城

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后，主力红军为实现“红五月打通

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计划,积极寻找战机,与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

5月7日,红军获悉高桂滋部驻瓦窑堡李少堂团的一个连,将押送被捕共产党员去清涧,并有杨家园子守军一个营到吴家寨子接应。刘志丹认为这是歼灭敌军的良好时机,遂派八十四师第一团团团长贺晋年,率部到吴家寨子以东迎击。他亲率八十四师第二团、四十二师第三团及义勇军,将敌接应部队重重围困于吴家寨子以南。战斗打响后,红一团与瓦窑堡出来的敌援军进行激烈厮杀,最后将其全部消灭。吴家寨子战斗俘45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及7挺轻机枪。

在吴家寨子战斗的同时,红九支队与赤卫队亦将从绥德出发,经清涧向瓦窑堡李少堂部护送军饷、被服及军官眷属的八十四师五〇〇团第三营,牢牢地围困于马家坪附近山上,并派人火速向刘志丹报信。刘志丹即命刚刚结束吴家寨子战斗的主力红军,疾驰增援。5月9日,红军向困守马家坪的国民党军发起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将其全歼。此战俘敌500余人,缴获骡子200多头,长短枪450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两挺、八二迫击炮两门,另有银币2万余元、军服1500套、药品及其他物资100余驮,极大地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

红军两战皆捷,重创高桂滋八十四师,迫使其放弃驻安定县城和延川永坪的防地,龟缩回瓦窑堡固守待援。红军解放了安定县城。至此,安定县除瓦窑堡孤城外,其余地方均为红军所控制。安定县城的解放,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计划。就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长官

何应钦,也不得不承认“此次驻军某部在清涧安定中间之望(瓦)窑堡与大部匪军遭遇,因众寡悬殊,稍有损失,若不通盘计划迅谋根本肃清,则匪患难平。”于是,他亲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讨清剿办法。

五、向南出击连克三城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打得“围剿”部队心惊胆颤。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承认“匪视探囊取物,或以众胜少,或以计设伏,由是屡战屡挫,即变视共匪为天兵天将,各怀畏心,一至交战,而内中恐慌之状不可遏止,愈害怕愈错乱,一错乱即失败。”^①于是,高桂滋一面“严令各县驻军,集中城防,不准出城,并属兵少之区团力亦同集中。”^②一面急请蒋介石速派援兵救助。1935年4月底,山西军阀阎锡山部方克猷旅,从吴堡渡过黄河进犯陕北根据地。

1935年5月10日,根据战情变化,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乘胜向南出击,在运动中寻机歼灭“围剿”部队,迅速打通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把整个根据地连成一片。

5月下旬,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二团及部分游击队由绥德挥师东进,作出准备攻打驻守定仙娥晋军的样子。此举引起晋军的极大恐慌,遂急忙巩固工事,加强守备,但红军在此虚晃一枪后,急速西返至张家圪台,如神兵天降,将毫无准备的高桂滋部一个连紧紧围住。5月27日向其

① ② 延川县长董公援给部力子的报告。

发起猛烈进攻,仅一个多小时即将其全部歼灭,缴获长短枪 80 余支、轻机枪 9 挺。绥德守军闻讯赶来增援,行至半途因听不到枪声,不敢轻举妄动,急忙缩了回去。

张家圪台战斗后,红二团掉头南下直指延长县城。于 5 月 30 日将守城民团李鸣吾部,诱出城外百里处的茄子崾。红一、三团乘城内兵力空虚之际,发起猛攻。经过二三个小时激战,全歼八十四师加强骑兵连,活捉县长董公绥及连长汪镜河,延长县城遂告解放。进城后,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国民党政府及地主豪绅的财物全部没收造册登记上账。李鸣吾民团闻知红军攻打县城,急忙回撤增援,在行至烟雾沟时被红二团及红一团围歼,李鸣吾被击毙。延长战斗,红军以较小的伤亡代价歼敌 480 余人,缴获各种枪 500 余支及大批补给物资。延长解放后,驻守甘谷驿民团主动向红军缴械投降。延川县城守军一个营及民团因惧歼,于 6 月 2 日连夜弃城逃到清涧,红军再获延川县城。

延长之战,是陕北红军首次县城攻坚战。它证明了日益发展壮大的陕北红军,不但能开展运动战,而且具备了攻克防守薄弱之中心城市实力。战后,红军在城内召开军民祝捷大会,处决了县长董公绥及几个豪绅地主,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6 月 10 日,前总命令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将延安县属之高桥镇民团包围。刘志丹即派红八十四师第一团赶赴增援,寨子内守军见红军势大,便自动缴械投降。次日,红八十四师第一团与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围攻国民党安塞县政府所在地新乐寨。新乐寨地势险要,工事坚固,除一条

小路经过吊桥可以入城外，四周皆为难以攀援之峭壁。守城部队均为当地民团，气焰极为嚣张。红军围城后，发动数次猛攻，民团自觉不支，14日夜遂弃城而遁。红军在消灭部分民团后顺利入城，活捉国民党安塞县新旧两任县长。安塞是红军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解放的第四座县城。

6月中旬，前总决定乘胜拿下李家塌寨子。李家塌是陕北和陕甘边的必经要道，也是安塞县驻军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寨子设在一个耸立的山包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内聚集着全县的恶霸地主，有600多名民团把守。他们经常出外抢掠群众财物，捕杀革命人员，对陕北与陕甘边的联系危害极大。6月17日拂晓，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八十四师第一、二团及义勇军按计划将寨子团团围住。随后，红一团在数十挺机枪的掩护下，组织起数十名突击队员，冒着密集的枪弹、滚木、擂石奋勇攀上寨墙，与驻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将东城门打开，主力部队乘势攻入寨内。战至傍晚时分，寨内守军被全部歼灭。战后，处决了团总唐海鳌等几个反动分子。

六、连续作战再克靖边县城

李家塌战斗结束后，主力红军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昼夜兼程，北上至靖边县青阳岔、卧牛城一带集结，准备攻打镇靖城。镇靖是国民党靖边县政府所在地，依山傍水，城墙坚厚，易守难攻。同时，驻军又在城西一座200米高的山上修筑了名叫西山寨的寨堡，与城内守军成犄角之势而遥相呼应。守城的是国民党八十六师第二营，系井岳秀的王牌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400余人，战斗力较强。

另有安边、靖边两县的民团、县警队、保安队 200 余人，协助守城。第二次反“围剿”以来，因红军主力集中力量先打高桂滋八十四师，并岳秀部未受大的打击，自恃武器精良，又知红军缺乏攻城装备，因而俱存侥幸心理，凭险固守。

为了确保攻城胜利，前总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调集了五个团和一个游击纵队共 3000 余人参战，在兵力上红军占绝对优势，取胜把握较大。6 月 27 日，红军由青阳岔、卧牛城出发，连夜急行军 100 多里，于 28 日凌晨完成了对镇靖城的包围。按照作战计划，义勇军攻打西山寨，三个主力团担任攻城任务，红一团为预备队，红三纵队在楼沟嘴准备阻击横山援军。战斗打响后，红军攻城部队很快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敌营长屈志鹏见势不妙，一边指挥残兵据守工事，负隅顽抗，一边强迫城内妇幼老弱群众走在队伍前面开路。红军因担心伤害无辜百姓，被迫后撤了一段。随即，红军改变战术，由红八十四师第三团转攻南城门楼并很快得手，义勇军也将西山寨守军全歼。城内守军见大势已去，顿时溃散，被赶来的红军全部歼灭。屈志鹏乘乱带几个残兵向西逃窜，亦被击毙。此战共毙俘 500 多名，缴枪 500 余支、迫击炮 6 门及大量弹药物资。因守军多系反动死硬分子，战斗中多被击毙，生俘者很少。其中包括多次侵犯苏区，残杀根据地军民的民团头目阎九登、沈桂芳等。

镇靖战斗威震三边，打出了红军的威风，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同时，也使国民党井岳秀部各地驻军军心涣散，惶惶不可终日。不久，驻守靖边张家畔、保安（今志丹）县及金佛坪、三道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闻风相继弃城逃

审,靖边、保安两县全境获得解放,从此,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真正连成了一片,形成了统一的整体。

在陕北根据地(不包括神府地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战绩。总计俘 2000 余人,消灭民团 9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00 余支,轻重机枪 200 余挺。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 6 座县城。同时,陕北主力红军在斗争中已发展壮大至 5000 余人,游击队发展至 6000 余人,还有大量的赤卫队组织。陕北、陕甘边除少数国民党军据点外,连成了一片,总面积达 6 万余平方公里。

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第六节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和 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

一、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围剿”的部署

1935 年 7 月,蒋介石部署的对陕北和陕甘边苏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他又调令东北军的 2 个军 7 个师,宁夏马鸿逵的 3 个骑兵团和原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总兵力达 15 万人,开始了重点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具体部署是:东面沿黄河一线,为晋军正太护路军孙楚部 3 个旅及七十一师二〇六旅、七十二师二〇八旅;北面的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木、府谷一带,为高桂滋八十四师及井岳秀八十六师,西北陕宁交界一线,为马鸿逵

第十五路军的3个骑兵团,西南一线,为东北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的5个师,何柱国骑兵第二军的3个师和1个独立团,宁夏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1个旅;南面延安以南,仍为冯钦哉的第四十二师,杨步飞的第六十一师。为了加强对陕北北部各“围剿”部队的统一指挥,蒋介石除严令保定行营驻陕北的参谋团切实协调各部动作外,又颁令成立了陕北“剿匪”总指挥部,以晋军孙楚和李生达为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军,根据地的军民在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二、刘志丹指挥北线反“围剿”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35年5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调河北。行前,决定以中共河北省委为基础,建立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导整个北方党的工作。中共西北工委改由中共北方局领导。不久,原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的驻西北代表朱理治、聂洪钧陆续到达西北苏区。

朱理治和聂洪钧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前夕,到达西北苏区的。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是坚决的,但是他们是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来指导斗争的。他们在7月15日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永坪镇执委扩大会议上,反复传达含有严重“左”倾观点的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北和陕甘边的5封指示信,通过了后来成为西北错误“肃反”依据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责刘志丹等犯了“右倾取消主义”的错误,号召“进行斗争”。

但是，朱理治和聂洪钧等此时尚未掌握西北红军的领导权。因此，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一开始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

7月10日，刘志丹率主力红军东进到三皇峁一带，红二十七军第二团隐蔽待命。12日，国民党军四四九团第一营的一个连，离开三皇峁寨子到王家沟抢粮、物，同红军遭遇，即向三皇峁制高点柳树圪塔退去，得到寨子内营部和机枪连的掩护，负隅顽抗。红军主力兵团即从西、南两侧向柳树圪塔和三皇峁寨子进攻。激战至13日上午10时，红军占了柳树圪塔制高点，毙伤敌70余人，缴枪30余支。

7月12日，国民党晋军方克清指挥12个连，将红二五纵队包围于吴堡西区尚家塬。时值大雨倾盆，行走困难。二五纵队队长郭玉人带头脱掉衣服，命令部队向晋军冲去，展开白刃战。经半个多小时战斗，消灭晋军一个排，缴获三八式步枪23支、冲锋枪3支、手枪2支和许多弹药，突出重围安全转移。

7月17日，刘志丹得悉高桂滋八十四师五〇一团一营、五〇二团三营和张廷芝骑兵营去老君殿高家塬（今属子洲县）抢粮。便率主力红军前后夹击，将其击溃。击伤团长艾捷三，缴获枪支弹药许多，从此高桂滋部无力出击陕北苏区。

8月1日，根据西北工委和前总的决定，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千余人进至清涧袁家沟、花岩寺一带，进行战斗准备。尔后秘密插至吴堡县宋家坡地带，决定消灭慕家塬守军，以便于红军扩大回旋余地，开展机动作战。慕家塬是个土寨子，寨墙坚固。守军是晋军二〇六旅的一

个连,红八十四师第一团担任主攻任务。10日拂晓,贺晋年带领红一团偷袭慕家塬未克。11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投入战斗,部队很快冲进寨内,消灭守军一个连。此时国民党军指挥机关不明战场实情,又从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各据点拼凑了1个营2个连的兵力,前往慕家塬增援。12日晨,增援部队撞进慕家塬畔红军的伏击圈,遭到突然袭击后仓皇撤退,红军在追击中歼灭约3个连。慕家塬战斗,红军攻坚、阻援共歼灭4个连。

8月16日,红军一部埋伏在石佛塬附近。然后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将横山石湾国民党2个连诱出击溃。此次战斗击毙连长2名,缴获步枪40多支。慕家塬战斗后,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南下新庄一带(绥德东南约20公里)集结待机。这时陕北游击队二五纵队正在围攻定仙娥。定仙娥是吴堡、绥德守军外围的重要据点,又是国民党军伸向苏区的一支触角,由晋军四一二团一个营驻守。该部在红军围攻下频频告急,晋军正太护路军为解定仙娥守军的危急,不时派飞机侦察轰炸。红军在定仙娥南约10公里的洗马湾击落飞机一架,俘虏驾驶员2名。晋军又派第三旅旅长马廷寿,率第六团前来增援。此刻红军围点战术运用成功,打援战机来临。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在定仙娥东北面两道山梁上做了打援布置:义勇军和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在北面山梁;红八十四师第一、二团在南面山梁,两军构成口袋阵。同时,派陕北游击队绥德五支队向枣林坪方向侦察警戒。8月21日上午,敌援军从枣林坪出发,向定仙娥疾进,红四十二师将其拦截在阵地前。晋军全力反扑,连续攻占了几个山头,向定仙娥接近。此时红八十四师从晋

军侧翼冲杀过来,予敌以重创,并派得力连队侧击其背,将其全歼。同时,全歼定仙墁守军。这一仗打死打伤副团长齐汝英以下 200 多人,俘 1800 多人,缴获八二迫击炮 6 门,重机枪 6 挺、轻机枪 37 挺、长短枪 1980 余支,骡马 80 余匹。红军夺得了定仙墁“围点打援”战斗的胜利,取得巨大战果。

9 月初,刘志丹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讨论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对策。会上,红三纵队指挥曹动之建议:横山城堡虽险要,但工事简陋,驻军只有国民党八十六师的骑兵第三营,兵力较弱,防守不严,红军可以在鲁家河集结兵力,奔袭横山。刘志丹也认为攻克横山,可以使石湾国民党守军二五六旅五一团不战自退。这不仅可使米西苏区扩展到无定河上游,还可以减轻八十六师对神府根据地的压力,更有利于红军集中力量打击南线的国民党东北军。于是,决定攻打横山。9 月 9 日,部队到达鲁家河,作突袭横山城的准备。安排红一团在城西北架云梯登城,游击三纵队由城东攻城,义勇军抢占南山制高点,四团抢占城北娘娘庙,二团赴斩贼关构筑工事,以备阻击波罗、榆林援军。12 日凌晨,各路军按计划进入阵地,不料被驻军发现,突袭不成,转为强攻。战至下午 1 时许,城仍未攻克,刘志丹恐榆林、波罗方面国民党军来援,遂主动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未打开横山城,但迫使井岳秀从驻守神府的二五八旅中调出一部加强镇川、武镇、横山一带的防御,有效地减轻了神府根据地的压力。

9 月 10 日,郭玉人率战斗团在绥德三十里铺打围歼战,拔掉绥德至吴堡公路沿线设立的反动据点。12 日,红

三纵队和二十一支队在贺树槐、王子长率领下，夜袭横山油房头民团取得胜利，击毙团总李培银。

三、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部署南线反“围剿”作战

1935年9月13日，率部在秀延县七里沟、玉家湾、黄家川一带宿营的刘志丹，接到中共西北工委的通知，要前总带领西北红军主力部队即回水坪镇，与即将北来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对兄弟红军的到来，刘志丹亲笔写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召开军政指挥员会议，号召全军指战员虚心向红二十五军学习，加强与红二十五军的团结。

9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胜利到达中共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县水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红二十五军是1934年11月从鄂豫革命根据地出发，12月初到达商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留红七十四师继续坚持陕南斗争，而北上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的。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水坪镇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主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为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任命聂洪钧为主席。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18日，聂洪钧在水坪镇皮肤沟滩宣布红十五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辖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

3个师,3000多人,其中八十一师由二十七军改编,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此时,东北军一一〇、一二九师已经到达延安。据守在陕北各重要据点的井岳秀八十六师、高桂滋八十四师又蠢蠢欲动,准备与东北军夹击红军,消灭刚成立的红十五军团。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认真分析形势,认为只有南下消灭深入到延安一带的东北军,才有可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南北夹击。中共陕甘晋省委即对南线的反“围剿”作了具体部署。红十五军团从永坪镇出发,绕过延安县城,抵达甘泉以北的崂山一带。

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崂山设伏,歼灭东北军援甘泉的一一〇师,俘团长裴焕彩以下2000余名,缴获各种枪数千支。崂山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的“围剿”部队震动很大,驻守瓦窑堡的八十四师一部星夜北逃绥德县城,安定县城乡全部解放。战后,红十五军团继续南下,攻克东北军一〇七师一部固守的富县榆林桥据点,歼灭4个营,俘团长高福源。不久,又攻下了富县张村驿据点及附近的土围子多处,缴获了很多粮食。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不但为粉碎第三次“围剿”和迎接中央红军北上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后来的直罗镇大捷创造了条件,对促进张学良放弃“剿共”政策,逼蒋抗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神府的反“围剿”斗争

神府苏区地处陕北的最北部,1935年2月至10月在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陕甘晋省委领导根据地的军民进行

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他们在数月内相对独立的进行了更为艰难的反“围剿”斗争。

1935年3月22日至23日，中共神木县委在园条塔村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攻打新寨子。会上，县委主要负责人在多数同志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决定集中红军、赤卫队主力，攻打新寨子，进而消灭花石崖国民党军。新寨子是国民党军一个大据点，工事坚固，防守兵力较强。26日，神府红三团及游击队、赤卫队、地方党政干部2600余人，在新寨子附近的九五会汇集。由于行动过大，事先走露了消息，国民党秘密增兵1个连，并加固了防守工事。29日拂晓，红军盲目发起强攻，冲了几次伤亡战士100余人，红三团参谋长刘鸿飞壮烈牺牲。进攻失利后，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分几路转移。国民党“围剿”部队则乘势进犯到栏杆堡、瓦罗、马镇、合河、盘塘、沙岸一线，沿途设立了40多个据点，并将“剿共司令部”由神木县城移驻沙岸镇。

鉴于形势的恶化，神木县委在呼家庄召开扩大会议，取消了特派员包揽决定一切的制度，成立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神府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工委下辖神木东、西、北三个县委及府谷县委。

当时，流窜甘肃、绥远一带的土匪史文华带着300余人进入神府地区，要求与红军合作，实则想借红军力量暂避傅作义的追剿。工委得讯后，认为虽不一定能与史部长期合作，但暂时收编也可共同对付“围剿”。遂派人将其改编为中国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师长史文华，政委王兆相，下辖两个团的政委贾怀光、刘世英均为工委派去的共产党员。工委又抽调16名红军干部，担任该师各连政

治指导员等职。史部受编后,奉神府工委命令,南下佳、米,准备打通与西北军委的联系。部队行至佳县阎家岭附近遭国民党军堵击,一触即溃退回苏区。后转至外线作战时,史文华见敌强我弱又起异心,带领部队投靠了国民党高桂滋八十四师。

5月中旬,神府工委在白家沟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问题。会上工委主要负责人不吸取教训,仍然坚持集中红军、游击队全部力量硬打硬拼。红三团突袭毛家圪塔兵连,歼灭四五十人。工委主要负责人更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在其后的许家圪塔会议决定乘胜攻打瓦窑渠。瓦窑渠是窟野河东国民党驻军腹地的一个大据点,驻有1个连。其东南数里的马镇和西北5公里的瓦罗,各驻1个连,互为呼应。红三团仅200余人,且装备极差,此战胜算的把握很小。干部战士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攻坚未克。转移途中,又遭国民党军三路夹击,损失惨重。此战失利,使苏区反“围剿”形势更趋恶化。军事冒险接连失利,工委主要负责人又对神府的反“围剿”斗争悲观失望了,遂决定缩编红军武装,遣散非武装人员,错误地分散了红军力量。缩编后的红军队伍,分成9个分队到各地打游击,国民党军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23个苏区有18个沦陷,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大部分遭到破坏。3800多名党团员仅剩400多名,被残杀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难以计数,苏区一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神府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分散到各地的党员、干部及红军战士一刻也没有停止斗争。贾家沟女共产党员黄云爱及妯娌刘金珍、贺博芳3人,为救隐藏在崖窑里的群众,将

“围剿”部队引向另一个山头，并毅然跳下绝壁，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巾帼女英雄事迹。广大革命群众也一如既往，义无反顾地掩护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支持他们开展斗争，神府苏区的革命之火从未熄灭。

9月7日，神府地区党、政、军干部在神木十区郑家圪召开前后方联席会议，认真总结了根据地几个月来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沉痛教训。与会同志分析了形势，认为随着陕北、陕甘边红军在南线作战接连取胜，国民党被迫将“围剿”神府苏区的部分兵力南调，根据地压力也相对减小，此乃重新集结和发展神府主力红军的有利时机。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集中和壮大红军力量，形成重拳打击国民党军。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赤卫队及各种群众团体，使全苏区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战斗。

9月12日，根据联席会议精神，在王寿梁村正式恢复了神府工委。书记张晨钟，组织毛凤翔、宣传乔钟灵、青年刘长亮。同时，恢复了红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下辖3个连，120多人。红三团恢复后，按照西北工委的指示精神，避开北面国民党重兵，迅速向南运动并进入佳芦地区寻机作战，以策应陕北主力红军北上。9月下旬，该团在申家里击溃邬青云骑兵1个连，后接连重创该部，使其不敢再向苏区侵扰。与此同时，神府工委先后派大批干部到各地恢复基层党组织，坚决打击国民党的“肃反”活动，镇压由劣绅和叛徒组成的“肃反小组”，使党的活动及革命斗争又普遍开展起来，为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奠定了基础。

第六章

根据地的开辟和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陕北根据地的开辟和 西北根据地的形成

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中共陕北特委 1934 年 4 月神堂沟会议后,陕北红军在府谷、神木、榆林、米脂、佳县、绥德、吴堡、清涧、靖边、横山及延川、延安、安定、安塞等县,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随着红军运动的广泛开展,出现了神府榆佳边、绥米佳吴、安绥清横靖三个红色区域,每个区域内又建立了小块的根据地,这就证明,红军运动与苏维埃运动是不可分的,在摧毁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之后,必须迅速建立起革命的工农政权。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十分关注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1934 年秋几次给中共陕北特委发来指示信。指示陕北特委要“勇敢的领导各种群众斗争,从日常细小的每一斗争(分粮、吃大户、抗捐、抗债),提高到没收与分配土地,为建立苏维埃政府而斗争”。“必须在已占领区域加紧开展灾民斗争,组织群众实行没收与分配土地,估计力量,坚决

打击敌人的弱点,加强白军工作,解除反动武装,用一切武器猛烈武装农民,肃清反革命,准备建立苏维埃,宣布中央苏维埃一切法令,高举起鲜明的反帝土地革命旗帜。”、“配合红二十六军正在胜利发展的行动,在陕北建立大块的苏维埃根据地”。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共陕北特委 1934 年 8 月 28 日,在寺播里会议上通过,9 月 11 日发出的《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中指出:“西北劳苦群众开展了空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已由分粮、吃大户斗争进行到分配土地的斗争,抗捐、抗税的斗争进行到推翻豪绅、地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政权的斗争”、“冲破敌人的‘围剿’是有机的联系着巩固苏区的任务。安定西区、北区和安塞(250 余村)、横山边界的革命委员会,应该确实执行各部门的工作。清涧东、南、北、城区四区(共 500 余村),绥德东南区(共 100 余村),神木东南区(共 300 余村),佳、吴交界(共五六十村),应该马上召集党、群众、游击队代表建立革命委员会临时政权,正副主席及土地、军事、肃反、文化、粮食、劳动委员会和政治秘书处都动员起来,颁布苏维埃的各项法令以及最小限度的实施。并且颁发《良民通行证》,宣布苏区的临时戒严,防止反革命分子的混入,于中华苏维埃成立纪念节(11 月 10 日)正式依照苏维埃选举法成立苏维埃政权。政府立即纠正现在发生的一切无政府状态,执行各种苏维埃法令,以巩固苏区,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各县切实执行决议案精神,迅速进行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10 月 15 日,中共陕北特委报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陕北于短期完成 6 个县革命委员会”,“清涧、安定已开始分配土地。

佳、吴、绥、神于最短期间即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分配土地”。

1934年8月25日，安定县革命委员会在涧峪岔景家河村成立，主席刘光显。11月下旬，在龙嘴子村召开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改安定县为赤源县，选举成立了赤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薛兰斌。赤源县辖安定西北部、横山南部以大、小理河为中心的大部地区，靖边东区，安塞一部分，分设10个区苏维埃政府。

1934年9月12日，清涧县在鹿儿塬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主持，选举产生了清涧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白世杰。下辖10个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先后驻鹿儿塬、店则沟、解家沟等地。

清涧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共陕北特委即以清涧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颁发了县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条例。要求各县参照清涧的组织形式，把临时政权建立起来。其方法是，先在党的县委领导下，成立筹备委员会，由筹备委员会确定党、团、游击队、群众组织代表的人数，然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此后的神木、佳县、吴堡、绥德县革命委员会，就是依这个条例组建起来的。

1934年9月18日，神木县革命委员会在王家庄成立，主席呼子威。所辖6个区，亦先后建立了区革命委员会。11月，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改为神木县苏维埃政府。

1934年9月下旬，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在坑镇马连塔村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宣布成立，主席王好明。机关无固定地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旋即抓区、乡红色政权的建

立和分配土地工作。10月后,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佳县苏区几乎全部丧失,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迁往吴堡县。

1934年11月3日,吴堡县在后冯家畔村召开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吴堡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庆玉。

1935年1月,绥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机关设在花石畔村,主席王学善。

随着各级红色政权的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四个苏维埃区域。即:

安定、延川地区:1934年底,赤源县划分为赤源、秀延、重远三县。赤源县向北扩展到靖边、横山南境,开辟了安定东和米西新区,向南到安塞北区,开辟了清涧、延川新区,秀延县南到侯家岔,北到淮宁湾,西至下十里铺与赤源县相接。重远县包括安定南区及延安、安塞、靖边各一部分。

绥德、清涧地区:除宋家川经义合至绥德之窄小走廊外,已与佳吴根据地接壤,南面已扩大到延川东区。

佳县、吴堡地区:开辟了米东新区。除绥德古镇、佳县店头、螭蛸峪、木头峪,吴堡岔上等国民党据点外,已扩展到北起店头,南至古镇、慕家塬等地,东西宽25公里,南北长35公里。

神木、府谷地区:1934年底,神府苏区北面已扩展到府谷县城以北,大岔、黄甫以南;南面延伸到佳北通镇以北;西面发展到榆林的建安堡以东;东西隔黄河与山西的3个秘密区委连接。苏区幅员南北约250公里,东西约100公里,人口约14万。共划分了23个行政区,其中神木13

个区,6个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余都是公开游击区,建有秘密区委。府谷有7个区,均建有党的区委和苏维埃政权。山西兴县有3个秘密区委。神府党员发展到2000多名,团员1000多名,红三团增加到300多人、200多支枪,七支队、十一支队和新三支队,共有游击队员400多人。

1935年1月25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到会代表100多名。会议讨论了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保卫发展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大会开了3天。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选举产生了省苏维埃政府及各部领导人。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经过选举改为县苏维埃政府。各区、乡也相应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在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主要工作是:继续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肃清反革命,纯洁内部巩固苏区;扩红、优红、支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文化教育,破除迷信,宣传执行婚姻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收复失地;组织生产建设,开展贸易,发行货币(纸币),建立财政制度等,还印发了不定期报《西北斗争》。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省苏维埃政府举办了土地训练班、党团干部训练班。各县也普遍办起了短期流动训练班,赤卫队干部训练班。学习内容主要是党、团文件,上级指示和游击战争基本知识等。

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陕北根据地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35年2月5日,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及地方武装,陕北苏区成为西北根据地的组成部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后,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根据地形成后,在中共西北工委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陕西北部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不断的巩固与扩大,除已成立的6个县苏维埃政权外,至1935年9月又相继建立了秀延、米西、府谷、西靖边、定边、东靖边等县的苏维埃政权。

1935年2月6日,中共秀延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柳沟村成立。县委书记李子厚,政府主席薛兰斌,下辖14个区,20多个乡。其中今属子洲县大理河以南的区域,属秀延县苏维埃政府。分设为秀延县第十一区(何家集一带)、第十二区(驼耳巷一带)、第十三区(砖庙一带)、第十四区(杜家湾一带)。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开创米西苏区。8月上旬,西北工委派曹世华、李兴平去米西筹建革命委员会,联保主任阎开旺突然叛变。8月13日,西北工委决定成立红二十三支队开赴米西平息叛乱。9月24日,米西县革命委员会在石窟沟乡(今属横山县)折家山村成立,杨彩卿任主席,辖7个区。其中在今属子洲县大理河以北的区域内,分设4个区。第一区辖石窟沟以南、周家坡以东、南殿寺以

北的村庄；第二区辖殿寺、赵寨子、盐湾、三川口等村；第三区辖瓜园则湾、吴家山、沙茂湾、三皇岭等村；第四区辖西庄、白草洼等村。

1935年3月，中共府谷县委在榆树坪召开千人大会，成立了府谷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王巨武，下辖7个区，相继建立区政权。

1935年5月，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在桃李洼（今属志丹县）正式宣告成立。主席周子恒，下辖4个区苏维埃政府，有13个工作部门。11月，苏维埃政府在“沙洼沟事变”中被破坏。

1935年5月，陕甘边政府指派蔡子伟、马亚西在今吴旗县的风凰寺筹建了定边县革命委员会。王玉海任主席，活动在定边、靖边边界地区。

1935年9月17日，东靖边县苏维埃政府在青阳岔的店家城正式成立。主席王治邦，下辖青阳岔、沈家圪坨、崩界、张家畔4个区苏维埃政府。

三、根据地的党组织

在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之前，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党组织，在今榆林境内苏维埃区域的有：中共绥德县委，书记贺治国，辖6个区委；中共神木县委，书记张晨钟，辖13个区委；中共府谷县委，书记赵希贤，辖7个区委；中共吴堡县委，书记慕生桂，辖6个区委；中共佳县县委，书记任子恩，辖4个区委；中共米东县委，书记郭文华；中共清涧县委，书记高长直，辖10个区委；中共秀延县委，下辖14个区委。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之后，又在陕北北部苏区内新建立

了中共神府工委,中共米西县委和中共靖边县委。1935年5月初,中共神木县委在呼家庄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神府工委,书记王达成,组织部长贾令德,宣传部长张晨钟,青年书记贾怀琪。为便于领导反“围剿”,又将神木县委分为东、西、北3个县委。东县委书记王恩惠,西县委书记乔钟灵,北县委书记刘北垣。同时派呼子文(后叛变)任中共府谷县委书记,带一批干部去府谷坚持工作。6月,西北工委派李生甫等进入米西,筹建党组织。8月下旬,任命杨彩霞为米西县委书记。11月,在牛肋脖湾正式成立了中共米西县委,辖7个区委,机关驻石窑沟一带。9月17日,正式成立了中共靖边县委,李子厚任书记,辖4个区委,机关流动于店家城、青阳岔、卧牛城、吴家峁等地。

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后,原属中共西北工委领导的榆林境内的党、团组织和各级群众组织均改属陕甘晋省委领导。不久,中共陕甘晋省委决定组建中共陕北第一分区区委,区委书记白炳炘(马义),组织部长杨和亭,宣传部长白清江,辖绥德、佳县、吴堡、清涧、延水等县委。同时建立陕北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白炳炘,参谋长乔红、政治部主任惠庆祺(一说杨和亭)。军分区辖绥德、佳县、吴堡、清涧、延水等县军事组织。10月,中共佳芦县委成立,书记王恩惠。

在根据地内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县、区、乡、村普遍有共青团的组织,乡、村普遍有农会和赤卫队,部分地方还有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它们发动、团结各阶层的群众,在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10月初,正当根据地的军民胜利进行第三次

反“围剿”的时候，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影响之下，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在根据地开展了错误的肃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逮捕了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黄子文、姜旭、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张庆孚、高朗亭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并错杀了 200 多名共产党员和红军、苏维埃干部，党内、军内、根据地内处于恐怖状态。军心动摇，民心不安，组织混乱，有的地方被迫发生反叛事件。此时国民党加紧军事“围剿”，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危机。10 月 19 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对错误肃反实施强行制止，从而挽救了西北根据地。

第二节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和西北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

一、中央红军过定边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历时一年，越过长征途中最后一重天险——六盘山。由甘肃环县，进入陕西省的定边县南部山区。

10 月 15 日，由红一方面军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环县洪德城、耿湾一带，第二、三纵队到达环县四合塬附近的兴隆山一带。两路军队基本保持平行距离，向陕北进发。

16 日，第一纵队从黑城岔出发，经耿湾进入定边县的

桥儿沟,途经沙堰、马堰、罗庞堰、贾二堰等地,当夜在地处陕甘交界的木瓜城一带宿营。

17日,部队艰难地登上木瓜城以东,张壕畔西北的山梁——大梁峁头。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排除干扰,红军战士头戴树枝帽圈,脚穿草鞋,沿着崎岖的山路疾走,国民党从天上派飞机袭击,轰炸,地上派三十一军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率兵紧追不放,其先头部队追到大梁峁头与红一纵队遭遇。红军指战员机动灵活地抢占了有利地形,作好战斗准备,待机挫伤追兵的锋芒。当追兵接近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猛烈开火。追军遭到痛击后,纷纷溃退。红军将士知道他们不会甘心失败,还要卷土重来,仍坚守阵地。不久,追兵再次向红军阵地进攻,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后,由于力量悬殊,红军开始撤退,国民党军紧追不舍。在路壕畔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后,红军边打边疏散,边向东挺进。行至榆岭梁时,飞来几架飞机侦察轰炸,还在周小埭附近投下七八颗炸弹。由于红军的巧妙伪装,飞机一直在上空盘旋,始终寻不着明显的目标。天黑时,国民党军停止追击,返回张壕畔。毛泽东率部经周小埭、蔡润、左峡峡、邢河等地,夜宿牛圈圪坨。次日,向吴起镇(今吴旗县)的田百户、铁边城一线挺进。

毛泽东分析军情后,在定边的牛圈圪坨至吴起镇的铁边城之间给陶峙岳的骑兵团设下了一个口袋阵,准备一举割掉这条尾巴。17日晚9时,毛泽东在牛圈圪坨给彭德怀发电,“如该敌续追,拟于后日在铁边城以东地区回击消灭之”,并对兵力布阵作了具体安排。由于国民党追兵怕苦、怕累、怕冷、怕饿更怕死,他们给“剿总”发电请求停止追

击,因而没有钻进红军设下的口袋阵。

第二、三纵队 16 日,由兴隆山一带经艾蒿埪、章桥进入定边县铁角城一带宿营。17 日,由铁角城出发经八道崂、二道崂、杏树崂、赵崂峁、贺渠出定边县境,向吴起镇进发。当部队行至二道崂至贺渠之间,被国民党的侦察飞机发现,投下了几枚炸弹,5 名红军战士牺牲、2 名红军战士病亡,当地群众就地掩埋了烈士的遗体。1969 年,群众又把这些烈士的遗骨集中迁葬在贺渠村前的小山梁上,建起了红军坟。

定边县的木瓜城、牛圈圪坨和铁角城,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北的第一站。红军途经定边县 3 个乡、20 多个村。红军路过之处,不损坏老乡庄稼,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有个群众在路上碰见一些红军战士很饥饿,可是他们宁肯把路边丢着的洋芋捡起来充饥,也不向群众要东西吃。即使他们吃了群众的东西,也要放钱或物给予补偿,就是喝口水也要留下纸条做宣传,说明他们是中央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北上抗日等。红军那种军纪严明,团结友爱,艰苦奋斗,不畏艰险和勇敢善战的革命精神,一直在当地群众中广泛传颂。

18 日,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与地方党和政府建立了联系,从而结束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陕甘支队在此休整 7 天,并取得“割尾巴”战斗的胜利。11 月 7 日,中共中央抵达中共陕甘晋省委所在地安定县瓦窑堡。

一年以后的 1936 年 10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毛泽东派周恩来途经定边县罗儿崂峁、罗鹿塬前往环县河连湾,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山城堡战

役,之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定边、环县、盐池一带休整。彭德怀率总部驻扎在定边县冯地坑乡梢沟壕、羊圈山一带。红四方面军在罗庞壕乡休整期间,总部驻庙梁、拐填口,野战医院在铺子塘、贺壕畔,后勤供给部在马庙湾,先后驻扎一个月。12月5日,红二方面军从环县耿湾乡红泥湾、崔园子一带出发,经黑城岔进入定边县桥儿沟。沿东川北上,经康庄、刘拐沟到苗土渠、申天池、冯地坑一带,先后驻扎两个星期。西安事变后,红一、二方面军经姬壕、西堆壕、罗儿峪路东去吴起。

二、中共中央对西北根据地领导机构和行政建制的调整

中共中央抵达吴起镇后,11月2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随后即设立了以张闻天兼书记的中共西北中央局,以秦邦宪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毛泽东兼主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群工作。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委会和陕甘晋省委领导的西北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调整了西北根据地的行政区划。以富县的下寺湾为界,北设陕西省,南设陕甘省,并设三边、神府、关中3个特区,均分属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委领导。行政区划调整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北部的苏维埃区域,分属陕西省和三边、神府特区领导。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甘

省,新设陕甘宁省,原为陕西省的定边、安边、赤安3县归其所辖。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设立了东地区特别委员会,先后辖中共绥清中心县委和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县委,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东地区办事处,辖吴堡、绥德、清涧等6个县的苏维埃政府。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随即设立西北办事处,周恩来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这样,西北军委直接领导与指挥野战军,军委西北办事处直接领导与指挥地方兵团,各级政府及相应的军事机构领导与指挥本地的游击队。12月下旬,军委西北办事处决定,以陕西省游击第一纵队为主,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下辖二五〇、二五一、二五二团。1936年3月上旬,军委西北办事处要求陕西省委再组建一个军,番号为红三十军,控制黄河渡口,保护东征主力的后方供应线。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集中主力游击队600多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下辖二六二、二六三、二六四团。

第三节 彻底粉碎第三次“围剿”

一、直罗镇战役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陕北时,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尚未粉碎,根据地南线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的5个师由合水东进,企图围歼红军于葫芦河、西北地区,并解红军对甘泉之围。

11月5日,毛泽东在富县下寺湾召开已恢复建制的红一军团和在陕北组建的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确定在直罗镇打包围歼灭战,并研究制定了战役计划。在战役发起的前两天,毛泽东又组织两个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看了地形,确定具体部署。

11月21日拂晓红军发动总攻击,24日结束战斗,此役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打死打伤1000余人、俘虏5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重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无线电两部。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两军团营以上干部会上对直罗镇战役作了总结。他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二、红军东征

1935年底,国民党继续调配兵力,企图再次铲除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东渡黄河进行东征,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红军东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选择在清涧县境内进行。其原因一是清涧东临黄河,与山西省石楼县隔河相望,黄河流经清涧县境40多公里,有良好的渡口。二是这里建党早,党群基础好。东征前,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在清涧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在清涧县双庙河、袁家

沟、高杰村、曹家圪生活和工作过 19 个昼夜，制定了强渡黄河的作战方案。

1936 年 1 月下旬，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总部机关和东征准备工作的先遣部队晓行夜宿，跋山涉水，经延川县于 2 月 4 日到清涧县双庙河，5 日到距离黄河西岸 15 公里的袁家沟村。毛泽东住在老党员白育才家的窑洞里，中间隔一条水沟是红军总部机关和电台人员的住处。7 日，天空纷纷扬扬飘落了一场瑞雪，毛泽东披着蓝布棉大衣，踩着积雪到黄河岸边观察对岸军情，实地勘察黄河渡口。当毛泽东登上高家堰时，面对银装素裹的大好河山，触景生情，诗意盎然，吟成了气壮山河堪称千古绝唱的伟大诗篇——《沁园春·雪》。15 日，以红军主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第二十八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17 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18 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在袁家沟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同时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19 日，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来到高杰村，住在白家元的窑洞里。这里距黄河渡口辛关临近，是红军东渡的前线指挥驻地，也是红军集结、疏散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司令员及有关人员对河口、沟口两个渡河点的详细侦察和黄河对岸每一个碉堡的敌人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的位置等情况的汇报。批准了彭总关于强渡黄河的作战方案，决定渡河时间在 20 日晚 8 时。当天，毛泽东又回到红军总部驻地袁家沟村。20 日晚上，红十五军团在辛关渡口突击渡河成功，红一军团在延川清水关、绥德沟口一线渡河成功。东征战役，

拉开了序幕。21日凌晨3时,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机关由袁家沟出发,摸黑翻山越岭,再次经高杰村、高家孤驷到达黄河岸边的铺子沟渡口。这里向南2公里多是辛关渡口,5公里处是河口大渡口。此时,红十五军团的后续部队仍在继续渡河,其先头部队已控制了对岸上下游各渡口,正向纵深挺进。毛泽东部署完后方工作后,与随行人员一起从辛关房儿沟渡口,踏上渡船,闯过惊涛骇浪,渡过黄河。24日晚,彭德怀由沟口东渡黄河。26日,在东征红军的打击下,晋军驻吴堡5000多人全部向黄河以东撤退。红军在7天内,共击溃晋军5个团、俘1200多人,缴获迫击炮10门、步枪800支、子弹10万发。同时,占领了吴堡县城。

2月下旬,周恩来来到折家坪红二十八军军部,同刘志丹、宋任穷一起指挥攻打绥德义合。战斗结束后,周恩来过无定河,由绥德沟口沿黄河南行,巡视河防、渡口、船只、兵站,并检查了清涧和绥德县委的工作。3月1日,周恩来和随行人员从清涧县马花坪渡口过河,到三交镇检查指导工作。

东征战役打响后,红二十八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的带领下,按照总部的部署,先沿黄河西岸北上打通陕北根据地与神府根据地的通道,帮助神府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然后渡河与红十五军团汇合,参加东征战役。3月中旬,红二十八军由安塞出发,经清涧、吴堡、绥德、米脂、佳县于19日进入神府苏区的佳芦县。县委负责人主动与红二十八军联系,向刘、宋汇报情况,给部队安排食宿,连夜给中共神府特委送去消息。20日,红二十八军向东北方向进发,在桃柳沟歼灭国民党军护送运输物资的一个

排，缴获了全部武器弹药和物资。神府特委领导人杨和亭、毛凤翔等得知红二十八军来到神府的消息后，立即前往接应，向刘、宋详细汇报了神府特区各方面的情况。21日，部队接群众报告，国民党军杨向枝营的两个连正在杨家塌抢夺群众的粮物。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八军的3个团对其包围袭击，将其全部歼灭。22日，神府特委在陈家坪召开欢迎红二十八军暨祝捷大会。周围群众自发地带着慰问品，从四面八方赶来，都想亲眼目睹西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会上刘志丹作了重要讲话。晚上，刘志丹向神府特委成员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及红二十八军北上以来的情况，对神府党、政、军、民各项工作和巩固发展苏区作了重要指示。

为了支援红二十八军强渡黄河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抗日，神府特委派王兆相、杨孝先到红二十八军协助工作。4月1日凌晨，在红三团的配合下红二十八军在山坡村强渡成功。为配合东征，神府特委又派王兆相率新三支队随军东渡，帮助红二十八军在罗峪口和黑峪口维持治安，护送伤病员和运输军用物资等。半个月后由于河东国民党军重兵南下，新三支队撤回了神府根据地。

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进攻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保安县金汤镇人。1903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党。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唐澍等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他曾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候补常委，是陕甘边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英勇牺牲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4月24

日,西北军委在瓦窑堡公葬刘志丹。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后,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5月5日,东征红军全部撤回黄河西岸。此役红军在山西1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并俘敌军4000余名,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30余万元。

三、红军西征

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剿共”政策,调集了16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

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5万余人组成西征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太相寺联合发布《西征战役计划》。西征红军分左右两路,由延川一带出发。左路军为红一军团,由左权、聂荣臻率领,经永坪、蟠龙、保安、吴起镇南下,连克曲子、环县、阜城等地,进抵宁夏七营、清水一带;右路军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指挥,19日从王家坪出发,经安塞、保安一线,挺进靖边、定边、安边。首战小桥畔民团,经过谈判,民团开寨门迎接红军。5月27日,十五军团又分两路前进。右路军攻下宁条梁,28日下午包围安边。左路军第七十五师,28日强攻定边未克。军

团部决定第七十八师围攻定边,主力部队转向定边以南前进。同时野司率直属队及第八十一师、骑兵团进到宁条梁。6月1日,十五军团第七十八、七十五师进占定边西南的红柳沟。6月5日,野战军总部决定:七十八师撤围定边,尔后西进至红柳沟,向定边、盐池方向游击。各部在已占领地区,努力做好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筹措资金。野司指挥机关及直属队由宁条梁进至洪德城。

6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横山至定边之间地区是西北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在7月半以前初步赤化,并决定调红二十八军配合执行此项任务。据此,西征野战军于10日下达命令:红二十八军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中路军,由红二十八军首长统一指挥,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城寨,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边境,东与老区连接的这一广大地区开辟新区。6月中旬,红二十八军进抵宁条梁和安边地区。17日,七十八师攻克定边,19日,红二十八军接防定边县城,开展地方工作。与此同时,红三十军转战靖边的新城、乔沟湾、崔界等地。这样红军迅即占领了靖边、安边、定边、盐池一线及西侧,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的地区。《红色中华》报在题为《庆祝红军西征的大胜利》的文章中指出:红军西征,共俘获国民党军人、枪各3000多。占领了环县、曲子、宁条梁、定边、花马池等城镇,开辟了广大苏区。消灭马鸿宾部3个团,扩大红军800多人。筹集抗日基金4.5万余元,扩大根据地纵横350余公里。

1936年5月下旬至7月底,西征野战军和根据地的红

军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西征的战略任务,创造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新根据地。

四、榆林苏区的支前工作

中央红军,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就受到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数十年后还深情地说:“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个落脚点了。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长征以来一直使我们苦恼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三边后,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作出决定号召全县人民:(1)热烈欢迎长征红军到达靖边。(2)各区、乡政府干部及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援长征红军。(3)搞好长征红军的吃、住和养护伤病员工作。(4)游击队、自卫队要紧密配合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同时,为了解决中央红军过冬问题,县里还完成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分配的200件皮袄的缝制任务。米西县苏维埃政府为了保证部队烧炭取暖,在石窑沟借了马家兄弟的两窑柏木板和群众换炭,送给当地驻军。过春节时,政府动员全体干部和群众做豆腐慰劳红军。

1935年12月24日,西北军委根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河东征任务,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要求陕西省1月份扩大红军7000名,3月份扩大红军2600名。老苏区人民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场面比比皆是,有的弟兄几人

争着去参军。不几天,秀延县扩红 512 名,清涧县扩红 420 名,瓦窑堡扩红 219 名,赤源县扩红 150 名,吴堡县扩红 150 名,米西县扩红 100 余名。神府地区参军的青年有 1000 多名。横山县六区有近 100 名共青团员报名参军。就在此基础上,陕西省组建了红二十八军,还扩大和新编了吴堡独立营、吴堡独立团、横山独立营、米西基干游击队、米西独立营、米西游击师、米西独立七营、米西独立五营、绥清独立营、定边游击大队、三边独立营、神府特区游击队和抗日十支队等地方武装。

1936 年 2 月,中央红军东进山西抗日前线前,党中央多次指示中共神府特委和绥德、清涧县委,限期赶造一批渡河用的木船,并把东征准备工作的地点选在清涧县。中共绥德、清涧县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一方面组织数百名木工昼夜打造船只,同时派人在绥德、清涧沿黄河一线寻找动员民用船只,很快按期完成了造船任务。另一方面组织黄河沿岸的老艄工为教练,挑选会水的青壮年参加训练,很快培养了一批渡船水手,保障了东征部队按期东渡黄河。神府各级政府同时积极行动,抽调了许多木匠工人,如期完成了赶造木船和选拔水手的紧急任务,保障了红二十八军在神木县沿黄地带顺利渡河东征。

陕北的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井岳秀的多年盘剥,群众生活十分艰苦。但是苏区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一切为着战争”为口号,勒紧腰带,节衣缩食,积极缴粮捐草,支援红军作战。陕西省在红一方面军刚进入根据地完成 970 余石捐粮任务后,从 1936 年 4 月 19 日至 5 月 24 日,布置各县共卖粮 5850 石,借粮 3550 石,捐

粮 960 石。仅秀延县在几天内就卖粮 130 石,借粮 40 石。1936 年 3 月间,集中驻在神府地区贺家川、贾家沟、沙岭头等村的红军部队、干部、担架队、水手工人等 2000 多人,每天就得用小米或其他杂粮 1000 多公斤。这些军粮全靠四周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的群众日夜运送。在广大群众节衣缩食全力支援下,保障了前方红军的用粮。

东征期间,各县都在进军沿途设立了兵站,运输粮食、军需物资和伤病员。各县还专门成立了运输队,集中骡、马、毛驴,把后方的东西运到前方,把战利品运回来。在每次作战中,各级政府除动员赤卫队参战外,还抽调得力的群众,组编成担架队,跟随部队上前线及时把受伤的红军战士抬回后方救治。陕西省妇联还发动妇女共做军鞋 8446 双,缝袜子 1553 双。有的县妇联还组织妇女成立了洗衣队、缝补组,为红军伤病员缝洗衣服和鞋袜。各级政府专门派干部发动和组织群众,给无劳动力的红军家属义务耕种土地作务农活,以保证红军家属的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了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中共三边特委组织定边党政军民召开欢迎大会。会上通过了迎接二、四方面军的通电,演出文艺节目,扩大红军影响,为抗日救国大造舆论。特委配合筹粮委员会,指示各县干部深入下去,宣传动员群众,号召各界人士“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三边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农村掀起以筹集粮草为主,城镇掀起以募捐抗经费为主的抗日捐助运动,商人、富农也积极捐款献财欢迎红

军打日本。仅定边、盐池两县就捐助现金达2万余元,还在一个月之内超额完成筹粮捐款任务。驻军领导深有感触地说:“三边人民在最困难的时期支援了党和红军。”三边人民说:“感谢共产党和红军从黑暗中拯救了我们。”

在红军东征的准备期间,彭德怀曾致电毛泽东表扬清涧县,他说:“为了保证东渡的胜利,清涧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支援,赶造大船百只。这里的保密、支前、拥军以及后勤供应工作都做得很好。清涧县的工作不亚于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兴国县。”这不仅是对一个县支前拥军工作的肯定和表扬,实际是党中央对西北苏区人民支前和拥军工作的肯定和表扬。因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既给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以后也成为红军抗日的出发点。

第七章

根据地的建设

第一节 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工作

一、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土地分配工作

1934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寺圪里会议提出,建立革命委员会,进行分配土地。之后,特委总结了清涧部分区乡的土改经验教训,由郭洪涛、马明方到清涧袁家沟、圪垯抓村和安定玉家湾村进行分配土地的试点工作。圪垯抓村、玉家湾村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做法是:(1)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2)中农土地不动,欢迎富裕中农献出多余的土地。(3)红军、贫雇农分好地。(4)参加革命的富农子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5)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女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6)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到以后成家)。陕北特委根据试点经验举办了分配土地训练班,培养骨干带动了整个陕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工作。1934年11月14日,中共陕北特委报告中央驻北方代表:“最近陕北苏维埃区域的日益扩大,各县都进行着分配土地,计划明年春耕时将土地分配停当。”1935年1月24日,《中共陕北特委代表的报告》提出“分配土地,原则按照土地法令

执行。方法是拿五六个村庄合起来分的,把这些村子按上、中、下统计起来,把所有人口(豪绅地主、反动派、不劳动的富农在外)按壮年、青年(15至18岁)、童子(妇女、小孩、老年不能生产的)统计起来分配的,比例如童子分4垧,青年即5垧多,壮年6至7垧,劳动富农也是一样来分的。”

当时划定的阶级成分有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7种。地主:全家人生活完全依靠剥削,出租土地、放高利贷、雇佣人,自己没有人参加劳动,不论土地有多少,都一律定为地主,债务一笔勾销,土地家产和生活必需品都没收。富农:全家人生活大部分靠自己劳动收入,少部分靠出租土地、放少数债务,雇佣半工或一至二个长工的定为富农,债务一笔勾销,好土地没收,多余家产没收,全家人分坏地。富裕中农:自己有土地,全家人生活全靠自己劳动所得,没有剥削行为,略有富裕。多余的土地可劝其自愿献出。中农:自己有土地,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没有剥削。土地财产不动。贫农:自己有少量土地,劳动还维持不住生活,仍需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佃农:自己没土地,租种或伙种地富土地,籽种、农具及牲畜全部是地富的。收获给地富交六成,自己落四成,忍饥挨饿维持生活。雇农:自己没土地,全家人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在分配土地中,贫农会权力很大。它把雇农、佃农、贫农和可靠的群众组织起来,根据分配土地的政策进行分配。首先张榜公布分配方案,然后颁发《土地证》,把土地分配到户。

吴堡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把土地改革作为中心工作来抓。首先组织调查组在北区搞了土改试点,组织农会主

任、赤卫队负责人、贫下中农代表，学习清涧试点经验，结合吴堡的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在全县范围内施行。吴堡的土改基本上是按陕北特委制定的土改政策执行的，但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出现过焚烧地契的现象。

绥德县的南区开辟后，采取了废除土地私有制，以村为单位集体耕种、集体收获的办法。在废除剥削债务时，也出现过焚烧一切文约帐簿的做法。对此，陕北特委立即进行了纠正。随后，中共绥德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在山榆砭村举办了为时一月的土地分配学习班，每个区派三至五人参加培训，全县各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

佳县开始土地改革，由于没有接到上级关于分配土地的文件，由党的县委和县政府制定了土地改革的办法。具体内容是：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富农出租的多余土地分配给贫雇佃农；对于下中农补偿给相当于贫雇佃农所得的相同数量的土地，对上中农的土地一般不分，但欢迎自愿献出多余土地分给贫雇佃农；没收庙田、祠堂地分配给农民。分配土地的办法，是平均分配，红军分好地、近地，贫雇佃农好、坏地搭配分，富农分坏地，对于民愤大的豪绅、地主、反革命分子不分地，但家属和人民一样分一份地。将豪绅地主反动分子的契约账簿一律焚烧。

神府苏区普遍开展土地分配工作初期，中共神木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三区乔家辿办了土地分配训练班，培训各区、乡的干部。当时文件规定，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进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中农自动献，贫雇农分好田。

当时苏区流传着“红色五月革命忙，分地分粮分牛羊，烧约账分衣裳，豪绅地主一扫光，群众喜洋洋”的革命歌

播,唱出了苏区人民的喜悦心情。

苏区在分配土地中,尽管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对革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损伤了一部分群众的利益,但它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它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地主、豪绅统治的经济基础,解除了反动政权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田租、粮款、捐税负担。土地分配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广大贫苦农民庆幸自己当上了土地的主人。他们自动参军、参战、站岗放哨、肃反锄奸,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这对反“围剿”斗争和度过艰苦时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二、按照党的新政策进行土地改革

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后,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对党的土地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即将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政策,改变为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情况的土地政策。

党中央此次调整土地政策,主要是三点。第一是调整对地主的政策。规定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但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的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商人兼大地主者只没收其土地部分不得侵犯其商业部分。改变了没收地主的商业部分和没收财产以后不给地主分配耕种份地、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做法。第二是调整对富农的政策。规定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好坏均不在没收之列,富农的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剥削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富农除缴纳统一累进税外,地方政府不得再向其进行其他征发。改变了把富农与地主、豪绅同样对待,没收其全部财产和征发的

做法。第三是调整对各种小业主的政策。规定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业主的土地，凭自己劳动所积蓄起来的工人所有土地，原非地主因失去劳动力而不得不出租土地的等，均不得没收。还规定大农业企业主的土地经营有别于地主阶级，应按照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

对于党中央制定的新政策，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要求西北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认真贯彻执行。效果是比较好的。西北局和西北办事处1936年4月4日的指示中说：“自从党中央及中央政府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命令与《陕甘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颁布后，由于一般干部的努力执行，在最近两三个月来，已经明显的得到了很大成绩，使陕甘苏区的土地一般的得到了正确解决，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巩固了我们和中农的联合，大量提高了群众生产兴趣。过去逃跑到白区的群众，亦不断的大批的回来，就是富农对于苏维埃这一政策的改变，一般的亦表示了同情的态度。那些成份定错了的分子，在改正后，更表示热烈的拥护，在白色区域，尤其是在附近苏区的群众中，影响更大。”但在执行中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米西、吴堡、靖边等地方对“左”的错误没有纠正过来，甚至还有继续过去错误的，一是在“过去一切都错了”的谣言下，有些定得并不错的地主富农分子翻案。针对这种情况，西北局和西北办事处要求，在未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方，一定要按照党的新的政策去进行土地改革；在已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方，要正确的彻底的纠正过去错定的成份，妥善处理成份纠正后的土地。

财产问题,并要镇压破坏苏维埃政策法令的豪绅地主,不许过去定得对的富农翻案。

在党中央新的政策指引下,苏区的土地改革踏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二节 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教育工作

一、根据地的经济工作

陕北革命根据地从开始创建,就遭到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状态的战时经济。

绥、米、佳、吴、清苏区,在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困难情况下,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粮食、财政等部门,一边反“围剿”,一边加强苏区经济建设工作。当时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没收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财物筹集。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支持苏区内部的开明地主和商贩到绥德、清涧县城等国民党统治区和山西汾阳、绥远、宁夏等地,购置回大量的火柴、食盐、布匹等日用品和各类医药“禁品”,以解燃眉之急。并鼓励农村中的小商贩和货郎,设点摆摊,走村串户,灵活多样地进行小型贸易活动。通过多种有效的措施,打破了经济封锁,搞活了苏区的商品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红军和地方干部的吃粮问题,一部分是打土豪时搞到的,大部分是群众无偿供给的,实行战时供给制。当时大多数村庄都有公田,所收粮食用于优抚红军家属和供过往

红军、干部食用。红军和地方干部所到之处，由当地贫农会负责，安排到群众家中吃饭。各级苏区政府，在经济建设中还抓了优抚、救济等工作。对于烈、军、干家属，由全村人帮助先耕先锄先收，这种办法称为“代耕制”。对于家境困难的贫雇农和孤寡老人，政府给予救济，在分土豪劣绅财产时予以照顾。为革命而残废了的红军战士，由全村人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为了解决游击队武器不足的问题，清涧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聘请河南铁匠赵文方、姚文德两人，锻打了一批长矛大刀。后枪支弹药需要量加大，遂派赵文方回河南动员了17名铁匠，带来两驮造武器用的原料，成立了清涧兵工厂。在一年多时间里，清涧兵工厂制造步枪四五十支，锻打了许多大刀、长矛，补充了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的武器装备。1936年春，清涧兵工厂合并到瓦窑堡中央供给部的兵工厂。

1934年7月，中共吴堡县委决定成立红色兵工厂，由刘文雄、贾治华负责。厂址先后设在李常家山村后石洞和上张家山马蹄岔、寺沟等村。兵工厂是由河南来的郑、黄两位技术人员和本地10多名铁匠组成。他们利用赤卫队割的电话线，寺庙旧钟，群众捐赠和斗争地主得来的钢铁，在5个多月时间里，打制近千把大刀、几百杆矛枪头、百余支长短突击牛枪、100多颗手榴弹、50多枚地雷、3000多发子弹。10月，由于国民党驻军强化保甲制度，兵工厂停办。

东西靖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工作，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的需要。(1)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靖边县地广人稀，种植

方法一直是以荒地轮作为主。县苏维埃政府因地制宜加强农业生产,号召山梁沟壑地区的人民扩大荒地开垦面积,组织滩润地人民引洪漫地以增强土地肥力和保墒,发动靠近河流沙漠边沿地区的人民引水拉沙平整土地。1935年,杨桥畔引水拉沙法开始推广,拉出的土地先种一年糜子或荞麦,第二年种春麦,麦子长高了再间种豆子,麦子一收,补种萝卜。这些种植方法,解决了在敌人封锁下的根据地人民严重缺粮困难。(2)大力发展林、牧业。为了解决荒地轮垦破坏植被的问题,政府动员人民群众、干部,每年春秋两季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同时还大力号召养羊,以便增加肥料。靖边的荒山荒岭牧草肥美,串山放羊既省人力,收益又高,冬季柳树梢又是养羊的好饲料。当时大部分农户养羊几十只或上百只,既解决了缺粪少肥的问题,又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增加经济收入。(3)活跃运输业和发展商业。靖边人民在农闲季节多以赶牲口搞运输为主,他们从定边盐池将食盐运出,换回各类日常生活用品。政府号召地方建立商业合作社,使运输队驮回来的商品能及时销售,满足群众的需要。在青阳岔、镇靖、张家畔等地,还组织群众集资办商业。对外地来的商业运输队,政府给予保护和大力支持,实行公买公卖,搞活商业流通。

定边县刚解放时,由于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在政治上破坏、经济上封锁,致使市场商品供应紧张,驻定边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吃穿用发生了很大困难。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派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到定边协助当地政府解决这一困难。毛泽民和县委认真研究,认为要改变经济困难现状,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他们组织人员

深入基层,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发动各地工商摊贩组织起工商抗日救国会和贸易局,充分利用定边的“三宝”资源,兴办工厂,发展贸易。他们把食盐、皮毛、甜甘草等土特产运往包头、宁夏等地,再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布匹、棉花、医药等生活必需品运进来,兴办起“新塞”、“难民”等小型工厂,整顿扩建了盐湖,从而搞活了贸易,繁荣了经济,保障了红军的供给,满足了平民消费,又解决了财政困难。

1935年9月,赤源县为了冲破封锁,解决群众、部队生活方面的问题,号召各区乡由群众入股建立供销合作社。动员群众联络一些进步脚户及小商贩,深入到国民党占领的包头、榆林等地,用粮食和土特产品,同国民党官兵换购一些子弹、布匹、衣服、鞋袜等物资来苏区出售。繁荣了市场,搞活了经济,使全体军民渡过了艰苦的岁月。

神府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中建立了财政、粮食、商业等部门,发展生产和商业。政府除没收地主豪绅的钱粮,动员开明绅士捐献粮款外,发动群众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利用统战关系去山西罗峪口和神木县城购买货物,鼓励小商贩设铺、摆摊、串村贩卖,繁荣集市。特区政府还在神木贺家川建立了民众合作总社,下设民众合作社4处,共有股金380多元。同时建立了纺织工厂,有职工18人,生产的布匹,对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6年春,神府特委建立了神府特区革命委员会银行,开办了钞票印制厂,印制与发行货币。货币基金的来源,主要是游击队打土豪没收的银元、元宝及其他贵重物品,抗日基金募捐委员会募捐的现金,发动群众自愿入股

到期分红的股金。货币先由神府特区革命委员会银行发行,后改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发行。货币面值分为壹元、伍角、壹角3种,被称为“苏票”。货币先是用漂白布印制,后来白布紧缺就改用厚纸印刷。货币的印制发行,促进了特区集市贸易的发展,有利于特区干部和红军生活供给,解决了特区生产的困难,深受特区人民欢迎。

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根本所在。为了解放生产力,提高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积极性,除党中央调整了土地政策,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还调整了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规定贫农团只在乡村组织,不需要省、县、区的组织系统,在土地问题解决后贫农团的注意重心应转移到增加生产、发展畜牧业,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充实革命战争物资供应而奋斗,改变了贫农团一度起过的政权组织的性质和任务。明令纠正强迫组织劳动互助社和在社内不执行互利原则的做法,调整劳动互助政策。修改苏维埃选举法,规定一切脑力劳动者,雇佣工人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的工商业主,也有选举权。西北办事处还颁发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关于发展集镇贸易的布告,关于发展畜牧业保护母羊的布告,关于热烈进行春耕生产运动的命令。这些都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二、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为陕北革命播下了星星之火。在开辟苏区阶段,党组织派遣大批党、团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兴办小学和农民夜校,普及文化教育并辅以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宣传工作,在根据地燃起革命的烽火。苏区政权建立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进一步抓了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社会教育奠定了基础。绥德、清涧等县区干部和工作人员,下乡经常背着油印机和纸。每到一地就结合革命形势,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或利用一些说唱等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法令,讲解革命道理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激励军民团结战斗。

根据地人民利用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编出了大量反映拥护红军,歌颂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和解放妇女的新民歌。反映抗捐抗税农民运动的有《张东蛟》、《清涧起义歌》等;反映建立革命武装,开辟农村根据地的有《跟上刘高阁革命》、《老谢总指挥》、《杀豪绅》、《赞红三支队》等;反映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有《走南梁》、《白军围剿》、《男女武装起》、《打河口》、《打开南沟岔》、《打横山》、《打镇靖城》、《刘志丹》、《红二十六军到来了》等;反映苏维埃政权建立,分配土地的有《建立苏维埃》、《工农群众都翻身》、《打土豪》、《斗地主》、《分土地》、《土地还家》、《米西群众喜洋洋》、《劳动人民大翻身》等。这些民歌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感情,起到取乐解闷、评论时事、扬善鞭恶、传播知识、鼓舞斗志、教化劝人的作用,唱民歌成了根据地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苏区群众的喜爱并广为传唱。

在搞好政治宣传的同时,各县苏维埃政府很注意抓文化教育工作。创办列宁小学,编写新课本。各乡、村普遍建立了农民夜校和识字班、冬学,大村一村一校,小村两三村一校。政府还委派视学员,督促各地发展教育事业。不少投身革命的农村干部,原来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接受了苏

区政府专门的文化教育后,短期内掌握了初步的文化知识,能够担当一定的行政和军事领导工作。

1936年6月定边县解放后,党组织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8月,办起了列宁小学,动员青少年入学念书。到次年春,学生由原来的二三十名增加到200多名,班级也由原来的一、二、三年级发展成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同时,各级妇女和青年组织也积极开展工作。宣传解放妇女、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买卖婚姻、缠足,动员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组织青少年参加少先队、儿童团等。成立了人民剧社定边分社,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编演新剧,宣传党的“三打三救”(打日本,救中国;打土豪,救穷人;打胡马,救西北)方针,为发动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大造舆论。文化教育工作提高了城乡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踊跃缴纳救国公粮,自愿募捐抗日经费,支前卫国的革命行为蔚然成风。定、安两县革命群众,拥护红军打日本,保卫西北的热情空前高涨。

神府苏区内的大部分村庄办起了列宁小学、冬学、夜校、识字班等。吸收劳苦群众的子女上列宁小学和冬学,中青年男女进夜校或识字班。办学师资不足,就聘请一些老秀才作教师。纸张缺乏,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想办法解决。自己动手编写课本或选择使用《百家姓》、《千字文》等一些旧课本内容。教育经费以群众捐献为主,教师的吃粮由群众筹集。1935年,国民党“围剿”神府苏区,苏区内的大部分学校被迫停办。1936年春,神府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4月神府特区成立后,设立了教育部着手抓教育事业,苏区的各类学校又得到恢复。到1937年初,神府苏

区的正规学校有 100 多所,还成立了一个不脱产的剧团,编演了《送郎参军》、《打日本》等革命剧目。神府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对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思想觉悟,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 巩固榆林苏区

一、巩固三边苏区

三边特区是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新设的三个特别区之一。

1935 年 11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三边特委,任命谢维俊为特委书记兼三边剿匪总指挥。谢是长征过来的干部,受任时就是三边的剿匪大队长,同中共西靖边县委、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一起活动。

11 月 16 日,东靖边县苏维埃政府根据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指示,派许占宝给陕甘第七支队靖边游击队长黄万英送信。信中谈到七支队一中队队长金林、县警卫一连连长宗文耀的一些问题。不料,此信落入金林、宗文耀之手。金、宗于 26 日召开紧急谋叛会议。27 日,叛匪逮捕了县政府副主席王国庆,肃反委员郝文明,工作人员李白锁。同时破坏第七区政府,逮捕区政府主席白登贵,宣传委员崔有发,劳动委员马占彪等 6 人,送往宁条梁段宝珊部,5 人惨遭杀害。28 日,金林向黄万英提供假报告,采取“调虎离山计”,将指导员杨占鳌和黄万英开枪打死。宗文耀听到枪声后,立即集合部队迫使战士胁从叛变,杀害骑兵连长白志

清。29日凌晨,金、宗带叛匪直扑三边特委和西靖边县政府所在地沙洼沟附近的滴哨台,偷袭三边特委和西靖边县政府,杀害了特委书记谢维俊和西靖边县政府主席殷云山等10人,抢劫了县政府全部物资,释放了在押地主恶霸30多人,并给陕甘边政府写假报告,诬告黄万英叛变。之后,叛匪又到各区采取枪杀、威逼、煽动等手段,解散了各区、乡政府,西靖边苏维埃政权组织全部被破坏。此即震惊三边的“沙洼沟事变”。

1936年1月19日,西北军委办事处任命的中共三边特委军事部长,中共陕北省委任命的三边独立营营长杨琪,同去瓦窑堡向省委汇报工作的中共三边特委副书记慕生桂,一起到达靖边县城西一个小山坡李家梁。

李家梁原是中共三边特委机关的驻地。由于叛徒出卖,全村狼藉不堪。刘景范等得知金林、宗文耀叛变当即决定绕道南下,找自己亲自创建的赤安县委。晚上,在赤安的李家嘴被叛匪包围。突围时慕生桂因天黑路滑,视力不好,掉下悬崖牺牲。杨琪、李育英脱险后回省委汇报。刘景范、崔宗仁在群众的保护下脱险之后,辗转找到了赤安县委。1月28日,刘景范写信向周恩来汇报三边特委的情况:靖边11个区、定边一个区、赤安7个区、共19个区政府,35个乡政府被叛军破坏,杀害党、政、军、群众干部53人,三边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周恩来回信指示刘景范:“养好病后,要马上找到独立营,把散了的游击队集合起来,清剿叛匪。”刘景范在赤安县委的帮助下,找到了甘洛游击队、保洛保卫队和赤安保卫队,亲自指挥,开始清剿叛匪。至5月底,经过永宁山、三台山、保安城、哨前湾、安边等几次战

斗,消灭、击溃叛匪 1000 多人,叛匪和地方民团彻底崩溃。西靖边有的区、乡重建村会、农会、赤卫军和苏维埃政权,又燃烧起革命烈火。

3 月,高岗率红二路骑兵与曹动之第二十二支队合作,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包围了靖边张家畔民团,经激战击毙团总突幼樵、突振兴,缴枪 30 多支,其他几股民团纷纷逃走。

5 月,红军西征,中共陕西北省委和新设立的中共陕甘宁省委即乘势努力恢复和巩固发展三边特区。6 月,中共定边县委成立,刘悠安任书记。县革命委员会改建为县苏维埃政府,王文英任主席,辖定边市和 6 个区、37 个乡苏维埃政府。中共安边县委同时成立,慕纯农任书记,因安边城还未解放,县委流动办公。县苏维埃政府于吴旗边界的新安边成立,王兆英任主席,辖 5 个区、31 个乡苏维埃政府。定边和安边两县属陕甘宁省建制。同时,中共陕西北省委派出工作团恢复西靖边的工作,筹建新设立的新城苏维埃县制。9 月 22 日,中共新城县委在靖边新城杜元岭正式成立,书记白凤章。辖 4 个区委。同时,新城县苏维埃政府亦成立,辖 4 个区,23 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宝贤。

为了加强三边特区的工作,中共中央于 7 月在定边成立蒙民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主任,贾拓夫任巡视员。同时,派出由毛泽民、贾拓夫、毛齐华、邓振勋、揭俊勋、秦力生、白茜(女)、张玉英(女)、曹建勋、张德生、滕余、唐振烈等组成的中央巡视团,到三边一带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指导各县建党建政,发展经济工作,并决定由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由保安迁往定

边。

9月,党中央决定进军宁夏夺取银川,把根据地向西北发展。为了做好战前准备工作,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来定边组建了定边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书记,宋任穷(红二十八军政委)、宋时轮(红二十八军军长)、高岗、贾拓夫为委员。成立定边回民游击队,司令员马怀嵩、政委李静波,下辖两个支队,后游击队战斗失利解散。工委成立后与定边、盐池两县委紧密配合,制定了白区工作计划,查明了吴忠渡河点及攻城有关情况。

1936年10月3日,为进一步加强和统一领导三边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成立中共三边特委。任命张德生为特委书记,贾拓夫、李维汉、董必武、宋任穷、宋时轮、毛泽民、高岗等为委员。朱协辉为组织部长,贺级三任宣传部长、揭俊勋任团特委书记,高岗任军事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长、钱希钧任特委机关总支书记。隶属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下辖定边、安边、盐池三个县委,统一领导这里的少数民族工作和经济工作。特委成立初和盐池县委合署办公,12月初迁至定边后,又和定边县委合署办公。11月,张德生调走,贾拓夫、李维汉、罗梓铭相继接任三边特委书记或代理特委书记。1937年5月,中共三边特委改为定边中心县委,朱协辉任中心县委书记。

三边特委成立后,领导各县继续建立健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1936年底,定边、安边、盐池三县共建立17个区党委和一个市党委,党员人数至1937年底发展到2000余人。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各县肃反委员会(后改为保卫局)与驻军(红二十八、二十九军先后驻防三边)部

队,共同领导建立各区、乡武装工作队。一方面配合驻军清剿流窜的特务和叛匪,保卫红色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革命工作。

三边地处西北根据地的西北边陲,位于陕、甘、宁、绥四省交界,蒙、回、汉三族杂居,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做好这里的少数民族工作,团结蒙、回族人民实现西北各民族的大联合,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党在西北地区的战略任务。为此,中共三边特委协助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同少数民族的经济贸易。通过组织递送,频繁往来,从而加深彼此了解,增进相互友谊。1936年10月下旬,在定边城召开了蒙、回、汉三大民族联谊盛会。与会各族代表一致表示:亲密团结,驱逐日寇,为争取中国独立和各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在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特委领导各县、区人民千方百计搞活贸易,筹粮捐款,有力地支援前线。在定边、盐池办起列宁小学。

这一时期由于干部队伍文化素质低和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等原因,出现过一些偏差。特委和中央巡视团的领导同志,在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经常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听取各方面的反映,认真检查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纠正了各种错误倾向。

二、巩固绥清佳吴米横苏区

巩固绥德、清涧、佳县、吴堡、米脂、横山苏区的反“清剿”斗争,在红十五军团于1935年9月下旬,由永坪镇南下甘泉、富县,迎击北犯的东北军的时候,就全面展开了。

1935年12月,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牵制国民党军队,刘志丹决定第二次攻打横山。15日,刘志丹率红十五军团的两个团和七十八师的3个营,从瓦窑堡出发,经三眼泉、石窑沟、韩岔到达距横山城七八里的张尔岭,当晚派军到县城周围实地侦察情况。16日派七十八师的二营清除横山城附近龙凤山的国民党守军,该军闻讯,仓皇渡芦河西逃。中午,红军大队抵城下,将城包围,佯做攻城态势。下午3时,战斗打响,红军从三面合围,首先向李家坵、五里墩等城外守军发起攻击,不到半小时,县城外围据点全部被红军占领,守军一部被歼,一部逃回城内,红军迅即将县城团团包围。这次作战目的,主要是牵制外线国民党军队力量,因而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围城5天后,刘志丹率部撤围,南下瓦窑堡做东征准备。

这次战斗,在北线造成很大声势,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大军,为红军东征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保卫群众秋收,中共绥德县委成立了绥德县警卫营,营长刘子恭,政委王季龙,主要活动在义合、枣林坪、薛家峁一带。横山先后成立了3支游击队,主要活动在横山境内。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扩编为战斗团,活动于佳县、吴堡、绥德、清涧一带。米西独立五营亦宣告成立,营长薛宏亮,政委朱明孝,活动在米西地区。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一支队奉命改编为横山独立营,营长薛兰洲,政委杨子珍。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和第二十三支队等在南沟岔合编为米西游击师。师长柴福俊,政委魏国亮,活动在横山、米西一带。之后,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改为抗日十支队,队长刘岳山,政委刘柯荣,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新四支队)及地

方游击队合编为吴堡独立营,营长薛英桂,政委张驾伍,后又扩编为吴堡独立三团。

在军事武装力量调整变化的同时,1936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赤源县,成立横山县。原赤源县的工作机构改为横山县工作机构,原赤源县的一、二、三区划归安定,其余8个区归横山县领导。党的县委书记高腾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林。4月15日,吴堡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正式定为苏维埃政府,下辖6个区苏维埃政府,县政府流动于冯家岭、寨子上、山头等地。

1936年6月,红军西征后,蒋介石调动中央军汤恩伯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十一师、四师,晋军陈长捷七十二师,高桂滋八十四师,高双成八十六师,总计30多个正规团,约6万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向绥德、佳县、吴堡、清涧等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军事“围剿”。一时间重兵压境,到处碉堡林立,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彻底粉碎“围剿”,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共东地区特委,书记戴季英。同时,设立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东地区办事处,王海山为主任;设立东地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黄罗斌。为便于领导,由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长王达成主持,在清涧寨沟村组建了中共绥清中心县委,属东地特委领导,下辖绥德、清涧两县境内的17个区委,机关流动在贺家沟、呼家坪一带,书记刘玉春。在吴堡县建立中共吴堡中心县委,设立第二作战区,领导吴堡、佳县和米脂东区的工作,县委书记、战区司令员慕生忠。通过突击扩红,将吴堡独立三团改编为吴堡独立团,下设5个连,1000余人,柴福俊任团长,慕生忠任政委。主要活动在吴堡和佳吴边境地区,受中共吴

堡中心县委和东地游击司令部领导。同时,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将抗日十支队和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清涧几个游击小组编为绥清独立营,营长雷高楼,政委惠艾深。在米西组建了独立第七营,营长杨岐,政委惠子俊。在这个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围剿”,米西苏区大部丧失,中共米西县委被解体。吴堡、绥德、清涧、佳县、横山等县的苏维埃政府政权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7月,陕西省委决定撤销米西苏维埃县治,划为游击区,米西县委及军事部改编为米西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惠子俊。

7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巡视员马义(白炳圻)到横山传达中央指示:红军已西征,地方各级政府要精兵简政,开展游击活动。横山县委、县政府根据这一指示,将党政机关精编组成武装工作队,由县委书记魏怀礼和县保卫局长刘光汉领队,开辟巩固根据地。活动在横山的3支游击队,编入横山独立营。8月17日,吴堡中心县委书记罗文(王学善)在吴堡于家沟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吴堡中心县委,并将县苏维埃政府缩编成7人工作组留在吴堡应付事变,其余人员随军突围。吴堡独立团第二连、县保卫队、地方游击队编为两个支队转战绥、吴,打击国民党“围剿”部队。18日,吴堡独立团突围北上神府苏区失利,退回吴堡北区活动。随军北上的党政干部决定南下,200多人撤到延川县。米西独立第五营、第七营并入横山独立营。此时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在卧龙湾成立了中共米西工委,机关设在石窟沟村,后迁到青阳川,负责人白文生。吴堡苏区沦陷后,国民党重建政权,组织“铲共”义勇军队,对未突围出去的红军战士、区乡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进行残酷镇压。

9月,陕西省委指示收复吴堡苏区,在清涧县组建了中共吴堡工委,书记李向良,由东地特委领导。11月以后,红军独立第一师先后攻占佳县以南的金明寺、井道岭、清泉寺等地,在佳、米、榆地区与“围剿”部队周旋,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取得局部胜利。巩固绥清佳吴米横苏区的反“清剿”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后,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才得以停止。

三、巩固神府苏区

1935年11月25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杨和亭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张江全任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汉武任特委常委、团特委书记,谢绍安为特委常委、红三团团长。12月10日,中央在瓦窑堡祁家湾召开会议,其中讨论了神府特区的工作,杨和亭、张江全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毛泽东指出,神府虽然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抗日的前哨。那里的形势很紧张,斗争很艰苦。去神府的同志一定要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一切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不要被困难所吓倒,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胜利。会后,贾拓夫又多次与杨和亭等谈了去神府的工作任务和方法,刘志丹对神府红军如何坚持斗争,王首道对保卫工作分别作了指示。刘志丹还派部队,护送杨和亭等去神府。

1936年1月初,杨和亭等(谢绍安在途中牺牲)到达神府后,在神木罗家垣召开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神府特委的决定及有关重要指示,报告了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第三次“围剿”的喜讯,使

大家情绪振奋,信心倍增。会上成立了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组织部长毛凤翔,宣传部长张江全,军事部长贾怀光、白区工作部长刘济民,少共神府特委书记张汉武。会议决定:军事上主动找薄弱点打,优待俘虏;解散合并了的村庄,把赤卫队等群众组织恢复起来;加强对白军和白区的工作;清查反革命,搞好肃反工作等。

中共神府特委成立后,1936年2月决定成立神府东北苏维埃办事处,主席乔钟灵。委派刘志清、杨孝先、刘起程、贾培谋等到府谷县的白家崖开展工作,正式恢复中共府谷县委,书记刘志清。重新建立5个区委。同时,决定成立中共神木县委,辖10个区委,书记贺子贵。3月,陕西省委派张秀山、邓万祥、刘明山、白兴元、黄正明向特委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对神府苏区前一段“左”的错误作了纠正,对在反“围剿”斗争中被迫自首的党员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这些措施有效地团结了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加快了神府苏区的恢复和发展。张秀山还传达了中央关于神府特委改由陕西省委领导的决定,调整了神府特委领导成员。书记杨和亭,组织部长张秀山,宣传部长张江全,白区工作部长刘济民,军事部长贾怀光,秘书长王恩惠,团特委书记张汉武。

神木县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下辖8个区革命委员会。佳芦县革命委员会在花石崖成立,主席梁士堂,下辖7个区革命委员会。中共榆林工委在榆林县安崖乡刘家村成立,书记张晨钟,辖两个区委。

就在此时,神府特区军民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国民党对神府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是以孙长胜

部晋绥骑兵旅为主力,1935年11月下旬开始的。“围剿”的重点,是神木南部和佳芦地区。在中共神府特委的领导下,苏区军民以重新恢复的神府红三团为主要力量,展开反“围剿”斗争。红三团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主动寻找战机。1936年1月在申家里击溃一个骑兵连,击毙10多人,俘50人,缴枪50支,战马20余匹。接着,在乔家辿击溃驻陈家坪国民党军一个连。2月,袭击榆林香水梁民团,歼灭30余人。在佳芦县刘国具村附近(今属神木万镇)消灭万镇民团20多人。3月中旬,在九孤击溃驻沙峁骑兵连,在毛谷川,截获“反共义勇队”运送的一批军衣、弹药等。国民党军遭到连续打击后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3月20日,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进入神府,慑于红二十八军的声威,驻花石崖、太和寨、汉路子沟、龙尾峁、乔岔滩、安崖等据点的国民党军,纷纷逃回高家堡和神木城。24日,红二十八军包围了驻沙峁镇孙长胜旅的3个连,第二天该部乘隙逃走。驻瓦罗、栏杆堡、石窑的国民党军亦闻讯逃回府谷。至此,神府苏区基本恢复,国民党对神府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4月,神府特委决定成立中共赤绥、神城工委。赤绥工委书记黄忠,神城工委书记王道三。神府独立第四团亦宣告成立,团长王兆相,政委贺伟。佳北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主席高增汉。神府特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4月15日在杨家沟召开。会上撤销神府东北苏维埃办事处,正式选举成立了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乔钟灵,副主席王聚英、刘兰亭,秘书长刘长健,内务部长李秉章,土地部长王昌岐,财政部长高振业,粮食部长王刚,国民经济

部长杨文胜(杨士敬),教育部长刘长健(兼),裁判部长李秉章(兼),银行行长高振业(兼),抗日基金会捐献委员会主任高步瀛,优红委员会主任刘瑞兰。4月中旬,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郭宝珊,政委毛凤翔。下辖郭宝珊团、红三团及吴堡、米西两个独立营。不久,郭宝珊率部南下离开神府,总指挥部撤销。

5月,府谷县革命委员会重新恢复,王巨武任主席,下辖7个区革命委员会。

6月,神府特委根据中央工作团的建议,将神府第五支队、第八支队和警卫连合编为神府游击队独立第一营,营长王子杰,政委刘全舜;第二支队、第四支队、第二十一支队合编为独立第二营,营长马腾宝(未到职)、政委贾如胜;第一支队和第七支队合编为独立第三营,营长刘德垣,政委贺道新;第六支队改编为新编独立第二营,营长李治民,政委高立贤。同时中共佳北工委成立,书记张成功。工委主要活动于上高寨、刘国具、朱家圪、王家砭、通慎一带。

8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独立第一师在神木县花石崖村正式成立。师长王兆相,政委张秀山,参谋长李治洲。辖第一团、第二团和警卫连、侦察连、骑兵连,全师近千人枪。是在神府独立第三、第四团的基础上组建的。由中共榆林工委领导的榆林县革命委员会,亦于8月在榆林安崖乡成立。

1936年秋,在中共神府特委的领导下,神府特区重新进行了土地分配。这次土地分配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而且团结了地富中倾向革命的力量,孤立了顽固派和反动势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神府

特委和特区政府加强了对财政经济、生产建设、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工作的领导,调整了相应的政策,使神府特区逐步走向稳定。但就在此时,国民党以晋军七十二师陈长捷部的4个团为主力,八十六师的两个团一个骑兵营和地方民团相配合,另调八十六师一个团进驻府谷,共计1万余兵力。采用南北夹击,以团为单位密集推进的战术,对神府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

在神府特委的领导下,神府苏区人民和独立第一师按照特委制定的“向南作战,先打晋军”的方针,以独立师为主力打击外线的国民党军队;独立营和游击队在内线寻机截击小股国民党军和破坏其交通运输;由地方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展开反“围剿”斗争。10月中旬,晋军分兵进犯万镇、花石崖、乔岔滩一线,使战线拉长。独立师抓住这一战机,乘隙插入其后,首战泥河沟(今属佳县)歼灭一个排。接着在苏泥家打伏击消灭两个连。随后独立师第一团在独立营、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的配合下,在王寿梁破坏交通、歼灭100余人。独立师第二团在万镇山上截击国民党军一运输队,缴获驮骡30多头和大批大米、白面等物资,迫使国民党军放弃高新庄、麻晏沟、任念功等据点。府谷的国民党军也因佳县封锁线被红军突破撤离苏区。11月底,独立师在乔岔滩围点打援,消灭了乔岔滩民团和高家堡援兵,使国民党军占领的佳芦苏区得到恢复。至此,神府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神木、府谷、佳芦、佳北县革命委员会,及所辖各区革命委员会,改称为苏维埃政府。

1937年1月初,国民党军乘神府苏区与党中央中断

联系,未知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消息之机,由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任“剿共”总指挥,纠集晋军段树华旅4个团,八十六师两个团和一个骑兵营,加上八十四师的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营,近2万余兵力,向神府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从佳县、米脂、榆林一线整体推进,向北进犯,企图将神府红军压进一个狭小地区胁迫诱降或武力消灭。当时神府苏区虽然不了解西安事变的详情,但基于坚持自卫的原则和统一战线的政策,神府特委果断做出决定:在军事上,动员军民坚决抗击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独立师继续插入国民党军后方主动出击,独立营和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打破国民党军“肃反清剿”的阴谋。在政治上,积极开展统战宣传,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团量。1937年1月中旬,独立师第一团在薛家会村设伏,打垮国民党军一个连,击毙连长一名,俘数十人,缴获步枪10支,机枪2挺。同时,第二团在王家塬伏击,活捉八十六师团附苏鼎臣等十多人,并从苏的口中获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

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及抗日统战工作,神府特区在1937年1月28日于温家川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将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改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增配强晓初、王明月为政府副主席。2月20日,为了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独立师打入佳县、米脂、榆林等国民党占领区,与晋军及八十六师纵横周旋十余天。这些战况引起秦晋两省报纸的惊呼,起到了给党中央报信的作用。周恩来见报后,立即向顾祝同提出抗议,使神府特区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4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中共神府特委与国民党驻军及上层人士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谈判,并达成协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发展时期。榆林各地的党组织在艰难困苦的形势下,经受了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大“围剿”的考验。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点燃革命火种,带领人民驱黑风斩恶浪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中共陕北特委、三边特委、神府特委和中共陕北第一分区委,先后组建了22个县委,6个工委和100多个区委。在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逐步形成了以绥清、三边、神府为中心的南、西、北三块苏区。

在反“围剿”斗争中,为了保卫根据地、保卫红色政权,许多优秀的榆林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5年8月11日,国民党姜梅生部在神木贺家川杀害了县赤卫队总指挥张廷杰和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刘存永等6人。8月下旬,国民党邹青云骑兵营在神木马家沟村先后血腥屠杀革命群众18人。11月下旬发生的震惊三边的“沙洼沟事变”中,党政军50多人被害。12月12日,国民党八十六师驻米脂胡采芹部到镇川逮捕了刘述相、刘绍让、赵文斌、常明镜等4人,在米脂逮捕了刘增祥、朱向荣2人。19日,刘述相、赵文斌、常明镜、刘增祥、朱向荣等5人被枪杀于镇川东门外。1936年3月13日,国民党横山驻军马志昌、方鸿成率部偷袭横山郑家梁七区政府,将王月虎、胡振荣、胡斌等11人杀害。4月23日,米西游击队和横山游击队在油房头

受挫失利,米西游击队政委白云祥、副队长拓世发等 30 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6 月,中共榆林工委书记张晨钟和军事部长刘生华在安崖与国民党保卫团遭遇,惨遭杀害。这些优秀的榆林儿女将永垂青史,永远活在榆林人民心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

第三编

中共榆林组织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八章

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一节 榆林的两个抗日行政区域

一、陕甘宁边区在榆林的辖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人民的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转入了国共合作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

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陕北北部形成了两个政治区域,一个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地区。在今榆林市的辖区内,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共设有12个苏维埃县治。即:定边苏维埃县,政府主席王文英;安边苏维埃县,政府主席王兆英;靖边苏维埃县,政府主席王治邦;新城苏维埃县,政府主席石子珍;府谷苏维埃县,政府主席刘志清;神木苏维埃县,政府主席王聚英;佳芦苏维埃县,政府主席梁士堂;佳北苏维埃县,政府主席高增汉;安定苏维埃县,政府代理主席宜瑞珍;清涧

苏维埃县,政府主席黄光声;绥德苏维埃县,政府主席刘汉鼎;横山苏维埃县,政府主席谢怀德。这12个苏维埃县治的治所,除定边设在县城,其余均设在县城外的农村,因为县城没有解放,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第233次会议决议,划陕西、甘肃、宁夏省的26个县为由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辖治。其中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神木、府谷、靖边、定边等9县均在今榆林市境内。

随着西北办事处的更名改制,定边等12个苏维埃县治,有的撤销;还存在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均改为抗日民主政府。靖边、新城、横山三县先属陕甘宁边区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三县合并改建为靖横县后,和定边县同受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其余各县均直接受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二、榆林国统区的政治军事设施

1935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分别在榆林、绥德设立第一、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一区辖榆林等8县,第二区辖绥德等所属9县。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国民党在陕北北部今榆林市境内设置11个县治,其中榆林、府谷、神木、佳县、米脂、横山、靖边、定边等8县属第一区,清涧、绥德、吴堡等3县属第二区。除定边县城,其他10个县城,榆林、

横山县的大部,以及各县的一部,为国民党的统治区。国民党在城,共产党在乡,多数地方有国共分别设立的两个政府。

榆林、绥德仍为国民党陕西省第一、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所在地。

1937年1月,陕西省保安第四指挥部在榆林成立。下辖陕北各县保安团,协同驻榆林的国民党部队防守榆林。由第八十六师师长兼陕北警备司令高双成任总指挥。后陕西省保安第四指挥部改组整编为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部移驻横山波罗,总指挥胡景通。

10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坐镇榆林。新组建的二十一军团,下辖邓宝珊的新一军和驻榆高双成部八十六师。国民党新编陆军第十一旅,也受邓宝珊调遣,由甘肃开赴安边、宁条梁一带驻防。

1938年,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成立,邓宝珊任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榆林城。5月,驻榆八十六师收编伊东游击纵队所属王永清、段宝珊部,与八十六师骑兵团编为骑六师,连同八十六师合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同年,由于太原、绥远相继被日军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军事机构及驻军纷纷撤往榆林。来榆林暂驻的外省部队有:蒙古游击军第二区司令荣祥及其所部,蒙旗独立旅(后改骑兵第三师),何柱国的骑二军,白凤翔的骑五师,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部,门炳岳的骑七师,东北边防军黑龙江省副司令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张随生的察哈尔第一游击军。同一时期,三边地方武装张廷芝部被察哈尔第一游击军收编为第二支

队,张廷祥部被陕北保安指挥部收编为保安第十三团,与新十一旅同驻三边。

抗战开始后,驻榆林的国民党部队分驻榆、神、府、横等地。具体驻地是:八十六师二一五团驻横山、石湾,保安骑兵三十大队驻高镇、韩岔;八十六师五一五团罗德新部驻神木县城,五一四团姜梅生部驻高家堡,五一二团部分连队分驻马镇、盘塘、沙岭头等地,二五八旅旅部、邹青云骑兵营、邓宝珊骑兵营、傅作义部孙长胜晋绥骑兵旅、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李少堂团和史文华骑兵营、晋军七十二师陈长捷部和二〇九旅段树华部后来也被调遣到神木驻防;八十六师二五八团三营驻府谷,马占山东北挺进军、何柱国骑二军分驻哈镇、麻镇、皇甫、沙梁、孤山、木瓜、清水等地。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榆林的组织

一、中共绥德特委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晋西北大部分地区,隔河炮击西岸。企图渡河西犯,进攻大西北,形势非常危急。为了抗击日军,保卫河防,经国共双方协商,设置了包括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的绥德警备区,并由八路军设立绥德警备区司令部,率部驻防。

绥德警备区的辖区是老革命根据地,为了统一领导警备区各级党的工作,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更有效地组织动员各界民众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

组建中共绥德特委。11月,中共绥德特区委员会在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民运科内秘密建立,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兼任特委书记。特委设秘书长及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军事部。特委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机关设在绥德城内仓房圪坨,对外以“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民运科”的名义活动。划归特委领导的中共绥德、清涧县委机关也都由农村迁入城内,以县的“抗敌后援会武装动员股(亦称民运股)”的名义对外活动。绥德县委下设11个区委,清涧县委辖9个区委。

中共绥德特委成立后,一方面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完善特委的工作机构,筹备组建警备区妇女联合会和青年工作委员会;另一方面利用民运科这一公开组织,在八路军驻防部队的协助下,恢复和建立县、区、乡各级党组织。1937年10月,绥德警备区警备第八团(原七一八团)的一部分进驻米脂,秘密建立了中共米脂县委,对外称驻军部队民运股,辖11个区委,机关先后设在米脂县城华严寺湾和东街地宅庵等地。11月,特委派张鹏图、慕生忠等人随警备区第八团的一部分分别进驻佳县、吴堡,重新恢复了中共佳县县委,组建了中共吴堡县委,佳县县委辖10个区委,机关驻县城,吴堡县委下辖9个区委,机关在宋家川。1938年9月,绥德特委组建了中共河防县委,辖4个区委,机关驻界首、西沟一带。

二、中共三边特委、中共三边分委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派刘耀山到靖横地区,组建了中共靖横县委。辖9个区委,机关驻李邱家坪。

10月,绥东抗战爆发。为了加强三边、伊盟、宁夏等地区党的领导,有力地支援绥东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再次建立中共三边特委。派白如冰、白寿康、赵苍璧与从陕甘省委调来的白凌云、萧彩峰、白成铭以及原在定边工作的王子宜、白坚等人组成中共三边特委领导班子,机关驻定边城内杨铜匠院内,设5个工作部门,下辖靖横、盐池、定边3个县委和鄂托克旗工委,11月,靖横县委改称中共靖边县委,县委机关迁至镇靖。

12月,中共三边特委称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白如冰任书记,与定边县委合署办公。

三、中共神府特委、中共神府分委

1937年7月,中共神府特委在府谷南部地区建立了中共府谷工作委员会,机关驻地贺家堡村。7月底,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神木、佳芦县政府、府谷县革委会与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合并,改称神府抗日民主政府。所辖区域由原神木、佳芦、府谷县的部分地区组成。至此,神府特委原辖的神木、府谷、佳芦3个县委和神城、榆林、佳北、赤绥4个工委全部撤销,只直辖根据地内的6个区委及国统区新建的府谷工委和神木东区委、神木西区委、高家堡区委等秘密党组织。特委驻地贺家川,张秀山任特委书记。

1938年8月,中共府谷工委奉命撤销。晋西北河曲、保德两县的党组织向府谷北部地区和绥远准格尔旗一带发展力量,新建立了4个区委。为了便于领导,晋西区委成立中共府谷县委,归晋西区委领导,辖4个区委。

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中共神府特委

改为中共神府分区委员会,武开章任书记,其下辖组织及工作机构无大变动。6月,分委在贺家川召开了神府第二次党代会,决定加强组织建设,壮大党的力量。到年底,全分区党支部发展到36个,党小组发展到200多个,党员人数达2724人。

四、榆林国统区中共组织

1937年7月,榆林师范学校教师、共产党员张明远组建了一个党支部。支部成员在女师、榆中、职中三校联络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支部成员陆续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组织遂告解散。1937年11月,中共绥德特委成立后,即派高克亭北上,主持组建了榆林县临时党支部,由朱枫任支部书记,李文正、姬也力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委员。到年底共发展了20多名党员。

第三节 共产党对榆林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党对榆林国统区军政上层和地方士绅的统战工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除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又向国民党中央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全国抗日怒潮下,蒋介石不得不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榆林是陕甘宁边区的北近邻,又地处抗日前线,战略地位重要。中

共中央为了在榆林境内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统战工作。

实际上,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共中央就同榆林国民党上层有了来往。1937年4月,中共中央派周小舟以毛泽东私人代表的身份到榆林,与驻榆国民党高双成部和谈。双方达成和平共处,一致对外抗日的协议,促进了榆林国共双方的了解和合作。同月,高桂滋、高双成、阎锡山先后写信或派人要求与神府特区谈判。中共神府特委一一写信表明团结抗日决心。同时,先后派王恩惠、武开章、杨文谟、刘北垣、毛凤翔、杨和亭等与国民党驻军八十四师李少堂团、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二〇九旅段树华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谈判,并在著名人士李公朴的敦促下达成停战协议。

1937年10月,邓宝珊率二十一军团到榆林。邓宝珊早就与共产党有来往,毛泽东到陕北后邓写过信,邓在兰州出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时,与杜斌丞一起会晤过西北著名共产党人谢子长,并给谢馈赠手枪两支,子弹百粒。所以他抵达榆林不久,就派副官石佩玖和八十六师副官高少白,带着他和高双成的信件,前往绥德拜会隶属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的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并派八十六师参议刘绍庭为驻绥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延安的联络工作。

邓宝珊部的河防区,北起神木贺家川,南至吴堡宋家川。黄河对岸的破口和军渡,是陕甘宁边区通往抗日前方的通道,经双方商定,此段河防由边区部队驻守。同时,商

定维护延安、榆林两地人员及物资的顺利出入和邮电、文化的自由往来。1938至1939年之间,延安和榆林曾多次遭受日机轰炸,双方及时通话,联合防空,减少了损失。延安出版的书籍、报刊,都给榆林各军政机关邮赠。延安的抗战剧团、战地文工团等文艺团体,先后到榆林为军民演出。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先后到榆林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4月,延安八路军驻榆办事处成立,主任龚逢春,驻地设于李掌士中巷冉家院内。办事处成立后,与榆林各界公开往来,宣传抗日。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惧于八路军办事处的频繁抗日活动,与边区政府交涉,办事处于次年春被迫撤离。

5月,陕甘宁边区派高岗到榆林,同邓宝珊、高双成会晤,研究进一步巩固河防防御日军人侵陕北的问题。高岗接受高双成的邀请,在国民党驻军数千人大会上,作了“团结抗日,枪口对外”的讲话。

7月,高双成应陈奇涵之约,到镇川堡会见陈奇涵和刘文蔚。不久,陈奇涵又到榆林和邓宝珊、高双成进行商谈。此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延安联络员李启明等先后到榆林,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商谈,双方保持了和平共处的默契。

1938年4月至1939年秋,邓宝珊前后3次途经延安,中共中央热情接待,毛泽东与邓宝珊做了彻夜长谈。毛说:“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中共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

是国民党里的联共抗日派，我们与你团结的方针不变。”邓宝珊说：“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是国家之福。”经过与毛泽东的几次面谈和书信交往，邓宝珊对形势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1939年底至1940年3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命邓宝珊、高双成从边区以北配合行动。胡宗南电令：“请将刘志宏的暂编十五师调榆。”邓、高复电以“粮秣困难”为由，予以拒绝。不久，日军向晋西北发动“扫荡”，阎锡山制造磨擦，河东的八路军准备西渡黄河来陕。蒋介石急电高双成部以两个团兵力截断螭蛸峪、宋家川沿河渡口，阻止八路军西渡。高双成向邓报告后，复电称“八路军在周家峪集结兵力三千多，有进攻榆林、打通神府之企图，无兵抽调”，搪塞过去。邓、高还向中共中央表示：“我们交朋友，就要交到底。彼此心照，不再明言。”中共中央转告邓、高：你们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是对处于艰难境况下的边区极大的支持，为抗战做了件大好事。

1940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南汉宸和袁任远偕同开明士绅刘绍庭，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榆林会见邓宝珊等；邓宝珊派胡希仲携带信件到延安、绥德等地，并转邓的口信：他愿意当国、共两党之间的“红娘”，协调两党关系。通过协商，双方进一步加强了友好关系。

同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派刘绍庭再次持毛泽东致邓宝珊的亲笔信赴榆林，转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观点，希望邓宝珊认清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和准备投降的阴谋，共同反对分裂，坚持团结抗战。邓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始终保持沉默。同年，王震到榆林与邓、高晤

谈，并游览镇北台、红石峡等名胜。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王震奉命再次赴榆林会见邓、高，重申团结抗日原则。是年，由于榆林大军云集，军粮乏匮，邓、高派二十二军军需处副处长严佐民到延安，洽谈购买军粮。严佐民到延安后，遇见了朱德总司令、萧劲光主任等，商定国民党新兵经过边区时，由边区粮站供粮。王震司令员派粮食科长田子亨到榆林，答应边区给榆林出售8000石粮食。榆林二十二军也向延安出售电匣子和干电池等物资。同时，延安对从西安运往榆林的国民党军武器、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给予免税免验的各种方便。榆林的官兵途经延安，二十二军从关中征集的新兵路过延安，延安还组织秧歌队迎送，并送去猪肉、豆腐等慰问品，对患病的官兵给以治疗，双方形成一片友好融洽气氛。

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邓宝珊对蒋的倒行逆施深为不满，坚持以团结抗日为重，始终与边区保持睦邻关系。同年夏，蒋介石电令邓宝珊绕道宁夏，到重庆开会。邓却有意取道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几次与毛泽东的会晤，更加坚定了邓宝珊与共产党合作共事、共赴国难的信心。他的次女邓友梅曾到延安，在陕北公学等校学习。后来因病转到榆林休养，仍然坚持做统战工作，从各方面支持革命。邓宝珊在重庆期间，蒋介石问他：“你的女儿是共产党？”他坦然回答：“是的，信仰不同，有什么办法！”当年11月下旬，邓宝珊在返榆途中经过延安时突然病倒。毛泽东亲临探望，邀请名医治疗，后来又将一件优质狐皮大氅相赠。邓病稍有好转，毛泽东又邀他到杨家

岭彻夜长谈。

1944年冬,刘绍庭持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亲笔信再次来榆林,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友好关系,信全文如下: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①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都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榆林解放区各分区的党政组织也从军事、政治方面做了许多促进工作,主要是力争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站到抗战立场上来。经党组织的耐心争取工作,在解放区“三三制”政策的感召下,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霍祝三,米脂的李鼎铭、贺连城、姬伯雄,佳县的杜嗣尧,定边的崔岳瑞、靳体元、丁子齐,靖边的白文焕,神木的刘荣胜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开明绅士,

^① 绍庭,即刘绍庭,抗战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虽然家居国统区,但都自愿的参加了解放区政府的工作。他们与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早日驱逐日本侵略者,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特别是李鼎铭先生,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站在国民党方面,后来在共产党耐心启发开导下,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主张,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诚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建议解放区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对此建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说李鼎铭先生“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在全国各解放区推行李鼎铭的这条重要建议,为度过经济困难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党在榆林国统区的文化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榆林国统区的文化工作,首先是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榆林地方组织开展起来的。

1937年春,民先队榆林地方组织,以榆林中学、职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为主,组织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到街道乡村进行抗日文化宣传。邓宝珊率部抵达榆林后,中共榆林县临时支部通过邓总部秘书汤昭武(共产党员),征得邓宝珊的同意,创办了《前哨》周刊。邓宝珊不但为刊物题写了刊头,撰写了发刊词,还与高双成、左协中给该刊捐款赞助。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高岗来榆时应邀给刊物题词:“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杨明轩(“西教会”主持人)也撰文表示支持。《前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着重刊登前线消息、时事评论,转载《解

放》、《救亡》等延安报刊的文章与战地通讯等，前后报道了八路军东征忻口车站战斗和平型关之战的实况，刊物以其内容新颖和敢讲真话为特点，颇获社会各界好评。后刊物遭国民党复兴社特务扼杀，只出了25期。

1937年11月，姬也力担任中共榆林县临时支部宣传委员后，开办书店，公开出售绥德抗敌书店的进步刊物及延安出版的各类报刊。此外，《大公报》驻榆记者杨令德团结了一批文化界人士及进步青年，成立了新闻记者协会，并出版了反映抗战救亡的刊物《塞声》。

在中共榆林县临时支部的组织和策划下，榆林各中等学校师生联合组成“战地服务团”、“别动队”等，走上街头，深入农村，以演讲、话剧募捐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鼓动，支援抗日前线。学生们还分赴横山、神府和绥远东胜、归绥等地，宣传抗日，慰问抗日将士。

在此期间，延安抗战剧团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战地文工团，先后来榆林、神府，演出抗战话剧《黄河大合唱》等文艺节目。延安烽火剧团与榆林战地服务团联袂，跨越黄河到山西保德、河曲、偏关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慰问演出。榆林成立了文学社、大时代剧团、孩子剧团等，经常向城乡群众宣传演出。

1938年4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华北办事处主任张继率领国民政府中央慰问团二团到达榆林，同来的还有作家老舍、画家沈逸千、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边疆通讯社》社长赵尺子，以及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榆林各界举行集会，热烈欢迎。老舍等在榆期间，访军营，探伤员，上讲台，敬谒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与各界人士广泛

接触。《塞声》杂志发表了长篇论文,高度评价老舍对抗战文艺的杰出贡献。

第四节 坚持团结 反对摩擦

一、反对何绍南的斗争

陕北的反摩擦斗争,是从绥德警备区反对“摩擦专员”何绍南开始的,而且这里也是反摩擦的重点地区。

绥德警备区本属国共两党合作共管的地方。国民党的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第二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保安团等驻在绥德县城。警备区所属的绥、米、佳、吴、清等5个县,都设有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共产党虽在绥德设了警备区司令部,但在绥德等5个县没有政权机关。可是死硬的反共分子何绍南认为,已进驻警备区的八路军部队,各县的抗敌后援会武装动员股,是他在警备区实行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严重障碍。所以他多方采取反动措施,制造摩擦,企图把抗日民主力量挤出绥德警备区。

何绍南上任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后,首先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集保安队400余人,又收买了一些兵痞、匪徒,合编为5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充当他制造摩擦的马前卒。1939年,他组织所谓的“学联会”,在绥德公开张贴反动标语,煽动学生向八路军警备司令部请愿,狂妄地要求八路军撤出绥德。他指示安定县长田杰生带领保安队袭击八路军驻地杨家园子,使驻军蒙受死伤数十人的损失。又面谕吴堡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八路军七一八团三

营副营长尹万生。他又指使清涧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他还伪造八路军臂章和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高步元等人,冒充八路军私贩大烟土,损害八路军声誉。1939年除夕晚,他派国民党特务暗杀队杀害了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正富。何绍南制造摩擦的罪恶行径,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愤。为了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开始共产党对何绍南采取克制态度,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摩擦,一致抗日。但何绍南及其帮凶却认为共产党软弱可欺,肆无忌惮的进行反共活动。对此,毛泽东和彭德怀曾分别在延安和西安对他的倒行逆施行径进行过严厉的指责和警告,斥责他是“摩擦专家”、“秘密的汪精卫”。但何绍南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地煽动保安队袭击八路军河防部队,先后打死打伤八路军留守兵团机枪连连长和哨兵多人。不择手段,明火执仗地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白银案”、“烟土案”、“赌博案”、“土匪案”等系列案件,诋毁八路军声誉,巧取豪夺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共绥德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原则,在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领导下,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彻底揭露何绍南的反动嘴脸,争取群众,中共绥德特委将其反动言行列出八大罪状,公之于众:(1)破坏抗战。八路军、新四军积极抗战,战果辉煌。何绍南一伙到处诋毁、诬蔑八路军不打日本,专打国民党军队。指使特务勾引八路军战士开小差,千方百计分化、瓦解八路军部队。(2)暗杀中共党政人员和八路军战士。(3)成立土匪别动队,扰乱

社会治安。(4)破坏警备区土地政策。(5)借禁赌为名,贪污巨额罚款。在他的影响、唆使下,国民党专署、保安司令部、保安团队、县政府等部门人员,大多混迹赌场,有的成为赌头赌棍,有的招赌抽头,从中渔利。(6)借禁烟为名,搜查、没收烟土,却将大部分罚金和烟土私吞,又转手贩卖,获取巨利。(7)破坏公路工程,贪污工人工资。何绍南一伙勾结整修咸榆公路工程处,扣压工人工资白洋数万元并责令停工,使数百名工人的生活陷于困境。(8)借禁用银洋为名,指使秘书在绥德、米脂等地没收和罚没了十多家商号白洋十五六万元,大部分被何绍南等人私吞。

何绍南一伙的罪行公开揭露后,陷入“人心背离,孤立无援,身败名裂”的境地。于1940年2月5日深夜,率众潜逃榆林城,对何绍南保安队的武装挑衅,警备司令部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坚决给予回击,三五九旅将吴堡和绥德义合一带保安队全部缴械。

在反对“摩擦专员”何绍南的斗争中,绥德警备区所属的县,也都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县长制造反共摩擦的斗争。

米脂县国民党顽固势力,对抗日军民一直采取敌视态度。县党部指导员王道之下令党部干事赵伯龄,率领军警撕毁抗日救亡标语。八路军进驻米脂以后,他们蓄意制造事端,造谣中伤,损害八路军声誉。1938年7月15日,中共绥德特委书记刘澜涛派人给米脂民运股长黄静波送信,被国民党方面诱获。国民党县长刘学海和王道之即借机大做文章,将篡改伪造后的信作“依据”,下令驱逐八路军在米脂工作的干部,解散抗敌后援会。刘澜涛闻知此事后,即向

王道之提出抗议,并与骗取信件的赵伯龄面谈,确认此事是王道之为破坏国共团结而为。在八路军驻米工作同志的强烈谴责下,王道之只得将原信交给黄静波。

吴堡地处河防前哨,是国共双方军政人员都过往的地方。但是国民党县长黄若霖给联保下令,不给八路军代表安排食宿,将铺盖扔出门外。更有甚者,1939年夏组织“暗杀队”,枪杀了八路军七一八团两名炊事员,将尸体抛入黄河。三五九旅奉命由华北回师加强河防,他们造谣说:“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自由行动。”“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他们肆意制造白色恐怖,下令禁止民众互相低语,不准夜间点灯,违者以“神秘会议”罪名逮捕。面对顽固派的挑衅,八路军一面向广大群众揭露他们的倒行逆施行径,一面组织便衣队、打狼队,惩处“暗杀队”中有血债者,以示震慑。为了拔掉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据点,动员群众在70多小时内,将原来修筑的754个碉堡摧毁。当年10月,七一七团接防后,顽固势力变本加厉,公开反对边区和八路军,枪杀抗日积极分子,抢夺枪支。1940年3月28日拂晓,经过周密的部署,八路军突然包围了国民党吴堡县政府,俘获其大部人员及保安队官兵(只有县长及保安队长潜逃)。

绥德警备区的反摩擦斗争取得了胜利。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成立。

二、神木的反摩擦斗争

1938年秋,神木国民党县长夏琼棠叫嚷“统一神木,收复失地”,借故八路军失火打死对方的保长,通电各地诬

袭八路军进占其统治区域。唆使大地主、民团团长解生龙带领团丁二三百人，越境进驻民主政府辖区五区胡窖则圪村一带，大肆勒索民众。佳县县长也纠合民团数百人，进驻三区白家塔、申沟、冯家店一带，杨言要“收复失地”，多次指挥万户峪、乔岔滩两联保，向上述地区群众滥摊款项。

中共神府特委面对顽固派的嚣张活动，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也派了一排保安队进驻胡窖则圪村。夏琼棠又调动了几个民团进驻杨家沟、武家沟一带，企图消灭保安队。神府特委识破了对方阴谋，及时增派了两排保安队自卫。同时，派员与对方进行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双方撤军，救亡工作不停止，双方停止征款及抽丁。初步平息了五区的摩擦。对于进占三区的反动民团，派员抗议，逼令他们停止收款，使顽军退出三区，避免了军事冲突。

1939年，神木顽固派与解生龙民团配合再次进扰胡窖则圪村。反动地主也纷纷向农民收租索债、夺回土地，顽军还逮捕了乡长王樞元。同时，游击军张勋生部进驻黄草滩，何柱国骑兵部队进驻黄河沿岸的马镇、合河等6村。对此，特委多次派员与之交涉，友军自行撤走。而对于重新闯入胡窖则圪村一带的顽军，经多次交涉无效，不得已派出两连兵力进行自卫。是年秋，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赴神木检查抗日救亡工作，出面调停胡窖则圪村摩擦事件，双方达成四条协议，双方撤兵，释放被捕人员，已分配的土地不能翻案，有争议区平均分配管辖。1941年春，国民党暂编第一团借口休整，进驻乔岔滩一带。

1942年春，五区胡窖则圪村事件第三次重演。顽固派借口“保卫秋收”先后进占任念功等地，掠夺财物，殴打群

众,阻碍抗战。八路军河防司令部派军队进驻上述地区,并逮捕了部分团丁。经多次谈判,双方军队撤离,避免了直接冲突。

三、定边的反摩擦斗争

定边县城是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和定边县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国民党的定边县政府和县党部设在乡间。定边的顽固派建立了特务组织,网络社会渣滓,造谣诬蔑,贩卖毒品,争夺地盘,不断地挑起摩擦事端。较大的有:

1940年12月4日,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派武装部队袭击驻定边附近苟池的八路军,打死打伤战士9人。继而增兵百余,围攻八路军,并夺走苟池盐湖。为了教训顽固派的挑衅,12月9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三边警备区司令部派出三个连,对苟池的顽军据点进行武装回击,毙31名、俘8名。同时,三边警备区司令部发布《为苟池事件告各界同胞书》,说明事实真相。后经双方和谈,达成协议。

1941年1月初,以马文良为团长的陕甘宁边区回民巡视团一行6人,从延安到盐池四区五乡回六庄检查工作。国民党惠安堡警察与马鸿逵驻军,于2月8日越境包围了回六庄,对手无寸铁的巡视团突然袭击。除副团长马文奎一人脱险外,其余5人均被逮捕押送宁夏。

1941年9月4日,三边的反动民团头目张廷芝、张廷祥设“鸿门宴”,诱杀了对八路军友好的国民党驻安边新编第十一旅旅长刘宝堂。事件发生后,一团团附、地下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牛化东根据中共三边分委的指示,组织全旅力量,于9月14日晚,收复安边城。击毙了张雨亭,抓回

逃跑的张廷祥公事枪决,安定事件遂告平息。

1941年11月22日晚,驻定边城外的新十一旅一团三营,在营长宋子元唆使下,突然包围了八路军驻定边西关骑兵营二连防地,射杀哨兵,向驻军马棚内扔手榴弹。经再三劝阻无效,八路军被迫自卫还击,打死打伤10余人、俘50余人。后经谈判达成四项协议,定边事件和平解决。

四、靖边的反摩擦斗争

靖边的东、西、北三面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国民党在沿边屯集重兵,设置众多碉堡和据点,日夜巡逻。经常派出便衣队、民团、土匪、特务到靖边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属的区乡实行抢劫、绑架、暗杀,秘密组建反动组织,进行反动宣传等骚扰活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

1938年冬至1939年春,国民党阎家寨子保安队长和联保主任多次率保安队,窜到解放区的刘家峁、胡家坪、马圈等村庄,强行编制保甲,拷打群众,抢劫民财,掠夺牲口,贩卖毒品,肆意破坏治安。靖边县民主政府请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意,向这一带派出县保安队,担任警戒,保护群众,维持地方治安。1939年3月5日,国民党保安队突然包围龙洲寨子,开枪打死民主政府保安队战士,制造了一起流血事件。

1939年4月,小桥畔教堂民团在国民党的支持和怂恿下,诬陷老百姓耕种了他们的土地,拉去17名群众,抢走牛、驴50余头。6月13日上午,驻小桥畔保安队及八十六师骑兵一连,在草山设伏袭击靖边民主政府保安队,打伤4人。

1939年5月28日,镇靖区五乡乡长冯万山夫妻惨遭特务杀害。1940年7月至8月,驻宁条梁的张廷祥部在新城区六乡、青坪区、大庙界、硬地梁、赵家坂等地,打死村民,抢掠财物,轮奸妇女。驻石湾的国民党八十六师一部和保安团队及横山柳桥、威武的国民党驻军,经常化装成土匪,进行捣乱破坏,在青阳区石桥拷打村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

对国民党制造的种种摩擦事件,中共靖边县委和县民主政府除在政治舆论上揭露批驳外,在行动上一般采取克制忍让态度,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每次事件发生后,靖边县民主政府都设法搞到确凿证据,向国民党靖边县政府的上级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报告。同时与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四十里铺、巴图湾、羊羔山、阎寨子、十里铺、死糜子圪坨及康家园等地进行谈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可是顽固派在反共高潮的影响下,不但对谈判毫无诚意,而且对解放区的骚扰与破坏与日俱增。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统战成果,1940年秋三边警备第三旅派遣第九团和保安第二团部分兵力,对顽固派的重要据点阎寨子实行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围攻,终于摧毁了这个顽固堡垒。此后,对方的骚扰、摩擦行为有一定的收敛,出现了相对缓和的局面。

五、结束“双县长”畸形状况,统一县级政权

国民党政府派往各县的县长,是摩擦事件的制造者。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根绝摩擦,还会带来更大的危险。1940年2月3日,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和陕西省府主席蒋鼎文:“国共合

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边区已忍让三年。”“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义之尽也。”程潜只得回电,表示同意边区各县之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据此,边区政府对那些县长中表现一般的予以放行;对个别制造摩擦的分子逮捕法办;对主张抗日又愿意留在边区的热情接待。同时边区政府又任命了部分县的县长。双重的县级政权局面从此结束。

但是陕甘宁边区仍然处在国民党政权的包围之中,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的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依然存在。从1940年9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在解放区周围修筑了一条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黄河的封锁线,由碉堡群构成。分为5道,每道相距数十里,其纵深宽度达百人以上。封锁线构筑成以后,顽固派搞摩擦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军事上,加强对边区的警戒,阻挠和袭击边区工作人员的出入,即使是一般商人和脚夫也不放过。在经济上,对边区实行封锁,禁止物资进入边区,公开扣留、没收一切运往边区的牲畜、财物。同时断绝交通,禁止通邮。在思想文化方面,实施“特种教育”,规定榆林、洛川、耀县等县区为“特种教育施教区”,向老百姓灌输反动思想,抵制边区的政治思想影响。

第九章

国共合作 保卫河防

第一节 建立和扩大抗日人民武装

一、成立绥德警备区司令部

1937年10月,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建立,属八路军总后方留守处领导。陈奇涵任司令员,郭洪涛任政委,文年生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警备区司令部设在绥德城内仓房圪塔。下辖警备第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警备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警备第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

1939年8月,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军委将在河东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三五九旅,调回绥德警备区。旅长兼旅政委王震,接任警备区的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七一七、七一八、七一九团和独立团。

1942年5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绥德警备区属八路军留守兵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双重领导。

二、建立三边保安司令部、警备第三旅

1937年10月,三边保安司令部在定边成立,属中共

三边特(分)委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双重领导。司令部驻定边城内王大镇油房院。白寿康任司令员,自治民兼任政委,赵苍璧任副司令员,齐渭川任参谋长,李方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边保安大队、三边骑兵营。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三边地区的特定环境,为防止国民党驻军的武装挑衅,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在原警备第一团和三边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的基础上,建立警备第三旅,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区,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贺晋年任旅长兼警备区司令员,王世泰兼任警备区政委,吴岱峰任副旅长兼警备区副司令员,吕振球任副政委,张文舟任参谋长,陈仁麒任政治部主任。

驻三边的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区,下辖三个团,分驻陕、宁、绥三省。第七团驻宁夏盐池,第八团驻绥远城川,第二团驻靖边。

三、建立河防司令部

1938年初,为了加强黄河防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在黄河沿岸划分了若干“黄河沿岸防务司令部”(简称河防司令部)防区,神府县境划为第一河防区。

3月,神府县保安司令部改为第一河防司令部,驻地温家川。黄罗斌任司令员,张秀山兼任政委,王宝珊任副司令员,钟生益兼任副政委,陈振峰任参谋长。防区范围北起小满村,南至佳县城北。下辖由神府保安六大队改编的神府独立第六营。1938年中秋节前后,对司令部又进行调整,并附设了修械所、医务室、宣传队、通讯排等。1941年6月,神府独立第六营开赴子洲、延安一带,神府河防由晋绥

军区特务团接管。

1941年9月,神府地区划归晋绥边区后,第一河防司令部归晋绥军区和中共神府分委双重领导。1943年春,原驻守神府的晋绥军区特务团奉命调走,晋绥军区派二十七团接防。同年秋,二十七团调离神府,河防任务由神府县保安大队和一二〇师后勤部负责。

四、发展和扩大地方抗日武装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联合发布命令,颁布了自卫军组织条例。榆林境内各县相继成立了地方武装——自卫军(游击队)。自卫军组织条例规定,自卫军的任务是:保卫边区,配合保安队或单独消灭汉奸、土匪,搜索零星匪徒,捕捉侦探,担任警戒,设置哨卡,侦察敌情,递送情报,进行抗战训练,为正规部队补充兵员,负责战时的有关军事工作。以班、排、连、营编制,营为最高单位。自卫军的领导、指挥、训练,统由保安司令部负责。

抗战期间,榆林各县组建的地方抗日武装有:

1937年8月,吴堡县国民党丁家畔、李家沟的联保队在队长秦茂芳、薛英桂率领下同时起义,收缴了岔镇和李家堰两联保的全部枪支,起义队伍200多人,史称“黑军暴动”。9月初,起义部队转移到绥德黑圪坨和枣嘴一带。同月,边区保安司令部派慕生忠将部队改编为抗日游击支队,辖两个连,薛英桂任队长,张驾伍任政委。10月,又改编为绥德警备区吴堡独立营。1938年初,编入警备第八团。12月,中共吴堡县委根据绥德特委和警备司令部的指

示,建立了河防游击队,开始有30多人,后发展到100多人,主要活动在宋家川、李家沟、岔上一带,慕明君任队长。1940年3月,河防游击队改为保安大队,大队长刘汉鼎。6月,绥德警备区成立保安大队,吴堡保安大队改为警备区保安第二队。7月,保安二队奉命开赴老君殿(今属子洲)一带活动。1942年5月,吴堡建立自卫军大队部,县长王恩惠兼大队长,各区建立自卫军。同年秋,全县自卫军进行整编,县为团,区为营,乡为连,共12616人(女3154人),占全县总人数的30%,其中基干自卫军连35个,3088人。1943年,自卫军再次整编,新编普通连35个,基干连4个。有土枪11支,长矛4537支,大刀170把,担架138副。

1937年9月,根据边区政府关于改造赤卫军的决定,清涧县赤卫军更名为抗日自卫军。他们平时不脱产,农闲集训,协助地方政府禁烟禁赌,维护社会治安。战时配合正规军作战,抬运伤员,运输物资。1940年春,成立自卫军大队部,属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和县委双重领导。荣成功任大队长,贺秉章兼任政委。下辖区自卫军营8个,乡自卫军连47个。1942年对自卫军进行了整编,全县有自卫军8829人,其中普通自卫军7448人,基干自卫军1381人。

1937年10月,中共靖边(11月改为靖边)县委在青阳岔组建了县保安大队,辖3个中队100多人,驻守在龙洲阎寨子附近。属三边保安司令部领导,大队长荣福俊。1938年春,保安大队和米脂独立第五营在镇靖合编为独立八营,下设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共300多人。主要活动在靖边和米西部分地区,营长荣福俊。1940年3月,独立八营与延川独立营合编为三边保安第二团,驻靖边,团长

高维嵩，政委黄永辉。同时靖边县又组建了30多人的自卫军大队，属三边警备区司令部领导，大队长由县长王治邦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贺建山兼任。1942年6月，靖边县在掌高兔成立了骑兵大队，辖两个中队，200多人，战马200多匹，长短枪200余支。1945年，骑兵大队与盐池骑兵营、警三旅骑兵连合编为骑兵团。团长曹动之，政委惠志刚，下辖4个连。

1937年12月，中共佳县县委组织原第十五支队、六支队部分人员，建立了佳县河防游击队，属县委领导。辖3个分队，共130多人，分别驻守螭蛭峪、木头峪、桃花渡、大会坪、万户峪等沿河岸重要渡口。队长冯有才，政委张成功。1938年夏，河防游击队编入八路军三五九旅。1942年7月成立了佳县自卫军大队部，属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和县委双重领导。辖各区自卫军营，倪伟任大队长，刘增山任政委。

1938年1月，神府县成立保安司令部，辖保安第六大队，司令员黄罗斌，政委张秀山。3月，保安司令部改为第一河防司令部。1942年3月，神府县保安大队成立，下设3个支队，属第一河防司令部领导，毛凤翔兼任大队长，刘长亮兼任政委。抗战开始后，神木县的赤少队改称抗日自卫军，属县武委会领导，区编大队、乡编中队、村以下为小队。1940年，神府县有普通自卫军2441人，基干自卫军722人。

1940年3月，中共绥德县委组建了绥德县警卫队，徐兴德任队长。1943年初，警卫队扩建为警卫大队，辖3个中队，属绥德分区保安处领导，王永胜任队长。在组建县警

卫队的同时,为了加强社会治安,保卫新政权,在原国民党县壮丁队、民团等武装组织的基础上,县委成立了绥德县自卫军大队,杨瑞霆兼队长,裴仰山兼任政委。

1941年,中共米脂县委建立了米脂县保安团,李仲英任团长。1942年,米脂县保安团改称保安大队,由马济堂兼任队长。5月,县委对全县的地方武装力量进行整编,组建了米脂县自卫军,马济堂兼任队长,贺秉章兼任政委。1943年11月,县委将县自卫军改称县自卫军大队部。县务委员会主任马济堂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冯文彬任政委。此时,自卫军下设9个营,51个连,177个排,共10468人。其中基干自卫排26个,班80个,1174人。武器装备,有土枪266支,大刀272把,红樱枪10916支。

1943年11月,子洲县自卫军大队部成立,属绥德警备区和中共子洲县委双重领导,谢怀德兼任大队长。全县共组建自卫军连9个,排55个,有自卫军1435人。1944年1月,子洲县第一游击队在周家埧成立,第二游击队在石窟沟成立,各有30多人。主要对付国民党顽军的骚扰,均隶属自卫军大队部领导。1945年5月,两支游击队合并为子洲县游击大队。辖2个小队120多人,谢怀德兼任队长。

第二节 抗敌后援会的成立及活动

一、解放区的抗敌后援会及活动

1937年10月,定边以工会为基础,吸收青年、妇女参加,成立了三边抗敌后援会。受中共三边特委的领导。

1938年1月,延安26个群众团体举行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根据大会制定的后援会章程,解放区各级普遍成立了后援会的组织,绥德警备区还成立了工人救国会和青年联合办事处。

抗敌后援会在八年抗战中的各个阶段,协助党和政府组织群众,支援抗战,为争取整个战争的早日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动员群众参加自卫军与少先队 1942年,吴堡抗敌后援会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自卫军12616人(其中妇女约占1/4),占总人口的30%左右,另有少先队员2213名。他们提出“不让日寇过黄河一步”的战斗口号,为绥德警备区七一八团扩兵18名。1938至1939年间,神府特区自卫军人数达到2746人,基干自卫军近千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3900多名,通过训练和教育,会员的思想、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一次就有700多名会员参加自卫军组织。他们以大刀、红缨枪为主要武器卫国保家。少年儿童也被组织起来,宣传抗日救亡。黄河两岸回响着鼓舞民族斗志的歌声:“陕北好地方,人民斗争历史长,亡国奴不愿当,抗日反投降,它是统一战线的好榜样。”几年当中,神府特区向前方输送兵员近千人。1938年春日军进犯神府时,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队开赴前线作战。自卫军组织了游击小组,保卫家乡,维持地方治安,军民齐心协力,巩固了后方。

组建各种群众组织支援抗战 后援会组织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宣传队、通

讯队、侦察队、破坏队、防空队、代耕队、妇女生产组、劳动互助社、战地服务团等战时组织,在锄奸剿匪、保证生产、动员给养、慰劳将士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吴堡县地处边区抗日前沿,当地人民的各种负担繁重。抗战开始后,后援会协助农会领导了全县的“归地运动”,重获土地的农民生产情绪和抗敌热情空前高涨。仅1937年到1941年就为部队做军鞋近1.5万双,为三五九旅纺棉花上万斤。抗战初期每年大约动员民工六七万人次,修筑河防工事和抬担架等。1942年动员民工7万多人次,牲口2493头次,为部队运输军用物资。此外,抗敌后援会还组织15至50岁之间的劳力4300多人,编成代耕队,给缺乏劳力的抗属代耕土地4436垧。给抗、工属困难户,发放赈济粮160石。1938年3月间,日军进攻兴县时,神府200多名河工冒着枪林弹雨,在黄河惊涛骇浪之中,抢运伤病员和军用物资,为保证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很大的贡献。1939年上半年,后援会动员民工12859人,牲口9083头,运送伤病员1020人。1942年,全分区做军衣上万套,军鞋1.2万双。在抗战期间,后援会前后共组织担架5万多付(次),抢救伤病员5000余名。成立运输队40多个,组织水手200多名,运送人员四五万名,军用物资10余万吨。

动员群众缴纳爱国公粮 各地群众在后援会的积极宣传鼓动下,深明大义,踊跃缴纳公粮,支援抗战。1940年吴堡县原计划征收救国公粮500石,实缴694石,同时给驻军

卖粮 300 石,谷草 18 万斤。次年,公粮增至 1530 石。1944 年,上缴公粮增至 1800 石,公草增至 18.5 万斤。神府分区 1938 年征收救国公粮 800 多石,1942 年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还征收了 650 石公粮。此外,给友军支援了部分粮草,巩固了统一战线。

募捐慰劳前方将士 1940 年 10 月 13 日,边区后援会与边区党政军共同发起为八路军募捐 40 万元寒衣代金运动。榆林解放区各地党政军民踊跃响应,积极募捐。吴堡县的 1 万元代金很短时间内就提前完成了。

宣传群众发展经济救亡图存 抗敌后援会从一开始便十分重视宣传抗日救亡意义。各地充分利用传统庙会、集会和各种重要纪念日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府谷抗敌后援会先后举办了几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并选送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干部到中央党校、边区党校、抗大等处学习。妇女联合会深入群众,宣传救亡图存道理,开展婚姻自主、读书识字、放脚、纺花织布、送子送郎参军等活动,还开展了为子弟兵做军鞋、拆洗缝补衣被、护理伤病员等工作。当时的宣传工作搞得很活跃,编写出的《除奸歌》、《紧急动员歌》、《保卫边区歌》等,在群众中普遍传唱。

抗战时期,抗敌后援会还协助各级党政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各项生产和经济建设。他们动员群众,开展互助合作,改造“二流子”,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帮助农民向地主索还土地、窑房,开展合理斗争,保护了农民利益,改善了群众生活;普遍建立“互济会”组织,经常进行劝募活动,救助贫困的抗工属;同时,领导各地商会,引导商人改

善经营、抵制日货、购买爱国公债、积极纳税,为支援抗战,救亡图存做了大量的促进工作。

二、国统区的抗敌后援会及活动

1937年5月,榆林国统区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社。这个组织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宗旨,卢沟桥事变后,已发展到六七百人,主要成员为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和部分国民党下级军官。7月,榆林国统区也成立了官办的各界抗日后援会,由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任主任。

以学生为主体的民先队,在榆林的抗敌后援活动中十分活跃,队长由共产党员姬也力担任。8月间,榆林中学、职业学校和榆林师范学生组成抗日宣传队,分赴陕北各县,宣传抗日救亡,募捐钱物慰问抗敌伤病员。是年冬,民先队组织了二三十人到鱼河堡、横山等地演讲,并演出歌舞、戏剧,张贴标语,大造抗日舆论。次年春,驻榆二十二军在包头滩和府谷、保德一带与日军初战告捷。在民先队队员王国宾、张学德等人号召发动下,榆林部分学生参加了榆林抗日后援会,随后组织战地服务团,先后前往东胜、神府等地慰问。他们为前方将士演戏,表演歌舞,并为伤病员拆洗衣服和被褥。他们走到哪里,宣传鼓动到哪里,受到抗日将士的普遍欢迎。

在抗战一周年之际,榆林举办献金救国活动。铁匠刘振德积极响应号召,将自己多年的积蓄200块银元和其妻的一些金银首饰慷慨献出。抗日后援会召开大会进行表彰,并赠送了“深明大义”木匾,悬挂于城内四方台楼

上。在他的带动下,各界人民掀起了有声有色的捐献热潮。

1943年7月7日,榆林各界为纪念抗战6周年,在莲花池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前举行公祭大会,进一步激发全民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第三节 抗击日军 保卫河防

一、保卫河防的部署

1938年2月,日军侵占山西平渡,直逼绥、米、佳、吴、清和神府河防。同时,绥远国民党军进犯三边地区,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榆林各地面临严重威胁。在此严重形势下,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所辖部队为主,组成河防司令部,分段防守千里河防。具体部署是:以王兆相为团长、张达志为政委的警备第六团驻神府,(不久六团调归一二〇师建制),神府保安司令部改为第一河防司令部。防守佳县以北、万户峪、沙峁、盘塘、马镇、贺家堡等渡口;以文年生为团长、韩荣为政委的警备第八团驻绥德、吴堡,守备大会坪、螭螭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枣林坪等渡口;以阎红彦为团长、杜平为政委的警备第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界首、枣林坪以南等渡口;以贺晋年为团长、钟汉华为政委的警备第一团,驻防米脂、佳县。同时,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左协中旅长率一团兵力驻神木,五一二团驻防府谷;马占山部担任晋西北接壤的黄河防务。留守兵团各河防部队到达指定地方后,按照边区党

委的指示和留守兵团下达的抗日总动员令,迅速成立了绥远、神府和绥德警备区河防司令部。划分了河防部队守备分界线,明确指挥关系,拟定击退日军西渡黄河时的各种具体作战计划;进行了战术研究、战役准备、特种地形的战斗演习和射击技术训练;在各主要渡口构筑坚固的纵深配套工事;对部队进行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边区政府号召边区人民及自卫军组织起来,配合河防部队及保安部队防御与打退日军的进犯。据此,绥德、清涧、米脂、吴堡、佳县和神府等县迅速组建和加强了各自的抗日自卫军组织。

1939年9月,河防吃紧,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回驻绥德警备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的守备力量。在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千里河防迅即筑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二、1938年的河防保卫战斗

府谷保德保卫战斗 1938年3月2日上午9时,日军一架侦察机从东北方向飞抵府谷、保德县城上空,盘旋数圈后飞走。5日上午,日军5架轰炸机在府、保县城黄河两岸投弹20余枚;下午,日军1000余人侵占保德城。6日,日军在保德城头用4门大炮向府谷县城猛轰,5只大船载日军600人向府谷岸强渡。虽然府谷驻军立即还击,但日军在飞机、大炮、轻重机枪掩护下,还是在马连圪尖岸口强行登陆。负责防守的国民党五一二团团团长张之因公在榆林,全团在营长张博学指挥下,将一个营的兵力部署在小河畔以东,李朝如游击队部署在高家湾、贾家湾沿河地

带,常振明营扼守城北的高家窑则。日军登岸后即与国民党军队接火,李躬如无援,被迫将部队撤退到山上王家畔、赵家石堡一带。马连圪尖河防部队因装备悬殊也逐渐向后撤退。日军尾追至前大路、新窑渠、阎家洼、徐家墩、西梁村,被常振明营截击,退回府谷县城。日军在县城烧毁民房400余间,屠杀38人,抢掠了一批财物,下午撤回保德县城。张之因团长在榆林闻警,星夜返防。路经神木借调驻神木高耀斌营赴府谷增援。8日晨,府谷国民党驻军由张之因督战,渡河还击日军。双方在保德城南坡展开激战,高耀斌营迂回将敌驻地包围,迅速解决战斗。击毙日军数人、军官1人,俘虏30人,获轻机枪2挺、步枪50支及各种弹药、辎重。21日,日军侦察机两次飞临府谷上空侦察,下午日军2000余人,轰炸机2架,卷土重据保德城。他们隔河炮轰府谷县城川民房,企图渡河,被河防驻军阻击。22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企图强渡,被坚守的驻军击退。日军辗转数日强渡不能奏效,便将保德城付之一炬后撤离。27日,保德、河曲、偏关三县为府谷国民党驻军收复。

神府河防战斗 1938年3月12日,日军2000余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侵占晋西兴县。13日,抵神府河防对岸的日军以大炮、机枪向河防阵地轰击。同时,以10余架飞机在河防阵地上空侦察、轰炸了3个多小时后强渡黄河。河防守备部队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密集部队渡河之际,集中火力予以猛击,并分兵一部乘日军混乱时迁渡河东,袭击敌侧背。在两面夹击下,日军向兴县溃退。此战击毙日军40余人,伤100多人,缴获步枪10支及

军用品一部分。

第一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8年2月29日,日军2000多人首次占领了军渡并隔河炮击吴堡宋家川和旧县城。八路军警备第八团用轻重机枪给以猛烈还击,迫使日军进入掩体工事盲目发炮。警八团派一个连主动出击,日军撤回柳林。3月上旬日军向破口集结,企图在破口用橡皮舟渡河。因舟小浪急,又受到八路军决死队和吴堡游击队的袭击,日军渡河企图未能得逞。3月25日,日军以一个旅团的兵力,附炮30余门,沿汾离路西进企图再占军渡。针对日军的部署,河防军民一方面加强阵地防御,一方面主动出击,警备八团一、三营固守河防阵地,二营流动防务,政委帅荣带两个连秘密渡黄河,炸毁薛村、穆村大石桥,中断离石通往军渡公路。迂回活动在离石、汾阳、清徐一带,从背后扰乱、牵制日军。团长文年生率3个连秘密东渡黄河,在离石游击队配合下夜袭日军驻王老婆山的一个联队,歼灭日军200余人,缴枪50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迫使日军未到河岸即行溃退。

三、1939年的河防战斗

第二次宋家川、马头关、凉水岩河防战斗 1939年6月4日、5日,日军1万余人进占军渡,在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并以大炮轰击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河防阵地。6日,日军又以1.5万兵力进攻孟门、破口,用飞机滥炸河西李家沟阵地及沿河城镇。与此同时,日军另一部2000余人占领马头关与凉水岩河东阵地,企图寻找适当渡口,实施强渡。河防部队坚守阵地,严阵以待,边区政府与民

众全力支援河防部队。河防部队依托坚固的工事,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河西,在宋家川方向经三昼夜的激战,粉碎了日军渡河的企图。在马头关、凉水岩方向,由于河防部队沉着应战,日军的渡河企图也未得逞。同时,河东八路军又猛击敌侧背,破坏敌交通运输,进犯河防之日军被迫撤退。此时,河防部队一部又乘机东渡,收复了李家垣、柳林。此次战斗共歼敌 80 余人,缴枪 10 余支。

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 年 9 月 4 日,日军三四千人,附炮 30 门,进占军渡,构筑工事,强令群众修复军渡到离石的公路,炮击宋家川,旨在巩固河东阵地,待机渡河占领宋家川。为粉碎日军这一企图,在河东游击侦察部队猛袭穆村、薛村,破坏公路,在孟门、留誉、暖泉等地抗击与消耗日军之时,河西部队又派一部兵力渡河迂回至敌后柳林、穆村、军渡间。日军因多面受袭击,乃于 12 日龟缩于柳林地区,进犯宋家川的企图又遭失败。此次战斗共歼敌 30 余人,缴枪 5 支。

破口河防战斗 1939 年 11 月初,日军集结万余人,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于 20 日分四路向破口合围,并以一路奔佳县渡口。23 日,日军占领破口、孟门两镇,开始向河西猛烈炮击,并以一部 2000 余人在火力的掩护下,由破口河滩实施强渡。河防部队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河面,袭击日军侧后,经 5 小时战斗,迫使日军分路向东撤退。此次战斗,毙敌百余人,俘虏 2 人,缴枪 6 支。

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 年 12 月初,日军集结 4000 兵力,附炮 20 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12 日,日军占领李家垣后,加强对河西阵地的炮击,企图强

渡黄河。河东游击侦察部队在河防司令部的指挥下,在日军进犯李家垣时即在李家垣以南山地阻击日军,之后又在军(渡)离(石)公路上打击日军。日军在侧后不断受到袭击,不得不于16日向东撤至柳林,河防部队乘机收复军渡、李家垣。此次战斗,歼敌20余人。

四、最后一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42年3月,日军又调兵“扫荡”黄河沿岸,骚扰河防阵地。据日军强行渡河的情报,河防司令部立即下达紧急动员令,要求部队于16日凌晨2时早餐,3时进入阵地,做好一切迎战的准备工作。

天色微明时,轰隆一声巨响,日军向河防阵地开炮。第一发炮弹落在河防部队阵地后的营房附近,房屋被震塌。紧接着,30门大炮一齐向河防阵地猛烈轰击,黄河西岸顿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炮弹碎片和碎石厚厚地盖满了地面。与此同时,日军还发射了一批批的催泪弹和毒气弹,致使河防部队指战员有的打喷嚏,有的流眼泪,有的昏倒在地。但英勇的河防战士并没有被吓倒和退缩,他们用湿毛巾捂着嘴和鼻孔,仍在暗堡和坑道里不断向日军射击。

天快晌午时分,日军的炮击停止了。他们隔岸观察到河防部队阵地一片沉寂,不见人影,以为河防阵地已被夷平,再也无力还击了,于是有近300名日军突然出现在河东岸的山顶上,河防部队立即组织火力,猛烈地向日军还击。日军猝不及防,死伤累累,急忙收兵进入阵地,又向河防阵地发射大量糜烂性的毒瓦斯炮弹,致使不少河防军

民中毒负伤,但大多伤员仍不下火线,继续坚守阵地。

这天夜里,日军停止了炮击,但翌日黎明时分又用大炮和机关枪向河西轰击,不过火力已明显减弱。由于他们意识到河防阵地是难以攻破的,而武装泅渡成功的可能性更小,所以进攻的狂热逐渐低落下来,但又不甘心中途退师,实际上是处于进退维谷、举棋不定的状态中。机智的河防指挥员抓住这个有利的战机,从绥德义合镇调总部炮兵团进入宋家川河防炮兵阵地,准备痛击日军。4月4日黎明,当日军炮兵刚一露头,正准备向西岸射击时,河防炮兵先发制人,一发发震天动地的炮弹,准确地落在日军的炮群中,打得日军昏头转向。日军在指挥官的督促下,虽也忙乱地向河防阵地开炮,但在强大的河防部队炮火攻击下,失去了招架之力,连大炮也顾不上拖走即狼狈撤退。经这次激烈的河防保卫战,破灭了日军渡河的最后企图。

日军在侵袭河防期间,不断派飞机对河防周边的城镇实施狂轰滥炸。1938年9月至1939年10月,日军先后5次65架飞机轰炸榆林城,百姓伤亡惨重,许多民房毁坏。对府谷县城实施空袭109次,投掷炸弹数百枚,炸死炸伤174人,炸毁民房1300余间。1939年日军近90架飞机三次轰炸神木城,造成数十人伤亡,百多间房屋毁坏。清涧、米脂、佳县等县城均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抗战期间,榆林人民经受了激烈的战火考验,付出了房屋被毁及人员伤亡、中毒的沉重代价,但最终粉碎了日军进犯大西北的野心,赢得了保卫河防战斗的辉煌胜利,保卫了陕甘宁边区这块抗日总后方和策源地。

第十章

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第一节 政治建设

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领导陕甘宁地下工作的西北工委与由陕甘宁边区党委改组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5月1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高岗任书记。绥德、神府、三边的党组织改由西北局领导。在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的领导下,经过几年艰苦的奋斗,这三个地方的党组织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1年1月,根据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指示,中共绥德特委改称中共绥德地方委员会,成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地委组织。绥德特委领导的各县级组织,改由中共绥德地委领导。工作部门除军事部取消外,其他均未变动。张秀山任地委书记。地委成立之前,1940年3月撤销了中共河防县委。地委成立之后,1942年8月设立中共西川县委,12月,更名中共绥西县委。为了纪念中共陕西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子洲,1944年1月,中共绥西县委改为中共子洲县委。至此,中共绥德地委辖绥德、米

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等6个县委,共有党员10109名,支部397个。其中清涧县有党员1993名,吴堡县有党员1028名,佳县有党员1376名(占全县总人口1.3%)。

1943年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中共三边分委改称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机关驻地仍在定边县城杨铜匠院内,地委与定边县委分开办公。至抗战胜利,王世泰、贺晋年、高峰先后任地委书记,高峰、惠中权先后任地委副书记。辖定边、靖边、吴旗、盐池4个县委,靖边县委辖8个区委、48个乡党支部,共有党员1500名。定边县辖8个区委,全县共有城乡党支部53个,党员809名(占全县总人口1.5%)。

1940年6月,日军展开夏季扫荡,晋西北环境恶化,八路军一二〇师和晋绥边区党政机关及其附属机构,都撤至神府根据地的贺家川一带。由于中共神府分委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领导,有很多问题难以处理。为了便于领导,更好地发挥神府根据地作为晋绥抗日后方基地的作用,1941年9月,中共晋西北区委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协商,经中共中央同意,将神府分委委托给中共晋西北区委代管。1942年8月,晋西北区委撤销,中共晋绥分局成立,神府分委归晋绥分局领导。1943年7月,中共晋绥一分区委员会建立后,神府分委又归该区委领导。1944年8月,晋绥一分区委员会撤销,分委归晋绥分局代管。神府分委下设5个工作部门,直辖神府县8个区委、一个乡支部(贺家川)和国统区3个区委。机关先后驻贺家川、温家川。1945年2月,神府分委改称神府县委。县委隶属中共晋绥一分区委领导,辖6个区委。县委书记刘北垣,机关驻地贺

“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步步引咱走正路。”“满洼高粱哪个高，人里头挑人数谁好？思量又思量，比较又比较，把那好人名字上选票。”

这一时期榆林境内建立的分区级政权组织有绥德和三边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0年2月底，国民党陕西省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何绍南逃离绥德。同时，吴堡县人民赶走了国民党县长杨玉峰，清涧县群众赶跑了国民党县长李鹏飞、县党部指导员王宏达。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置绥德分区，在边区政府工作团的协助下，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任专员。专署驻地绥德城内九贞观。同时，绥德分区召开了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抗日各党派、各民众团体和地方驻军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各县政府也聘请部分参议员，共75名。其中有共产党员参议员17名，国民党员参议员9名，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张哲卿，米脂的李鼎铭、姬伯雄、杜瑞兰（女），清涧的师道成、惠仁齐，吴堡的樊一平、王国宏，佳县的任文林、杜嗣尧等开明绅士都在其列。

随着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成立，分区所属五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绥德县先将国民党县政府改组为县政务委员会，与专员公署同时成立。原县长杨瑞霆仍为新政府的县长。9月，绥德县政务委员会与绥德分区专员公署合署办公，改由副专员马豫章兼任绥德县长。1941年10月，绥德县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大会历时8天，全县206名县参议员出席了大会，选出县常驻议员10人，安文钦当选为议长。1942年3月，绥德县政府与专署分

设,并将所辖的13个区合并为10区一市。8月后,霍祝三任县政府县长。吴堡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3月成立后,辖6个区公所,张鹏图任县长,机关驻慕家塬,后迁至任家沟。1941年9月,吴堡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选出县参议员59名(其中中共党员12名,无党派人士21名),裴仰山当选为议长,王恩惠当选为县长。清涧县人民政府1940年3月19日成立,黄静波为县长,机关驻县城。9月,贺秉章任县长。1941年8月,清涧县举行第一届参议会,王金璋当选为议长,县、区、乡2260名参议员中,中共党员占四分之一。米脂县于1941年春,根据“三三制”建政原则,将国民党县政府三大科合并,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米脂县政务委员会,马继堂任主任,下辖7个区公所和一个市政府。同年10月,米脂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选出县常驻议员7人(其中共产党员3人,左派2人,国民党党员、中间派人士各一人),李鼎铭当选议长。1942年7月,政务委员会改称县务委员会,基本取代了国民党县政府。1943年12月,米脂人民驱逐了国民党县长高仲谦。1944年1月,米脂县人民政府成立,马继堂任县长。6月,米脂县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选出常驻议员7人,高愉庭当选为议长。佳县在1941年夏进行民众普选,成立了佳县参议会,选出县参议员18人,中共佳县县委书记赵锦锋当选为议长。1942年春,国民党县党部撤销,县长张冲逃走,旧政权彻底垮台。7月,佳县县务委员会成立。倪伟任主任,辖10个区公所,机关驻佳县县城。1944年1月,佳县人民政府成立,马义任县长,县务委员会撤销。

1942年9月,为了解决绥、米、清等县交界地区的行

政管理问题,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成立了西川办事处。马义任主任,辖8个区公所,机关驻双湖峪镇。12月,边区政府将西川办事处更名为绥西办事处。1943年3月,增辖石窟沟区。1944年1月,改称子洲县人民政府,谢怀德任县长。

三边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是1937年10月,在原定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的,与县政府合署办公。专员王子宜兼定边县长,机关驻定边城内旧衙门院内。辖盐池、靖横两个县和定边县9个区。11月,靖横县改称靖边县。1941年的“五一纲领”公布后,按照“三三制”的规定,靖边县和定边县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县参议会,更广泛地团结了各方面的抗日力量。1942年8月,吴旗县政府成立后,归三边专署领导。1943年1月,专署与定边县政府分设,罗成德任专员。

1937年7月成立的神府县抗日民主政府,后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辖。1941年7月、1942年9月、1945年1月,神府县先后召开了三届参议会,按照“三三制”的规定进行政权建设。为适应战争环境,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9月将神府县交由晋西北行署代管。1942年8月,晋西北行署撤销后,神府县政府归晋绥边区行署代管。

三、实行精兵简政

抗日战争开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一直采取“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从1937年至1940年,财政收入逐年增长,边区人民的负担较轻。但是1940年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每年60万元),

同时顽固派加紧对边区的进攻和经济封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出现了“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尖锐矛盾。边区脱产人员 1937 年仅有 1.4 万多人,到 1941 年剧增至 7.3 万多人,占边区人口总数的 5.37%,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公粮负担逐年加重。1937 年是 1.39 万石,人均负担 1 升。到 1941 年增至 20 万石,人均达 1.5 斗。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发行了 600 万元的救国公债,以弥补财政赤字。于是,在群众中便滋生了一些不满情绪。

1941 年 6 月 3 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电闪雷鸣,一位县长当场触电而亡。一个农民借此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怎不打死毛泽东!”此事发生后,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重视,下决心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9 月,毛泽东指示西北局宣传部组织考察团,从延安出发,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农民负担确实很重。在缴纳公粮和扣除籽种等以后,每人每天拥有的口粮仅有六七两。中央掌握了这些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将当年 20 万石公粮减少到 16 万石,并发动机关、部队开展节约运动。为了共度难关,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中共中央在发动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精兵简政”工作。

1941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克服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成为大会的重点议题之一。会上,边区参议员李鼎铭、姬伯雄等 11 人联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要求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对于政府,实行“简政主

义”，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对于公务员，规定供给条例，提倡节约、廉洁作风等。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这个提案非常赞赏。毛泽东把提案全文抄录在笔记本上，并且批注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接着找李鼎铭面谈，告诉他中共中央将把“精兵简政”作为一项新的政策，在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实行。不久，中央发出了有关指示，明确指出：“为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中央成立了整编委员会，首先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李鼎铭协助林伯渠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县、区、乡三级政权组织条例，为精简和整编工作奠定基础。

从1942年1月至1943年年底，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三次精简。通过整编基本上做到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要求。实现了政令统一，加强了集中领导，充实了基层，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行政经费，减轻了人民负担。

1942年夏，绥德分区、三边分区、神府分区分别开始精兵简政工作。

精兵方面，根据兵贵在精而不在多的原则，做到部队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2%的要求。1942年，吴堡县对自卫军进行整编。整编前为12616人，整编后为35个连，3088人。1944年春，定边县对全县自卫军组织普遍进行了一次整编，全县自卫军保留9个营、43个连、队员5115人，由于部队素质高，更加强了战斗力。简政方面，绥德专署根

据边区政府指示,整编了各级政府机构。将专署 5 个科合并为 2 个科,调动工作的有 601 人,占分区原有干部 1036 名的 58%,大部分转移岗位充实基层。分区、县、区的行政人员,由原来的 483 人,减至 356 人,减幅为 26%。吴堡县在简政后,县、区行政与教育部门的干部,由 90 人减为 68 人,还制订出改进工作的措施,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减下来的干部,或由专署重新分配,或外出学习,或调整到其他系统,或回乡生产。绝大部分干部都能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神木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聚英,回乡当了乡长,使基层工作起了很大变化。

“精兵简政”,作为党在抗战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为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四、干部培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大多数是工农兵出身,文盲比重大,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必要修养,有的只靠经验办事,虽有革命积极性,但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同时,一批由全国各地汇集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虽有爱国热忱,但残存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些问题不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因此,大量培训干部,就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一环。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当时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有业务、文化、政治、理论四种,其中以文化教育为主。根据干部的资历、年龄、文化程度,又分为初、中、高三级进行。初级为文盲或半文盲,中级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高级为

初中毕业程度。教材分等级,由边区教育厅选编。业务教育,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进行;政治教育,根据文化水平分别组织学习;理论教育,先从事具体调查,分别组织学习。

在中共中央、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分区、县普遍、系统地开展了干部培训工作。抗战开始后,陕西省党校改称陕甘宁边区党校,1940年3月15日,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在定边成立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学校,当时只设一个班,有40多名学生。1942年4月增设地方干部班,中共三边分委书记白治民兼任校长,有教员10多人,专门负责对三边分区干部的学习、教育工作。各分区、县还依照上级组织的指示精神,结合各地历史沿续的文化教育观念和文化基础的差别,分别制定出干部培训计划。绥德分区着重抓了干部的理论学习。三边分区着重抓了干部的文化学习,以消除文盲为主。神府分区在教育干部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神府党组织在党校举办了数期培训班,对象大多是中、青年干部,培训期为三个月。学习内容主要有《中国革命近代史》、《六中全会文件》、政治常识、党建常识,以及有关统一战线的文件等。县乡级干部的学习,由县上开办训练班,利用春、冬两季农闲时间,采用活动培训等形式分期进行。县级党政领导或抗敌后援会负责人担任主讲,要求通过培训教育每乡培养出一个乡长来。学习班结束后,选送一批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干部到延安去深造。

各地的干部培训工作以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为宗旨,坚持“学以致用”、“为用而学”的原则,应用教、学、

做三位一体，动与静交替使用，学习、生产、工作相互渗透的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学习文化知识，提高理论水平的政治热忱。他们以“钻、挤、恒”的勤奋精神，自觉消灭文盲，力争提高文化水平，进而掌握阅读和写作两套本领。

经过几年的在职干部培训工作，广大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不仅为绥德、三边、神府分区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还为陕甘宁边区输送了大批的干部人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解决了抗日时期干部紧缺的燃眉之急。

五、整风运动

1942年，榆林解放区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12月，当整风运动全面铺开时，中央开始审干工作。1943年4月，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作了《除奸保卫工作》报告，先后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绥德抗大分校和绥德师范作动员报告，并在边区政府大礼堂导演了“坦白大会”的闹剧，7月15日，康生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随之，边区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抢救”大会，开展“坦白检举大比赛”。各单位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日夜轮番进行“抢救”。一时形势咄咄逼人，是非难分，人人自危。于是，绥德分区、三边分区、神府县的正常整风运动也被引入歧途。

绥德分区的机关、学校和所属各县的整风运动，开始

都是正常的、健康的,使学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是当康生的指示传下来后,情况则完全变化了。中共吴堡县委是1942年5月13日召开专门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部署全县开展整顿“三风”的。规定每天不少于3小时的学习时间。学委会要求,始终以整风文件为中心,人人联系思想实际,撰写自传。讨论典型人物时,联系文件对号入座,以此达到教育党员和干部的目的。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还调集区级干部集中一个多月,每天5小时学习文件,联系思想实际,最后写出总结。到1942年底,整风运动在全县展开,发展健康。但是开展“抢救失足者”后,全县几十个教师中,只有十多个未被整成“特务”,农村竟然出现了十二三岁的“特务娃娃”。全县“坦白者”457人,不少人违心地承认自己参加过反动组织,形成许多冤案。绥德师范在“抢救”运动中,全校挖出230个“特务”。绥西办事处教育界绝大部分教师与504名学生,被误整成“复兴社”特务。米脂整出了所谓“复兴社”、“CC”、“暗杀队”、“美人队”、“皮袄队”等特务组织,许多人不明不白被投入冤狱。清涧县在整风中,逮捕68人。

1942年5月30日,神府县召开党政军民各系统干部扩大会议,决定从6月1日起到8月31日止,安排4个阶段整风。整风先是对整顿三风文件进行学习和讨论,并成立了整风学委会,加强对全县整风学习的领导。同时决定,抽调一批党政干部骨干,分赴各区、乡,具体指导整风文件的学习和贯彻。为了更好地领导神府地区的整风运动,中共神府分委和县政府率先行动,组织党、政、军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三个报告及中央有关文件,深刻领会精神实

质,边学习,边对照检查自己思想和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及存在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县上的整风带动了区、乡、基层干部,他们也普遍认真地开展了整风文件的学习与宣传,使大家受到一次普遍的教育。1943年10月,晋绥分局一分委,在神府县一区杨家沟村召开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审干肃反动员大会。会后,中共神府分委当即集中干部集体学习讨论。此后,神府分区整风运动中的审干肃反,就被所谓的“抢救失足者”代替,使一些无辜的同志遭受诬陷和迫害,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被整。严重干扰了整个运动。

1943年5月27日,中共三边地委发出指示,全分区从6月1日至8月底开展整风运动。学校放假,机关半天办公。农村教师及区乡干部,都集中到县上参加整风。分区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并在定边城内举办干部学习班,集中学习有关整风的文件。三边的整风由于开始的比较迟,所以整风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全区集中了三四百名外来干部,在三边师范办整风集训班,大搞“车轮战”、“逼供信”。所有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无一幸免,140多人全被戴上“特务”、“叛徒”的帽子,有的受到逮捕审讯。

1943年8月,中央鉴于“抢救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恶果,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阐明毛泽东提出的9条审干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同时,尖锐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10月,毛泽东在批转绥德分区反奸大会材料时,又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

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至此,历时数月的“抢救运动”才先后刹车,边区的审干工作纳入了正轨。

1943年冬季,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各分区陆续开展了干部甄别工作。12月2日,当绥师在党员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这个决定时,不少人热泪盈眶,激动万分,该校接着采取“蛇蜕皮”的方法,对230名“特务”逐个甄别。对那些纯系捕风捉影的冤、假、错案,如“三民主义研究会”、“太阳社”、“月亮社”、“乌云社”、“十八大弟兄”等,都进行了平反。

绥德分区、三边分区、神府县的类似案件,也先后得到了甄别和平反。

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受到一次普遍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加强了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和西北局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经过整风,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使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还为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锻炼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第二节 经济建设

一、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榆林解放区的大部分地方,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进行了土地改革,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绥德分区的米脂、绥德、子洲、佳县的部分地方和三边的大部分地方都未分过土地。抗战开始后,在广大农村进行的土改工作

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过土改的地方,反对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保卫农民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广大农村开展减租减息。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交纳。一方面要规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仍属地主,地主依法有对自己土地出卖、出典、抵押及做其他处置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当地主作这些处置之时,必须照顾农民的生活。”“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区,其租额以减低原租额25%(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不论公地、私地、佃租地、伙种地,也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适用之。”关于债务与减息规定:“减息是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为适应债务人的要求,并为团结债权人一致抗日起见,而实行的一个必要政策,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

三边、绥米等一些未经过土改的地方,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以高得惊人的地租去租种地主的土地。当时租佃形式大致分为租种、伙种两大类,租种类有定租、包山租、活租三种形式;伙种类有伙种和安庄稼(安伙子)两种形式。其中活租的租额在靖边一带为10—20%,在绥米一带为40—50%,减租减息主要是在这些尚未分配土地的地区进行。

减租减息是关系到地主和农民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

之间直接利害关系的运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斗争。米脂县民丰区三乡许多地主感到减租不可避免,便想方设法对抗。他们或者将外村的地出卖,换买本村的近地,或者把地租改成伙种、活租、安庄稼,用改变租佃形式的办法,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他们还威胁佃户,如果透露实情,便要撤佃、换佃(就是来年抽地,不让对方继续耕种)。佃户们顾虑以后种不成地,在表面上说“按公示分”(按规定的四六分租),实际上是与地主对半分租,有的还将已分到家的粮食,又偷偷退还给地主。

榆林各地的减租减息,共经历了四个阶段。1937年至1939年,为宣传阶段。这个时期,各分区、县都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口号,并进行了宣传,但均未实施。1940年至1942年,为初步贯彻阶段。这一时期,各分区、县先后召开了参议会,提出和通过了减租减息条例或决议,减租减息由宣传变成了立法。但由于地主对减租不满,有的地方领导也存在着思想负担,怕减租减息,影响“三三制”政权建立,对地主只讲团结,不言斗争。这样,减租减息只能依靠政府发布命令,用行政的办法包办代替,没有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除米脂的印斗、子洲的双湖峪、绥德的沙滩坪少数地方搞得较好,大部分地区仍未减,还普遍发生了明减暗不减和地主收回土地,提高租额等问题。1943年至1944年,为全面贯彻阶段。各级党政组织根据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克服迁就地主、放松减租的思想,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减租减息。各级干部向广大佃农做工作,确实保证减租以后仍然有地可种,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发动他们向地主索要多交的地租。首先组织群众清算从1939年至1942年以

来,未执行减租而多交了租额的账目,确定应退的租额,由地主将多收的部分如数退还给佃户。最后,由租佃双方进行换约,实行保佃。农民从中得到了实惠,又保障了佃权。米脂县民丰区在三年中,农民多交 226.87 石租子,减租后,地主退出 146 石。

在减租的幅度上,各分区、县根据中央的政策,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实际贯彻减租政策时,各地的减租幅度有所不同。绥德分区规定若遇丰年,减少 25%,平年减少 40%,歉年减少 55%。定边县 1943 年进行了一次推减,原为二八租减为一九五租,原为一九五租减为一九租,一九租未减。米脂县二五减租,改为四六减租,后来又改为二八减租。

绥德分区的许多开明绅士、地主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热烈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动向农民减租、退租。米脂县杨家沟地主马醒民、马光九和桃镇的李凤雄(李鼎铭之弟)等,平时对政府的政策法令积极拥护,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带头减租、退租。边区参议员李健候(小说《永昌演义》作者),在减租清查中,查出他名下的伙子尚未实行减租。经调查,原来他的 300 垧地,历来一切租佃手续委托亲属管理,李健候并不知情。对此,他并不推卸责任,立即命退回多收部分,并向伙子们保证,减租后决不改变租佃关系。

1943 年 9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土地登记试行办法》。10 月,中共中央总结了一年多的减租减息工作,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边区的减租斗争形成高潮。各地党政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租户会、减租会和减租保地会等群

众组织,推动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10月至12月,绥德6个区、米脂3个区、子洲5个区、清涧三个半区和佳县个别村,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31732.82石,退租1842.7石,并在抽约、换约的同时,进行土地回赎,广大农民以廉价把典给地主的土地抽回,无不扬眉吐气,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绥德县义合、田庄、辛店等区的减租会上,农民按照减租条例及补充办法,追回了多交的租子,揭发和制止了地主因减租而假典、转租的行为,使减租减息运动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行。

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各级政府还注重坚持了交租交息。绥德义合、米脂印斗等区乡政府,带上佃户驮着租子给地主送到家里,防止过“左”行为的发生,使地主也能够生活,发展和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

1945年至1946年,为深入查减阶段。通过查减务必彻底做到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务必使佃权得到切实保证。

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绥德郝家村农民刘永山,全家4口人,自有山地5垧,租种地主土地23晌,1943年共收粮12.9石,如不减租,他至少出租子4.99石,占租地产量的一半以上,减租后他交租3.44石,除去全家人的吃饭和消费,变成有1.46石的余粮户。减租减息提高了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1943年在保卫河防动员时,佳县的群众自动起来协助政府调查户口,贮藏公粮。绥德郝家桥农民郝进理在减租保佃后说:“去年咱租种5垧地,减了租,地也保住了,种庄稼也有劲了。”减租减息照顾了地主利益,坚持了抗日统一战线。各级党政组织坚持政策,

办事公道,使不少地主认识到,减租后租子虽然少了,但收租有保障,他们主动提出按政府法令减租减息,有的当众烧毁了多年的陈账,一些逃离的地主也纷纷返回家乡。有的开明绅士还被选进各级参议会,参加政府的工作,为支持抗战做了一定贡献。

减租减息促使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减租减息后农民的收入增加了,而地价却随地租下降而下跌,农民就有条件抽回或赎回部分典地、押地,买地的农民增多了,卖地的地主也增加了。绥德杨家塔 13 户地主,在减租后卖出土地 629 垧。米脂印斗区三乡 41 户农民中,原来租地种的有 38 户,自己只有土地 40 垧。减租后两年买入土地 180 垧,人均增地 4.5 倍。这说明农民的土地增加,地主的土地减少,土地所有权由集中走向分散。减租减息削弱了地主经济,促使其改变经营方式,并向资本主义转化。一些地主认为搞其他经营比收地租好,所以绥德、米脂等县的一部分地主典卖土地,有的转向“富农经营方式”,有的投资工商业和合作事业。米脂银城市(米脂城)有 6 户地主,共有 200 多垧地,1942 年至 1943 年典卖出 156 垧。6 户地主中两户投资工业,3 户投资商业,一户投资合作事业。1943 年后,绥德分区地主把全部土地的 50—80% 卖给农民,将资金转向其它经营。减租减息使农村土地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阶级结构也发生两头缩小中间壮大的变化。多数雇农、贫农上升为中农,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而地主和旧式富农削弱了。

二、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39 年 1 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

一届参政会上发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此后，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发出一系列的决定和指示，确定边区的经济建设以发展农业生产为首要任务。一场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全面展开。

榆林解放区所属的各分区、县，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以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开辟塞上好江南，创造“南泥湾精神”为光辉榜样，全力掀起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热潮。同时，积极发展畜牧、手工业、纺织、商业贸易等行业，搞活商品流通，繁荣市场贸易，促进经济发展。

绥德分区所属 6 县人多地少，人民群众生活困难。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后，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刘玉厚带领郝家桥村民，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精耕细作、改善土地条件、选择优良品种提高单产等办法，使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习仲勋帮助刘玉厚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在全分区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同时，分区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安排，一方面有计划地组织各县困难群众向地广人稀的外地移民，3 年共移民 1.3 万户、3.3 万人。这些移民到新居后，开垦荒地 5 万多亩，他们男耕女织，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制定了许多扶持农业的政策，采用发放农业贷款，鼓励大种棉麻，兴修水利，选育与推广优良品种等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号召分区各县的机关干部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每年要向政府交一定的粮食。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的干部都纷纷行动起来，斗志昂扬的投身到开垦荒地，种粮种棉的大生产运动中。

1945年,绥德分区各机关种地达1896亩。

绥德分区的家属手工纺织业随着种棉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也应运而生,蓬勃兴起。纺纱量和织布数,最高时分别占到全陕甘宁边区的57%和63%。1941年,仅绥德、清涧、吴堡3县就拥有纺车3.5万多架,布机7000余架,参加纺纱的有4万多人,上起花甲老人,下至7岁幼童大都会纺纱,一年纺纱32.5万公斤。参加织布的有7000多人,年织布4万多匹。1942年,吴堡县基本上是“家家有纺妇,户户有织机”。1943年,子洲县组织变工组941个,有5446个劳力参加,产粮274713.5石。农业生产和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很快解决了分区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绥德分区在搞好生产建设的同时,还组织各界人士到延安参观学习。1941年8月,绥德、米脂学生参观团赴延安参观,毛泽东在边区政府接见了参观团,并亲切询问绥德、米脂的情况及民众呼声。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干好,希望把这个意思转告绥德、米脂父老姊妹们,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帮助和改进当地工作。代表团将题有“你是我们党的光辉旗帜”的锦旗献给毛泽东。参观团回来后广泛宣传在延安的见闻,对分区的大生产运动起到了鼓舞和促进作用。

三边分区土地广阔,资源丰富,有著名的食盐、皮毛、甘草三宝。但是由于三边“早上冷,上午晒,下午刮风惹大怪”,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虽广,却严重缺水,农业增收完全要靠天。为了搞好大生产运动,三边分区领导除了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合理种植,还重点引导人民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1941年,靖边县杨桥畔群众在当地驻军的帮助

下,整修水地 2000 亩,被毛泽东誉为“水利乡”。1943 年 4 月,《解放日报》报道了中共靖边县委书记、县长带领群众引洪漫地 2 万亩,生产粮食 1200 石的消息。1945 年,三边分区各机关人员种地 6235 亩。

食盐,是三边乃至陕甘宁边区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抗日战争开始前三年,我国各大盐区相继沦入敌手,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边区人民用盐发生了极大困难。早在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民经济部就向边区军民发出“大家到盐池去驮盐”的通知。此后,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大力开展三边的食盐生产和贸易,调剂边区出入口平衡,增加政府财政收入。1940 年秋,三五九旅第四支队 2000 多名指战员,为了保卫三边,开展生产自救,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奉命来到定边县盐场堡一带驻防和进行盐业生产。1938 年以前,苟池有盐田 461 块,只有盩泥、莲花、敦包、湾湾、娃娃、旱滩等少数盐池。四支队来到定边后,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战士们自己动手,挥舞铁铤老镢,在靠盐湖畔的边墙上开挖了 100 多孔土窑洞。接着就开始砍柴压盐坝,控行道,平盐坨,和当地群众一起,先后在苟池筑起盐田 282 块,花马池筑起盐田 801 块。到 1943 年,盐田总数发展到 2834 块,约有 4000 亩之多。同时政府采取了“官收官卖、民运民销”、“民产官督,自由买卖”等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盐的产量质量很快提高。

盐产出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运输问题。当时三边乃至陕甘宁边区的交通十分落后,食盐的运输主要靠牲口驮运,而所经路途多为山大沟深,道路崎岖难行。为此,从

1941年起,边区政府决定,实行食盐督运政策,对有运输能力的群众实行义务运盐(公盐),有运输能力而不履行义务者,交纳“公盐代金”,用代金雇用牲口驮运。三边分区及所属县、区、乡自上而下,都成立了运输队,由各级领导兼任主任或队长。定边县这一年,集中了2839头畜力组成了运输队。在通往定边的大道小路上,到处都是车载驴驮的运盐队伍。每天人欢马叫,川流不息,铃声不绝,歌声悠扬,一片沸腾景象。

三边分区本来没有纺织基础,手工业也相对落后。大生产运动中,在三边分区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和扶助下,全分区建立各种手工作坊506家,从业人员1426人。这些作坊中,以毡坊、口袋坊、皮坊、油坊居多。

时属晋绥分局管辖的神府地区,在大生产运动中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为了解决群众、部队、机关干部的穿衣、被服问题,晋绥边区驻神木各机关与神府县建设科一起,深入农村,指导群众多种棉花,并免费供应籽种。举办培训班,教授群众纺纱、织布技术,同时将“三娘教子”式的旧织机,改为半机械化织机。1938年成立了纺织厂,贺龙亲自到工厂视察,给职工很大鼓舞。到1942年,农村织布机已达400多台,每年可织土布1000多匹,洋布100多匹,袜子100多打,毛巾50多打,纺纱500多斤,做到不但自足还有外销。

1942年,神府县政府作出决定,各级干部(除女干部不参加繁重劳动外)一律参加农业生产,每人种地2.5垧,体力较弱的也必须种1.5垧,保证各级干部一个半月的口粮和蔬菜全部自给。规定县、区政府的种棉数量,保证自

己年内的棉花需要量。之后,进一步提出具体要求:每人每年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生产5斗小米。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外,每人还配备纺车一架,工余时间纺纱、捻线、积肥,自上而下投入到大生产热潮之中。1944年,全县开荒6841垧,增产粮食3500多石;种植棉花上万亩。全县共有大小各类纺织厂30多处,有快机79架,土机237架,纺织妇女3576名。经过党政军民的共同奋斗,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粮食和经济作物自给有余,支援了抗日前线。

榆林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改善了广大军民的生活。到1944年,真正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耕三余一”,机关、部队、学校、城乡到处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民收入增加,负担减轻。1944年比1940年粮食产量增加25%,同期的农业税减少30%以上。绥德分区的景家沟,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阶层的负担,1942年比1934年分别减轻54%、58%、67%和83%,其中4个抗工属和8个雇农不负担。有的农民深有感触地说:“革命前后的生活,就像不是活在一个太阳底下!”

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榆林解放区的八路军驻军,响应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军队实行电田开荒,种粮种菜,背煤贩煤,养猪,增加收入。从1940年5月起,驻军的蔬菜达到完全自给。

在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榆林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抗战后期,基本上解决了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达到了丰衣足食。

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取得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成果,使榆林解放区党政军民从极端严重的经济困扰中

挣脱出来,度过了难关,保障了供给,支援了抗战。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使之成为代代相传,永放光芒的革命传家宝。

三、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抗战前,榆林的工业十分落后,少有厂矿。抗战时期,为了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经济,保障军民的生活供给,增强抗战实力,榆林解放区的党、政组织着手创建企业和发展工业。当时,由政府、八路军驻军创办的工矿企业及政府扶植创办的民营手工企业主要有:

神府难民纺织厂 1938年11月创办,有职工、学徒25人。设备有铁织机1架,木织机10架,铁纺机1架,手纺机40架、织袜机1架。1939年6月,神府开办了1所纺织学校,招收学生20多名,培养了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

新塞毛织厂 1940年10月,三边专署创办。资金1300元,厂长王彩文。

靖边县毛织厂 1942年,靖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张家畔创办。有资金78万元(边币),设备有推毛机、纺线机、织布机10多架,主要生产毛和子布供解放区军民穿用。

神府纺织厂 1942年,神府县政府在陈家坪村开办。1943年,万镇、花石崖、马镇等地办起6处私营小型纺织厂。

第一、第二纺织厂 1940年,三五九旅在绥德砭上创办第一纺织厂,主要织布;在龙湾创办第二纺织厂,主要织毛。两厂共有织布铁机4架,木机60架,织毛机21架,织

毯机4架,工人200人。一厂每月出宽布800匹、小布500匹,二厂每月出小布300匹、军毯50条。

织袜厂 七一八团在米脂创办,有织机4架,每台每日产袜2打。

八一工厂 1944年,警备第三旅九团在靖边创办。下设织布、制鞋、制毡、编油篓4个车间,有职工253人,产品主要供军队需要。

大成丰丝铺 三五九旅在清涧创办。有工人10多名,主要生产湖绉、手帕、手巾。

徐家沟煤矿 1941年3月,三五八旅与当地政府合建。1942年投产,有职工240名。

洞则沟煤矿 1943年,七一五团在子洲县筹建,军民共管,按股分红。有职工30多人,日产煤10吨。

万合毛织厂 1942年,由姬伯雄在米脂创办的私营企业。设备有手拉毛织机2架,织棉布机2架,栽绒毯机2架。投入资金6万元,从业人员20多名。年产毛料布300丈,土棉布1400丈,2×4栽绒毯18块。1943年边区政府投资20万元入股,同时吸收私人股金26万元,成为公私联办厂,产量比上年提高了8倍。1944年,边区政府又投资15万元,100石小米,5000公斤羊毛,群众入股50石小米,人员增加到40人,生产进一步发展。

民生纸厂 1939年,米脂绅士艾斌卿创办,以4000元法币为资金,雇佣4名工人。1942年边区政府投放贷款10万元、小米30石,同时吸收私人股份扩大生产经营。有工人60多人,日产纸4000多张。

白家沟织绸厂 1940年,由三四家私人投资合办。有2

架小织机,2个工人、3个学徒,主要织绸子和箩底。

另外,清涧县有丝绸作坊10多家,织绸机30多架,织帕机5架,年产丝绸6570匹(5丈为1匹),手帕1825打,毛巾1800打。

在创建企业和发展工业、手工业的同时,各级政府和驻军还重视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三边分区和三五九旅第四支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盐业生产运动。子洲县充分利用马路沟十里盐湾、阳孤、三川口、盐淋圪堵盐滩发展盐业生产,三五九旅投资5.4万元在子洲三皇岭打盐井10口,有工人近百人,年产盐1380担。

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各地实现工业品半自给和全自给创造了条件,为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开展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四、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商业是促进商品流通,搞活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和支持长久抗战的重要经济活动。根据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决议关于“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以利商业发展”、“发展交通运输,改善公路便道,发展合作事业,繁荣市场”的精神,榆林解放区极力恢复、扶植和发展商业,使榆林经济建设出现了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新局面。

1938年,米脂县的共产党员李增仁联合两人创办桃花岭抗属商店。1941年,商店迁入县城东街设铺。1943年公私合营,用公方资金办起民生商店,用私人股金在桃镇成立民办消费合作社。不久,高庙山、印斗、沙家店等地相继开办合作社。主要经营土布、市布、棉花、火柴、食盐等

日常用品和生产用品。在清涧县,1938年店则沟组建了民众合作社,经营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品。1940年县政府兴办了新华商店和新华客栈。县城内有私人商号8家,个体工商户49家。特别是刘世荣开办的清华饭馆,以一碗“国共合作肉”(一种蒸碗肉,由半边红条肉和半边白条肉组成)驰名边区。1940年,吴堡县岔镇、李家沟、辛家沟、任家沟商业日兴,先后办起了供销合作社和供销商店。横山全县有经销杂货的合资商号33家,经销药材的独资商号2家,从事饮食的独资商号16家,经营五金独资商号两家。今子洲县境内,1940年在姜崖村开办了驼耳巷群众合作社。1942年,县上成立区联社,在县城设立门市部。1944年,县供销合作社成立。同时,周家峪、老君殿等地成立合作社,由群众入股民办公助。主要经营粗布、锅、瓷、火柴、箩底、麻纸、毛口袋、搭毯等,代农民销售农副产品,组织土特产品出口,组织运输和妇女纺纱。1942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和工业局在绥德成立了永昌土布产销有限公司,帮助群众解决资金困难,供给原料,推销产品。绥德分区和各县也积极引导和发展集市贸易,恢复和发展了农村集市,蝎镇、石岔、桃镇、龙镇、枣林镇、辛家沟、定仙娥、吉镇等地都建立了农村集市。1944年绥德县的私营商店就有184家,比1942年增加了73家。

1939年,靖边县对全县的消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合并。1942年,消费合作社改为民办合作社,动员群众入股投资。1943年,新城区参议员田宝霖吸收241户群众入股办社,入股资金74.04万元(边币)。合作社组织了运输队贩运食盐和土布,半年赢利89.9万元。开办油坊不到两

年,赢利 232.9 万元。在田宝霖的带动下,1943 年底全县合作社发展到 24 个,附设骡马店 7 处、运输队两个、油坊 11 处、木匠铺、药铺各 1 个,全年推销农副产品总额 100.9 万元。

1938 年,神府县政府在贺家川创办自立成合作商店。1941 年,将二、四、五区联办的二四五军民合作社改组为贺家川民众合作社。1942 年,随着生产自救的需要,马镇、盘塘等大村镇先后办起纺织、运输合作社。合作社使商业的经营范围和业务活动突破经商界限,扩展为纺织加工、粮油运输、医药卫生、代办邮政多种经营。

五、开展劳动英雄运动

抗战时期,横山籍的吴满有、杨步浩,清涧籍的郝树才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做出了显著成绩,成为劳动英雄。毛泽东称赞这些劳动英雄们,起到了“模范、带头、桥梁”作用。

在开展吴满有等劳动英雄运动中,绥德分区、三边分区、神府地区积极开展比、学、赶的劳动竞赛活动。广大农民群众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大胆解除思想顾虑,向劳动英雄学习,向劳动英雄看齐,努力扩大生产,积极劳动致富,又涌现出许多的劳动英雄。同时,在英雄之间、村庄之间、机关之间、军队之间、军民之间、各县之间,迅速掀起一个生产大竞赛热潮和互助合作运动。

1943 年 1 月 14 日,三边专署专员罗成德、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清涧县长黄静波,在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被推举为英雄,受到中共中央的奖励。毛泽东为罗成德亲笔题词“不怕困难”;为惠中权题词“实事求是”。

是,不尚空谈”;为黄静波题词“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绥德分区、三边分区和各县都分别召开大会,表彰奖励分区、县涌现出的劳动英雄。在这次运动中,绥德县的王家坪、郝家桥等一大批村庄,变工、扎工组织得好,粮食打得多,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头,成为模范村。刘玉厚、郝玉亮成了人人皆知的劳动模范。1943年4月9日,米脂县召开各界群众3000多人参加的奖励劳动英雄大会,刘威信、郭风英、常锦花等劳动英雄受到奖励。

定边县生产搞得最好,全县机关人员480人,种地7965亩,人均15.9亩,产细粮1143石,每人平均2.36石;产棉花1730.5公斤,每人平均3.5公斤多;产菜9.38万公斤,平均每人195公斤;糜谷麦草13.11万公斤,可供县级机关80头牲口吃两年。

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与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同时在延安开幕。三边、绥德分区各县分别推选贺宝元、高仲和、刘占海、王科、李文焕、崔岳瑞、张杰、马生骏、白玉堂、傅其华、李全时、郭秉人等23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了这次大会。29日,英雄们在杨家岭中央礼堂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聆听了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的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会议期间,三边分区将题有“西北人民的灯塔”,绥德分区将题有“西北人民的领袖”两面锦旗,献给毛泽东。

时属晋绥分局领导的神府县的劳动竞赛,也搞得有声有色。1943年晋绥边区举行了一次群英会,政府分别给群英奖励了黄牛、绵羊、生产工具和武器等。群众赞扬他们道:“大黄牛,黄油油,两对牙,四岁口。政府奖给咱,生产更

加油。”同年，神府二区涌现出了“开荒地雷”（劳动英雄）白仓子，他一年掏石板地9亩多，方圆数十里闻名。他还带动全村群众，同心协力，增产支前。第二年，涌现出更多的劳动英雄（由26人增加到125人），他们是通过全县人民无记名投票推选出来的，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戴。尤其难得的是，原来不齿于人的“二流子”，经过改造，重新做人，一些人还进入劳动英雄的行列。

劳动英雄运动的广泛开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纺织、除奸、民兵、拥军、水手、支前等行业迅即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米脂县二乡纺织英雄常锦花，每天能纺0.35公斤毛线，4个多月纺线37.5公斤。

开展劳动英雄运动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现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发展农业，繁荣经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六、开展妇女运动

由于地理区域的原因，陕北的广大妇女长期处于封建习俗的压抑之下。榆林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首先从政治上解放妇女，动员他们参政。那些从前足不出户，成天围着“三台”转，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们，扬眉吐气，走出家门，参选参政，享受到同男子一样的民主平等权利。在民主政府选举过程中，妇女参加的比例在70%以上。各级参政人员中，妇女比例占到8%以上，县级参议会中的比例达到32%。她们当中，有的原来是童养媳，有的是抱着孩子开会的“母亲议员”。

妇女不仅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而且取得受教育的权

利。过去穷苦人家的妇女(包括干部),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文盲。1938年至1939年之间,三边、神府分区在农村举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培训在职妇女干部。各地还兴办了许多冬学及各种类型的文化学校,组织妇女识字学文化。在扫盲的基础上,还给他们讲授妇幼卫生知识,使广大妇女提高了文化科学知识水平。

与此同时,广大妇女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投入大生产运动的洪流之中。原籍米脂的马杏儿,随父在延安定居,辛勤劳动,成绩突出,被评为劳动女英雄,成为边区推动妇女运动的一面旗帜。定边等县,涌现出许多妇女开荒变工班子。她们互相挑战、应战,有的人每天可开荒0.5亩,有的还向男子挑战。

妇女是纺织运动的主力军。从1938年到1945年7年中,榆林解放区的妇女大部分参加了纺织运动,出现了许多纺织能手和纺织英雄。为改善军民的穿着条件,为坚持抗战立下了功劳。

青年妇女抛弃旧观念,参加普通自卫军,扛起红缨枪,为保卫边区进行刻苦训练。吴堡县的自卫军中,女队员占到25%,她们生产训练两不误,站岗、放哨、锄奸、救护伤病员,帮助部队抢修工事,参加物资运输等,有力地支援了正规军。

为保证前方将士英勇杀敌,搞好支前慰劳工作,许多村庄的妇女们自动组织起看护队、缝衣队、洗衣队,积极完成各项战勤工作任务。1940年,三边妇女做鞋袜5.34万双,洗衣服1.2万多套,慰劳部队蔬菜10.5万公斤。为了保证部队按时换装,妇女们还为军队做了大量军装。1941

年,佳县四区界牌乡 120 多名妇女,给驻军缝制棉衣 100 多套,有的一个人就完成 4 件。神府县贺家川妇教会组织洗衣队,在一周内就为驻军医院伤病员洗衣 1000 多套,做鞋千双。米脂县女劳动英雄郭风英,一次为前方将士做了 18 双军鞋。群众赞扬说:“婆姨家,郭风英,比个男子还能行。”尤其突出的是神木县沙峁乡王家圪的王补梅大娘,三年多如一日,爱兵如子无私奉献,被誉为“人民军队的好妈妈”。她宁肯自己和孩子挨饿受苦,也要把节省下的细粮、鸡蛋、肉食等送给八路军伤病员。她给重伤员喂水喂饭,无微不至地关怀,经她亲手护理和掩护的伤病员,就有二三十人。她把两个儿子送到部队,保家卫国。她的动人事迹在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一带广泛流传。

七、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1943 年春节前后,绥德分区、三边分区和神府县的党、政、民、学和军队,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的《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拥军公约》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发布的《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拥政爱民公约》,开展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双拥”运动。各级政府,都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部队派代表参加,认真开展自我批评,并提出改正措施。在群众中举行各种座谈会、拥军大会、军民同乐晚会等,进行普遍深入的拥军教育,启发群众爱护军队的自觉性和真挚感情。在拥军运动月中,各个乡政府和各机关学校,都募集了许多慰问品,并且推举代表或组织慰问团、秧歌队等,热忱地慰问驻军、抗属、医院、休养所和退伍荣誉军人。

1943年春节,吴堡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宣传动员群众组织了秧歌队,召开拥军大会,给部队拜年。集中动用了340多头毛驴为部队驮炭,200多头驴送军粮、运送军需品、转移工厂、转移伤病员,动员了648名民工自带干粮抢修河防工事。1944年春节,慰问部队边币1.5万元,猪肉148公斤,羊肉40公斤,还有米馍、粉条、小米、小麦、白面、挂面、豆腐、干果、蔬菜等。同时,给抗大做军鞋500双。

1943年春节,神府县各级政府带了许多细粮、酒肉等食品以及790双军鞋,到后方医院慰问伤病员。1944年慰问部队时,带去猪、羊肉1500多公斤,麦子14石多,边币5.9万元。

拥军工作还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绥德县开明绅士霍子乐,将两个儿子送给八路军参加抗战,在募捐寒衣代金中,带头捐献银洋2000元,名列全县之首。1938年,河防吃紧,部队供给困难,他与另一位绅士安文钦带头捐献抗日经费,每人各捐500元银洋。在他们的带动下,绥德警备区人民共捐银元2万元。安文钦在购买救国公债时,尽其所有购买了大量债券,此事被绥德群众誉为“安文钦买公债——尽力而为”,此赞语至今在绥、米一带流传。靖边县参议会副议长白文焕积极拥军,赠送八路军大树23株,解决了军队缺少木材的困难。为了抗日,他自愿多出救国公粮2石多。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晋绥机关和部队一到神府,就把开展爱民运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各机关制定了“爱民公约”,并建立了一系列爱民小组:医务小组经常深入农村为群众治病,教育小组深入家庭和夜校扫盲;

文艺小组帮助群众开展文艺活动,生产小组帮助群众解决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

抗战时期,榆林解放区的八路军有可靠安定的后方,有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援,军民团结,众志成城,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解放区的“双拥”运动加强了党政军民大团结,在当时对敌斗争和边区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逐渐发展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第三节 文化 建设

一、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接着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到农村去,到部队去”的口号,纷纷深入基层,实践党的文艺政策,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作家们写出许多反映解放区人民艰苦奋斗、同仇敌忾和追求团结进步的优秀文学作品。1943年春,吴堡籍作家柳青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坳乡政府任文书,深入生活,参加如火如荼的斗争,写出生活气息很浓的小说《土地的儿子》、《地雷》等。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女英雄》,介绍燕家坨台劳动模范郭风英的事迹。柳青在这里工作了3年,写出长篇小说《种谷记》。诗人李季也在同一时期,到时分区的盐池县担任政务秘书。他酷爱陕北民歌,1944年以

信天游的形式发表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震动了当时的诗坛，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郭沫若称它为“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女作家丁玲，采访了靖边县第一个民办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事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篇特写《田保霖》，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还有许多作家深入生活，勤奋笔耕，写出大量的小说、散文、特写等，充分发挥了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

座谈会以后，《讲话》的精神犹如春风吹遍了整个解放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率先走上街头演出，带动了边区各县的文艺活动。1943年春节，榆林解放区出现的新秧歌运动，几乎遍及每一个乡镇。平均1500人当中就有一个秧歌队，还有许多自乐班、皮影戏等。春节后在延安举行的会演中，三边分区杜芝栋的陕北说书《破除迷信》、子洲县拓开科的练子嘴《闹宫》、民间艺人李卜的《张连卖布》等获得好评。在新秧歌的带动下，陕北民歌、诗歌、新说书、快板、剪纸等民间艺术之花竞相怒放。原籍横山县的民间艺人韩起祥，带头组织了“陕北说书组”，自编自演了《刘巧团圆》、《四羞捎书》、《反巫神》等许多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新说书，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同时，绥德县的石维俊、三边的冯明山，也编了一些新说书。他们走村串户，宣传边区的民主生活，提倡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尤其是韩起祥的说唱新书，不仅活跃了农村的群众文化生活，也为普及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这一时期，陕北民歌发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抗战起到了极有力的战斗号角作用。流传清润的《五月赞》、佳

县的《红旗》、绥德的《何绍南大赃官》、《三十里铺》等,反映了榆林解放区人民抗日军、保河防、破封锁、反摩擦的斗争。流传三边的《走三边》、横山的《毛主席号召学英雄》等,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英模运动的火热场面。其中闻名世界的《东方红》,是佳县“人民歌手”李有源,从内心深处吼出来的一首歌。早在1936年红军东征途经佳县和八路军驻绥德警备区部队进驻佳县时期,李有源就编了不少热情歌颂共产党和红军,痛斥国民党的歌。1942年冬,他终于编出了一首以民歌“骑白马”为曲调的《东方红》歌曲: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1943年春节,他们村的秧歌队进城演出。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是个拿头,第一个唱出了《东方红》,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好评。从此,《东方红》首先在佳县附近广大农村流传开来。1944年春,附近村子里有许多人移居延安。李增正担任移民队长,沿途经米脂、绥德、清涧、子长等县,李增正到处传唱,一直唱到延安。后来,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加工整理,就形成了现在的《东方红》。抗战时期,李有源还编了《捉特务》、《种棉花》、《小女孩放哨》等小剧目和民歌《边区办的呱呱叫》,受到佳县城乡群众的欢迎。

当时绥德分区领导的民众剧团(后改为绥德分区文工团)除了演出歌剧和秦腔外,还向群众征询对戏剧内容和演出工作的意见,并帮助群众排演秧歌、教唱歌曲、书

写标语等,受到热烈欢迎。剧团还把当地劳动英雄的事迹编成剧演出,教育更多的群众掀起大生产热潮。由于文艺节目的内容与生活和战斗息息相关,四十里铺的群众说新秧歌是“斗争秧歌”。

卢沟桥事变后,定边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业余剧团,即七七剧团。1940年,由政府领导正式成立七七剧团,1942年改为三边文工团。1944年,驻定边的警备第三旅宣传队改为边保剧团。七七剧团成立初,主要演一些小型秧歌剧、活报剧、小舞蹈等,后来在延安民众剧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联政宣传队的指导帮助下,主要以演出大型现代剧为主。他们和边保剧团合演的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一时轰动三边。

神府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前方”,人民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抗日救亡歌曲在群众中久唱不衰。最流行的是《歌唱陕北好地方》。神府基层,成立了一些不脱产的业余剧团。期间,神木成立七月剧团、大众剧团、文化剧团等。他们改造旧剧目,充实新内容,编演了《血泪仇》、《八大锤》、《反徐州》等剧,经常在根据地巡回演出。有时也把戏送到国统区,宣传抗日救亡工作。

延安的文艺团体经常深入绥德、三边分区、神府地区各县以及当时尚为国统区的榆林等地进行演出和采风。

1942年1月,延安鲁艺河防将士慰问团到米脂为驻军和群众演出新剧,慰问抗日将士和群众。1943年前后,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分区活动了3个多月,一边为群众演出,一边收集陕北民歌。从陕北各地收集了数千首民歌,并整理出版了选集,极大地提高了民歌的知名度。1943年

12月27日,中共西北局办公厅开会欢送剧团下乡。会后,鲁艺秧歌队来到绥德分区,青年剧团来到三边。他们在演出文艺节目的同时,帮助群众组织变工队,制定生产计划,深受群众欢迎。1944年1月27日,鲁艺工作团来米脂,演出话剧《兄妹开荒》、《拥军花鼓》、《二流子变英雄》、《血泪仇》等。是年12月,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到三边各县慰问演出了《穷人恨》、《中国魂》、《查路条》、《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剧目,受到三边人民的热烈欢迎。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鲁艺工作团田方、王大化、华君武、张水华、贺敬之、于兰、孟波、唐荣牧、张平、张鲁、马可等42人,由团长张庚率领来到子洲县闹秧歌、采风。张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以朱永山弟兄为原型编成戏剧《周子山》,公木写成诗歌《十里盐湾》。

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和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

1942年6月25日,边区政府第25次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调整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绥德师范、定边师范为培养地方国民教育师资的中等学校,米脂中学为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中级学校。同年3月3日,边区政府民政厅在《给各分区县市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信》中指出: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准与理论水准是今年干部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此绥德分区、三边分区为加强教育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排部署。

小学教育的发展。1943年3月19日,徐特立和柳提

联名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座谈会,绥德、三边分区的专员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边区教育应从实际出发,改变教育方式,依照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和需要编写教材。4月19日,边区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将大多数甚至全部小学交给地方群众办,做到每村有一个民办村学,在村学协助下办冬学、夜校、识字班,尽力扫除文盲。

在民办公助方针的指导下,在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基础上,绥德分区、三边分区和神府的民办小学发展很快,而且形式繁多,各具特色。最著名的有:米脂高家沟式。其特点是:群众自己办,自己管,自己教。学制、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完全按照群众需要而定,学生学到能写会算就毕业。教学时间分全日、半日两班,农忙放假,农闲上学,学校成为本村文化政治活动的中心。这种类型的民办村学,极受群众欢迎。在识字班的基础上办起的小学校,教育对象包括儿童和成年人。这种学校最大的特点是全体学生都不脱离生产,分早班、午班、夜班授课,教学内容根据群众需要确定,打破了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界限。

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后,各地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识字教育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读报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各种形式的识字教育发展很快。这种群众识字组的教学时间,随季节及生产忙闲而定。群众识字组主要有:(1)以生产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识字组。教学以不误生产为原则,采用子教母、夫教妻、民教民等办法,以绥德县王家桥等识字组为代表。(2)以小学生为教员的识字组。绥德小学生刘佩珍的识字组,米脂小学生刘安信的儿童团识字组等为代表。(3)家

庭识字组。(4)妇女识字组。(5)识字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学校。定边县民教馆办有7个职业补习学校,一面教识字,一面教手艺。学生不脱离生产,既学了技术又识了字,曾在榆林各地推广。

榆林解放区各地的冬学运动,也是在不断整顿改革中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三边分区,共创办各种形式的冬学461处,参加冬学人数6292人。其中识字成绩较好的冬学,靖边县有32处,学生571人,平均每人识字495个。他们中94人能写简单的句子,164人能写简短的便条,71人会珠算的加减乘除法,99人能记账,40人能读报。在全县250处冬学中,有102处转为民办小学。1943年绥德分区各县、区、乡,共办冬学905所。其中50个区每区一所,322个乡办644所冬学,参加学习的干部30715人,人人随时学习文化知识。1944年,习仲勋总结了子洲县周家圪塔办冬学的经验,写出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刊登在11月23日《解放日报》上。他阐述了开展冬学运动的方向,对绥德分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榆林解放区的在职干部培训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42年,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队移驻子洲县苗家坪、马路沟、周家峪等处。1943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总校第八期学员与第二、三分校合并,校址迁至绥德。校部设在城外西山寺,学生分别住在城西寺沟、落雁砭和辛店延家岔等村的土窑里,校长何长工。同时,抗大第二大队移驻清涧,队部设在痘神庙。2月下旬,抗大第七分

校及附设陆军中学 1000 多名学员,由喻楚杰副校长率领,从晋西北兴县出发,西渡黄河到达绥德,营连干部队与抗大总校合并。抗大总部和抗大七分校移驻绥德后,对驻地的社会教育和干部培训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协助,富有成效。

三、新闻事业的发展

为了宣传和动员人民更自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及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新闻事业的发展。抗战期间,榆林解放区创办了两种分区级的报纸,及几种县级的报纸,此外《晋绥日报》也在神府一带发行。这些新闻载体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大事;教育、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和生产,支援前线,为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各地广大群众还因陋就简,办起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黑板报,同样发挥了宣传、鼓舞、教育群众的作用。

最早面世的是《抗战报》。它是 1939 年 8 月,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出面创办的实际为中共绥德特委的机关报,社址设在警备区司令部院内,8 开 2 版,单面印刷,5 日刊。在 7 年间共出了 536 期。黄植、张沛、欧阳正、田方、庄启东先后任主编。是绥德分区 60 万人民的战斗号角。

1941 年春,中共三边分委的机关报《三边报》在定边创办,报社设在定边城杨铜匠院内,4 开油印版,5 日刊,在定、靖、盐池、吴旗等县发行,最多发行到 2000 多份。直到 1949 年 9 月建国前夕停办。主编先后由王文岐、刘莫冰、

苏奇、谢兢、李季、张源等担任。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最初就发表在《三边报》上。

在抗战的炮声中，又诞生了《米脂报》、《子洲报》、《靖边报》、《佳县报》、《新神府》等报。它们同样为争取最后胜利尽到一份力量。

此外，晋绥创办的《抗战日报》，也经常报道神府县党、政、军、民加紧生产，积极抗日救亡的消息。同时，驻军各部队几乎普遍办起了黑板报和墙报，驻三边的警三旅每个班都办有一个《练兵小报》，及时反映生产和战斗情况鼓舞斗志。

四、医药卫生工作的推进

陕北山区，医药卫生工作滞后。抗战初期广大群众仍处在不讲卫生，地方病严重的局面里。封建迷信活动猖獗，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农村医药条件极差，每千人中只有一名医生，其数量还不及巫神的数量。正如毛泽东所说：“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多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

1940年以后，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全面展开。当时主要方向是面向基层，为群众服务。各公立医院除为“公家人”和部队治疗外，主要任务改成为群众看病，并要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服务。各医疗单位为群众看病，医药费实行全免，但是此项工作进展很不平衡。为排除门户之见，毛泽东提出实行中西医结合。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是绥米一带著名老中医，他积极响应，加以推广。三边中医崔岳瑞率先实行中西医合作，以科学破除迷信，治疗效果显著，成

为卫生运动中的模范。他的经验在各地推广,被誉为“崔岳瑞运动”。各卫生专业部门还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经常性的群众卫生运动,使大家认识到讲卫生,搞防疫,才是走向人丁兴旺的惟一正确途径。

鉴于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与传统势力的束缚,妇婴保健更是薄弱环节,有的地方婴儿死亡率竟然高达80%。为此,有关部门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妇幼卫生知识,培训专业人员,推广新接生法,大大减少了婴幼儿死亡率。同时,还由政府颁布政策法令,保障妇幼健康,使整个妇幼保健工作大大改观,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第四节 张闻天等在榆林解放区的调查研究与晋绥边区领导机关在神府

一、张闻天等在榆林解放区的调查研究

为了响应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执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张闻天组织了延安农村调查团,奔赴陕甘宁边区和晋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1年零2个月的农村调查。调查团由10人组成,张闻天(化名张晋西)担任团长,一个警卫班随行。

1942年1月26日,调查团一行从延安出发,2月28日到达神府开始调查。4月12日,调查团写出《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反映的是神府县直属乡贾家沟、贺家川、孟家沟、阎家山、西山上、尚家庄、路

家南孤、崔家岭 8 个自然村的综合情况。调查团对各村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为中央和边区政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为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了切实的依据。这些村庄地处偏僻山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物质匮乏,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经济商品化程度低,土地总面积不大,耕地也少,人口不多。但是,这些村庄在战前经过两次土地改革,共产党员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较大(6%),群众觉悟高。此地既是陕甘宁边区的前哨又是晋绥根据地的可靠后方,从总体上看政治环境很优越。在各村中,政治上的进步派均占绝大多数,中间派数量占少数,顽固派更少。

神府县经过土改,农村各阶级正进行重新分化。一些贫农将上升为中农,一些中农上升到富裕中农。调查认为,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发生与发展资本主义,“农村资本主义,是农村经济将来发展的前途。”“充分发展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力,正是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

4月20日,结束了神府调查之后,调查团又东渡黄河,到晋西北的兴县农村调查。9月26日,张闻天一行来到米脂县杨家沟。

杨家沟属米脂县河岔区第六乡,共有6个自然村,271户居民,但有55户地主。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分布密度如此之大,在中国农村是罕见的,因此也很具有典型意义。

杨家沟以拥有“马光裕堂”(一个地主集团的代号),而闻名陕北。这里的阶级对立特点是“富户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都是马氏家族“光裕堂”的大户;贫者则是

堂外的绝大多数小户。杨家沟的 55 户地主(每户都有“堂”的代称),主要靠收地租和放高利贷以及兼并土地而创立家业。

马姓地主集团的创始人是马嘉乐,他生有 5 子,分家时给每子分到千垧以上土地。他们累世繁衍,又滋生出许多地主(堂)。在杨家沟,除马氏家族各堂地主外,绝大部分为贫、雇农(贫农 104 户,雇农 32 户),在贫农中又有 94 户佃农,占农民总数的 69%。他们大多数没有土地,只有 41 户占有 141.5 垧土地,平均每户只占有 3.5 垧地。大多数无地或少地农户,靠租种、伙种、安种地主的土地谋生。

通过对杨家沟地主集团的全面调查,由马洪起草,经张闻天充实、修改定稿,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的调查报告。以大地主马维新为典型,通过大量的账簿、契约等资料和口头调查,揭示了地主阶级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以实行租佃、借贷和雇佣劳动等手段,进行土地兼并的事实。这个典型,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村阶级剥削制度的集中反映。马维新通过给农民借粮、借钱、迫使农民撩地(出典或出卖)等手段,从 1924 年至 1941 年的 18 年当中,将他的堂弟、破落地主马维城的 185 垧地兼并为己有。

马维新的发家方式,主要靠的是发放高利贷。他实行的利息分年、月、日三种,以月利为主,月息平均 2 分。如果在一、二年内债务人不能依约还本付息就要“撩地”。即将抵押的土地交由债权人处理。放高利贷的抵押品五花八门。有指地、指窑、指牲畜、指树、指工、指青苗等。总之,农民为解燃眉之急,不惜用一切东西作抵押,主要以土地为主。高利贷又名“驴打滚”,农民一旦落入这个罗网之中,就

很难自拔。马师云从1924年起,借了马维新的50元现洋,月利1.4分,以10垧地作抵押。他借贷13年先后共付息109.2元,超过了本金两倍多。直到1937年,他才把本金还清,但还欠22.62元利息。

杨家沟的地主还有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伙喂驴”(限于母驴)。即由地主出钱买驴,作价后交由伙喂人喂养。双方立约为证。母驴生驹后,出售所得价款,首先须清母驴本。待本清后,出卖母驴,将所得均分。

另一种剥削方式为“安伙子”,即由地主出种子、肥料、牲畜、农具等,“伙子”付出劳力伙种土地的一种方式。“伙子”是赤贫农户,其一切费用均依靠地主。地主家有什么差役,“伙子”须随时应差,双方秋后算账。收成除去畜料、籽种后,平分秋色。“伙子”劳作终年,还了老账,又欠新账,正如地主所说,“伙子的账一辈子还不清。”对于地主来说,“安伙子”比出租土地更为合算。

马维新是大地主,有囤粮居奇的条件。1928年是大荒年,他出售了300多石粮食,为30年来出售最多的年份。他用售粮所得的大部分资金,买地和典地。这种囤积居奇、待价抛售的行为,是在“济世活人”的伪善口号下进行的,可谓名利双收。在历史上,往往土地典价、卖价最便宜的年头,正是广大农民最受熬煎之时;对地主来说,则是扩大积累、发福生财的黄金时期。

调查报告,通过对典型大地主马维新全面活动的解剖,以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展示了中国农村封建地主经济的特征。特别是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结合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对农民进行三位一体的残酷剥削、

压榨,从而更大规模地兼并土地的剥削方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此以前,像这样具体充实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是很罕见的。张闻天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决心深入基层调查,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行动上整风”。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实践,丰富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唯物辩证思想。

11月23日至1943年2月24日,张闻天还在米脂城内、绥德市区作了许多商业经济调查。搜集了绥德西川双湖峪以及马蹄沟盐滩、徐家沟煤窑、西川各区的经济状况、公粮占有、地主分布情况等。

张闻天在1942年10月7日,发表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其核心思想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要人们认清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以加快发展生产力。这一思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是完全正确的。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根本准则的思想,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宝库。

张闻天率团结束了长达14个月的农村调查后,于1943年3月27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出发归来记》。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作了深刻的论证和发挥。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指调研)当作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就。”他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它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不仅对某一时或某一事适用,而且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都适

用。他从理论的高度充分阐述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着重阐述了调查研究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张闻天率团在神府、绥米调查的前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晋西北行政公署,也派考察团到榆林解放区进行过调查。1940年5月1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出森林考察团对边区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进行考察,边区自然科学院植物标本采集组同行。该团顺桥山山脉及横山山脉,在靖边、绥德、清涧等地进行考察。历时两个多月,摸清了边区的森林资源。1942年1月,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的考察团,先后到绥德、米脂以及绥西(子洲境内),调查了土地改革、“三三制”政权建设、文化教育、社会各阶级关系以及党务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事后撰写出版了《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1942年2月25日,晋西北行政公署考察团一行10人到神府县,考察区、乡、村三级组织机构、领导和干部状况及国民教育等问题。

中共中央和边区领导开展的这些调研考察工作,有效地克服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晋绥边区领导机关在神府

抗战时期,神府根据地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前哨,党中央通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也是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后方。从1939年开始,日军对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年大扫荡,为了保证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的安全,更好地指挥和支援反扫荡的斗争,晋绥边区

党政机关和八路军一二〇师的部分后方机关,从1940年6月至1945年8月,先后移驻神府县境内。1941年9月,为使神府更好地发挥晋绥抗日后方基地的作用,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西北中央局将神府委托给晋西北区党委代管,1948年11月10日归回陕甘宁边区。晋绥机关移驻神府后,领导晋西北300万军民,与日、伪、顽展开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为全国的抗日胜利做出了贡献。

晋绥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一二〇师司令部、后勤部等,抗战初期驻山西兴县。1940年6月移驻神府县后,中共晋绥分局、《晋绥日报》社和纸厂在杨家沟村;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法院、监狱、洪涛印刷厂在菜园沟村;晋绥边区党校在呼家庄村;晋绥边区公安局在王家庄村;晋绥中华邮政总局在东梁堡村;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在刘家湾村;后勤部在采林村;供给部兵工厂在葛富村;卫生部先驻马镇村,后驻贺家川村;手术医院先驻贾家沟村,后驻贺家川村;兵站在西豆峪村;被服厂在王桑塔、王家沟、葛富等村;粮食仓库在石岳岭村;荣誉军人休养所在罗家滩村;伤病员休养一、二、三、四、五所,分别移驻温家川、合河、刘家湾、马镇、兰家会等村;三五八旅供给部、被服厂、鞋厂、化学厂和荣誉军人休养所等单位,移驻万户峪镇和冯家山村。

晋绥机关移驻神府后,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对神府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驻呼家庄的晋绥党校,每期举办干部学习班、训练班时,都尽可能多吸收神府各级干部和一些群众积极分子参加。还特地

为神府一些不识字的干部,开办文化教育和扫盲识字班。神府县各级干部,大多数经过晋绥党校的系统学习和专门培训,政治觉悟、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成了各项工作的骨干,有许多人后来担负了重要的领导工作。

驻神府的晋绥各机关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神府县发展文化教育。先后在石砬砬、王家庄、王家沟、杨家沟、东梁堡、阎家堡等村,办起了民办公助小学;在呼家庄、采林等村庄,开办了 10 多处农民夜校,每个学校都配有专职教员。动员各村庄 60% 以上的适龄儿童入学,接受正规教育。动员 80% 以上不识字的男女青壮年,参加夜校扫盲识字学习。经过学习很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有的成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的通讯员,有的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为革命骨干,担任领导职务。

神府地处偏僻山乡,长期以来缺医少药。晋绥机关移驻神府,给神府人民带来了福音。一二〇师卫生部各医疗所和手术医院,把给神府人民看病当做自己的重要职责。他们经常组织医疗队下乡搞防疫、种牛痘、培训乡村医务人员,使神府乡村的医疗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发病率大大下降。抗战期间,他们为神府 3400 余名群众治好了疾病。

抗战中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神府支前任务不断增多,人民的生活遇到严重困难。晋绥各机关干部战士,首先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并动员神府人民一起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生产共渡难关。他们经常帮助当地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为使神府人民尽快掌握种棉和纺线织布技术,晋绥机关不仅多次举办技术培训班,还

经常深入田间地头,群众家里传授技术,指导如何种棉花和纺线织布。经过几年艰苦奋斗,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不仅达到了丰衣足食,还为抗战支前作出了贡献。

晋绥机关干部战士帮助神府人民的实际行动,极大地提高了神府人民支前工作的积极性。他们不惜财力、物力、人力,只要前线需要,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抗战期间,神府县人民向前线输送兵员 1000 余人;供粮食 10 余万石,棉花 50 多万担,布匹 30 余万丈,军衣、军鞋 5 万余件(双);组织担架 5 万多付(次),抢救伤病员 5000 多名;组织运输队 40 多个、水手 200 余名,运送过河人员近 5 万名、参战物资 10 万多吨。

军爱民、民拥军,晋绥机关和神府人民在六年的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团结奋斗,克服了不少困难。1940 年至 1945 年,移驻神府的晋绥党政机关和一二〇师后方机关约有 3 万多人,加上医院、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粮食仓库、疗养院等公共设施,所需房屋至少得 6000 多间,住房问题成了最大的困难。为了减轻神府人民的负担,晋绥机关的干部战士主动要求睡地铺、住草房,并在极其紧张的工作环境下,自己动手新修和补修了 1500 多孔窑洞以及会议室等公共用房。神府人民把晋绥来的干部、战士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女,为了让他们住好、休息好,沿河所有村民合家并房,很多群众自己主动搬在粮房、库房和简易房屋居住,让出好房、大房给晋绥机关住。有许多群众几家人、几代人,挤在一个破房里生活而毫无怨言。

晋绥机关对神府人民的热爱和帮助,使神府人民更加热爱子弟兵。开展拥军优属,养护伤病员成了神府人民的光荣义务。由于日军对晋西北的残酷扫荡,前方转来的伤病员不断增加,为使伤员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伤病员驻地的群众都成了义务护理员。他们主动给伤员烧水、喂饭、缝洗衣服,很多群众省吃俭用,将集攒的鸡蛋、肉类等营养品送给伤病员。涌现出许多象王补梅那样,被誉为“人民军队的好妈妈”的拥军模范。神府人民还积极慰问驻地机关的干部战士,表达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

晋绥驻神府机关和神府人民为了增进友谊,经常在一起开文艺联欢会、庆祝会,开展体育比赛等活动。晋绥边区的七月剧社经常下乡巡回慰问演出,帮助群众开展文艺活动。在他们的帮助下,马镇、盘塘、贾家沟、菜园沟等地都创办了业余剧团。文体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双方的友谊更加深厚,情意更加深长。

三、国际友人在榆林解放区

1938年5月1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率医疗队,由延安来到清涧县师家园则村八路军前总卫生部视察。2日在前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陪同下,经绥德、神府,准备奔赴晋冀抗日前线。5月底,到达神府根据地。在神府县政府所在地贺家川,白求恩详细地检查了一二〇师贺家川收容所,为伤病员治病,并将随身携带衣物赠送给伤病员。1944年夏末,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为了能直接了解八路军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他们除到八路军驻地实地考察、交流外,还组织全体成员乘车到绥德,

参观已迁到这里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并与学员们深入进行交谈。加深了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了解,扩大其国际影响。1944年8月中旬,由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合众社、《泰晤士报》、《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哈里逊·福尔曼,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塔斯社的记者N·普金科等组成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在延安参观访问后,由国民党中宣部张潮生陪同,来绥德分区参观访问。8月22日,由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主持,开明绅士安文钦、刘绍庭、刘述三、张哲卿、王德安、丁子文、张敬斋、王文卿等,同外国记者们进行了毫无拘束的座谈,并坦然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8月30日,外国记者东渡黄河,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访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绥德、三边、神府、榆林的党政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领导机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带领人民群众从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外交等方面,开展了统战、整风、“三三制”民主建政、精兵简政、加强抗日军队和自卫军建设、反摩擦、反封锁、土改、大生产、发展商贸、兴学办教等彪炳史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堪称模范的工作。从

第四编

中共榆林组织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十一章

争取和平 准备自卫战争

第一节 进行和平劳动建设的榆林解放区

一、解放区的概况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规模空前,并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不只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而且创造了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120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

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陕北北部苏维埃区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已经发展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榆林解放区。榆林解放区设有绥德、三边两个分区,及由晋绥边区代管的神府县,总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0多万。

绥德分区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等6个县。党的地委书记由李井泉代理,副书记白治民,秘书长赵锦峰,组织部长白清江,宣传部长李华生,统战部长刘文蔚,行政公署专员杨和亭,副专员王恩惠,军分区司令员王

季龙,白治民兼任政委。

三边分区辖定边、靖边、吴旗、盐池4个县。党的地委书记高峰,副书记朱敏,秘书长李会友,组织部长王春华,宣传部长贾怀济,统战部长赵忠国。行政公署专员吴志渊。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王世泰兼任政委,副司令员吴岱峰,副政委吕振球。

神府县辖6个区。党的县委书记刘北垣,县长梁士堂。

政治自由民主,吏治清明廉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生产向前发展,群众的物质生活较抗战前普遍有所改善,部分达到丰衣足食。在农村,由于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变化,因此阶级成份,从以前雇农、贫农为主变成了以中农和富裕中农为主。

榆林解放区的存在发展,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榆林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既是榆林人民的骄傲和自豪,也是榆林人民的希望和未来。抗日战争一结束,榆林解放区的各级党、政、军组织,便遵照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全面展开了解放区的建设工作。

二、解放区的普选工作

1945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1945年秋后开始普选准备工作,要求各分区选择数乡先行试点。8月17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榆林解放区各地根据边区政府的安排,对这次普选做了周密的部署,绥德分区确定绥德县辛店区八乡、清涧县折家坪区四乡、吴堡

县刘家沟区五乡；三边分区以定边县城区四乡为试点，先后召开试点工作会议，总结有关经验。

9月6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决定从10月15日起至年底，全面进行乡、县、边区三级政权的普选工作。《训令》指出：这次选举必须继续坚持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和宗教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限制，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原则，乡选是三级选举的基础。10月5日，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员县市长的信》，根据试点选举的经验就选举方针、检查工作、选举代表、开代表会、宣传鼓动、加强各级领导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10月14日，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做出决定：改乡议会制为人民代表会制，以克服乡级政权议行并立的缺点。

10月中旬，榆林解放区各县在边区政府工作团的指导下，分别举办区乡干部和选举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骨干。县、区选举工作人员深入农村，同基层干部一起发动群众，组织选举。经过选民登记、检查工作、改选人民代表（乡为代表，县、边区为参议员）、选举政府领导人员四个阶段。按照“自由选举，选举好人”的方针和“自由提出，经民主讨论，集中表决决定”的程序，产生乡人民代表候选人，再采用差额选举办法，选出正式的乡人民代表。各县的选民到会率在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群众满意地说：“这次选举是头瓜里选头瓜，好人里挑好人。”至1946年1月，乡级选举基本结束。新一届乡人民代表会和乡政府委员会普遍成立，新的县参议员也民主选举出来。

1946年1月至4月，清涧等7县陆续召开县参议会，

选举产生本届议会的正副议长、常驻议员和新一届民主政府的领导人。

1946年1月12日至18日,清涧县第二届参议会在县城关小学召开。出席会议的议员48名,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常驻议员3名,赵锦峰当选议长,王士英当选县长。

1946年1月13日至19日,子洲县召开第二届参议会。出席会议的议员63名,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常驻议员9名,李世业当选议长,王占山当选县长。

1946年1月,佳县第二届参议会在县城召开。54名议员出席会议,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常驻议员5名,张俊贤当选议长,杜嗣尧当选县长。

1946年2月,吴堡县第二届参议会在宋家川召开。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常驻议员5名,高荣卿当选议长,魏希文当选县长。

1946年2月20日至27日,定边县第三届参议会在县城召开。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常驻议员5名,郭子范当选议长,丁子齐当选县长。

1946年3月5日至11日,绥德县第二届参议会在城内召开。出席会议的议员62名,候补议员6名,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常驻议员13名,张方海当选议长,霍祝三当选县长。

1946年4月,靖边县第三届参议会在张家畔召开。李尔直当选议长,曹九德当选县长。

这次民主普选工作,是榆林解放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指示下,获得圆满的成功。它对于加强民主运动,改进政府工作,转变

干部作风,增强干群团结,推进和平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三、解放区的减租工作

1945年9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秋收与减租》,要求各老解放区“检查过去减租的情形,如减组不彻底的地区,要重新发动群众进行减租”。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12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党内指示:1946年,除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外,老解放区应普遍开展减租减息复查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紧密结合1945年冬至1946年春的普选与生产活动,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以“查租保佃”为主要内容的减租斗争。

榆林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都十分重视查租保佃工作。1945年11月14日,绥德分区行政专员公署发出《1945年减租办法》,要求各地结合乡选认真减租和查租。这个办法不但对定租、活租、伙种、安庄稼的减租交租作了具体规定,还对伙种、安庄稼的副产物柴草的分配、灾后的减租以及公地、学田、水地、树木的地租等也作了具体规定,深受群众欢迎。《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供各地参考。各县在贯彻《1945年减租办法》中进一步发现,绥德分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减租之后未能及时换约,没把减租与保佃联系起来,由于顽固地主的乘机破坏,使一些农民失去佃权。佳县石板村的租额,自1940年到1945年冬竟从未减过。对于违反和破坏边区政府租佃条例的这些问题,在民主普选、

检查工作时被一一揭发出来,群众强烈要求实行减租保佃,并把选举干部与其贯彻执行减租政策的表现结合起来。根据各县的具体实际,绥德专署又详细规定了减租保佃办法,确保佃农利益,同时适当照顾地主生活。各县除对少数态度恶劣的地主坚决斗争外,对认错并表示愿意改过的地主,则由政府出面,召集租佃双方在一起开会算账,解决了不少问题。

三边分区的定边县,于1946年3月召开县临时参议会,决定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二五”减租。佃户纷纷成立农会,向地主进行清算,要回多收的租子。同时,在东滩区5个乡进行减租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在全分区推广,取得较好的成效。

正当榆林解放区各地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进一步开展土地征购和回赎等工作时,国民党军开始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这场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伟大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四、解放区的生产建设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巩固解放区的根本大计,中共中央1945年11月7日提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陕甘宁边区政府12月17日发出关于增产粮食的指示,要求县、区、乡干部坚决克服命令主义和放任自流两种偏向,深入群众,指导农民改良农作方法,精耕细作。建立和整顿变工、扎工、磨将班子等劳动互助组织,推行劳模运动,改造二流子,有计划地组织移民从事生产。

榆林解放区各分区党政组织根据边区政府的安排和

指示,始终把发展生产当做第一要务来抓。各地积极行动,掀起以变工、扎工等为组织形式的生产运动高潮。绥德县王家坪村,对耕种主要庄稼采用按期变工的办法,既有效弥补了劳力不足,又做到不违农时,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这个村还成立了由9名骨干组成的核心小组,带领群众把本村建成了自治模范村。安边县干部深入基层,在全县范围内培养了231名生产骨干,带领群众发展生产。

在边区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指引下,榆林解放区各地的造纸、熬硝、盐业、小煤炭、民间交通运输、民间纺织等工业生产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经过党政军民的齐心努力,加上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工农业生产都取得了较大成就。按照1946年上半年的生产统计,榆林解放区人民完全有把握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方案所规定的各项生产指标。但是正当生产建设顺利进行时,却被国民党军的进攻彻底破坏了,解放区的军民只好拿起枪杆,投入到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中。

五、解放区的救灾工作

1945年,榆林解放区继春旱之后,夏秋又发生大面积的干旱,加上风沙、虫蚀、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的频频侵袭,给农牧业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害,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特别是米脂、子洲、绥德,灾情更为严重。

1945年5月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相继发出关于抗旱救荒的指示和训令,紧急动员各地人民行动起来,抗旱救荒,增加生产。同时,号召全体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的主要领导人林伯渠、李鼎铭、谢

党战，联名写信给各级参议员、劳模、中小学教师，号召他们带头救灾防荒。于是，生产救灾活动在全边区开展起来。

中共绥德地委和专署组织 3 个工作团，分赴绥德、米脂、子洲三县重灾区协助救灾工作。绥德专署发出紧急指示，提出 8 条救灾措施，要求各县领导深入灾区，解决人民的具体困难。同时，发放农贷 100 万元，解决灾区人民粮种、畜力、生产工具等问题。组织群众抢种和补种秋田作物，扩大冬麦面积，增种土豆、萝卜、南瓜等品种。号召全区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节衣缩食运动，兴修水利，争取多打粮食。明确规定机关、部队、学校，每人每天节省 4 两口粮救济灾民。严令禁止铺张浪费，号召人民节用口粮，积极储存野菜、野果、玉米芯、荞麦皮、榆树皮、糠麸子等代用品，备荒度灾。

由于歉收，解放区 1946 年的春荒更为严重。绥德、米脂、子洲等县的大部分地方人无口粮，畜无草吃。中共绥德地委、专署及时发放救济粮，并由合作社和公营商店供出粮食，救济重灾区。同时，动员灾区人民采取以人力、畜力、帮工、变工，调剂口粮，开展互助互济，自救救人等办法，缓解春荒的威胁。三边分区采取互助调剂的方法，先后调剂 1200 余石粮食，解决群众的吃粮问题。灾区群众家家户户还订立备荒计划，想方设法节用口粮，作了长期度荒的打算。在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安排下，榆林解放区的党政军民经过共同努力，灾民的吃粮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春耕生产也较顺利地开展起来。

六、解放区的战备工作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密谋策划了由南、北、西三线分进合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胡宗南部频频调集部队,蠢蠢欲动,榆林国民党军和宁夏马鸿逵部,亦调兵遣将遥相呼应。国民党军对榆林解放区的大小小牵动性侵扰、袭击,屡屡发生。国民党在榆林的党、政、特、警,也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破坏捣乱活动。一时间解放区周围战云密布,人民处在严峻的战争威胁之下。

面对挑衅,榆林解放区党政军民团结一心,高度警惕,积极开展了战备动员工作,随时准备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一切军事进攻。各分区、县根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一系列有关战备动员的指示、命令,分别召开了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三级干部会议,教育干部认清形势,响应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一切为了保卫边区,一切为了自卫战争胜利”的号召,牢固树立自卫战争必胜的信念。各机关、企业、学校、工、青、妇等团体,分别召开宣传动员会。乡村由下乡干部进行宣传动员,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同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使胡、马军所到之处饥不得食,渴不得饮,无地立足,无处安身。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生产与战备结合,劳武结合,参军参战,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决心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热潮。

绥德分区、三边分区及各县党委,都把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当成最紧迫的任务。举办各种民兵骨干培训班、爆破训练班。通过组织整顿,各县的普通自卫军、基于自卫

军、武工队的思想觉悟、纪律性、战斗力显著提高。绥德分区成立了民兵司令部,杨和亭兼司令员。各县还组建了民兵游击大队,乡村成立了游击小组、武工队,开展广泛的练武活动。民兵个个掌握了投弹、射击、埋雷三大技术。他们还不断地改造和创新劳武结合水平。米脂民兵学会制造石雷、铁雷、瓷雷、水雷等武器,银城民兵营长杜修成发明二十多种地雷,推动全分区造地雷4万余颗。三边分区自卫军,在学会三大技术的基础上,还苦练骑马射击技术,子洲民兵制造出子弹头雷管。

为增强部队实力,动员广大青年参军是各级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榆林解放区各级党政组织采取宣传动员、调查研究、民主讨论、解决困难、慰劳欢送、党员、干部带头等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动员群众参军。同时,各县的地方武装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积极配合部队打击国民党军的侵扰、破坏。1946年11月16日,鱼河独立营侦察队在大队长王巨才的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将来犯的国民党驻归德堡萧炳南营400余人击溃。神府支队从1946年11月起,在队长列吉甫的率领下,不断主动出击,开展了苏泥家河、龙尾岭等战斗,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小股部队及其别动队、还乡团、便衣队、暗杀队等的侵扰破坏。1946年12月4日,定边县警卫队、游击队配合警备三旅八团、城川兵团、新十一旅一团,奇袭兴武营、大圪塔、余庄子,一举歼灭马鸿逵骑兵十九团团部和3个骑兵连,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收复兴武营等地。

榆林解放区的战备工作及参军参战运动,有力地配合

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备工作,为边区的自卫战争,争取了时间,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三边新解放区的形成

一、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在安边起义

抗战胜利后,中共三边地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统一三边,巩固发展和新编十一旅的统战关系的指示,在积极准备自卫战争的同时,加强了对驻安边的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的统战工作。

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十一旅,是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陕西警备骑兵团二团的基础上,几经奔波三次改编,两易其主,于1932年组建起来的。这支部队,有较好的革命思想基础。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由谢子长、刘志丹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在上级党的指示下,领导过兰州水北门、甘肃西华池及靖远县等地的兵暴运动,掩护过不少地下党的同志脱离险境。1936年,曾经收容过红军长征中留下的不少伤病员,有的及时转送延安。

1937年底,新十一旅由甘肃移驻三边后,二团的地下党组织被该团团附、叛徒张鼎臣瓦解破坏。一团党的力量较强,当时营里设党支部、连里设党小组,经常以军事学习组、文化学习组、读书会等形式,团结教育士兵。地下党的负责人有牛化东、李树林、胡立亭、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谢有德等,1941年,一团连以上的23名军官中有18名是共产党员。1944年4月陈国宾旅长病逝,曹又参任代旅

长,牛化东任一团团附,13个连长中11个是共产党员,3个营长中的李树林是共产党员,一团的军权完全被地下党掌握了。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在中共三边地委的指示下,首先在一团举办了两期班、排干部训练班,又成立了西北民主促进会,借以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加紧进行民主革命、反内战等政治思想教育。这些工作都为后来的起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45年10月,蒋介石、胡宗南认为驻榆林的邓宝珊二十二军反共不积极,尤其驻防三边的新十一旅不可靠。便以调防和从内部瓦解的办法对付邓宝珊部,在明令新编十一旅调往包头改为整编军的同时,又密令副旅长吴棻及二团团团长史觐城等复兴社分子,从内部瓦解十一旅。曹又参得知调防改编消息后,赴榆林向邓宝珊请示。乘曹去榆的机会,10月15日,吴棻勾结史觐城,派二团团附张鼎臣、旅部副官长任怀义带领卫士10余人,由二团驻地宁条梁进驻安边“万发店”,对一团官兵宣传改编为正规军的好处。因其不知三连连长赵武臣是地下党员,以为赵平素与他们关系相好,便对赵说:“一团若不接受改编,我们二团便于本月28日以长途野营为名进驻安边,趁机武力解决一团。”赵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地下党组织,党组织速派冯世光、王子庄去定边向中共三边地委和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汇报。经三边地委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一团先发制人,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三边地委派警三旅通讯联络参谋葛仲,随冯、王返回安边领导起义。

10月24日晚,牛化东、王子庄、冯世光、赵武臣等,根据三边地委指示,研究拟定了起义的具体方案:一、成立起

义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总指挥。二、派高昆山去白泥井二营防地,传达起义命令。三、调二营六连连长朱子春(地下党员)来安边待命,供指挥部机动使用。

25日拂晓,起义开始。首先扣押了副旅长吴霖、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以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公安局长等人。张鼎臣拒捕被击毙。接着派一营、三营迅速占领全城制高点和要害部门。当日下午,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和参谋长张文舟率部进入安边城。新十一旅一团安边起义成功。

27日,起义部队和八路军在安边城召开会师大会。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一团起义官兵1500多人和旅部直属机关300多人参加大会。会上王子庄宣布新十一旅为了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举行武装起义成功,并宣读了坚决消灭二团反动势力的命令,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宣读了贺信。

28日,起义部队攻打宁条梁。二团凭借暗堡和外壕等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攻城战斗受阻。11月1日,警三旅旅长贺晋年亲临阵地指挥。11月3日拂晓,攻占了宁条梁。击毙团长史觐城以下百余名,俘虏800余名。驻堆子梁的二团一营400多人逃往榆林。宁条梁、堆子梁解放。11月5日,曹又参、牛化东、王子庄、李友竹等代表十一旅全体起义官兵,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十一旅的工作,把起义部队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任命曹又参为旅长,郭秉坤为政委,牛化东为副旅长,王子庄为参谋长,苏效蒙为政治部主任。

新十一旅起义不久,贺晋年陪同曹又参到了延安。毛

泽东主席在接见曹又参时说：“你们是火车头！”《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十一旅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火车头》的社论。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设宴招待曹又参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为曹又参专门组织了欢迎晚会。

国民党新十一旅的起义，是中共统战工作成功的一个范例，是中共和平民主主张的胜利，对于西北和全国的统战工作，具有较大的影响。

二、安边县制的恢复

以安边堡为中心的安边国民党统治区，随着新编第十一旅的起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恢复了安边县制。县下辖安边市及东滩、柳堡、砖井、白泥井、梁镇等5个区。安边县隶属三边分区。

1945年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决定，中共安边县委在安边堡成立，书记李维钧。县委设秘书及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辖安边市委及东滩等5个区委。

同时，安边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县参议会有议员64名，其中共产党员27名，国民党员24名，无党派人士13名，常驻议员5名，国民党员刘显民为议长，共产党员为副议长。县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安边县地方自治委员会，主持县政。11月24日，安边县地方自治委员会安边县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13名，主任委员刘文卿（绅士）、副主任委员邓清辉。后安边县政务委员会改为安边县民主政府委员会，委员13名，刘文卿为委员兼县长，邓清辉为委员兼副县长。县政府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

科、保安科及司法处。县政府辖安边市政府和东滩等5个区公署。31个乡政府。

第三节 榆横新解放区的形成

一、梅廷栋连在佳县打火店起义

1946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中共绥德地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向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绥德地委即按此方针组织力量,开展了对梅廷栋连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佳县的绝大部分地域是解放区,只有打火店到白家沟一小条块是国统区,它象插进边区的一根楔子。1943年,国民党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二五七团一营第三连驻防打火店。连长梅廷栋,出身贫寒,为人耿直,重义气,容易接近;指导员张宏儒(军统特务)为人奸诈,阴险毒辣,与梅明争暗斗,格格不入,矛盾日益加深。

打火店距边区管辖的通镇(又名通秦寨)15公里,通镇是佳县北区最大的集镇,有例行集市。每逢集日,附近群众购物易货,贸易繁盛。梅廷栋及其官兵也常来赶集置办生活用品,地方党组织与其友好交往,热情接待。

从1943年起,中共通镇区委书记李德玉就遵照县委的指示,开始做梅连的统战工作。他先以生意人的身份去打火店梅连办的小商店,谈生意拉关系。后来与连长梅廷栋、上尉军医龚焕章有了交往,逐渐和梅廷栋成了知心朋

友生死弟兄。1944年,李德玉出任县委统战部长。为了开展对梅连的统战工作,他一度把办公处临时迁到通镇。两年多时间里,不但李与梅交往甚深,关系愈强,而且与梅连的几位排长也熟悉了,梅廷栋及其官兵,深受李德玉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

1946年7月,绥德地委统战部派马健飞到佳县协助做梅连的工作。9月中旬的一天,梅连军医龚焕章的岳父到打火店看望女儿。指导员张宏儒认为龚的岳父是“共产党密探”就把他关押了一夜。梅廷栋知道后,下令放人。张宏儒就借故去榆林报告梅廷栋“通共”。二十二军军部接连数次命令梅廷栋回榆接受审查,情势非常危急。梅廷栋立即到通镇找李德玉问怎么办。李认为时机成熟,请示县委,县委又请示绥德地委。9月23日,根据绥德地委的指示,分区保安处长薛克明和中共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到达通镇。会同马健飞、李德玉,与梅廷栋商定起义方案;24日夜至25日清晨,梅连以鸡叫为号撤出打火店,边区派部队和民兵接应,具体接应工作由马健飞负责;驻佳副营长王成俊率一个连于25日凌晨以前到达打火店村东面山上,梅连一撤出立即占领寨子;绥德军分区民兵科长薛英桂率县警卫队,在鸡叫前赶到王家砭村,阻击追赶梅连的国民党军,同时截击梅连可能叛逃人员,完成任务后于拂晓撤退;中共响石区区委书记袁继成带基干自卫军,割断旧寨至刘千河(团部驻地)的电话线;马健飞同中共车会区区委书记李海时,组织200名基干自卫军,于24日晚齐集在距打火店5公里处的贺家仓村,接应梅连起义。

梅廷栋由通镇返回打火店连部,先向3个排长做了工

作。深夜，命令执勤排长孙万才将全连紧急集合，宣布了起义。天快亮时，率队到达白家沟。

梅连撤出打火店后，王成俊和马健飞率领队伍入寨，搬运梅连库房的武器、弹药、装备物资，于拂晓前撤离。梅廷栋连起义成功。

9月28日，中共佳县县委召开庆祝大会，方圆5公里之内的万余群众赶来庆祝。庆祝大会后，在申家湾梅连与游击队、警卫队合编为独立团，梅廷栋任团长，贺树槐任政委，绥德军分区派赵立业为副团长。12月，独立团与警备六团合编，梅廷栋任团长，张明科任政委。这个团骁勇善战，驰誉疆场。

后来，梅廷栋等人到延安，受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接见。三五九旅政委余秋里，宴请了梅廷栋等人。

二、胡景铎部在横山起义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要加强边区北线工作，目标是榆横地区，为以后的自卫战争取得回旋余地。

1946年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工作会议，安排布置北线的统战工作。决定派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专做与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的联络和统战工作。师源到绥德后，经请示绥德地委、西北局，批准他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身份，借谈判边界纠纷问题，公开去榆林，从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胡景通（师源与胡景通、胡景铎

是同学)处得知胡景铎的驻防地。师源离榆返绥后向地委做了汇报,又选派武启政携带书信去横山波罗堡与胡景铎联系。拉通关系后,师源秘密去波罗堡会见胡景铎,从中了解到胡景铎的态度和要求,向习仲勋做了汇报。4月,师源仍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的身份,借谈判边界问题为名,第二次公开到波罗堡会见了胡景铎。胡景铎素具民主主义思想,长期以来积极靠近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表现英勇,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排除异己、削割杂牌军、宽窄嫡系等做法,十分不满。胡景铎向师源表示,他就是要在共产党尚处于困难时期坚决跟共产党走,不做蒋家王朝的“一杯黄土”,愿意把队伍拉到解放区去,要求西北局派干部来帮助他组织武装起义,用实际行动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据此,西北局决定接收胡景铎为中共特殊党员,入党时间是1946年春(后来因为胡景铎的请求,改为1946年7月1日),无预备期,入党介绍人习仲勋、师源、范明,并先后派王玉、王直、任强、孟长海、杨万军、朱光等30多名军事干部打入该部,协助工作。胡景铎遵照党的指示,积极发展进步力量,防范顽固分子。他举办训练班对思想进步的士兵、班排长,进行民主和反内战教育。秘密发展张亚雄、许秀岐、杨汉三、李振华、姚绍文、丁彦荣等人入党。

1946年7月1日,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及时组织横山起义。毛泽东听取汇报后,立即予以批准,并指示边区部队乘势发起榆横战役,相机夺取榆林城。西北局遂与边区北线总指挥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等研究,决定乘胡宗南部正在进行整补和调整部署的机会,调教导旅、新四旅、警三旅和绥德军分区四团、六团集结绥德以北地带,配合起

义行动,乘机夺取榆林。又派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赴波罗堡与胡景铎商定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

10月12日夜,横山东南交通要道石湾的国民党驻军保九团一大队官兵,在少校团附张亚雄、少校军需主任范止英和机枪中队上尉中队长许秀岐的领导下,打开了城东暗道,让绥德军分区接应部队两个营入城。后经激烈交火,解放军兵分六路控制了各制高点,包围了保九团团部,将所有抵抗分子全部缴械。13日上午,国民党米(脂)、绥(德)、子(长)三县联合党部总书记叶秀卿等党、特分子被俘。

12日晚,胡景铎按照预定计划,在石湾以北的波罗堡指挥部队控制全城,把妨碍起义的顽固分子全部软禁起来,逮捕堡内所有反动地方头目。13日,他亲率600多名官兵到城外,迎接解放军入城。

13日晚,绥德军分区一个营从石湾进抵高镇外围。驻守该镇的保九团中校团附秦悦文接到胡景铎的密信,要求他听从绥德警备区高朗亭副政委的命令。便召集连以上官兵开会,宣布了起义决定。14日凌晨,秦悦文与大队长吴风德集合各据点700余人,迎接解放军入寨。高镇起义后,外围附近的海流兔庙、五龙山、韩家岔等小据点驻军也相继起义。

与此同时,边区主力部队亦在东线和北线采取军事行动。13日,一举扫清外围据点,攻占镇川堡、鱼河堡。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贺电祝贺横山起义成功,并任命胡景铎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李振华、姚绍文为正、副参谋长,范明、师源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张亚雄、魏

茂臣、杨汉三分别为团长。15日，解放了武镇，占领万佛洞。北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张仲良率领黄龙、三边部队，13日包围了横山城。15日，胡景铎致书二十二军新编十一旅骑兵团长王永清，王永清表示愿意起义。16日，横山县城获得解放。17日，边区主力和胡景铎部包围无定河以南惟一的残留据点响水堡（驻国民党二十二军萧炳南一个营）。消息传到榆林，胡景通急率两个营赶来救援。边区主力围点打援，于20日全歼援敌，胡景通带少数人逃回榆林。21日，攻克响水堡。

横山起义后，中共中央鉴于榆林邓宝珊部还有争取的可能，榆林城内已有准备以及胡宗南在南线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所以放弃原定攻榆计划。

10月下旬，胡景铎率起义部队集结武镇进行整编，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和慰问。11月4日，庆祝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成立大会在武镇举行。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及各群众团体到会祝贺，并祝贺榆横人民获得新生。胡景铎发表起义通电，宣布率部退出反革命内战，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行列。

12月17日，胡景铎奉命率骑六师2100余名官兵开赴延安，22日下午到达，受到西北局、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北财经办事处及延安市党政军民代表的列队欢迎。23日下午，西北局、边区政府、联司，设宴招待胡景铎将军。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习仲勋、王世泰等领导人接见了骑六师的干部。毛主席寓意深长地说：“骑六师起义给西北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

明大道。”还用两只船作比喻说,美蒋那只船现在虽然大些,但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船现在虽然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所以我们要准备随时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次起义,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直接指导和北线部队的有力配合,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先后有国民党驻横山的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十一旅、榆林保安团 5000 多人起义。有 2100 余人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壮了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军损失近 7000 人,解放了榆横 12 万人口近 5000 平方公里土地,拔除了插入陕甘宁边区北部的楔子,大大减弱了北线国民党军对边区的严重威胁,对促进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榆横特别区的设立

为了巩固横山起义后形成的榆横新解放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46 年 10 月下旬设置榆横特别区,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随之成立。

1946 年 10 月 31 日,中共榆横特区委员会在米脂县龙镇成立。刘文蔚任书记,组织部长白耀明、宣传部副部长任秀明,统战部长朱侠夫,民运部长高凤山,军事部长李子川,公安处长薛克明。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特委举行第一次会议,对“北线形势与新区方针问题”、“政权问题”、“地方武装人民自卫队问题”、“减租问题”、“对外工作问题”、“建党问题”等,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关于政权问题,会议决定,特区内设镇川、横山两个县,各辖 6 个区。“应成立榆横政务委员会,暂时不归边区,将来

视情况由人民决定之”，“其成立可由民主联军发起，召集各县代表会议选举之”。

11月上旬，由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发起，经两县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榆横政务委员会成立。胡景铎兼任主任，王思惠、曹雨山为副主任，赵彦卿、史文秀为委员，政务秘书姬也力，民政秘书杨沛琛，经建秘书古国英，财政处副处长李丕仁。

榆横特区的军事领导机关榆横军分区同时成立，隶属中共榆横特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由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兼任，政委高朗山，副司令员王心珏。

榆横特区所属的镇川、横山两县，都是新设的县制。镇川县以榆林县南的镇川、盐湾、鱼河、吴庄4个区，横山县东的响水、武镇两个区为辖区。全县42个乡、171个行政村、542个自然村，常住人口5万多。党的县委书记李广业，副书记黄志诚，县委辖镇川市委和吴庄等5个区委，全县共有党员300多名；行政先设政务委员会，史文秀任主任，后改设为县人民政府，王思惠兼县长，辖镇川市政府和吴庄等5个区公署。新设的横山县，以县城、石湾、李先、威武、韩岔、波罗等6个区为辖区。党的县委书记赵文献，副书记郝玉堂，县委辖6个区委；县长李坤润，副县长李东原，县政府辖6个区公署。

榆横特委成立后确定的发展总方针是“迅速巩固”。巩固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发动群众，加强武装，改造政权，肃奸反特等基本工作上。横山、镇川两县的党政组织，根据这个总方针，领导人民摧毁、废除了国民党的各级保甲制度，建立了区、乡、村的党、政、群组织。开展了减租减息、土地改

革运动和整党、地方武装建设、备战支前、对榆林国民党军的统战、培训横、镇两县基层干部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自卫战争开辟了回旋余地。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北犯陕甘宁边区时,榆横特区的大部一度陷落。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不久全部收复。

第四节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

一、号召地主“献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五四”指示下达后,榆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

1946年7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同时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陇东、三边、绥德分区帮助土改工作。

以张国根为团长的安边工作组,依据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系列的指示,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党的减租查租、征购承购、清算恶霸地主、欢迎地主献地等政策,迅速掀起了减租、退租的土改热潮。新十一旅参谋长王子庄主动提出减租,并写信给佃户叫他们退去应减的租股。安边大地主陈建中有1000垧水漫地(每垧4亩),他的58家佃户在自选的退租委员领导下,与陈建中进行斗争,收回退租56石。

并促使其他 14 户地主退租 137 石。

1946 年 7 月,三边分区收回教产委员会在安边县成立,当即派代表向小桥畔天主教堂提出收回庚子赔款失地的交涉。7 月中旬,群众向堆子梁、白泥井、小桥畔教堂斗争,清算了自 1935 年《北平协定》以来 11 年间教堂应退还的租股粮草,收回长 195 公里,宽 36 公里的全部土地。10 月,中共三边地委组成分配教会土地工作团,分赴东滩、宁条梁、白泥井 3 个教区,将 14 万亩教会耕地分配给 1.3 万农民(占全县人口 1/3),每人分得耕地 5 垧(25 亩),并颁发了土地登记证。从此,三边人民洗雪了 46 年的耻辱。

1946 年 8 月,在欢迎地主献地政策的号召下,新十一旅二团团长李友竹(共产党员)、一团副团长高昆山、一营营长冯世宝相继献地千垧。10 月,在安边县长刘文卿的带动下,韩继臣、傅子奇等 11 户地主献地 2 万余亩。献地后,边区政府工作组协同区、乡干部、农会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分了土地,贫雇农每人分得水漫地 2 垧至 3 垧。三边的献地分地工作还没有结束,征购承购土地尚未进行,就因胡宗南进犯边区而中断。

1946 年 8 月,绥德分区也采用鼓励地主自觉献地和清算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受到开明地主、开明绅士的积极拥护。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张哲卿、蔡幼轩、白联娥等献地 8600 余垧;米脂地主献地 1416 垧(每垧 3 亩);子洲绅士安旗庭代表母亲、兄弟献出山地 10 垧、川地 2 垧和应征购的窑洞 3 孔。

然而,在献地活动中一些地主乘机钻空子,只献坏地、山地、远地,还戴上“开明”绅士的假面具,麻痹群众,逃避

清算斗争。边区政府派赴绥德分区的工作组,发现佳县车会区的许多村庄,竟有 7 年未减租的情况。在已经分配过土地的地区,也发现程度不等地存在地主以抽地,对抗减租、查租、退租等明减暗不减问题。

二、征购地主土地的土改运动

1946 年 12 月 20 日,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边区政府与西北局共同抽调各级干部 1000 多人,组成 3 个征购地主工作团,分赴绥德辛店一乡、米脂杨家沟和庆阳王家源进行征购地主试点。

绥德辛店一乡的试点,在开展了宣传《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发动群众、成立征购地主土地委员会的基础上,采取摸清土地情况、评议阶级成份、确定征购和承购户、签订契约等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征购地主工作。米脂杨家沟的试点工作,以激发农民渴求土地的愿望,组织控诉地主大会的方法,引导农民走翻身解放的道路。经过一个多月的的工作,农民从全乡 63 户地主手中征购了 20881 垧土地,使 292 户无地或少地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 年 3 月 7 日,杨家沟附近农民代表 2000 多人,在杨家沟召开庆祝大会,推倒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功名碑”,为农民树立了“翻身碑”,并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致函,报告翻身喜讯,表示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八路军的感谢。

1947 年 1 月下旬,榆林解放区各县,展开了发动群众,征购地主土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土改运动。为了促进土改运动,2 月 13 日绥德地委发出《关于春耕前深入发

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补充指示》，明确提出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仍是当前工作的中心任务。并向佳县、米脂等县派了土改征购工作团。2月20日，榆横特委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横山县在殿市、韩岔二乡搞了试点。各县分别召开了土改、战备工作会议，掀起了征购与清算斗争相结合的分田分地土改热潮。与此同时，过去已分配土地的老区佳县、清涧、绥德等地，进行了土地登记、解决地权纠纷、进一步落实减租政策等工作，也取得较大进展。

但是，由于土改政策不够完善，一些干部把富农看成团结对象，走了富农路线，地主的红约老帐未销毁，有的干部出现了包庇地主、窃取斗争果实、多吃多占等错误倾向。更为重要的是虽经清算斗争，但地富占地较多，贫雇农得地较少。米脂县地主人均占地3.44亩，富农人均占地4.6亩，贫雇农人均仅有1.7亩，农民的土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三、“左”偏与大力纠“左”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新民主主义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实行按乡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的政策。

11月1日，西北局在绥德义合召开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和县长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总结了贯彻“五四”指示以来的土改工作成绩，批判了以往土改工作中

的右倾做法,作出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

会后,榆林解放区普遍召开了干部会,传达贯彻义合会议精神,迅速开展土改和整党试点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老区、半老区陆续开始土地改革。

然而,在土改的发展过程中“左”的错误倾向也日益抬头。片面宣传所谓“贫雇农路线”、“彻底打乱平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采取一些过火斗争的方式方法,结果程度不等地出现了“左”的偏差。有的地方划定农村阶级成份标准严重紊乱,错定、高定阶级成份。只看铺摊大小、财产多少或生活好坏定成份。主张在农民中间“平圪塆”、“削圪崂”、“筷子里选旗杆”,把成份已经转化的旧地富拉出来批斗。侵犯新富农或富裕中农的利益,排斥中农。对地富不给出路,挖底财、分浮财,扫地出门,乱打乱斗乱杀人,使用肉刑致残致死被斗对象。绥德县义合、延家川两区非正常死亡80多人,佳县死亡达130多人,子洲死亡35人,122个地主、富农外逃。集镇、县城工商业者被斗,其店铺作坊资产被没收分配。一些坏人乘机兴风作浪搞报复,借口“打破旧框框”,“反对旧干部路线”,搬开原有基层党政组织。党员、干部不分好坏,统统踢开或挨斗,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佳县城关群众针对当时的“左”偏状况说:“贫雇农在外独跳哩,中农关门在家睡觉哩,地主富农逼得寻死上吊哩。”清涧勤劳致富的一位老贫农痛心地说:“冤屈冤屈真冤屈,屈了我生产好劳力,吃穿二字均节省,几年节省成了新富农,帮助国家打胜仗,他们计划把我斗,斗了我生产好劳动,我一觉睡到大天明。”

“左”偏倾向,违背了土改政策的基本原则,造成一些地方农村阶级阵线严重混乱,农村基层党政组织陷于瘫痪,社会秩序不稳,人心惶恐,对解放区的稳定和生产建设、支前、抗灾等工作起了负面作用。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米脂杨家沟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强调指出党的土地改革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在土改中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同时还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是两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肯定了土改运动的巨大成绩,也严厉批评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任弼时在关于土地改革的发言中,深刻批评土改中盲目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指出对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应采取正确的政策,要求各地加强领导,坚决迅速地纠正各种“左”的偏差。

杨家沟会议后,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立即赶赴绥德、米脂、子洲、镇川等县,传达会议精神,并针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严肃批评。要求各分区、县党政机关迅速行动起来,果断制止坚决纠正各种“左”的错误行为,把土改尽快引到党中央新确立的正确轨道上来。

此后,绥德分区,三边分区,镇川和横山等县,依据党中央一系列政策文件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各项具体政策、规定、指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慎重周密地决定纠编任务、工作步骤与方法,分期分批地展开纠“左”复查工作。坚持有错必纠,切实兑现的原则,对错定错斗者逐个复查郑重更正,召开大会宣布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坚决退还

土地财物,合理补偿损失;对少数坏人利用土改乱打乱斗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司法机关查清事实依法惩处。对留土地、财物过少的地富,也补足了应得的一份,还发了土地证。

彻底的纠“左”工作,刹住了泛滥一个月的极“左”风潮,为取得全解放区的土改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土改胜利结束

杨家沟会议以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确立“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指导思想,对老区、半老区加强了调查研究。从大量的调查材料中,掌握了老区半老区土改的固有特点。经过反复研究,深思熟虑,郑重决定以“抽补调剂”作为边区今后土改的指导方针。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方针,西北局抓基层,树典型,总结推广了绥德义合镇7乡黄家川村抽补调剂的成功经验。

黄家川村属老解放区,住74户,333口人。1947年春进行过一次比较彻底的土改,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土改干部进村后,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群众共同调查研究和登记土地,终于找准本村土地分配不公的情况。通过算帐,激发了贫雇农对土改的要求,引导他们向地主作斗争。同时重视做中农的思想工作,解除了他们的顾虑,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经过反复酝酿和充分协商,决定了按全村平均产量及人口,并照顾贫苦和老弱病残的抽补方案,先动地主的土地和公地、学田、绝户地,不足部分再动中农真心实意自愿献出的少量土地,合理兑换了远近地,调剂了园地。分配方案张榜公布后,交村民大会复查核

实通过。并且还颁发了临时土地证。黄家川的“抽补调剂”工作,既较好地满足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全村各阶层都满意,革命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黄家川的成功经验,把“抽补调剂”方针具体化,西北局认为是创造性的正确做法。毛泽东看了材料后,非常高兴,指出黄家川的经验具有典型性,对全国老解放区土改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随之《群众日报》、新华社、各解放区报纸纷纷转载。毛泽东还亲笔对绥德黄家川等三个土改经验材料做了批示,印发每个乡村干部学习。同时,榆林特区在镇川市进行土改试点取得经验,由董英等人撰写的《镇川堡工商业调查》一文在《群众日报》上发表,新华社也同时播发,成为全国土改的先进典型。

榆林各分区、县在黄家川土改经验的指导下,结合本地的实际,认真贯彻土改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抽补调剂、土地登记、评产、发土地证、确定地权等工作,使土改沿着正确轨道稳步前进。1948年10月,绥德分区406个乡的5147个自然村土改胜利结束。除分给农民应得的土地财物外,还从斗争果实中发给农民救灾粮7121石,衣物2.47万件,银洋4.58万元,白银1.46万两,元宝315个,黄金95两,纸币16亿元。

经过土改,彻底地消灭了农村残存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巩固了民主政权。

五、整党

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义合召开的边区干部会议上,针对党内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

题,决定以“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纪律制裁”为方针进行整党。

12月中旬,中共绥德地委、三边地委相继召开区、县干部会议,传达义合会议精神,订出本地整党的具体措施,逐步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波浪式向前发展的整党。三边地委在进一步落实“抽补调剂”土改方针的同时,认真抓了定边、靖边、吴旗等县的党组织整顿恢复和党员的审查工作。对叛变自首的党员分别进行了处理,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年底,绥德地委在义合镇黄家川村进行整党试点。

1948年7月19日至8月4日,西北局在延安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传达了中共中央《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结合整党试点经验,具体地指明了整党的方针、政策、方法和步骤,全面安排了农村整党工作。9月,绥德、三边分区整党工作有领导、有步骤、有政策地全面展开。吴堡县的整党,先在宋家川、东庄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推广全县,收到较好的效果。全县清洗了16名蜕化变质分子,处分了78名严重违纪党员,纠正了党内的贪污、腐化、强迫命令、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使全县1553名党员受到教育,同时发展了204名新党员。

1948年秋冬,榆林解放区的整党胜利结束。

第十二章

坚持自卫战争 保卫榆林解放区

第一节 国民党军大举进犯榆林解放区

一、在北线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全面爆发之后，蒋介石集团进一步加强了从南、西、北三个方面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阴谋利用时机突然袭击延安，吃掉陕甘宁边区。

榆林解放区地处陕甘宁边区的北部，蒋介石为加强其在陕甘宁边区北线的军事力量，命令驻榆林的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赶修榆林飞机场，召集徐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并于11月6日将胡宗南部的整编第二十八旅旅部及其所属第八十三团从西安空运到榆林。一面增强国民党军在榆林的兵力，一面监督邓宝珊的第二十二军这个“杂牌”部队，为其进攻陕甘宁边区出力效劳。

驻榆林的第二十二军是从1946年9月开始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二五七团9月30日侵占佳县古木区马家圪村，10月3日侵占车会区刘家崖窑、宋家西畔、木瓜树岭村，6日

又进犯古木区公署驻地石家孤村,击伤区保安队战士三人。同时侵占米脂县民权区海会寺一带,侵占横山县米家园子、吴庄、兴隆寺村。在北线之东的神府,二五六团侵犯神府县二区的贺家沟和七区的龙尾岭、任念功等村。11月16日,二五七团又侵犯鱼河岭一带。国民党军侵占的地方,虽然大都被当地民兵武装收复,但对群众造成了重大的财产经济损失。

1947年2月,胡宗南飞抵榆林,具体部署包围延安事宜,并在榆林城内中山堂向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反共讲话。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后,胡宗南又于4月初将其整编第二十八旅之八十二团、八十四团空运至榆林城,增加北线进攻解放区的兵力。26日,整编二十八旅分三路南下绥德、米脂,寻找解放军主力作战。同时,二十二军的两万多人也向横山、米脂、佳县解放区进攻。

二、在西线

国民党军在从陕甘宁边区北线进犯边区的同时,也从西线进犯边区。

1946年9月23日,绥远国民党军一部,在第二十二军二五七团的配合下,进犯西乌舍利庙,24日进犯靖边县巴兔湾,抢劫马匹数百。12月17日,宁夏马鸿逵部一个团侵占盐池县二区牛毛井、聂家井等地。接着,马鸿逵陆续派遣骑兵旅、整编第八十一师和三个保安团东渡黄河,集结在三边以西地区,近窥三边。

1947年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

步芳亦不惜血本,出动6万多兵力进攻三边分区。3月21日侵占盐池,4月3日攻陷定边,4月6日再占安边城。三边大部地方被其侵占。

三、在南线

国民党军从南线进犯榆林解放区,是在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军占领延安空城之后。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侵占延安一座空城后得意忘形,急欲寻找解放军主力作战。3月下旬,胡军数万人尾随中共中央机关踏入清涧县境。3月31日,整编第七十六师侵占清涧县城。4月26日,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的9个半旅14万人,排成纵横十数公里的“战斗方阵”,沿咸榆路北上向绥德方向进犯,5月2日,进占绥德城,不久又侵占子洲。7月,胡宗南部尾随中共中央机关进犯米脂,并侵占米脂县城。8月14日,整编第三十六师悉知西北野战军撤离榆林,旋即沿咸榆公路南下尾追,董钊、刘戡率7个旅北抵绥德,配合作战。16日,董钊率整编第一军军部另两个整编旅进攻米脂;刘戡率五个整编旅由绥德又合北进佳县;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进至镇川堡向沙家店进犯,准备双向夹击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

国民党重兵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榆林解放区的乡村。然而,就在如此严峻残酷的情势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在陕北,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自卫战争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

第二节 中共中央转战在榆林

一、毛泽东在榆林的光辉行程

1947年3月18日傍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延安后,于3月19日转战榆林境内,途经清涧、子洲、绥德、米脂、靖边、横山、佳县、吴堡8个县,曾在邱家坪、天赐湾、小河、青阳岔、梁家岔、朱官寨、南河底、神泉堡、杨家沟、吉镇、刘家坪等36个村庄居住,并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3月19日来到清涧县的徐家沟,20日转移到高家峪村。3月29日晚上到清涧县石嘴驿乡的枣林沟村,当晚举行政治局会议。后到绥德县的田庄,刘少奇、朱德等乘车前往河北,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则骑马沿淮宁河向西行,经子洲县南川的邱家坪、高家场,绕道子长县的石家湾,4月5日黎明到了靖边县的青阳岔。

毛泽东在青阳岔住了8天。他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通知》,指出: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他亲自安排部署了羊马河战役,用电函指挥西北野战军在4月14日,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一三五旅,生俘代旅长麦宗禹。4月13日,转移到王家湾。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并部署指挥了5月2日至4日的蟠龙战役。

6月7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向小河转移,后到天赐湾。16日上午,根据国民党军几次在天赐湾附近瞎闹乱碰的情况,和天赐湾地势险要,村子小,中央机关人多不便工作的困难,毛泽东便决定重新返回小河。毛泽东二次到小河后,由于全国和陕北的战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在小河比较稳定的住了48天。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在小河台兑沟召开纪念七一大会,周恩来发表了重要讲话。7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决定离开小河向东转移。为了保密,改变了番号,中央机关三支队变为九支队,中央警卫团由九团改称三团。

8月1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青阳岔。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部队向东转战,当晚在横山县火石山乡小水沟村宿营。4日,路经石湾镇村接见了部分县区干部和武装民兵,当晚住在肖崖村。8日,率九支队经子洲县巡检司向东进发。9日晚上,到了绥德县李家崖。连日以来,全国各主要战场上进展顺利。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继鲁西南大捷之后,又粉碎了蒋介石分进合击的阴谋,开始了向大别山的千里跃进;陈赓率领的太岳兵团,横扫晋南敌军,作好了强渡黄河的准备;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已扫清榆林外围之敌,开始了攻城准备。一切都在按照毛泽东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部署进行。由于董钊、刘戡正在加紧向绥德靠拢,钟松提早逼进榆林,西野攻城的准备工作尚未完全就绪,但调胡宗南主力北上的目的已经达到。为了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毛泽东于李家崖命令西野:在钟松赶到榆林前,撤离榆林。

8月12日午后,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从李家崖出发,急

行军 30 公里,于 13 日到了绥德城西 5 公里的黄家沟村。太阳下山后,刘戡率二十九军离黄家沟不远了;董钊的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已过了清涧,正向绥德猛扑。毛泽东立刻率九支队出发,终于抢在董钊、刘戡前面,赶过绥德永定桥(十九洞大桥)向佳县转移。14 日,到来脂县井家坪住宿。15 日,住佳、米交界处的陈家岔。16 日,途经佳县乌镇,晚上来到神泉乡曹家庄村。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开会,对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是否过黄河的问题,又经讨论统一了意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不过黄河,继续留在陕北。会后,周恩来打电报给彭德怀,说明中央不过黄河,仍留在陕北。彭德怀马上复电,建议中央机关向佳县以北通秦寨转移,又派许光达司令员带领第三纵队连夜到乌龙堡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安全转移。

8 月 17 日拂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到了佳芦河边。因前日晚下暴雨佳芦河水猛涨,连佳芦河的支流五女河也过不去。这时已能听到后边国民党追击部队的枪炮声,遂决定改变行军方向,沿五女河南岸朝西北前进,经小石板、大石板桥村,下午到白龙庙村宿营。18 日,过了五女河,沿五女川西进,傍晚到了杨家园则村住宿。19 日,经曹大壩村、磨川村、蒋家崖村、黄石壳村,天黑前到达兴隆寺乡梁家岔村。

毛泽东来到梁家岔,下令立刻架通与西野总部的电话线。电话铃响了,毛泽东健步走到跟前,拿起电话机说:“是呀,我是毛泽东!”自从转战以来,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他的真实姓名实行战场指挥,这说明战局大大改观。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汇报指示说:“好,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

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当日傍晚，为了保证打好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沙家店战役，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连夜赶到距梁家岔村 10 多公里路的西北野战军驻地前东原村，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对沙家店战役进行了具体部署，当晚又返回梁家岔村。8 月 20 日，沙家店战役大捷。21 日，毛、周、任再次到前东原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表扬沙家店战役打得好，并向参加会议的西北野战军全体同志祝贺胜利。

8 月 23 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从梁家岔动身，倒经黄石壳村、蒋家崖村、磨川村、曹大塌村、石家砭村，傍晚赶到朱官寨乡朱官寨村。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在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指引下，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迅速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预言：“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9 月 21 日早晨，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从朱官寨动身，经过苏家砭、马家砭山路，傍晚到达神泉堡村。毛泽东在神泉堡居住的 52 天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同时主持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

号》、《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关于公布土地法大纲的决议》等重要文件。毛泽东还先后到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底、白云山、香炉寺、吕家坪、峪口纸厂、阎家砦等地，视察或居住。毛泽东每到一处地方，总是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询问干部的工作，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教育干部战士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战胜灾荒。10月18日，毛泽东应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的请求，在白市布上挥笔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光辉题词。

11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部队，从阎家砦动身途经乌龙堡离开了佳县，21日住米脂县申家硷村。第二天，向米脂县的杨家沟转移。转移前，中央机关的番号又改为“亚洲部”，中央警卫团三团改称“亚洲部”三团。22日，到了米脂县城东20公里的杨家沟。毛泽东在杨家沟4个月，是转战榆林以来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关于情况的通报》等17篇重要文件。周恩来写了《关于全国战争的形势》、《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等重要文件。毛泽东在杨家沟，亲自指挥了西北战

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还亲自指导了杨家沟的土改。他不但派出一批工作人员参加土改，还抽时间亲自参加土改会议，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杨家沟的土改运动健康地发展，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到了绥德县古镇。23日上午，沿黄河畔到达吴堡县岔上乡川口村，从园则塔渡口乘木船渡过黄河。至此，毛泽东离开了他生活和战斗过13个春秋的陕北，离开了榆林。

二、中共中央在榆林召开的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 1947年3月29日晚，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留不留陕北的关键问题。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暂住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中央前委机关也按照军事编制武装起来，编了4个大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其番号先后为三支队、九支队、昆仑支队、长江部、亚洲部等。为了保密，毛泽东取代名“李得胜”，周恩来代名“胡必成”，任弼时代名“史林”，陆定一代名“郑位”。

中共中央小河村会议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靖

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陈赓、彭德怀、杨尚昆、林伯渠、贺龙、王震、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张经武、李井泉、王铮等人。会议主要研究了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形势下的许多重要问题。确定了“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互为犄角，逐鹿中原”的战略进攻布局。为了便利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中原行动，决定西北野战军佯攻榆林，调胡宗南主力北上；山东解放军发动胶东攻势，把敌人引向海边；贺龙统一领导晋绥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等。这次会议后，全国解放区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中共中央杨家沟会议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谢觉哉等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7日至24日举行预备会议，分政治、军事、土地政策三个小组，座谈形势、政策和工作情况。各地土改、整党中产生的一些“左”的倾向，引起与会者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25日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多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军事史上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制定了经济政策。还对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形势报告，详尽分析了全国战局的发展形势和敌我军力对比的巨大

变化,指出在战争第二年内我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无例外地转入主动。他代表党中央提出,要将革命战争一直打下去,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消灭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任弼时在关于土地改革等问题的发言里,严肃地批评了土改中盲目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指出对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应采取正确的政策,要求各地加强领导,坚决、迅速地纠正各种“左”的偏差。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人在会上认真地总结了工作,并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作了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28日,会议结束。各地来的同志返回战斗岗位,传达贯彻会议精神。

1948年1月,中共中央在杨家沟继续开会,进一步研究战略进攻和如何纠“左”等问题,慎重制定土地改革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对于西北各地的工作,继续给予强有力的指导和帮助。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党政领导机关在榆林

一、马蹄沟整编

随着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撤出延安。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转战陕北,坚持对边区各地的实际领导,配合西北野战军不断取得胜利。

为了适应环境,适应战争需要,在撤离延安之前,西北局分设了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马明方为书记的后方工作委员会。边区政府也成立了由林伯渠主

持的后方工作委员会，并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之前，率领由范子文、曹洪澄等组成的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到了安塞。据随行的杨明轩《读书札记》记载：3月13日到白家坪，27日到安定旧城；4月4日到白庙岔；6月12日到绥德庙岔，25日经绥德抵子洲县，26日到马蹄沟。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转移到子洲县马蹄沟后，边区政府举行政务会议，决定撤销一批与战争关系不大的组织机构，紧缩各厅局办事处人员。撤销总动员委员会，将战时动员工作划归民政厅统一领导。大力加强兵站部工作，由其统筹安排和实施战时转运供给。6月底，边区政府后方党政机关在马蹄沟进行整编，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人数减为3746人，较1946年减少5038人。整编后，针对胡宗南军在老君殿、安塞、志丹等地“清剿”破坏的暴行，总结教训，组织群众反“清剿”。西北局于6月18日，发出《关于粉碎敌军清剿的指示》。7月1日，边区政府在马蹄沟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6周年纪念大会，林伯渠讲了话。7月9日，林伯渠和夫人朱明在马蹄沟接见了出席子洲县教师会的全体教师，并讲了话。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进攻，8月中旬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奉命东渡黄河，暂住山西破口高家坪一带。

二、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榆林召开的重要会议

义合会议 1947年10月，西北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胡宗南节节败退，延安以北广大地域已基本收复。10月20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西渡黄河，驻绥德义合一带。10月下旬，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和

整党的重大决策,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着重检查和总结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以来,边区进行清算、减租、征购地主土地的进展情况和问题。批评和纠正了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某些离开党的路线、政策和违反纪律的倾向,对于部分干部中出现的阶级观点模糊,对敌斗争不坚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思想,予以揭露、批评和教育。会议作出关于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开展整党工作的决议。12月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司令部发布《坚决实现土地法大纲》的联合布告。义合会议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同封建剥削阶级作斗争的积极性。然而,反右没有防“左”结果导致在土改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绥德会议 中共中央杨家沟会议结束后,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立即赶赴米脂、绥德、子洲等地,传达毛泽东的报告,检查并指导各地的工作。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召集绥德分区党政军和各县土改工作团党员干部200多人开会,详细宣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用好这个文件,认清时局,研究政策,掌握政策,要学会分析事物。指出当前尤应注意纠正把中农搞成富农等过“左”的偏向,强调各地必须把土改与救灾紧密结合起来。15日至16日,西北局召开会议,由习仲勋传达杨家沟会议精神并报告在绥德分区视察情况。全体与会者认真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重要报告,深入研究如何把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及各项改革原则在边区具体化,确定土改、整党、救灾、生产、支前等工作的实施步骤

和方法。17日,西北局在绥德举行有640多人参加的边区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和西北局的有关决定。习仲勋在会上再次号召全区党员干部认真深入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武装思想、指导工作。对前一时期在战争和土改中,暴露出的一些“左”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边区党政军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加强对老区半老区土改整党工作的领导,迅速刹住极“左”风潮,认真复查纠偏,全面落实政策,抓好农村整党试点工作;紧急动员全边区军民奋起救灾;积极开展1948年春耕大生产运动;壮大和提高边区地方武装,加强对敌斗争;厉行统筹统支,精简节约的财政方针。

“两委”扩大联席会议 1948年2月27日至3月1日,林伯渠主持在绥德召开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常驻议员习仲勋、安文钦、房文礼、曹力如、霍仲年、高愉庭;边区政府委员林伯渠、贺连城、唐洪澄、霍祝三、霍子乐、王子宜、霍维德、蔡登霄。边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王维舟、李卓然、周兴、乔松山、范子文、常黎夫等列席会议。林伯渠作了《革命战争一年来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代表边区政府向全体军民提出“恢复经济,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习仲勋作了《关于边区土地改革的报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作了《关于边区军事形势与地方武装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1948年恢复与发展边区农工商业、合作社及运输业计划》等多项重要议案,一致增选杨明轩为边区政府副主席。3月18日,林伯渠、习仲勋、杨明轩、王维舟等专程到米脂杨家沟,代表边区党政军民与党中

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亲切话别。4月25日,林伯渠在绥德雷家沟发表谈话,称赞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的丰功伟绩。

1948年5月11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从绥德胜利返回延安。

第四节 西北野战军在榆林解放区进行的重大战役和新式整军运动

一、三边战斗

三边分区人民为保卫解放区进行的自卫战争,从1947年4月开始到1949年8月结束,艰苦曲折地坚持了两年多,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1947年4月5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入靖边县境,活动于靖边县芦河以南的青阳岔、小河、天赐湾一带。为了不使已侵入三边解放区的宁夏马鸿逵部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造成威胁,确保党中央、毛泽东的安全,西北野战军总部命令三边分区:“要动员所有地方武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来自北线的敌人,绝不允许其中任何一股危害中央的安全。”三边分区东线指挥部司令员曹动之、政委孙润华,随即命令驻守靖边张家畔周围的伊盟支队:要以芦河为天然屏障,阻击西北来犯之敌。

芦河,是靖边境内由西南向东北穿行的一条有名的烂泥河。当时,通过芦河的主要渡口是张家畔渡口和距其以北5公里的王家湾渡口。伊盟支队负责人王悦丰、高

平、高增培、谢有德等经过认真研究,将不足 400 人的兵力作了重点部署:由何福才一连防守张家畔中心渡口;王建国三连和石玉山警卫连防守王家湾渡口;李廷兰二连与乌审旗二大队做机动增援部队。

5 月 20 日,盘踞在宁条梁、白土岗子一带的马鸿逵部骑兵第二十旅,派出骑兵第十九团附马海潮还乡团 600 余人进犯张家畔。马军在强火力掩护下,组织了三次冲锋,妄图夺取张家畔渡口,进而向东南方向冒犯,但均被防守的伊盟支队击退。此时,司令部根据其它防线没有马军进攻的动态,分析马军可能集中所有兵力还要强夺张家畔渡口,遂决定开辟第二战场主动向马军出击。遂派侦察参谋周兴远带一个尖刀班,由苗家湾一带涉水过河,从侧翼袭击马军;命令驻守王家湾渡口的王建国、石玉山两个连迅速渡河对敌发起反冲锋。马军腹背受击,仓惶溃逃,伊盟支队乘胜追击到宁条梁毙伤对方 30 多人。加之马部第八十一师的一个团在环县被西野全歼,侵占三边的马部不敢东进,从而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靖边的安全。

6 月 25 日,西北野战军主力隐蔽从陇东分区的环县北进。29 日,第一纵队经沙漠苦水区到达定边南山,30 日和新四旅向定边发起攻击,守军马部一个团弃城西窜,定边城光复。7 月 2 日,第一纵队攻克安边,7 月 7 日,第一纵队攻占盐池城。

7 月 21 日,在三边休整的西野开赴榆林,马鸿逵部又派两个骑兵团侵占了定边、安边、梁镇等地。8 月后,马鸿逵部在定、安、盐三县又派驻大量部队。仅驻安边的兵力

就有整编十八师骑十旅旅部及其骑兵第二十团,宁夏保安第二团,三边保安司令张廷芝的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大队,共约3000人左右。安边县6个区(市)中,除砖井、柳堡、梁镇3个区的部分山区为游击区,其余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

1948年10月上旬,为了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三边军分区所属第二团、定边游击第二大队和安边游击队共800多人,集中在距安边城东5公里的石洞沟一带。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把安边张廷芝保安团的3个步兵营、一个骑兵大队和赵级三的骑兵支队,共1000多人引出来,经过激战毙伤80多人、俘虏20多人,缴获一批战马和枪支弹药。

1949年春,马鸿逵的一部分兵力调往陇东,进犯关中。驻三边的兵力只有两个骑兵团和张廷芝的保安团,总共3000多人,全部龟缩在安边、定边、盐池三座县城。驻安边的有张廷芝保安团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大队和马鸿逵的骑十旅第十九团,他们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妄图负隅顽抗。中共三边地委决定由保安分处处长邓国忠、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牛化东和副政委孙润华,率领三边军分区所属第二团、定边游击第二大队、靖边游击第三大队、安边游击队共1000多人,对安边守军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6月14日攻克安边城,缴获六〇炮3门、炮弹10余发,步枪10余支、子弹2000多发,战马36匹、马刀64把,俘敌3名、打死打伤2名。16日上午,从榆林西逃的国民党军又窜回包围了安边城。17日夜晩,邓国忠、牛化东率部安全突围,安边又一次失陷。

榆林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奉命西进。8月,定边、安边、盐池县相继收复,三边全境解放,党、政、军机关分批迁回县城。

二、沙家店战役

沙家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在榆林解放区进行的第一次重要战役。

1947年8月12日,西野主力从榆林撤围后,隐蔽集结在榆林东南的三岔湾至鱼河堡一线山上寻找战机,并让后方机关一部分人员在佳县北东渡黄河,制造中共中央和西野主力要东渡黄河的假象,有意迷惑对方。胡宗南误以为真,认为西野主力是“仓皇逃窜”欲东渡黄河。

8月13日,奉命急进援榆的钟松,带领疲惫不堪的第三十六师进了榆林城。但他尚未喘过气来,便接胡宗南的电报,声称发现共军主力,严令其率部南下“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14日,三十六师南下归德堡遇到解放军抗击,拐到鱼河堡附近宿营。15日,改走无定河西岸,16日进抵镇川。胡宗南部主力已会师绥德,董钊率整编第一军军部和整编第一师留守绥德、米脂;刘戡率第二十九军5个旅沿黄河直奔佳县圪镇店,刘戡与钟松东西相距不过百里路程。他们准备向东封锁黄河渡口,向西控制咸榆公路。此时,毛泽东、中共中央机关、西野主力部队都被挤在佳、米、榆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域,处于背靠沙漠,侧水侧敌的险境中,情况十分危急。8月17日,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彭德怀,中央不过黄河,关键是必须迅速歼灭国民党军之一部,粉碎其合围企图。

同日,刘戡率部继续向佳县逼近。自恃“援榆有功”的钟松急功近利,决定以第一二三旅附第一六五旅的四九三团为前梯队,由镇川向沙家店以东的乌龙堡前进;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的大部为后梯队,向沙家店以东行进。

彭德怀瞅准其南北夹击之势尚未形成的战机,抓住三十六师是骄狂、疲惫、孤军之师的弱点,果断决定,坚决消灭三十六师。

8月18日,钟松部前梯队由沙家店以南经万佛洞、高家园子向乌龙堡东进。上午10时,西野第三纵队和绥德军分区第四团、六团在乌龙堡以北地区与钟松的前梯队接触,且战且退,将其诱至乌龙堡北山。第一、二两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在常高山附近与钟松的先头部队刚接触,钟松部就退回沙家店。由于当日大雨如注山洪爆发,解放军暂停进攻。

8月19日,刘戡率主力进占了佳县城、神泉堡、李家庄、桃向圪塔等地,钟松率后梯队进至沙家店地区筑防,发现沙家店附近有西野主力,急电一二三旅向沙家店靠拢。一二三旅因畏惧西野伏击与夜战,仅派附属的四九三团先行驰援。

20日拂晓,战斗全面打响。西野围歼计划未变,仍把三十六师切成两块,分割包围歼灭。第一、二纵队向沙店店的钟松师部及一六五旅发起猛烈进攻;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把企图向西救援的一二三旅包围在常高山附近并展开攻击;第三纵队及警备四团、六团,在乌龙堡以南地带抗击刘戡增援部队。

战斗到13时，彭德怀下达了动员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发扬你们无限英勇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情绪激昂，勇气倍增，冲杀追击更加勇猛顽强。黄昏，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带少数官兵化装逃跑，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被俘，歼灭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多人；缴获山炮7门、迫击炮21门、六〇炮34门；轻机枪168挺、重机枪30挺、司登枪48支、步马枪2013支、短枪32支；山炮弹10发、迫击炮弹546发、六〇炮弹400发、各种子弹20万发；骡马577匹，无线电台5部、报话机4部、电话机27部。

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的第三天，解放军太岳兵团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切断陇海铁路，潼关告急，西安吃紧。胡宗南急电董钊、刘戡收拾败军南下。西野主力乘胜追击，西北战场的大反攻开始。

三、延清战役

沙家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积极实行反攻。9月23日，西野司令部在延长县西北的安家渠召开纵队干部会议。决定：第二纵队、第四纵队（由警一旅、警三旅、西北民主联军骑六师组建）南下黄龙山区，进行外线作战，调胡宗南主力南下，以利于解放军在陕北内线收复失地；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和教导旅、新四

旅在内线延长、延川、清涧一带，实施延清战役。会后，各部队按照作战部署，分别开始行动。

10月2日清晨，第三纵队和教导旅首先进击延川县城，一小时即攻克，全歼守军及保警纵队。当日夜9时，又攻克延长县城，全歼守军。第一纵队在清涧城南的三十里铺，击溃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师辐重营并俘其大部。

3日，西野前委在延川县马家店召开会议，研究攻打清涧问题。清涧守军第七十六师是胡宗南的嫡系，装备精良，战斗力强。针对强敌，会议做了打援攻坚的周密部署。彭德怀指出，收复清涧是收复瓦窑堡、绥德，巩固后方，夺取榆林，向关中进军的关键。他郑重宣布：“打下清涧，我请大家吃肉！”

4日，第一、三纵队完成了对清涧城的包围。6日下午4时，攻夺清涧城的战斗打响。由于守军凭借重重障碍，负隅顽抗，又加连续下雨，到第二天只攻占了10多个外围据点。彭德怀抽调打援的新四旅十六团参战，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城。守军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师长廖昂一日九电向胡宗南求援。

7日，胡宗南急派刘戡率5个半旅向清涧增援，遭到担负阻击任务的新四旅和绥德警备四团、六团的突袭、阻击，逼使其离开公路，钻入史村以北的山林里探寻前进。结果预计两天到达清涧的刘戡援军，到第4天还被阻止在清涧城西南15公里的樊家河至刘家河一线的山岭地带，直到清涧战斗结束。

9日，清涧城外围据点被西野陆续扫清，仅剩城西笔架山。笔架山周围是悬崖陡壁，国民党军多次进行过人工

切削，山上又有重兵设防，极难攀登。西野司令部在笔架山下召开紧急营连干部会，发扬军事民主，共同商讨攻坚作战方案。彭德怀带领野司指挥员亲临山下察看后，批准了大家提出的进攻方案。担任主攻的第三五八旅按照作战方案立即进行部署，于10日拂晓发起猛攻，10时攻占了笔架山，两连守军全部被俘。至此，整个清涧城完全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中。10日晚9时40分，对清涧城发起总攻。第三纵队独立第二旅五团首先炸开城东门，随后第一纵队的独一旅和第三纵队独五旅的十五团互相配合，又炸开了城北门，解放军冲进城内展开激烈巷战。到11日晨5时，解放军攻入七十六师师部和二十四旅旅部，并在城东北老关庙大碉堡旁的窑洞里，活捉了藏在灶炉箱架夹缝中的师长廖昂和躲在桌子底下的旅长张新。11日晨6时，战斗胜利结束。

此役俘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国民党清涧县长方本格等官兵4300余名，毙伤近1000人；缴获山炮4门、迫击炮及六〇炮28门，轻重机枪119挺、长短枪1300余支，子弹31万发、炮弹1100余发；电台5座、汽车一辆、骡马200余匹。10月11日下午，西野部队撤出清涧，进入绥德集结休整。

10月21日，西北野战军和绥德军分区全体军民5万多人，在绥德城举行祝捷大会。彭德怀司令员和张宗逊副司令员发表了重要讲话。彭德怀指出，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了7个月的自卫战争，消灭国民党军6万多人，打败了胡宗南的进攻，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我们还要继续消灭胡宗南部，解放大西北，打倒蒋介石，解放

全中国。张宗逊号召全体官兵要军民团结一致，紧密合作，英勇善战，克服困难，严格执行拥政爱民和拥军拥政政策，打到蒋管区去。

四、西北野战军在榆林解放区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12月上旬至1948年2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利用作战间隙，分别集中在米脂、绥德、清涧等地，结合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普遍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训工作，毛泽东把它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

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开诉苦会，普遍进行诉苦。其次组织学习土地改革和整党的政策，开展“三查”活动。第三在诉苦和“三查”的基础上，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活动。

新式整军运动的开展，使西北野战军达到了中央军委制订的“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要求。全军上下意气风发，士气空前旺盛，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毛泽东高度评价诉苦三查运动，认为这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个创造。周恩来连声称赞诉苦三查运动，是壮大解放军的法宝。

就在西北野战军全军进行新式整风运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西野的最高领导组织前线委员会，于1948年1月10日至20日，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1947年内线作战经验，讨论决定1948

年的战斗任务等重大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介绍了华东解放军一年来的作战经验，彭德怀先后作了《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关于我军转入外线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的报告，任弼时作了关于《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贺龙作了关于后方动员与后勤供给问题的报告。经过与会人员的热烈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使西北野战军高级指挥员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迪。这次会议也是对西野新式整风运动的总结，它为西野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奠定了思想和政策基础。为推动西北解放战争的发展直至取得胜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五节 榆林解放区的生产救灾和支前工作

一、严重的“胡祸”和天灾

在陕北自卫反击战中，国民党胡宗南、马鸿逵等部曾先后占领过榆林解放区境内所有县的城镇，“清剿”和“扫荡”了90%以上的乡村。其所到之处，一律实施灭绝人性的“七光”政策（即：房窑门窗要烧光，锅灶器具要毁光，骡马毛驴要拉光，粮食财物要抢光，鸡猪牛羊要吃光，碰见男人要抓光，发现妇女要奸光），还制造“无人区”，比日军的兽行犹有过之而无不及。陕北老百姓叫此为“胡祸”，咒骂胡马军是匪军。当时流行的民谣是：“国民党，坏中央，胡匪

来了民遭殃,吃了你的米和面,砸烂你的酸菜缸,又夺牛驴又牵羊,强奸妇女烧民房。”清涧县的7个区中,胡宗南部踏遍了5个区的23个乡、234个村。杀伤农民28人,拉走98人;刨抢粮食和面粉5153.5石,糟踏庄稼1.64万亩;抢去牛138头、驴584头、骡马66头、羊6307只、猪1568只;抢去衣服5.1万件、被褥3057件;银币9703元、边币1.72亿万元;损失饭锅1454口、瓮1474口、门窗1273副、桌凳6104张、农具5088件。子洲、米脂、佳县、清涧、镇川、靖边6县;被胡、马部拉夫死伤345人(其中被杀死100人);损失粮食3.79万石;毛驴3572头、牛194头、骡马106匹、猪羊1.34万头、鸡鸭4.17万只;踏坏麦苗98.92万亩,被奸妇女174人。至于群众损失的树木、门窗、农具、纺车、布匹、衣物、生活用具等,就更难以数计。胡、马部侵犯榆林,给榆林解放区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

在“胡祸”猖獗的同时,榆林解放区又遭受天灾的频繁袭击。1947年,普遍春旱、秋涝、霜冻,个别地方又遭受雹、水、虫灾,庄稼被毁,产量锐减。子洲县10个区60个乡,有9个区26个乡遭水涝、冰雹,15.46万亩耕地全无收成。米脂县亩产平均谷子2升、黑豆5升、高粱2.7升、糜子1升,4000户2万人没粮吃;佳县的佳北5个区27个乡379村受灾最重,亩产粗粮不到5升,全县5万多人没粮吃,多以荞麦花、野草、树皮充饥;清涧县3个区受灾面积达9.72万亩,32个村遭水灾,损失粮食2575石,牲畜、农具、家具、衣物、棉花、布匹等损失更大;镇川、横山县旱、涝、霜、冻、冰雹均发生,受灾面积12.73万亩,每垧平均收粗粮2至10升,70%至80%的人连野菜都吃不上;靖边县旱死麦

苗 8.96 万亩,遭雹灾毁田禾 6.01 万亩,青杨、龙洲、新城、镇罗遭霜冻,青杨区 2544 亩全无收成,2080 亩糜谷遭虫害,2.25 万亩田禾遭早霜冻死;安边县 32 个乡,24 个乡颗粒未收;定边县夏秋田 30 万亩,因受灾只收细粮 6670 石,人均粮 1.48 斗,没粮吃的 1154 户 6771 人。

天灾之年,子洲、横山重灾区,大、小理河畔的榆树皮被剥吃一空。在榆、横、米、佳一带有大批灾民逃荒,甚至一些干部也夹在其中。1948 年春,吴堡出现严重春荒,全县 59% 的农民陷于饥饿疾病之中,1101 户家无颗粒粮,以野菜充饥,1024 人卧病于榻;春夏之际,神府、神木两县有 10 万灾民度不过难关。由于胡宗南部的侵犯和天灾,镇川、佳县等地的伤寒瘟疫等多种传染病也蔓延起来。

“胡祸”天灾和瘟疫相继侵袭,给榆林解放区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也构成相当严重的死亡威胁和生存考验。

二、军民一体度灾荒

天灾和瘟疫日趋严重的状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杨家沟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曾专门讨论灾情并研究对策。毛泽东指示:陕甘宁和晋西北的灾荒是很大的问题,一定要努力解决好。

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早在 1947 年六七月间就十分重视救灾工作,成立边区生产救灾委员会,先后将 900 石救济粮分发给灾区人民。12 月,召开了生产救济会议,确立了救灾总方针:“组织起来,团结互助,生产自救,并辅之以政府赈济。”随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多次发出关于救灾问题的指示决定,强调指出:“动员一切力量和灾荒作斗

争,是当前最严重最紧急的任务,救灾工作与支援战争、土地改革同等重要,在重灾区则是救灾第一。”要求全边区每一个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应把救灾作为自己的责任,为战胜灾荒而斗争。同时,还制定了救灾的主要措施和办法。

榆林解放区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响应西北局、边区政府提出的“胡祸必灭,人定胜天”的号召,发扬老区人民久经革命战争锻炼和考验,吓不倒、压不垮的英雄气概,与“胡祸”、天灾及瘟疫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一、广泛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党员、干部、群众充分认识灾荒的严重性,树立必胜信念。各分区、县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习仲勋、林伯渠等领导人亲赴各地检查督导生产救灾落实情况。

二、安定和鼓励群众的生产情绪。号召生产发家,劳动致富。针对战争与灾荒造成的劳动畜力不足、种子缺乏的情况,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动员妇女上山下地。鼓励群众抢种夏田多种秋田增加粮食产量,号召群众自救互救。佳县南部轻灾区向北部重灾区调剂谷糠 1200 袋,粗粮 45 石。

三、各地大力发展打盐、挖炭、造纸、熬硝、畜力贩运等副业生产,大力恢复、开展群众性的纺织业,争取土布出口。同时,提高一切入口布税率 25%。

四、在土改地区没收地主埋藏的粮食,征收富农的多余粮食,并用斗争果实换取外地粮食籽种、农具、耕畜等分给灾民。鼓励群众互相借贷,有借有还。

五、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产粮区移民。绥德分区的重灾县,向陇东、延属、晋南移民 4.3 万人。

六、组织重灾区的群众,从志丹、陇东等地运粮。党中央指示太岳解放区,筹集10万石粮食接济陕甘宁边区。贺龙司令员亲临第一线指挥,边区政府派民政厅副厅长惠中权带领600名干部,赴河东组织运粮。榆林各地选派了500名干部,设立100多个转运站,组织10万群众人背驴驮,顶风冒雪日夜兼程运回全部粮食,解决了紧张的吃粮问题。

七、各地政府组织卫生机关、中西医下乡治病,狠抓疫病的预防和治疗。8月疫病得到控制,9月停止传染。

榆林解放区军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由于西北局、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各地党政军民万众一心,太岳、晋绥等解放区的大力支援,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灾荒、瘟疫。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三、榆林解放区的支前工作

胡宗南、马鸿逵等部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以来,榆林解放区人民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粉碎国民党军的侵犯,在极其严重的灾荒面前,进行了艰苦卓绝经常浩繁的战勤支前,为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

筹粮集草支前 支前中的头等任务,就是筹粮集草。战争刚开始,部队走到那里当地政府和人民就能保证给养。随着“胡祸天灾”的严重破坏,西野和地方部队的增加,军用粮草就越来越困难。但是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榆林解放区人民群众宁肯自己吞糠咽菜,忍饥挨饿,也要

把节省下的粮食送给军队。为了解决部队粮草,绥德分区从1947年6月即向各县布置借粮。先后三次向群众借粮5.98万石,超过当年应征公粮5.31万石的6700石;公草1100万斤,超支200万斤。后来,群众的粮囤囤都空了,实在拿不出粮食。但是老区人民热爱解放军,仇恨“胡儿子”,他们把地里尚未成熟的玉米、黑豆、高粱、糜谷穗子剪下,在炕上烘干、锅里炒干,不分昼夜碾好送给解放军。有些地方,把正在地里长的洋芋、南瓜送给部队吃。人民群众竭尽全力支援了前线,他们一门心思就盼解放军打胜仗,以后跟上共产党过好日子。1947年11月,神府县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还动员1000多名青壮年,3000多头牲畜,组成几十个运输队,为部队攻打榆林城运送节省下的粮食。12月,绥德分区为了支前和救灾组织群众到山西运粮。人民群众顶风冒雪,人背畜驮,昼夜不息,无怨无悔,为支援前线尽了最大的努力。

担架运输救护 当时,前线的战勤工作相当浩繁。除了运粮送草,还有转运军火、抬担架(分随军和临时)、运送伤员、破毁碉堡、转运机器物资、抬云梯大炮等等,需要大批的人力、畜力。绥德分区1947年动员民工420万人次,常备担架1900付,参加担架运输民工22万多人次,每个男劳力平均支前约40天;征用牲畜160万头次,常备牲畜2986头,临时备用1.73万头,每头牲畜平均支差37天。最重的清涧县,每个男女劳力支前52天多,平均每头牲口支差110多天。吴堡县从1946年6月至1949年2月,先后6次组织担架370付,动员1857名青壮劳力,246头牲口,到沙家店、榆林等战场随军担架、运输、抢救伤员,

拥军支前。每次外出都因组织严密、奖惩严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绥德县常备担架队待命出发前，群众赵泰金和赵泰银兄弟两人争着要去支前担架，经区长劝解，老大才让给老二。榆林解放区人民群众不但完成支前工作，还以勇敢勤劳，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精神，完成了拥军救伤任务。涌现出米脂桃镇区 17 岁的支前模范刘启仁，子洲县马路沟区刘福昌领导的支前模范集体。他们不仅是最好的担架队，而且人人尽了最好的“护士”职责。1947 年 3 月，吴堡宋家川建立兵站，全县人民义务搬卸从华北运往西北的军用物资，人背驴驮，几乎天天不断。有一次，卸在黄河岸边的 4 船弹药压破结冰沉入水中，群众不畏严寒下水打捞上岸全部运走。

心连子弟做军鞋 自卫战争中，解放军采取毛泽东的“蘑菇”战术，要牵制国民党军像扭大秧歌一样，兜圈子。蹚蹚子，走很多路。解放军没有交通工具，只靠步行。有时一双鞋只能穿几天，部队需要大批军鞋。仅 1947 年，绥德分区 5 次布置做军鞋 27.05 万双。这些军鞋凝聚着榆林妇女热爱子弟兵的情意，串连着榆林人民与子弟兵的心。

架桥带路送情报 沙家店战役中，无定河涨水影响了部队行军。镇川县三个村群众自动拿出门板、井绳、驮绳，利用船只，一夜间搭起一座浮桥，让解放军迅速地通过。战士们高兴地说：“有榆林人民帮助，纵有天险也挡不住我们的胜利前进。”解放军行军途中，米脂群众设下长达 15 公里的开水站慰劳战士。军队每到一个地方，政府就组织群众诚实地为部队带路送信、探听军情、传递情报，使人民解放军“处处明亮。”主动攻击；蒋胡军逆民心，害民意，

搜刮残害人民，“处处黑暗”，到处被动挨打。1947年3月至1948年1月，边区群众为解放军当向导1.17万人次。其中，榆林解放区群众为党中央、西野部队、各级党政军干部当向导，要占相当大的比重。榆林解放区的群众，为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为了保守西野部队的军事机密，为了掩护各级干部和伤病员的安全，不论男女老幼都能做到守口如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7年春，绥德分区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接应由延安、关中、陇东、三边来的机关、学校、医院、家属等，东渡黄河到东北、华北、华东解放区去。在近两年时间中，清涧、绥德、米脂、吴堡、佳县的地、县、区、乡干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组织民工、畜力，筹备粮草，安排食宿，迎来送往。黄河沿岸所有船只和水手，昼夜不停地往返摆渡。安全护送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徐向前等党政军领导人渡过黄河。周恩来副主席曾经两过宋家川渡口，代表中央对吴堡人民积极支前，顺利完成中央机关东渡任务，给予高度的赞扬。

榆林解放区人民群众在支前中做出了无私无畏的奉献，正如西野彭德怀司令员所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的政治上最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

第十三章

进行外线作战 解放榆林国统区

第一节 两次攻打榆林城受挫

一、第一次攻打榆林城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实施在小河会议上制定的战略进攻总部署,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北上,力求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命令晋绥军区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同时,指示西野主力攻打榆林。

7月22日,西野主力从靖边东移到子洲县的双湖峪、周家峪、水地湾集结。做了围攻榆林的具体部署:第二纵队、新编第8、教导旅向高堡、鱼河堡、归德堡、三岔湾、赵庄等外围据点攻击,然后第二纵队绕过榆林城东,向北、西北城垣突击;新编第四旅向城东南攻击,教导旅为预备队;第一纵队统一指挥绥德军分区第四、第六团,以一部兵力攻击响水堡外围据点后,向榆林南、西南城垣攻击;第三纵队带领独立第五旅,由沙家店经杏树塔、银匠岭攻击刘千河、青云山,独立第二旅西渡黄河后,攻击高家堡、乔岔滩,然后两个旅均向榆林城东攻击。要求各部队于7月30日至8月4日先后向指定战场攻击前进,8月6日开始总攻。

榆林城，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是贯通陕北、连接山西、绥远的重要交通枢纽。榆林守军西与马鸿逵部，南与胡宗南部形成犄角，北与绥远傅作义部遥相呼应。城周有较多的坚固据点，城墙悠久坚厚，易守难攻，是军事防守的重要关隘。蒋介石深恐丢失榆林影响西北战局，急忙于8月7日飞抵延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向胡宗南部高级将领面谕陕北作战要急进猛攻的战法，命令钟松第三十六师由左翼沿长城东进侧击解放军，榆林解围之后南下与北上主力会合，在榆、米、佳之间的三角地区围歼西野主力。胡宗南盲从蒋介石的授意，电令邓宝珊固守待援，命令正在志丹、安塞地区“清剿”的董钊、刘戡率7个旅，分两路向绥德、佳县急进。钟松率两个旅组成快速兵团，轻装经靖边出横山县城北上，沿长城星夜兼程驰援榆林。

8月2日，驻榆国民党守军获悉解放军分三路向榆林挺进的消息，邓宝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放弃除神木城以外的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榆林城，并对城防作了具体部署：二十二军八十六师负责东、西、北三面城防和城外东岳庙、官井滩的防务，由副师长张云衢任东城、北城指挥官；西城分为两段，大西门由保安第十三团团长江子亚任指挥官，小西门由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博学任指挥官；二十八旅防守榆林南城和城外的凌霄塔、三义庙、飞机场等据点，八十二团团长江松山任南城指挥官，八十三团团长江明权任城外据点指挥官，八十四团团长江菊村驻城内南街为总预备队；新十一旅二团由三岔湾撤回，防守金刚寺邓宝珊总司令部“桃林山庄”。6日清晨，各部进入指定防区，邓宝珊亲自检查了城防工事。要求守军每夜在城

墙外边间隔 10 米,悬挂一个燃烧的炭笼。城墙上每隔 300 米,堆放 10 多箱手榴弹。城墙下端炮台里的重机枪,对城外构成交叉火力。

6 日晨,解放军第二纵队迅速将撤至赵庄、三岔湾一带的国民党新十一旅二团和二十八旅一个营包围,战至下午三时将其全歼,俘团长周效武,趁胜攻占了城北的镇北台、红石峡、北岳庙等阵地;第一纵队向城南 918 高地和飞机场逼近,新编第四旅攻占了青云山、金刚寺;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旅击溃刘千河、殿皇岭守军后,攻占了城东的无量殿高地;独立第二旅渡过黄河后,7 日攻克高家堡,全歼守军,俘国民党陕北警备司令张子英、二十二军二五六团团团长李含芳等;防守横山的保安第五团,于 7 日弃城北窜。

7 日晚 10 时,解放军第一、二纵队分别向城外重要据点凌霄塔、官井滩发动进攻。同时,在西沙梁架起数门迫击炮向城内轰击。当晚攻占了飞机场、三义庙、东岳庙和官井滩等阵地,基本完成了对榆林城的包围,惟有凌霄塔未能攻破。凌霄塔是榆林城南的最高点,军事位置非常重要。从 7 日至 9 日,双方均不惜一切代价争夺。凌霄塔几次易手,双方均有很大伤亡。9 日,榆林守军将东岳庙、三义庙、官井滩的民房和小西门外的龙王庙,一律焚毁推倒,以便开阔火力射击范围。10 日,第三纵队独二旅由高家堡抵达榆林,加强了围城兵力。当日晚 10 时,解放军主力攻城。在西沙梁以平射炮向小西门附近的城墙轰击,掩护攻城部队架云梯登城。11 日凌晨 3 时许,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用炸药炸开了小西门,三营九连在连长薛占魁的带领下,冲进城与守军展开巷战。但因后续部队未能跟上,被守军

总部特务营的侦察连和二十八旅工兵连将城墙缺口堵住，九连除少数官兵撤出城外，大部壮烈牺牲。11日晚，解放军再度攻城，在夺回凌霄塔高地（塔身仍未夺回）的同时，利用重机枪和西沙梁增设的平射炮交叉火力，向小西门附近城墙上猛烈扫射、轰击，掩护部队架云梯攻城和组织爆破。但因爆破未成功，攻城部队遭到重机枪火力网封锁不能靠近。12日，国民党三十六师快速兵团已抵达榆林西南15公里的苏庄子、天鹅海子一带。西北野战军诱其北上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遂主动撤围榆林城。

第一次攻打榆林，共毙伤国民党军2000余人，俘3200余人。

二、第二次攻打榆林城

沙家店战役、延清战役、黄龙战役胜利后，西北战场的形势越来越好。此时，榆林城及其驻军已陷入孤城、孤军的境地。西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认为其时南下收复延安的条件尚不具备，而集中主力北上进攻榆林消灭二十二军，进而解放神木、府谷，既可扫清北线障碍巩固后方，又可为主力南下作战解除后顾之忧，遂决定第二次攻打榆林城。

10月22日至24日，西野命令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六纵队（由教导旅和新四旅组建）及绥德军分区第四、六团，先后由绥德向榆林开进。

榆林守军经第一次攻城打击，二十八旅又于9月被空运到西安应急，兵力更加空虚。总司令邓宝珊也远在北平，城防守备较为松懈。在解放军伏击飞机场时，守军才急忙

关闭城门,布置城防。高凌云二五七团防守城外东南的凌霄塔阵地;副师长张云衢指挥二五六团和军师直属部队防守东城和北城;新十一旅第一团防守西城,第二团一营防守南城;第三营防守北门外解振翔住宅和官井滩。

27日拂晓,解放军开始对驻三岔湾的新十一旅第二团二营发起攻击,守军在强大火力打击下败退至飞机场。经激烈争夺战,飞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并击毁运输机一架。29日,榆林外围的据点归德堡、三岔湾、五里墩、918高地、青云山、金刚寺、无量殿、常乐堡、红石峡等被解放军攻占。西野司令部由绥德清水沟移住榆林东南的韩家畔。30日晚5时,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独一旅和第六纵队新四旅的七七一团分别对三义庙、凌霄塔发起攻击,守军凭借明碉暗堡与地道相结合的强固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采用坑道爆破、排炮轰击、肉搏冲锋等战术反复争夺数次,翌日晨8时才将其攻占。守军二五七团被歼过半,残部由石佩玖团掩护逃回城内。军长左协中见情况危急,急电令驻神木城的二五八团星夜援榆。11月1日拂晓该团进至城郊,被解放军歼其一部,余部窜入城内。11月2日黄昏,解放军利用凌霄塔、三义庙有利阵地,集中火力进行强攻。第一纵队及第六纵队向城南和城东南主攻,第三纵队向城东和城北助攻。由于城上很多暗火力点事先未发现,解放军数次冲锋皆受到侧射火力狙击。加之攻城云梯长度不够,被守军从城墙上甩下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炸毁。战斗至3日3时,仍未突破城防,遂停止强攻,改用坑道爆破攻城。11月8日,解放军冒着飞机的轰炸扫射和守军的火力封锁,在城东南角魁星楼附近完成了长达60米和120米的两个坑

道。晚12时,二次发起攻城战斗。独一旅坑道爆破成功,炸塌南城墙宽约20米的缺口,解放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冲锋。战斗非常激烈,双方均有较大伤亡,守军以死伤700余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新四旅所挖坑道,因炸药包距坑道尽头远了一点,引爆后在城墙外三四米处爆炸,虽未炸开缺口,但把守城敌军震昏约半小时,因后续部队未及时登城,错过了战机。

解放军第二次攻打榆林战斗开始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左协中坚守待援,一面急令傅作义、马鸿逵派兵驰援,同时出动太原、延安、西安、归绥等地空军飞榆助战。

11月6日,马鸿逵部整编第十八师师长马敦静带领3.5万余人的宁夏援榆兵团,经三边东进援榆。北路援军傅作义部暂编第十七师由邓宝珊率领从包头抵扎萨克旗,声称10日已抵达五道河则,距榆林50公里。当确知北边援军距榆尚远时,留绥德军分区部队在榆林城北监视傅部,主力于12日黄昏移兵西进,伏击宁马援榆兵团。13日清晨至15日,双方激战于巴拉素乡元大滩、巴拉滩、讨讨滩等地。经西野各部的伏击和三边地方部队的侧击,宁马军死伤、被俘、逃散约5000多人,缴获迫击炮10多门、轻机枪70多挺。

16日,解放军主力东移准备继续围攻榆林城时,侦知宁马援军并未回撤,而是绕道乌拉尔林,在榆林城北的庙嘴子、三道河则与绥远援兵会合,共援榆林城。于是,西野改变战略,撤围榆林,结束了第二次攻打榆林城的战斗。

第二节 解放神府国统区

一、解放神木县国统区

解放战争时期,神木县国统区有7乡1镇45个保。县城、城前的东西山、石窟上、高家堡、栏杆堡等地驻扎着国民党二十二军二五八团;高家堡、乔岔滩、龙尾峁、任念功、刘家畔等地驻扎着二十二军二五六团;石拉沟、瑶镇、高家堡等地驻扎着神木县自卫总队。另外,流亡的国民党佳县政府、县党部驻乔岔滩,配合国民党神木县政府进行活动。

1946年11月,国民党二五六团驻乔岔滩的一个营,经柳巷、刘家畔向解放区苏泥家河进犯。在花石崖西一带活动的神府支队,经一天的急行军,先期赶到苏泥家河设伏迎击,将其击溃,俘虏2名,缴获枪2支、子弹30余发。12月30日晚,神府支队经花石崖急行军,次日凌晨两点多赶到龙尾峁,趁国民党驻军熟睡之际,发起进攻,俘虏50多名,缴获全部武器弹药。1947年4月7日晚,神府支队秘密潜入石窟上国民党据点寨子门前的一排空窑洞内,次日凌晨,趁守军开寨门担水发起冲锋,攻下寨子。活捉自卫队长石百生以下40多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手枪50多支,子弹数百发、手榴弹数百枚。6月中旬,驻胡窑子据点自卫队30多人到解放区骚扰,神府支队在柳树沟将其包围,除队长逃跑外,其余全部俘虏,缴枪30多支。

1947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攻打榆林,调晋绥部队参

战,晋绥部队参加打榆林,必先拿下挡道的神木高家堡。高家堡驻有国民党二五六团和自卫大队一个补训营,还有陕北警备司令张子英的部分兵力,共1500余人。8月5日,晋绥军区第三纵队许光达司令员率独二旅和神府支队分四路对高家堡发起进攻。激战至7日,共毙伤200余名,俘陕北警备司令张子英、二五六团团团长李含芳、副团长崔尔骏和3个营营长及以下官兵1400余名,缴获长短枪800余支、轻机枪41挺、重机枪8挺、迫击炮6门、小炮两门、掷弹筒13个,子弹10万余发、炮弹百余发、刺刀291把、手榴弹2000余枚,骡马52匹、电台1部、电话机8部、望远镜7副。

高家堡解放后,驻守神木城的二五八团杨仲璜部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强迫群众构筑工事,加强防守。10月,杨仲璜带两个营西去援榆,神木城只留一个营和部分地方武装防守。为了趁机解放神木城,孤立榆林的国民党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一旅在副旅长吴岱峰和参谋长李治洲率领下,于10月28日进入神木。29日,警一旅和神府支队同时向神木城发起攻击,30日凌晨攻克。神木城宣告解放,8月成立的中共神木县委机关迁入县城,并成立神木县人民政府。

1948年春,流窜在神木北部地区的国民党神木县政府和自卫队等千余人,被二十二军改编为补训团,后又改为二五六团。3月13日,神木游击大队200余人进至鸡圪坨一带剿匪。14日晨,被二五六团包围。正在激战中,适逢张达志率西北野战军警一旅解放绥远东宫府、神山之后返回,即参加战斗,国民党军三面受击,溃不成军,团长方锦

海被活捉，团附王龙庭被击毙。1949年5月26日，流亡的国民党神木县政府秘书张希纲带领10余人向人民政府投诚。随着榆林的解放，国民党神木县政府垮台，余党有的投诚，有的被消灭。至此，神木县全境解放。

二、解放府谷县国统区

解放战争时期，府谷县的大部分地区属国统区，只有南部一小块地方（今白云乡一带）属解放区。以国民党府谷县县长诸承恩为首的地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府谷驻军二十二军二五八团第三营等部互相勾结，对府谷人民政治上实行高压，经济上加紧盘剥。

1946年7月16日，晋绥边区第二分区以李全超为团长、赵希贤为副团长的解放府谷随军工作团，先期进入府谷花坞镇一带。不久，山西兴岚支队西渡黄河进入府谷，在晋绥工作团的配合下，解放了花坞镇（今破壑乡高尧崂村），随即成立了中共府谷县工作委员会。7月下旬，工作委员会组建了百余人的府谷县游击队。几天后，晋绥二分区副司令员李仲英率领第三十四团，从山西河曲县西渡黄河开进府谷。8月初，三十四团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向府谷县城发起攻击。从3日开始，县城内的国民党党政机关陆续撤至哈拉寨（今哈镇）。5日下午，县长诸承恩弃城出逃。6日，府谷县城首次解放。

几天后，为了诱敌深入彻底消灭，解放军主动撤出府谷县城。诸承恩卷土重来，占据了县城。他多次电请驻榆林的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派兵增援府谷，一些豪绅地主也联名上书乞求。9月上旬，绥远准格尔旗保安司令部

的 200 多名步兵、50 余名骑兵进入府谷。

10 月 3 日,诸承恩率 260 余人在解放区的深壕、温家圪塔、薛家圪塔、白家圪塔等村抢粮。4 日,解放军四四中队与之激战于白家圪塔、薛家圪塔之间。次日晨,活捉府谷县自卫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柴千以下 53 名、毙伤 25 名,缴获步枪 38 支、冲锋枪 2 支,马、驴 12 头。

此次战斗后,诸承恩再次派人前往准格尔旗保安司令部求援,同时电请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派兵驻防府谷,并将自卫队的驻防作了调整,分部驻守镇羌(今新民)、天平镇(今木瓜)、庙沟门、石马川等地。1947 年 10 月中旬,中共府谷县委、府谷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解放军三十四团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向木瓜西南挺进,扫清了庙沟门、沙梁的自卫队,歼灭石马川守军。

由于蒙古军和自卫队的接连失败,诸承恩再次电请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火速调兵增援。总司令部电令其向附近友军求援。诸承恩派人带着礼物前去十里长滩,请求朱五美的保安团增援。朱五美的保安团是由兵痞流氓、逃亡地主、社会渣滓拼凑的一支顽军。1948 年 1 月,朱五美令其参谋率 200 余人前来府谷驻防。8 日中午,十里长滩来电告急,该部又匆匆返回。

1948 年 1 月 16 日,晋绥军区第三十一团(由神府支队改编),在刘吉甫团长的率领下,奉命从神木出发,挺进府谷。途经镇羌消灭民团 1 个连和部分自卫队,俘获自卫队 23 名。17 日,三十一团绕木瓜向县城逼近。三十四团也由南向县城运动,对府谷县城形成包围圈。诸承恩弃城逃跑,自卫队不打自散。同时,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进入外线作战,

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姚喆率领野战骑兵团第三旅,晋绥二分区第四十团、四十一团,神池游击队,偏关游击队,河曲与五寨的警卫连,长驱直入府谷境内,于15日全歼朱五美保安团。至18日,先后收复府谷县城及十里长滩、镇羌、皇甫、麻地沟、古城、哈拉寨、五字湾等地。毙150余名,俘营长以下430余名,缴获迫击炮2门、轻炮10门,轻机枪14挺、长短枪366支,子弹2.76万发、迫击炮弹120余发、轻炮弹580余发、手榴弹500余颗,战马21匹、骡子4匹,电话机4部、马达1部、望远镜1副及其它物资。至此,府谷县全境解放。

第三节 和平解放榆林县国统区

一、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在榆林起义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与驻榆国民党上层人士建立了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统战关系。

1946年10月,横山起义成功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及时讨论了对驻榆国民党军开展统战工作的必要性和各种有利因素。11月至12月,派罗明协助刘绍庭,利用亲戚、朋友、乡党、同学等关系三进榆林城,与邓宝珊、左协中面谈。具体了解到,邓宝珊有起义之心,无起义之力;左协中有起义之心,无起义之胆;张采芹(八十六师副师长、城防司令)有起义之胆,无起义之门;徐之佳(八十六师师长,蒋嫡系军统特务)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等情况。同时,派罗明、刘绍庭与邓、左的代表张旨展,在米家园子、鱼河峁

会谈,均因二十二军要求共产党放回起义官兵,退出榆横新区等无理要求而未有进展。

1947年解放军两攻榆林后,二十二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邓、左重新与共产党接触。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加速和平解放榆林进程,撤销中共榆横特委,成立中共榆林工委,重建榆林军分区。采用军事围困、统战促和的策略,专做二十二军的转化工作。

榆林军分区为了贯彻落实西北局的部署,从1948年5月到1949年春,派所属第三十九团先后进行了耳林滩、三卜树、忽惊兔、三岔湾、尤家岭、野目盖、十八墩等多次战斗,解放了榆林城以南刘千河、古塔、刘官寨、余新庄等地,迫使驻榆国民党军龟缩榆林城。第三十九团和新编第四十团、伊克昭盟骑兵团,在地方游击队、武工队配合下,围困了榆林城。同时,伊盟、三边军分区合作,铲除了流窜陕、宁、绥交界地带祸害百姓的张廷芝、高怀雄、马甫、周玉清、郭振华、王二娃、鲁仰尼等反动自卫团和土匪,发动群众建立了人民政权。1949年3月,围城解放军对榆林城东南的炭窑和飞机场实行军事封锁,中断了二十二军惟一的军饷来源。从军事、经济上构成双重压力,使其陷入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在进行军事围困的同时,中共榆林工委从各方面加强了统战工作。积极发展壮大城内地下党组织,在二十二军官兵中发展党员,接通了汤昭武(大革命时期入党,1938年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荐任邓宝珊晋陕绥边区总部秘书)的组织关系,接收李文正入党,建立起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利用关系秘密活动,争取了二十二军军

部的程蔚青、赵德义和无线电排、电台、有线电总机班的官兵，建立了地下情报通讯队伍，冒着生命危险用军事密码把重要情报发往延安，使上级党组织能及时洞悉二十二军的一切军事行动。

榆林工委还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的情报队伍。城内城外情报组织密切配合，加强了宣传、情报转送、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8年12月，榆林工委遵照西北局的指示，为了制止二十二军北逃，争取该军就地起义，发动群众开展榆林和平促进运动。在地下党员周济信、汤昭武、高广昌的领导下，由李文正、张文炳负责，公开成立了“榆林和平促进会”。成员有曹鸿义、武震九、郭季宁、尤德、黄义君等，这些人经常深入街头巷尾居民家户，传播解放军在全国大捷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解和平解放榆林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阻挡的大潮流。散发、张贴《告榆林同胞书》、《促进榆林和平解放宣言》，发动群众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对拉壮丁，反对摊派军粮”等游行示威，组织了向毛泽东、党中央发致敬电的万人签名运动。次年4月，“和平促进会”组织榆林师范、榆林中学、榆林职业中学（旧农校）学生代表团，出城慰问解放军，表达了欢迎解放军早日解放榆林的愿望，受到刘长亮、吴岱峰、黄罗斌等党政军领导人的接见和热情勉励。“和平促进会”还根据榆林工委的指示，在邮电局、修械所、印刷厂、职中等单位秘密组织护厂队、护校队、治安队，勇敢地进行了反破坏斗争。

榆林工委为了促进榆林和平解放，广泛开展“寻人运动”，“二十二军自救运动”。向驻军营地散传单，印发“解放

官兵通行证”、设立“解放官兵招待所”，对反战投诚官兵实行优待奖励政策。组织起义、被俘军官胡景铎、田子亨、郝登阁、贾世柄、李含芳、周效武等到二十二军军部现身说劝。特别是现身说劝人员讲到伊盟乌审旗国民党军司令奇玉山及其妻子儿女，被解放军三擒三纵的事实，使二十二军官兵深感震惊。又先后策动驻三岔湾国民党别动队一个中队40人，驻金剛寺晋陕绥边区总部特务营侦察连副排长旦云章率部80人，总部留榆机关团孔芳亭、郑义厚、苗洛山、甄载明等50多名官兵，到三岔湾起义。统战促和工作，有力地动摇、削弱了驻榆军心，推动了和平谈判的进程。同时，升任华北“剿匪”副总司令的邓宝珊受傅作义之命，已电令二十二军的二二八师、军直的骑兵团、炮兵营、骆驼队陆续开往绥西，在榆林协防的马鸿逵第二纵队两个团、胡宗南的八十三旅也迫于自顾不暇调离榆林。二十二军仅剩军部及下属的八十六师，共4500余人。且外无援兵，内无粮秣，孤军守孤城，处境岌岌可危。

在此榆林守军内外交困之际，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西野副司令员赵寿山、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先后致函邓宝珊和左协中，说明起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劝告他们早日举义完成大业。但左协中等人却坐观动态，不置可否。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2月21日邓给左通电：榆林问题已与中共中央交谈过，着转你们加强保卫地方，听候安排。然而因二十二军主要负责人意见分歧，徐之佳坚决反对，起义之事议而未决。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继续采取力争和平解放的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争取其上层开明人物，孤立打击少数死心踏地的反革命

分子,影响教育下层官兵。同时,继续围城。同月,罗明与李含芳第三次到二十二军军部,在地下党的积极配合下酝酿举义大事,终因上层意见莫衷一是,“二月起义”流产。

4月上旬,中共榆林工委、榆林地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派罗明、田子亨等人四进榆林城,敦促二十二军尽快派人谈判。左协中虽然举棋不定,可是在各方的压力下,又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全国解放迫在眉睫,终于同意派人谈判。4月下旬,二十二军组成以参谋长张之因为团长,鱼勃然、张旨晟、雷无尘为团员的代表团。拟定四条谈判原则:1、起义后暂住榆林,短期训练完再调动。2、政工人员随时另派,其余人事暂维现状,必要时再调整。3、请延安立即补给粮秣。4、原榆林专署旧人员,除特工人员外,量才录用。5月2日,二十二军代表团随罗明南下镇川。中共榆林地委、工委按照西北局、西北军区的指示,力争就地谈判,二十二军代表团却执意要在延安谈判。5月5日,朱侠夫、罗明与二十二军代表团同赴延安。6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接见了二十二军代表团,对他们屡失良机表示惋惜,希望这次能够解决问题。西北局组成以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为团长,西北局副秘书长曹力如为副团长,李启民、朱侠夫、罗明为团员的代表团,遵循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草案》条款精神,于10日同二十二军代表团正式开始会谈。双方在基本原则上一致看法。15日,左协中突然电告张之因停止谈判,即日返榆。17日,左又复电张之因令其继续谈判。由于左的反复,双方代表团商定经西北局同意,同往榆林继续谈判。5月22日,途经镇川。曹力如召开解放军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传达

了西北局、西北军区和平解放榆林的意图；加强城外围攻，促进城内和谈。

5月24日，参加太原战役后的西北军区警二旅回师镇川，28日，与榆林前线部队在城外战壕里会师。围城的解放军已达8000余人。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第二轮谈判揭开了序幕。

5月27日，以曹力如、朱侠夫、张汉武、罗明、石达康、田子亨为代表的西北军区代表团和以左协中、张之因、高凌云、张博学、鱼勃然、黄镇威为代表的二十二军代表团，在榆林城正式开始谈判。双方代表围绕起义的名义、八十六师师长人选、城防归属、协议书及宣言中的措词等中心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5月29日，达成了《榆林局部和谈协议》，曹力如、左协中在协议书上签字。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二十二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榆林县国统区全境解放。

14日，左协中、张之因、张博学、高凌云、黄镇威、黄正谊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和全国各界，宣布国民党二十二军接受和平改编。7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嘉勉起义官兵。

二、榆林市制的设立

榆林城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设置榆林市市制。边区政府命令，榆林城及城周围南至三岔湾、北至牛家梁、东起杭庄色草湾、西至尤家砦为榆林市行政区域。辖北部、南部、城内、东南、西南、东北、西北6个区。城内23条街道辖321个居民小组，城外划设19

共佳县县委、佳县人民政府分别下辖4个区、83个乡(镇)党委和政府。

1949年5月2日至7日,中共吴堡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宋家川召开,出席会议代表64名,代表全县1600名党员,选出县委委员11名,慕生桂(与1936年组建中共三边特委时的慕生桂是同名同姓)当选书记。王锦荣任县长。中共吴堡县委、吴堡县人民政府分别下辖4个区、29个乡(镇)党委和政府。

1949年4月20日至27日,中共清涧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大会代表61名,代表全县3716名党员,选出县委委员11名,李笃信当选书记,白云腾任县长。中共清涧县委、清涧县人民政府分别下辖10个区、46个乡(镇)党委和政府。

1949年4月28日至5月2日,中共子洲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双湖峪召开,参加大会代表40名,代表全县1750名党员,选出县委委员9名,王生源当选书记,刘直卿任县长。中共子洲县委、子洲县人民政府分别下辖10个区、62个乡(镇)党委和政府。

三、三边分区

三边分区辖定边、靖边、安边、吴旗、盐池5县,全分区设33个区(市)、190个乡(镇),4922个自然村。

中共三边地委朱敏任书记,贾怀济任副书记。

三边分区专员公署吴志渊任专员,陈思恭任副专员。

三边军分区下辖第二八团和骑兵团,曹又参任司令员,朱敏兼任政委,牛化东任副司令员,孙润华任副政委。

1949年4月21日至27日,中共定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张峡峡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6名,代表全县830名党员,选出县委委员11名,郝玉山当选书记。丁子齐任县长。中共定边县委、定边县人民政府分别下辖8个区、46个乡(镇)党委和政府。

1949年4月19日至25日,中共靖边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小河畔村召开,参加大会代表54名,代表全县1206名党员。选出县委委员11名,郝志伟当选书记。李克忠任县长。中共靖边县委、靖边县人民政府分别下属8个区、49个乡(镇)党委、政府。

中共安边县委、安边县人民政府分别下属6个区、34个乡(镇)党委和政府。李子奇任县委书记,刘汉鼎任县长。

四、榆林分区

榆林分区辖神木、神府、府谷、榆林、横山5县和榆林市。全分区设40个区(市)、246个乡(镇),有4007个自然村。

中共榆林地委朱侠夫任书记,李子川任副书记。

榆林分区专员公署朱侠夫兼任专员,赵希贤任副专员。

榆林军分区辖第三十九团、神府支队。司令员吴岱峰,政委刘长亮,副司令员王心瑛。

中共神木县委、神木县政府分别下属14个区(市)、34个乡(镇)党委和政府。李子川任县委书记,李子科任县长。

中共神府县委、神府县人民政府分别下属10个区、45个乡(镇)党委和政府。梁士堂任县委书记,刘朝功任县长。

中共府谷县委、府谷县人民政府分别下属 8 个区、24 个乡(镇)党委和政府。杨沛琛任县委书记,段复升任县长。

1949 年 4 月 17 日至 22 日,中共榆林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镇川瓦岗寨举行,出席大会代表 39 名,代表全县 707 名党员,选出县委委员 11 名,高凤山当选书记,王庆海任县长。中共榆林县委、榆林县人民政府分别下属 6 个区、49 个乡(镇)党委和政府。

1949 年 4 月,中共横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韩岔召开,出席大会代表 46 名,代表全县 842 名党员,选出县委委员 9 名,姚进贤当选书记,高俊德任县长。中共横山县县委、横山县人民政府分别下属 9 个区、44 个乡(镇)党委和政府。

第五节 恢复战争创伤 支援解放大西北

一、恢复生产

1949 年,榆林解放区各级党政组织遵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系列指示,调整和放宽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各项政策,实施一系列奖励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进一步调动和刺激了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热情。

在榆林,不论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广大群众都投入生产发家,劳动致富,恢复生产,繁荣经济的建设洪流中。各地实行农副、劳武、生产战勤三大结合,全力以赴繁荣经济。为了弥补战后劳、畜力的严重不足,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政府提倡和发展了变工、扎工小组、生产互助合作

社等劳动生产组织形式,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各种生产活动;帮助地富从事生产劳动,促其自食其力;教育和监督二流子学习改造,转向生产劳动;有针对性地发放有借有还的生产贷款等办法,发展和恢复生产。在市、镇和地少人稠的地方,贯彻执行“劳资合作,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方针,保护城乡工商业者的资产,协助他们复工复产扩大经营。加强对广大手工业者及城乡家庭副业生产的具体帮助,活跃集市贸易,疏通商品流通。因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各区、县普遍深入地掀起新的生产热潮。

1949年,陕北老区新开荒和恢复原有耕地面积99万亩,达到战前水平。植棉12.7万亩(绥德、三边分区,植棉比1948年增加17%多)。耕畜31.7万多头,比1948年增加14%多。羊子总数,比1948年增加30%。粮食产量因遭各种自然灾害侵蚀,达到战前的84%。工业方面,恢复和建立了火柴、肥皂、造纸与农具工厂,1949年的生产量超过原计划的16%。榆林城解放后接收的3个工厂,也都恢复了生产。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安定了民心,较快地医治了战争创伤,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

二、清匪肃特

榆林和平解放后,驻扎城外的反动地方武装均未受编,逃窜伊蒙。

7月下旬,俞方皋(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参谋长)等反动分子又组成了反动的二十二军军部,并由原二十二军段宝珊部编为二五六团,和协华部编为二五七团,榆林河

东、河西乡自卫队总队长高怀雄部编为二五八团，神木自卫队张世华、解生龙两个营及通格朗自卫队赵凤岐部合编为直属补训团，共4个团，骑步兵总计2500人左右。这些匪军和扎旗、萨克旗蒙军勾结，以扎旗、东胜为据点，不时向榆林、神木、神府县边境，长城以外地区进扰，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其时原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和残留隐藏在榆林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及逃亡榆林的地富分子，也蛊惑人心，造谣生事，伺机破坏。

榆林分区在建党建政建立新秩序的同时，与伊盟地区军民合作，同心协力进行了清匪肃特工作。榆林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主动向残余的匪军、国民党自卫队、地主民团发动进攻，先后剿灭了以张廷芝、高怀雄、张世华等为首的2000多名有组织的武装土匪。发动群众深挖了隐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收缴了散藏在民间的各种武器弹药。拼凑起来的“二十二军”，不久也被陕绥军民打散了。社会秩序逐步好转，社会治安日趋稳定。

三、支援前线

为了尽快解放大西北，榆林解放区人民在遭受“胡祸”天灾的困难条件下，依然焕发出战争年代那样一股热情，那样一副干劲，那样一种拼命精神，无私忘我地支援前线、支援新区，又做出新的贡献。

从1947年3月到1949年7月，榆林解放区就有2.5万多名青壮年参军，1000多名干部随军支前或支援新区工作。1948年4月，绥德分区经过土改后的4000名翻身农民，自愿组成1000副随军担架队，一万头毛驴的运输队，

支援收复延安,解放黄龙,支援解放大西北。榆林解放区参与为军队磨面、炒干粮、做军鞋的达 65 万多人,为部队带路 1 万多人。按照榆林老区可供动员的男劳力 20.95 万人、畜力 11.49 万头平均计算,同期每名男劳力服勤 195.9 天,每头畜力服勤 111.7 天。同时,交爱国公粮 666 万石,公草 5549 万斤。老区人民不仅支援了解放大西北,而且协助支援了解放大西南。1949 年和 1950 年初,为解放大西南动员民工 1700 余名,担架 840 副,驮骡 460 头。支前队伍跟随解放军南征北战,栉风沐雨,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表现了完全、彻底的革命精神。清涧、子洲、吴堡等县的担架队,荣获“随军支前模范”的光荣称号。

民兵游击队,积极支前参战大展雄风。1949 年 6 月,定边县支前民兵队长罗光廷带领的 40 余人,行至关中周至西北河湾与国民党第三十九军的溃军遭遇。罗光廷立即命令民兵占领有利地形,断其后路,沉着应战。打得溃军晕头转向,误以为遇上解放军,举手投降。缴获六〇炮 5 门,轻重机枪 30 挺、短枪 15 支、步枪 200 支,子弹 3000 发、手榴弹 80 枚、电台 1 部,俘师长 2 名、参谋长 1 名、团长 2 名、营长 4 名,士兵 200 余名。为了表彰罗光廷及其民兵英雄们的战绩,西野第一兵团二师赠奖旗一面,奖罗光廷坐骑一匹。为了答谢陕北人民的深情厚义,野战部队奖给陕北每县一面绣着“感谢陕北人民的支援”大红锦旗。

解放战争时期,榆林党组织领导解放区军民,在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土地改革,粉碎胡宗南部的进攻,战胜“胡祸”天灾,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支援解

附录一

榆林各分区书记一览表

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一览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杜 衡	男	陕西佳县	书记	1928.4—1928.10	
杨国栋	男	陕西子长	书记	1928.10—1929.4	代理
古国桢	男	陕西华县	书记	1929.10—1930.7	
赵伯平	男	陕西蓝田	书记	1930.7—1932.秋	
马明方	男	陕西米脂	书记	1932.秋—1933.7	代理
崔田夫	男	陕西绥德	书记	1933.7—1935.2	

中共神府特委、分委书记一览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杨和亭	男	陕西子长	书记	1936.1—1937.2	
张秀山	男	陕西神木	书记	1937.2—1937.9	
唐洪澄	男	陕西清涧	书记	1937.9—1937.11	
杨和亭	男	陕西子长	书记	1937.11—1938.5	
张秀山	男	陕西神木	书记	1938.5—1939.2	
武开章	男	陕西佳县	书记	1939.2—1942.2	
刘长亮	男	陕西神木	书记	1942.2—1945.2	

中共绥德特委、地委书记一览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备注
田伯英	男	陕西蓝田	地委书记	1926.6—1926.12	
蔡南轩	男	湖北黄陂	地委书记	1926.12—1927.7	
郭洪涛	男	陕西米脂	特委书记	1937.11—1938.3	兼
马明方	男	陕西米脂	特委书记	1938.3—1938.4	代理
刘澜涛	男	陕西米脂	特委书记	1938.4—1938.11	
李合邦	男	陕西清涧	特委书记	1938.11—1940.1	
张秀山	男	陕西神木	特委书记	1940.1—1941.1	
张秀山	男	陕西神木	地委书记	1941.1—1942.10	
李井泉	男	江西临川	地委书记	1942.10—1943.春	
习仲勋	男	陕西富平	地委书记	1943.春—1944.10	
李井泉	男	江西临川	地委书记	1944.10—1945.8	
白治民	男	陕西清涧	地委书记	1945.10—1947.6	
张邦英	男	陕西耀县	地委书记	1947.6—1948.6	代理
白治民	男	陕西清涧	地委书记	1948.6—1949.3	
杨和亭	男	陕西子长	地委书记	1949.3—1949.7	
杨彩霞	男	陕西子长	地委书记	1949.9—1949.10	

中共三边特委、分委、地委书记一览表

姓 名	性 别	籍 贯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谢维俊	男	湖 南	特委书记	1935.11—1935.11	第一次建立
张德生	男	陕西榆林	特委书记	1936.10—1936.11	
贾拓夫	男	陕西神木	特委书记	1936.11—1936.12	
李维汉	男	湖 南	特委书记	1936.12—1936.12	代理
罗梓铭	男	湖 南	特委书记	1937.2—1937.5	
白如冰	男	陕西清涧	特委书记	1937.10—1937.12	
白如冰	男	陕西清涧	分委书记	1938.1—1938.4	
刘英勇	男	陕西清涧	分委书记	1938.4—1939.夏	
白栋材	男	陕西清涧	分委书记	1939.夏—1940.夏	
自治民	男	陕西清涧	分委书记	1940.夏—1941.1	
高 峰	男	陕西清涧	分委书记	1942.2—1942.9	
郭炳坤	男	甘肃正宁	分委书记	1942.10—1942.12	
王世泰	男	陕西洛川	地委书记	1943.1—1945.4	
贺晋年	男	陕西子长	地委书记	1945.4—1945.6	
高 峰	男	陕西清涧	地委书记	1945.7—1947.秋	
郭炳坤	男	甘肃正宁	地委书记	1947.秋—1948.7	
朱 敏	男	陕西榆林	地委书记	1948.7—1949.9	

中共榆林特委、中共榆林地委书记一览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备注
马云程	男	陕西米脂	地委书记	1927.5—1927.7	
刘文蔚	男	陕西神木	特委书记	1946.10—1947.12	
王恩惠	男	陕西神木	特委书记	1947.9—1947.12	兼
张德生	男	陕西榆林	地委书记	1947.8—1947.12	
刘长亮	男	陕西神木	地委书记	1949.2—1949.7	
朱侠夫	男	陕西榆林	地委书记	1949.7—1949.9	

附录二

榆林籍中共中央委员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至党的十六大,榆林有 21 人任过或在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清涧县 5 人:白如冰、白栋材、赵苍璧、白恩培、王侠;子洲县 4 人:马文瑞、安子文、安志文、王扶之;榆林县 2 人:张德生、胡启立;米脂县 2 人:马明方、刘澜涛;神木县 2 人:贾拓夫、李子奇;佳县 1 人:张达志;绥德县 1 人:白纪年;靖边县 1 人:白克明;定边县 1 人:李守林;横山县 2 人:高岗、高维嵩。有 2 人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胡启立。有 1 人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

高 岗(1902—1954) 横山县人,1926 年入党。曾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北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45 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54 年 2 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不久自杀。1955 年 3 月,中国共产

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党籍。

马明方(1905—1974) 米脂县人。1925年入党。曾任米佳镇中心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38年赴苏联学习。1941年回国,路经新疆时,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拘禁。1943年被捕入狱。1945年经中共中央营救获释抵延安。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晋南工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财贸部部长。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刘澜涛(1901—1997) 米脂县人。1928年入党。曾任中共陕甘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天津市委副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顾问。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79年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

为中央委员。并在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增选为副主席兼秘书长。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安子文(1909—1980) 子洲县人。1927年入党。曾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兼管北平学委工作,中共太岳工委书记,晋冀豫省委统战部部长,太岳地委书记,太岳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党校教育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遭诬陷和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9年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贾拓夫(1912—1967) 神木县人。1928年入党。曾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共青团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兼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1933年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到中央报告工作。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随中央主力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局局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西北

局常委,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9年被错定为右派,到基层工作。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予以平反。

马文瑞(1912—2004) 子洲县人。1928年入党。曾任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陕甘边区东部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东北军工委书记,陕北西部地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书记,八路军一二〇师三八五旅和陇东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常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国家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7年、1982年在中共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达惠(1911—1992) 佳县人。1929年入党。曾任中共佳县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委员,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政治委员兼一团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七十八师政治委员,陕北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备六团政治委员,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晋绥军

区塞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陕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西北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兼甘肃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于中将军衔。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69年、1973年分别在中共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德生(1909—1965) 榆林县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汉中特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从事政治工作。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关中警备区兼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统战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李守林(1928—1992) 定边县人。1950年入党。“文化大革命”中曾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定边县小滩则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陕西省贫农协会副主任。1969年、

1973年、1977年分别在中共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高雄嵩(1916—1985) 横山县人。1933年入党。曾任共青团安定县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一团营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三十军第二六三团政委、第三六四团政委,中共陕北东地特委军事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二团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第八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晋绥野战军警备第三旅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青海省军区政治委员,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白如冰(1912—1994) 清涧县人。1928年入党。曾任绥清县委书记,横山、延川、延长县委书记,陕甘晋军区供给部部长,红军总供给部副部长,三边特委书记,绥蒙工委书记,绥远省委书记,晋绥边区党委书记,绥察边区党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山东省副省长、省长,济南军区第一政委。1973年、197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白栋材(1916—) 清涧县人。1935年入党。曾任

陕西省苏维埃主席团巡视员,陕甘宁边区党委党务委员会副书记,三边地委书记,西北党校副校长,延安中央党校五部主任,吉林省工委组织部部长,吉林省委秘书长,图门市委书记,江西南昌地委书记,江西省委第三副书记兼南昌市委书记、市长,省委副书记兼省工业部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省委常务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省长,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7年、1982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赵苍璧(1916—1993) 清涧县人。1935年入党。曾任西北保卫局巡视员,三边专区保安副司令员,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兼西南公安学院院长,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委员。1977年、1982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扶之(1923—)子洲县人,后迁居延安。1936年入党。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测绘股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通讯参谋、副连长、师通讯股长,东北民主联军营长、第一一六师作战科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副团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团长,志愿军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军参谋长、

副军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部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7年、1982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李子奇(1923—) 神木县人。1937年入党。曾任中共吴旗县委副书记，安边县委书记，安边县游击大队政治委员，青年团宁夏省工委书记，宁夏省教育厅副厅长，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经理，中共白银市委书记，甘肃省轻工业厅厅长，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书记。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胡启立(1929—) 榆林县人。1948年入党。曾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常委，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国际学生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恢复工作后，历任宁夏西吉县委副书记，固原地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2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免去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后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199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安志文(1919—) 子洲县人。1937年入党。曾任绥德地委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哈东地委副书记,嫩江省委民运部部长,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委、计委副主任,西北三线建委副主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白纪年(1926—) 绥德县人。1942年入党。曾任吴旗县政府民政科科长,青年团西北工委副秘书长、陕西省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汉中地委副书记,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白恩培(1946—) 清涧县人。1973年6月入党。曾任陕西延安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厂长,1981年任厂长、党委副书记,延安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厂长,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7年、1992年在中共第十三、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97年、2002年在中共第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白克明(1943年——)靖边县人,1967年参加工作,历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主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2002年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王侠(1954——)清涧县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4年入党。历任水利部黄河中游治理局劳动人事处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党组副书记,延安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常委。2002年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附录三

榆林籍将军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至2000年7月,授军衔的将帅中有榆林籍的军官35人,其中:中将4人,少将31人,以县籍分:佳县3人,中将张达志、阎揆要,少将贺大增;绥德县6人,中将崔田民,少将郝旺盛、崔文斌、崔军、崔世芳、白文仲;米脂县9人,中将郑守增,少将王再兴、张驾伍、刘国辅、李彬、高本宗、雷光银、姬亮洲、姬有明;吴堡县3人,少将慕生忠、冯维精、张绍增;神木县3人,少将王兆相、许培仁、高文华;清涧县1人,少将白寿康;定边县1人,少将牛化东;横山县2人,少将汪洋、高维嵩;子洲县4人,少将王扶子、安蛟驹、徐作旭、纪海亮;靖边县2人,少将高耀山、陈宝林;府谷县1人,少将郝长熙。

张达志(1911—1992) 见附录二榆林籍中共中央委员

阎揆要(1904—1994) 佳县人。1924年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第三军骑兵团营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曾在杨虎城部任警卫团副团长、团长,八路军总司令部科长、参谋处处长、军政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参谋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顾问。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贺大增(1906—1977) 佳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一团连政治指导员,红十五军团第八七一师三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二三四团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冀鲁豫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十旅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政治委员,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副政治委员,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一文化学校政治委员,海军工程学院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崔田民(1912—1991) 绥德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保卫局局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六八九团政治委员,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兼新编第二旅政治委员、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北局党校第四部主任、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铁道兵政治委员、顾问。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

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郝旺盛(1917—) 绥德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班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排长,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连政治指导员,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一团连长,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连长、副营长,第七旅特务营营长,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〇团营长,第十九团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六师四十六团副团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四十七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代军长,广州军区炮兵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崔文斌(1917—2000) 绥德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大学特务团连副政治指导员兼教员,中共陇东特委正宁县工委主任,镇远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新四军第六支队营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师十六旅三十二团政治处副主任,江苏盱眙总队副政治委员,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独立第四团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四十七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七十一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中南军区空军预科室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崔 军(1928—) 绥德县人。中共党员,1937年

至1946年,先后就读于延安保小、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1948年赴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工程专业学习。1954年毕业回国后历任电力工业部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工程师、狮子滩水电工程局主任工程师、工区副主任、紫坪铺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青铜峡水电工程局副总工程师、陕西省水电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兼工程处处长、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六十一支队副支队长、水电指挥部副参谋长、参谋长、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等职,高级工程师,少将军衔。1999年10月离休。

崔世芳(1930—) 绥德县人。1943年在延安抗小上学,1945年随部队撤离延安前往晋冀鲁豫中央分局。1947年2月参军,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绘图员、校对员。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审校员。1949年在太原军管会工作,1950年任军委作战部测绘局参谋,1954年赴越南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参加抗法援越战争,回国后任总参谋部测绘局办公室参谋,1968年任总参测绘局大地航测制印处副处长,1976年任总参测绘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2年任总参测绘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全军地理学会理事长。1988年9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白文仲(1931—) 绥德县人,1946年7月参加革命,先后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员、司令部收发员、野战医院文书、政治部民运科、联络科、保卫科干事。1947年参加过太石科遭遇战,第一、二次榆林战役中的神木、响水战斗,永坪狙击战,沙家店战役,太原战役及1949年6月解放榆林的战役。1950年9月入党。1952

年后任师部政治部保卫科干事、副科长、科长,1955年授上尉军衔,1956年晋升大尉,1960年晋升坦克兵少校。1956年任坦克第6团政治处主任,1970年2月任坦克独立一团政委。1978年后任坦克四师副政委、政委,1983年任陆军第16集团军政委,1988年2月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郑守增(1944—) 米脂县人。1962年12月入党,1963年1月参军,先后任兰州军区某集团军班长、排长、连长、团副参谋长、团参谋长、团长、师长、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1999年4月任兰州军区参谋长,10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90年6月被授予少将军衔,2000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再兴(1914—1965) 米脂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横山县委书记,陕北红军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第一团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二〇师雁北支队营政治教导员,支队政治委员。绥德保安第四团政治委员,绥中地委书记兼绥蒙军区骑兵旅政治委员,北平军事调配处执行部驻集宁小组代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绥蒙骑兵旅政治委员,陇东军分区政治委员,甘肃军区政治部主任,甘肃军区副政治委员,解放军测绘学院政治委员,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驾伍(1911—1963) 米脂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六支队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秘书,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营政治教导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指导员,第二分校大队总支书记,第二分校供给处政治委员,抗大总校

政治干部科副科长、科长,组织科副科长,东北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西满分校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大学江西分校副政治委员,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国辅(1914—1981) 米脂县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文书,红二十八军第二十八团团部统计员,八路军宋邓支队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平西第十二支队营副政治教导员、政治教导员,龙赤区队政治委员,北平军分区第十四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晋察军区第二纵队四旅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十九兵团补训师政治委员,解放军师副政治委员,第一战车编练基地政治委员,装甲兵学院干部部长,第一坦克学校副政治委员,第二坦克学校政治委员。1964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李 彬(1915—) 米脂县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二团特派员,鲁西军区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四团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一旅二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六军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川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二步兵学校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1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高本宗(1930—) 米脂县人。1946 年参加革命,曾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绥德军分区特务营、一野第四军军部任干事、秘书等职。参加了解放榆林、

沙家店、太原、兰州等战役。解放后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西北公安部队司令部、兰州军区司令部任秘书。1965年后任兰州军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司令部党委委员。1983年9月任陕西省军区参谋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离休。

雷光银(1942—) 米脂县人。1959年考入西安仪器专科学校,1961年8月响应祖国的号召,肄业入伍,1962年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4年入党。历任班长、排长、团侦察参谋、师侦察参谋、侦察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新疆军区装备部部长、军区党委常委等职,199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0年12月退休。

姬亮洲(1946—) 米脂县人。1964年12月入伍,1966年8月入党,历任宁夏军区运输队队长、司训队队长、宁夏军区机关助理员、副处长、处长、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兼党委书记、宁夏军区副司令员。2000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姬有明(1949—) 米脂县人。中共党员,1966年7月参军,历任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空军第二飞行学院学员、空军某航空测量团飞行员、中队长、大队长、团长、空军第十六飞行学院参谋长、院长(正师职)、空军第二飞行学院院长(副军职),先后荣立三等功3次,二等功1次,一等功1次,并被评为空军“十佳飞行员标兵”,1991年被授予空军首批“功勋飞行员”。2000年7月授予少将军衔。

慕生忠(1910—1994) 吴堡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红五团政治委员,红二五纵队政治委员,陕西省委委员、白区工作

部副部长,中共吴堡县委书记,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佳吴中心县委书记,延安东地区作战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参谋长、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西藏运输总队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冯维精(1919—) 吴堡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军委二局译电员,八路军总部机要员,军委二局四科机要员,一科股长,一处一科副科长,四系副主任、四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七科科长,西北军区司令部三处处长,二局局长,军委技术部一局副局长、局长,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一局局长,十局局长,三部副部长、政治委员。1961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绍增(1943—) 吴堡县人。中共党员,1962 年考入重庆第七军医大学,1968 年后在兰州军区解放军第一、二十五、六总医院任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教授、泌尿外科主任、专家组成员、第四军医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奖多项,主编或参与主编专著 11 本,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被授予少将军衔(文职)。

王兆相(1909—) 神木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六军特务队队长,神木县游击队队长,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团团长,神府独立师师长,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六团团团长,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

师长,辽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六二师师长,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军后勤学院后勤组织系副主任、主任,后勤学院高级班班主任,高级工程兵学校校长,工程兵学院副院长、院长,解放军工程兵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许培仁(1912—) 神木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神木县赤卫队大队长,红二十七军独立三团经理处处长,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十一支队政治委员,陕北独立师一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总务科科长、供给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总兵站部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分部副政治委员,解放军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海军后勤部政治委员,海军南海舰队后勤部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高文华(1945—) 神木县人。中共党员,1960年8月参加工作,任神木县三堂公社通讯员,1964年参军,在陕西军区独立师历任排长、副连长、作训参谋、副营长、副团长。1983年后历任武警陕西总队副参谋长、副总队长、总队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武警总队队长、党委副书记。1996年3月后任武警陕西总队总队长(副军职)、武警甘肃省总队总队长、党委副书记。1996年7月晋升为武警少将军衔。1998年1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共甘肃省第九、十届委员。

白寿康(1912—) 清涧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八军军部参谋,第三团连长,中共延安县军事部部长,独立营营长,独立团团长,三边军分区保安司令员,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警备第四团副团长、团长,陕甘宁边区三边警备区参谋长,延属军分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四军十二师副师长,解放军公安部队师政治委员,高级公安学校政治委员,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政治委员,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牛化东(1906—1995) 定边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在西北军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1945年参与领导该旅在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十一旅副旅长,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

汪洋(1920—) 横山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副排长、宣传干事、副连长、旅作战参谋,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一支队独立二团团长,第一支队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参谋长,东北军区警卫师师长,志愿军师长、军参谋长,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高维嵩、王扶之 见附录二榆林籍中共中央委员

安蛟驹(1936—) 子洲县人。1956年入党,1959

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公安部工作,历任办事员、科长。1983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后,历任武警部队司令部内卫处副处长、处长、副参谋长、武警部队副司令员。1993年被授予武警少将军衔。1996年4月退休。

徐作旭(1941—) 子洲县人。中共党员。1959年1月参军,历任青海玉树骑兵一支队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玉树骑兵支队副政治指导员,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监察科干事、副科长、科长,兰州军区纪委办公室正团职干事、副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二十七分部政委、党委书记,青海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省军区副政委等职。1993年8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纪海亮(1946—) 子洲县人。1963年入伍,1965年入党。历任兰州军区驻甘肃某炮兵部队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团机关干事、政治处副主任,兰州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员、处长、副检察长,兰州军区老干部工作局局长、群众工作部部长,兰州军区驻河西走廊某师政委、宁夏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被授予少将军衔。

高耀山(1931—) 靖边县人。194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3月参军,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蒙汉骑兵支队通信员、内蒙古军区伊克昭盟军分区政治部保卫干事、三支队连政治指导员、绥蒙军区后方总医院连政治指导员、兰州军区独立骑兵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团司令部军务股长、青海省军区果洛骑兵支队副参谋长、兰州军区骑兵二师七团参谋长、甘肃省军区骑兵团团长、甘南军分区副参谋长、酒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边防团团长、酒泉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副司

令员、省军区专职纪委书记等职,1988年8月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离休。

陈宝林(1946—) 靖边县人,1965年入伍,在西藏军区第52师157团8连服役,参加了中印边境乃堆山口守卫战,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7年入党,任成都军区张国华司令员的保卫干事,后任50军侦察连副连长。1972年后历任师侦察参谋、侦察科副科长,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1979年后历任副团长、师部参谋长、团长、副师长,1988年在国防大学深造,1990年任四川省涪陵军分区司令员,被四川省委树为“人民公仆”。1997年任重庆警备区参谋长。2003年7月任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授予少将军衔。

郝长熙(1932—) 府谷县人。1948年4月入伍,同年入党,历任西北军区警二旅四团三营八连战士、东北军区坦克师摩托化步兵团二营四连排长、副连长、第十预备学校学员兼区队长、桂林步校学员兼区队长、战术教员助理员、校务管理科副科长、四十三军后勤部运输处副处长、处长、政治处主任、军械处处长、一二七师后勤部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三十三分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总后勤部基地指挥部参谋长等职。1988年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离休。

后 记

《中共榆林历史》是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自编自审的党史研究丛书。

2001年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编写《中共榆林历史》。6月,正式成立编写组。赵旭东撰写第一、五章;薛生德撰写第二章;钟自鸣撰写第三、四、七章;陈世蒙撰写第六章;李永清撰写第八、九、十章;乔兴继撰写第十一、十二、十三章;钟自鸣撰写榆林籍中共中央委员和榆林各个时期书记一览表;郝世平、王洲、常银山提供了榆林籍将军资料,任强设计封面。

2002年春,《中共榆林历史》初稿写出后,任德存、白泽生、郭向军、钟自鸣进行审稿,并特邀贾自新、乔兴继对书稿作全面审改;钟自鸣统稿,李涛、任德存对全部书稿作最后审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对该书史实作了反复细致的核实订正,对文字进行了锤炼修改,有的章节做了较大的改动。根据该书体例,增删了部分章节,调整了先后次序,补充了新的内容。最后,全书为4编13章55节。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市委领导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榆阳、府谷、神木、定边、靖边、横山、佳县、吴堡、米脂、绥德、清涧、子洲等县委史志办积极提供资料,给予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初次编写此类研究丛书,受掌握材料和编写者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2004年10月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榆林历史/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24-06867-5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史料—榆林市 IV. D235.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5980 号

责任编辑:刘景巍

封面设计:任 强

书 名:中共榆林历史

主 编:任德存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32 开 13 印张 4 插页

字 数:244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7-224-06867-5/D·1071

定 价:38.00 元
